日本侵华内幕



〔日〕重光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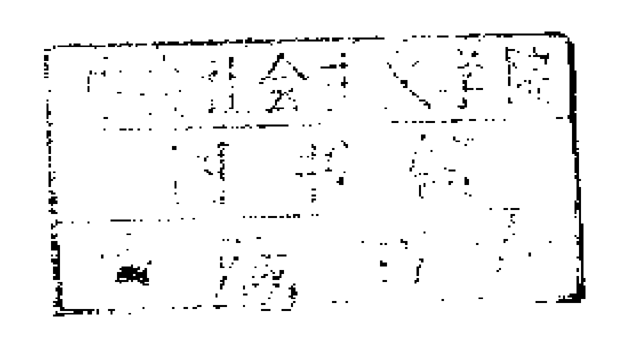
齐福霖 李松林
张 [illegible] 郑桂芳 译

解放军出版社

日本侵华内幕

〔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张　颖　史桂芳　译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七月·北京

重光葵著作集1——昭和の动乱

根据重光葵著作集一原书房株式会社1978年版译出

日本侵华内幕

〔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张颖 史桂芳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4印张30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

统一书号：10185·181 定价3.20元

译 序

本书根据重光葵著的《昭和的动乱》一书译出。书中主要记载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过程及历史事实。

重光葵在巢鸭监狱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的两年时间内，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和狱中其他战犯如东条英机等的谈话写成此书的初稿；一九五〇年底出狱后又用了一年时间，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及记录，并向老资格外交界人士调查核实，于一九五二年三月最后完成。书中援引了大量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重光葵在《序》中说："在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是笔者从未知晓的，又有很多是属于因事件的发展过去未能充分了解、听到后才初次弄清的。在整个动乱中，多少在内外负有责任地位的笔者尚且如此，何况许多无直接关系的人们，对多年来的内外各种事件的发展一定有不少不明白之处。"通观全书内容，这确是一部日本侵华的秘史，所以我们的译名定为《日本侵华内幕》。该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日文版出版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出版。我国目前还没有该书的全译本。这次将全书翻译出版，一定可以为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侵华史的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该书涉及了日本战败前中日关系史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田中奏折、"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芦沟桥事变、全面的中日战争、汪伪政权、日本的诱降活动、日本对华新政策及“八·一五”投降前后等等；对每一个重大事件均做了详尽地论述，并介绍了当时日本统治阶级的内幕。

重光葵从事外交活动达三十年之久，是日本外交界的重要官员。从一九二五年任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起，有长达十年之久任驻中国的外交官，因此也是日本战前侵华时在外交方面的关键人物；一九四五年以外务大臣资格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一九四七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七年徒刑，但不到三年即被释放，一九五七年死去。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所限，所以书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并有为日本裕仁天皇、日本政府及自己开脱罪责和辩解之处。如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日本自身的自卫、日本政府反对军部向华北扩张势力、对华新政策的目的是日中两国共存共荣等等，望读者注意分析鉴别。原著还把“九·一八”事变称为“满洲事变”等，为存原貌，译文未加更动。

本书第一至三章由齐福霖译，第四至六章由张颖译，第七至八章第六节由史桂芳译，第八章第七节至第十章由李松林译；全书译文统由齐福霖校订。

译　者

一九八七年一月

著 者 序

昭和二十余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在日本历史上是对内对外的一场大动乱，同时因战败也使它成了日本开国以来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仍在继续进行中。

昭和的动乱大多数始终与中国问题有关系。笔者在满洲事变爆发时，身为驻华公使，战时又一度任驻南京大使，具有在中国代表日本的地位。满洲事变后，大约三年时间在中央任外务次官；后来于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至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驻在世界动乱的中心地苏联；其后直至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复以大使身份驻在西欧中心地英国；日本参加世界大战后，战争期间有两年担任外务大臣，因此有许多方便条件来观察世界动向。

战败后，笔者受到联合国东京军事法庭审判，凡两年有半。在此期间，得到了许多机会听取检察官提出众多材料与辩护律师的反驳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是笔者从未知晓的，又有很多是属于因事件的发展过去未能充分了解、听到后才初次弄清的。在整个动乱中，多少在内外负有责任地位的笔者尚且如此，何况许多无直接关系的人们，对多年来的内外各种事件的发展一定有不少不明白之处。因此，尽可能以客观的态度整理两年半期间所反复接触的资料，我相信不仅仅是笔者个人有兴趣的事。总之，昭和的动乱是日本史无前例的事件。我认为凡是日本人都应仔细研究，为着重建将来的国家，对包含许多情况的资

料应自己加以反省。本书所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因过去地位关系所知道的，以及审判中每次记录下来的，还有笔者所记忆的；此外，也包括在四年牢狱生活中，从与过去指导日本直接有关的人们的言谈中听到的宝贵资料。

对昭和动乱的责任加以正当的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这需要将来相当的时间，由博识的历史学家去研究。笔者当然决不是试图在本书中做历史的评判，只不过尽负责当局之一员的义务，将本人所相信正确的加以若干观察提供出来，作为历史资料而已。

东京军事审判当然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单方面的而且是敌我关系上的军事审判，是以日本为侵略的国际性的犯罪事实为前提举行的。多数法官的判定对这个前提予以确认，但也有少数法官，除菲律宾法官的判定外，所判定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印度法官波尔的判定，全面地反对多数法官的判定，认为日本的行动不应由军事法庭来审判。东京审判的本身，世界上大致已有了定评。然而，历史研究家不仅应研究多数判定，而且不要忽略少数的判定；还有对于审判资料，对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方面提出的资料，连同法庭受理的或未受理的资料，都必须慎重地加以研究。

昭和动乱的由来、经过，以及对日本将来的影响，我认为越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对日本民族的将来越是有益的。

重光葵

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年）

三月一日写于巢鸭监狱



作者董光葵（1952年）

目　　次

第一章 满洲事变

一 天剑党

裁军风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建立了国际联盟(一九二〇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消灭战争而战，其结果所产生的国际联盟就是力图永久确保世界和平的一个国际机构。因此，国际联盟准备限制作为战争工具的各国军备，以消灭国际纠纷的因素。限制军备问题成了战后国际联盟面临的最大问题。旧敌的德国差不多被禁止存在作战力量，所以当时一般舆论认为要想维护和平，战胜国自身也必须平衡地限制军备。

为处理东亚及太平洋问题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也根据上述的观点达成了协议，规定美、英、日三大海军国的主力舰比例为五:五:三，同时限制西太平洋方面的防务，订立了海军条约(一九二二年)。空军在当时尚未具有显著的意义。海军唯一的攻击力是主力舰，所以限制主力舰就是限制海军军力。在这个武力背景下，决定了政治问题，终于订立了太平洋四国公约与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及其决议；同时取消了英日同盟，并且以善意来对待中国方面的要求。

为了要消灭战争，在巴黎签订了禁止以战争作为实现

政策的工具的条约(一九二八年八月)。这就是凯洛公约，又称之为非战公约。这都是基于尊重现存条约的观点，企图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华盛顿会议之后，国际联盟更进而开始解决包括陆军的军备限制问题。战后欧洲国际问题的焦点，也还是限制军备问题。法国担心德国的复兴，因此站在相当困难的立场上，致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蒙受了无可挽救的打击。一个国家为自卫而保有必需的防卫力，这无论在国内或国际观点上，都应看作必要的；但是在当时企图过分地限制军备已成为一种当然的趋势。而这种限制军备潮流，不幸地多少又被不切实际的世界和平运动所煽动。当时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沉浸于和平与安逸的气氛中。

当然应该承认限制军备的观点是对的。拥有超过必要的军备，从政策上看不但是愚笨的，而且是危险的。在日本，随着海军军备的限制，陆军也在继田中大将之后的山梨及宇垣陆相的主持下，依据政党内阁的期望，陆续限制陆军军备。由于轻浮俗论的流行，限制军备的气氛立即引起了一般轻视军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一般不愿意限制军备的军人，对先辈也发生了感情上的激变，其结果对政党产生了极坏的恶感。

财阀的跋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因英日同盟之谊参战，日本军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胶州湾，对欧洲方面向地中海派遣有力的驱逐舰队，以防卫印度洋的运输线；同时日本增加生产力，给同盟国以经济援助。但是，这种经济援助促使了日本的商业势力向海外扩张，也意味着日本对外贸易的急速扩张。当时日本只知有自由贸易而不知统制经济的意义，将刚刚发展的轻工业产品无

限制地输出到世界市场上，因此种下了战后抵制日货的种子。总之，因这种战争繁荣而致富的，不只是明治以来的政治商人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而且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大小商人也迅速地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因此，战后的日本，出现了暴发户泛滥的时代。战时获得的财富虽有一半因后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与东京大地震而失掉，但大多数的大小新旧财阀仍能保持其繁荣并施展着新兴资本家旁若无人的骄横态度。这种暴发户的风潮，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给社会带来了难以名状的坏影响，国民道德低落，风俗糜烂，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到处横行，因此金权势力理所当然地立即左右了政治。

派阀政治　明治时代的藩阀政治经过民主政体的逐渐改革，到了大正以后演变成政党政治。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潮已很明显，但是日本社会的机构大多数仍未能挣脱旧的桎梏。在明治维新时代，封建制度托庇于贵族的特权而保留下来，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脱离不了派阀的或者感情用事的习惯，而不能依照意志合理地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主政体取得胜利，世界各地都在讴歌民主政体。而日本只吸收了民主政体的糟粕，当时得势的政党政治，只是追逐社会生活潮流并走到不自觉不负责的路上去了。应该作为国民代表的政党只是斤斤计较党的利益，经常把国家的利益摆在次要位置上。更有不仅为了政治资助而向新旧财阀低头，而且利用这些资金来培养政治家的个人势力。经济界的繁荣并不是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结果，而是和当时政权相勾结的财阀势力扩张的结果。大小财阀靠着国家与国民的协力而发达起来，又和政党勾结操纵了金融，致使巨大的财富很少使用于一般公共事业

上，而是大部分耗费在私生活方面，或用在博取政治上、社会上的声望以及扩展自己的势力方面。遍及全国的拜金风潮，终于波及到政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贫富的悬殊更恶化了思想问题，农村处于极度的贫困。至此，滥用财富的弊病急速地表现出来。政友、民政两个日本大政党不但不能担负民主政体的领导责任，反而由于它们与金权势力的关系，终于变成了政治腐败颓废的主要原因。

日本人的自大心理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俨然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在世界和平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就是从对日本国家的将来发展、日本人自身的进步方面考虑，也不该忘记明治以来辛辛苦苦的努力，而是更应充分认识本身的地位与责任的重大。只有常常反省和继续努力，才能完成这繁重的任务。然而，日本的国家与国民听任拜金潮流泛滥，徒有其表而无内容与实力。日本地位的跃进只能靠日本国家与个人谦虚的态度与努力，才能有大的成就的——这个极容易明白的道理也完全忘记了。这是袭入了一股非日本化的、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浊流，只顾眼前的利益、缺乏正确认识个人及国家的久安与理想所致的。这就是昭和动乱的原因，也是在这动乱中所看到的不幸现象。

对军人的蔑视　军阀作为日本藩阀势力的延续在日本政治上社会上已经构成了传统的一大势力。随着自由民主风气的盛行，政党想打倒军阀，而军阀也起而对抗并防止其势力的衰退。战后轻视军人的风气立即在军部以外的人们中蔓延。政党长期受军部横暴欺压，想乘机削减占国民负担大部分的军事费，借以推倒军部的势力，其首领们也

会在议会上公然诽谤军部。一般国民起来剥夺军人的特权，这是过去不敢做的事。他们这样蔑视军人，自以为就可以呼吸到自由阔达的空气了。多年来阀族军人蛮横所激起的狭隘复仇心也在起作用。这是由封建时代经过藩阀刚踏进资本主义时代，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国民情感的暴露，也是政治及政治势力脱离一般国民及舆论的现象。军部自认为是特权阶级，立志继承藩阀势力；而政党也无视国民的委托，埋头于扩张私人势力与利益。两者都沿袭藩阀时代的作风，缺乏自己是国家及国民的一部分的共同观点，更缺乏自己负责处事的责任感。

军人到处受到轻视与侮辱，军人乘电车也被认为是不应该的。例如，当着军人乘客的面前，起劲地谈着"军人为什么要坐电车"。军人的长剑也被乘客认作讨厌的东西。而军部反对这种轻视军人的风气的做法，也相当恶劣。军队中不论任何阶级，大部分是农村的子弟。农村是形成军队的背景。农村因城市的繁荣与腐败而疲惫衰落，从而危及军阀的基础，于是军人提出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军人的愤慨　军队直属于天皇，一旦有紧急情况，军人有以死卫国的责任与义务。军人是维护国家的，而且认为是发展国家的力量。而这种纯粹忠心构成建国基础的军人被人轻蔑的空气，是由于政党的专横与金权势力的跋扈而产生的。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堕落的直接原因。这种风潮的流行，领导日本的上层人士是有责任的。因此，逐渐在狭隘的军人中充满了一种反动的思想：必须铲除这种腐败分子才能医治国家的疾病，诛戮国贼为什么要踌躇呢？在参谋本部、陆军省以及地方军队中，有不少的上级及中坚将校也鼓吹这种思想，士官

学校的学生与青年将校都兴奋起来了。

血气方刚的青年将校认为，古时大化新政就是由中大兄皇子天剑一挥，在殿中诛杀了苏我入鹿而得到实现的。为实现昭和新政，使用非常手段为什么要踌躇呢？这才是忠君爱国的至诚，杀身救国的时机。因此他们之间相互以诛戮国贼、革新国政为目的，纠合同志，从东京向全国各地军队发出檄文。各师团与镇守府的青年将校以血书来参加盟约，宣誓挺身为国家革新献出自己的生命。青年将校这种以直接行动为目的组织的秘密结社，自称为天剑党。

昭和时代的革新思想，还本着复古主义，依照一千三百年前的历史时期的习俗，以暗杀作为手段，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青年将校　天剑党中的青年将校，都是年青的尉官、见习官以及士官学校的学生，也都是具有单纯救国精神的青年。同时把所有精通军务的年青的优秀将校也吸收进来。他们既然有舍身的觉悟，许多人连对于结婚成家的日本传统也置之不顾。他们的主张和决心是：“日本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要断然革新把它挽救出来，为此我们先要牺牲自己。”

军队首脑部虽对这种趋势表示忧虑，但只是阻止他们进一步的行动，而再没有积极的措施。不但如此，军部当局反而善意地或恶意地利用以青年将校为中心的军队内部的形势，作为帮助军部跋扈的推动力。

这些青年将校的目的始终是以直接行动铲除国家的病根，是单纯的破坏活动，而他们作为革新的急先锋则打开了革新的道路，至于破坏后的建设，他们没有什么计划方案，也没有那种力量。建设方案只有等待外部提供。他们

准备委托他们信赖的前辈来实行建设事业。事实上军部中的中坚将校是利用了这种形势，制订军部独特的计划而付之实现的。

当然，军部以外的各行业的右翼或左翼团体以及浪人，也对这些青年将校或支持或操纵，进而予以煽动。

北一辉 对天剑党的活动提供思想基础最有力的人是北一辉。他生来就是革新者，也是阴险计划的实行家。他年青时曾漫游中国，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从他的《中国革命外史》及其它著作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情况。

北一辉在中国最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是国民党的左翼革命家宋教仁。直到宋被袁世凯暗杀为止，他们两人一直共同活动。因此，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革新计划站在怎样的基础上，是可以设想到的。他的最终目的虽然不清楚，但可以知道他的计划是完全混合了左右思想而编造出来的。

北一辉写的关于国家改造的著作，无疑地已成了天剑党的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他对青年将校的控制，在后来发生的“二·二六”叛乱事变（一九三六年）中表现得最明显。

二 三月事件

思想反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思想界很长时期在极右与极左之间激烈地摇摆着。思想虽在激烈地动荡，而政治社会机构却依然保持旧态，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这表示日本政治上的领导，没有随着大战后的国际形

势而进展。

战后，自由民主思想旺盛的时候，在思想自由制度之下，苏联革命思想传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也流行起来。从日苏开始邦交（一九二五年）前后，特别在东京大地震时期，日本共产党也在各地成立组织，共产势力日益壮大。

对共产势力的反动，成了山本地震内阁垮台的原因。从难波大助在虎之门狙击元首事件起，国粹思想逐渐激烈并突然抬头，因之左、右两派思想的暗斗持续了很长时期。在这时，平沼男爵领导的国本社也宣告成立。

在这思想混乱的时期，日本不仅没有能出现一位善于领导思想的人物，来很好地顺应世界大势和文明的潮流，而且连尊重条理的合理主义也加以排斥。一般人只在迷混之中无自省无深虑地追求着新奇，而陷入由极端走到极端的状态。日本陷入这种政治上、社会上，以及思想上的混乱，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弊病以及被浮浅的宣传煽动而呐喊革新所致。国粹派攻击左派，而分不清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他们认为皇室是绝对的存在，对天皇的忠诚当然关系到国家的存立，连对这方面进行议论也被认为是“危险思想”，是违背国民义务。思想自由在这一点上已是危险的，主张排斥自由主义的中道论认为革新首先必须从排斥自由主义开始。

共产主义运动是以彻底破坏国家机构来完成革命的；而盲目反动的国粹运动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运动而形成的，结果仍是采用同样的手段，逐渐压迫自由主义中道论者，以至领导了缺乏政治训练的国民。

日本也有封建锁国时代，由于外界势力的压迫才进入了开国进取的时代，同时因自由思想制度，匆忙输入了个

人自由主义，又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消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被卷进资本主义潮流中去，没有充分时间来取得民主主义的训练，因此没有办法以各自坚实的判断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强大舆论力量作为背景进行活动。舆论只是为强硬论喝采而排斥稳健论，因此自然造成了动乱的祸根。

革新运动 明治维新以来，迄今已有七八十年，经过大半世纪，日本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演变，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昭和革新的风潮。不论大化新政还是明治维新，实际上都是受当时的世界大势所支配。只有顺应人类文化的进步，日本才能前进。所谓革新，就是使长久停滞在孤岛的文化，与外界大范围的世界文化接触而获得解放，并努力迅速追上世界的水准。日本的实情及地位，和世界大势要求相差太远时，日本将发生命运性变化，这可以肯定地说是自然的趋势。

在大正、昭和年代，当时的日本人要想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文化大势究竟走向何方，是非常困难的。那时的世界形势是极为复杂的。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尽管世界大势很明显地走向民主主义的自由民主方向，但因为日本不信任自由主义，而错误地做出了判断，以致使当时的革新运动走向歧途。

当时的世界可分为民主政体与全面独裁两种，或可再将后者分为共产主义世界与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这就有三个世界。日本的革新思想没有以强有力的步伐走向中道的民主政体，反而带着集权主义的德国军国主义的色彩，选择回到旧时代的方向。这是昭和动乱的根源，在出发点上已经发生了时代性的错误。

如丘吉尔所说，纳粹是共产党所生的畸形儿，那么做

昭和革新梦的日本军部，也应该说是纳粹和封建派阀所生的杂种。

大川周明 有识之士感到昭和革新的必要，开始研究如何使日本进行革新。在这个时期，宫内省有关方面一度曾设立大学寮，也招聘民间思想家进行演讲。儒教方面由中道主义的安冈正笃担任，一般思想方面则由大川周明博士担任，国际历史方面由满川龟太郎，军事方面由大川博士推荐的西田税(因参加"二·二六"事变处死)等担任。大学寮虽不久中途停止，但大川周明已和军部合作，组织了大行会，志在实行革新，而该会成了以军部为中心的对内对外革新运动的原动力。

大川博士曾多年担任满铁调查部的主持人，从事内外各种问题的调查，以思想家的身份写了许多著作。从他的著作可知，他的出发点开始于左翼思想，后转变到国粹主义，最后主张依靠军部进行集权主义的国家革新。但是，他的做法与北一辉的做法，在旨趣上有所不同。北一辉是以掌握单纯的青年将校，用直接暗杀行动来铲除与革新有害的人物，然后拥立可信的适当人物以达成目的；而大川周明是与掌握军部实权的中坚将校及首脑部联系，推动他们断然实行以军部为主体的"政变"，立即组织军政府，对内对外实行纳粹式的革新。推动中坚将校，以军部的政变对日本的内外进行革新运动，这也是本书所谓的昭和动乱的主体。如前所述，把中坚将校或上级将校当作傀儡，完全无视其权威，因而形成了下克上的风气。

"政变"的实体 当时在陆军省，陆相为宇垣大将，次官为杉山中将，军务局长为小矶中将；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为金谷大将，次长为二宫中将，第二部长为建川少将。

参谋本部的中坚将校在上级将校的默认下，以研究时局为名，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叫作樱会（一九三〇年）。为刷新内外诸政，树立军部政权，着手计划“政变”。三月事件的首谋者，包括小矶军务局长、建川第二部长、重藤课长等将校，此外还有桥本欣五郎、长勇等中坚将校。桥本中佐任驻土耳其武官，目睹凯末尔的革命，对之深为羡慕，是刚回到日本的（桥本中佐的《世界再建之道》及《革新的必然性》）。这个团体的人士与大川周明等的革新团体，有密切的合作。

十月事件与樱会 他们认为，要想肃清政党及金权势力的毒素，刷新对内对外诸政，只有依靠军部，断然进行政变，解散议会，拥立宇垣大将，成立军政府。于是，大川博士经小矶军务局长的同意，用口头或文书劝告宇垣大将请其出马。

这就是所谓三月事件。其计划是：“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劳动组合法案向议会提出的当日，根据大川周明的计划，动员民间左翼及右翼分子一万人，从四面八方向议会举行示威游行，并爆炸民政党、政友会总部以及首相官邸。派了解该计划的干部管理各队的先锋，并布置各队成立拔刀队以排除可能发生警察队的阻止，而且使用爆炸性大而杀伤性少的炸弹。”（三月事件审判记录）在这个计划中还有动员第一师团及近卫师团包围议会迫其解散，并强制若槻内阁辞职，拥立宇垣大将为首相，以上级官担任各要职。幸亏宇垣大将没有承认这个计划，终于泄漏而归于失败。后来军部中坚将校屡次策划的建立军部政权的企图，也常与这一次同工异曲，但同样无结果。

大川周明一派与军部配合策划用政变实行革新的运

动，对内方面虽然归于失败，但对外方面却由关东军参谋在满洲实行了。这就是所谓的满洲事变。

三　满洲事变(一)

日本大陆发展政策　日本自明治以来，在内政与外交上有两个潮流。一个是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称为自由民主即民主政体的一派，后来也称为英美派。它的思想大部分浸入到宫廷、政党及民间。明治时代民主思想的始祖是福泽谕吉；而在政治方面当初是以大限信侯及板垣退助的反藩阀势力为代表的，也就是后来产生政党的起源。另一个是模仿德国的军阀政治，军部和一部分官僚在山县有朋元帅领导下，在政治上、思想上形成独立的一大军阀势力。海军方面，有山本权兵卫大将为首的长时间形成的萨摩派势力；陆军方面，有山县元帅领导的一派形成的长州派势力。海军由于仿效英国，与模仿德国的陆军不同，因此其中有不少人能理解英美的民主主义。

随着当时的潮流，明治的藩阀外交站在所谓富国强兵主义的立场上，运用了日本的发展政策。然而，日本的发展鉴于当时周围的状况，只能是向邻近地区即事实上唯有向东亚大陆发展。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之后，日本终于经过朝鲜把势力伸张到满洲。这又是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一个方法。满洲是中国领土的边境地区，俄国的势力从北伸进来，日本的势力由南向北扩张。同时，美英的扩张通商贸易的经济政策，也明显地开始重视东亚。这种形势在大正以后也大体上没有变化。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发展政策结果只能以中国为对

象。中国的排外运动乘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潮流与苏联革命的影响，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日本向大陆伸张，和中国的排外民族运动之间如何调节？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满洲问题就成了这个问题的试金石。

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保全在满洲的权益，无疑实际上成了岛国日本生存的问题。因为日本粮食不足，资源缺乏，而且在世界现势上没有移民地。如何保存在满洲的权益，这是日俄战争以后历届内阁烦恼的问题。

满洲是人口稀少而又未开发的中国边疆。日本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权益，有旅大的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经过逐次开发，每年有将近百万人从中国本土来到这里，而且其中大部分在此定居。满洲因为是中国的领土，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中国的政治力量也增强起来，终于要排除外国权益，自己来经营满洲，于是就和日本发生了利害冲突。

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的租借地。它同其它的中国租借地一样，有九十九年的租期。但是日本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在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这个期限已剩下不多了。因此，日本希望设法延长这个期限。

加藤外相的抱负　大隈内阁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藤高明为外相。加藤由驻英大使卸任返国，就任该内阁外相之前，拜会英国外相格雷，并与之商谈有关东亚的各种问题。

这次谈话也偶尔触及到满洲问题。加藤大使谈到旅大租借地期限问题时，强调日本在满洲权益的重要性，并且说："日本已经在该地建设了永久设备，广植树林，绿油满

山。”格雷外相回答说：“日本不仅在关东州种植树林，而且种植了‘血’，所以日本重视满洲问题是必然的。”表示了对延长关东州租借期限问题的谅解。因此，加藤大使回国后就寻找机会解决这一问题。

所谓二十一条问题 大隈内阁成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爆发了。日本因有英日同盟的关系，决定参加大战，开始攻击山东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加藤外相企图趁此机会解决满洲问题，遂令他伦敦时期以来的部属政务局长小池长造，编拟对此问题的草案，其结果对日本的进路造成了无可挽救的重大过失。这就是大隈、加藤政党内阁留下的难以抹掉的污点，严重地损害了政党内阁的信誉。

小池局长参照军部与同中国有关系人士的要求起草方案，加藤外相将此方案交给驻北京的日本公使，令其向中国政府提出。案中包括的事项，有关于满洲的，有关于山东的，更有关于中国本土一般的。日本不仅要求对满洲及山东的特殊权益，而且对中国本土也要想得到一种优越的地位。最严重的是对中国本土的一般要求事项，后来就仅仅作为希望事项处理，最后日本方面将其撤销了。

中国政府接到这个要求后，不但将它秘密地提示给英美驻华代表，而且也向外国记者透露，煽动了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世界舆论，从而激起了国内排日热潮。延长满洲租借期限问题虽不久已交涉成功，但中国方面对其余的山东问题、中国本土问题，特别对称之为希望事项的一般问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世界舆论对日本此次交涉也加以谴责。日本方面发出了最后通牒，尽管长时间使用高压手段，但收获不大。在交涉的问题中，日本只取得了满洲方

面极不完全的权益与若于山东问题，而一般问题不得不由日本方面撤销了。

经过这次交涉，日本信誉几乎扫地；英国外相格雷也通过驻英的井上大使，劝告加藤不应过分妄行。日本经此次交涉之所得，除在满洲及山东的若干权益外，就是暴露了对中国的野心，引起了国际对日本的不信任以及中国人民排日运动的高涨。中国问题不再是日中之间的问题，它已变为世界问题。

美国根据门户开放政策，以保全中国领土及经济上之机会均等为其政策之重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表示完全同情，对于其它国家的对华积极政策，不管其理由如何，常持反对的立场。

日本对华政策的错误 中国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觉醒，此时日本应该洞察世界大势，清算过去近视的对华政策，应该决定以日中亲善与合作作为国策。然后，日本将山东交还给中国，并请中国答允日本在满洲的要求。制订确立包括这些内容的对华政策，从当时情况看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经过二十一条交涉，尽管日本知道以武力对付中国所能得到的限度，但寺内军阀内阁却继续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政策，这是日本的政治家对世界大战的意义及后来的国际动向缺乏洞察明识的缘故。

大多数日本的领导者，只能看出问题而没有见识，不明了世界大势，也不明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如何的意义。他们只认为"中国就是中国"，头脑里仍存着历史上对中国的印象，拘泥于眼前的利害。长州派、军阀大本营的寺内内阁，成立于大限内阁之后，重演了比二十一条还要恶劣的过失，使日本的信誉更趋降低。这就是寺内内阁以

数亿元西原借款的援段（祺瑞）政策。日本援助当时得势的安福系军阀，借此取得权力，其结果引起了中国革命势力及一般中国民众的反感，排日风潮因此更无法遏止了。

满洲问题由于二十一条交涉及援段政策，没有达到任何的根本解决，问题仍然留下来了，留给田中外交及币原外交来处理。

四　满洲事变（二）

日本对华外交存在着两个流派　如前所述，在大正时期有国粹派和自由派。这就是藩阀与政党、军部与文官的对立，以致后来在外交方面，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这种对立是以田中外交与币原外交作为代表表现出来的。当然，这两个派别，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且各有混淆不清之处，而他们在思想上也有根本的差别，加上对国际形势认识的不同，因此两者在政策上的差别非常之大。币原外交代表自由主义政策，它观察整个世界形势，认为美英领导的民主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大势，因而主张应与代表民主主义的美英合作、贡献人类福利作为国策基础；而对外政策，不应采取直接行动，而须以外交手段解决。因此，对于战后国际机构的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不但予以承认，并且认为，只有在其范围内与其合作，才可以达到日本的繁荣和进步，这是合乎国家的最大利益的唯一手段。币原外交的态度，在国际间是以谈判与协议并根据谅解来行动的。因此，对华政策方面，对满洲与中国其它地区不加以区别，而且对于当地的日本侨民亦采取由当地中国当局保护的办法。

田中外交代表积极政策，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机构，仅仅是维持富有国家现状的机构。不论是国际联盟也好，华盛顿会议也好，并不能解决国际纠纷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东亚问题，尽管由于苏联革命而变得非常重要，而国际联盟对此并没有加以深刻考虑。日本应当遵守国际上的条约是当然的事，但中国的排日风潮在苏联革命后愈益激烈，日本的权益一直蒙受损害，对这种情况并没有能够想出国际上的救济方法。国际联盟等国际机构，一点也不热心积极地维护正义与公平，它只不过是维持国际间资本主义现状的英法机构而已。满洲问题是日本独有的问题，只能日本自己单独解决，并应采取自卫的积极政策。其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认为，满洲是中国之特殊地区，主张特殊处理，并且对在华日侨采取由现地日本当局保护的政策。

华盛顿会议的意义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采取的军阀的积极政策，由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而被清算了。这是原敬内阁（内田为外相）时期。多年来作为英日两国对东亚政策的柱石的英日同盟也被废止，日本重新承认了根据国际联盟条约、四国公约及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主义。根据限制海军条约，英、美、日的主力舰比例规定为五：五：三，并且禁止各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务设施。对中国方面，承认其民族的要求，各国商议给予援助使其实现。根据凡尔赛条约，日本从德国继承下来的对胶州湾特权也归还中国；并决定撤废在中国所设的邮局。然而，只有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没有涉及。

日本虽因华盛顿会议而处于被动地位，但已开始根本改变对华政策，从过去的以中国为对象的发展政策，改变

成作为日本的合作者的善邻政策。当时当局的见解认为，为了使日本强大起来，就不能与中国对立，而应该与中国合作，应建立与中国共存共荣的善邻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满洲问题的解决。否则，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日本开始认识到在东亚的使命，如果日本无阻碍地渐进式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自然可以得到东亚安定势力的领导地位了。

原敬首相被暗杀之后，继承他的日本领导者，应当用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内政与外交上强力推进这个正当的新政策，更应当设立有力的宣传机关努力进行正确指导，使国民对国际形势有深刻的认识。

对币原外交的谴责 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条约与决议，在北京举行了关税会议和法权委员会的国际会议(一九二五年)。后者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以废除治外法权为目的；前者是以中国恢复海关自主权为目的。日本代表日置大使，在这个会议的开头就提议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这表示日本政府是始终忠实地以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来行事的。在这之前，对于交还山东问题，已由小幡公使与王正廷间进行交涉，并在逐步实行(一九二二年)。

交还山东交涉及北京关税会议，是币原外交的第一步；而与币原外交有重要关系的佐分利贞男，后来当了驻华公使。

北京的国际会议(一九二五年)是在冯玉祥等左倾新军阀为基础的段祺瑞执政政府时期召开的。当时中国军阀战争不断，而且中国的革命运动开始猛进，蒋介石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段执政政府垮台，北京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

正在举行的国际会议终于虎头蛇尾而自然消失了。

在日本，军部和政友会对民政党内阁的攻击已逐渐猛烈，反对及谴责币原外交之声越来越强烈。谴责的理由是："中国内乱连续不断，从外部来挽救它到底是困难的。币原外交虽符合中国之意，但反而得到相反的结果，中国只是内乱，日本只是徒然丧失权益。"

蒋介石的国民军北伐到处胜利，也到处惹出了问题。在容共联苏的政策之下，由苏联顾问训练的军队已经赤化，蹂躏外国权益，镇压土豪劣绅。其结果，无论在汉口还是南京，都发生了大掠夺；在南京的英美军舰向中国军队开炮。南京的情况很悲惨（一九二七年二月）。但是，对日本领事馆的暴行行为当时并没有引起日本军舰开炮。荒木海军少尉负责领事馆的守备，后来感到未能完成保护而自责剖腹自杀。此时，日本舆论激昂起来，认为日本蒙受屈辱，都是币原外交的结果，于是对政府的谴责达到白热化了。反对党抨击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并主张应在当地保护侨民，必要时应断然派兵；而侨民从危险地区撤退，有失国家威信，也丧失权益。

于是，民政党内阁垮台，而出现了政友会内阁，田中大将任首相兼外相，任命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一九二七年四月）。

田中奏折　田中大将是长州派的宠儿，早年历任军部要职，从佐官（校官）时期起，已在陆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梦想当前辈的维新时代的元勋。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向西伯利亚出兵之时（一九一八年八月），他任参谋次长，以实权指挥一切。但是，他公开采取对华直接政策，是从作为政友会总裁，继民政党内阁之后自己组织内阁后开始的。

政友会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从这时起转变到军部的田中外交。

田中兼任外相时的政务次官是森恪。森恪当时是政友会中一名斗士，颇有势力。他的对华政策主张非常放纵的积极意见，和军部的极端分子联络，煽动对满洲采取强硬论。田中内阁成立不久，在大连召集与满洲有关系的军人及官宪，举行东方会议，协议并宣传对华积极政策，这也是他的主意。

东方会议前后，中国的报纸上登载了田中奏折的记事。这个有关日本最高政策的秘密文件作为田中奏折广泛地向世界宣传。田中大将关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意见作为奏折的形式被流传开了。其内容是：日本占领满洲，再由华北向东亚发动军事行动，进而征服全世界。文件用具体的事实有次序地陈述，日文很流利，只是有一些在事实上有错误。

在日本，没有人相信有这奏折的存在，只认为是一种恶意的宣传而置之不理，但在外国特别是中国，都相信这是反映日本真正企图的文件。笔者当时在外务省任职，曾广泛调查这种文件或类似的文件是否存在，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也没有找到这种文件，同时认为其内容并不是田中大将本人的意见。恐怕是日本军部里的极端分子中的某些人收藏过类似的计划，而这种不负责的意见书落到他人手里，经过改写做成奏折而用之于宣传上。总之，可以肯定地说，田中奏折是由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合作编造出来的。然而，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步骤进行的，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

田中大将与满洲问题 田中大将对满洲问题的方针，

是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并打算将满洲问题与满洲实权人物张作霖之间解决之。因此，田中大将对张作霖把野心扩展到中央在北京出头一事，并不赞同。希望张作霖由于日本的援助，只固守住东三省得到事实上的独立。这样张即可与中央分离，同日本建立特殊关系，按照日本的意见解决满洲问题了。况且张作霖自己已经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四日)宣布东三省独立。至于中国本土，田中大将仍希望援助国民党使其成功，其条件是国民党默认日本与满洲的关系。

因此，田中大将同北伐中的蒋介石也有所联络，在蒋介石占领南京后流亡日本时，对于北进之事给予谅解。而与此同时，对于进入北京的张作霖势力，特派前任陆相山梨半造大将去劝告，让张作霖立即从北京撤退专心在满洲维持治安。当时张作霖已在北京就大元帅之职(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以中国元首自居。张作霖听到山梨大将的劝告后，突然严肃地说："自已来到北京是与共产势力做斗争，我的战争也是日本的战争。但是，日本援助受到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返回满洲，真意何在?"山梨大将对张的反问没有回答，他愤慨张作霖的傲慢态度，返回东京做了汇报。这件事使军部对张作霖在感情上发生了很大的裂痕。

另一方面，芳泽公使负着和山梨大将同样的使命，执行田中首相的训令。这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极为强硬的训令，其内容是：如果张作霖不听田中大将的劝告，与国民军发生冲突，战败后撤回满洲时，也许日本军将在山海关阻止其撤退。

出兵山东 田中大将尽管对蒋介石统一中国进行北伐

已有谅解，但还是发生了日中两军的冲突事件。

蒋介石的北伐军受到了赤化，在共产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燃起了恢复国权意识，到处发生恣意掠夺暴行，蹂躏了外国权益。日本在济南的侨民被虐杀，日本的权益也濒于危殆。田中内阁对此采取了与前内阁币原外交不同的现地保护政策，当即两次派兵经由青岛前往济南，终于同国民军发生冲突。结果，日本军占领了济南(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就是所谓济南事件。幸而这个事件没有扩大，蒋介石军在日本谅解下绕道北进。在华北的满洲军撤退，张作霖因田中首相强硬的劝告而撤回奉天。日本军出兵济南更煽动了排日风潮，关税会议以来币原外交所尽的日中亲善的努力也成了泡影了。排日风潮立即弥漫全中国，而日本却未能想出有效的对策。当时的排外运动是一种最有效的对外武器，蒋介石也充分地加以利用。中国的抵制日货，立即压迫着日本的经济界，以致经济界首先强烈地谴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至此田中首相也多次考虑迅速解决济南事件，使日中关系恢复正常。于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底派芳泽公使到上海，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解决济南事件，经芳泽公使的努力，于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获得解决。随之，南京、汉口两事件，也由芳泽公使加以解决。日本承认南京的蒋政权即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日中之间又重开邦交。这是田中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笔者在北京关税会议之后，再度前往上海、南京，也是进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济南事件的交涉。

张作霖被炸　张作霖当时在北京控制中央，骄傲自大，连苏联的中东铁路与在东三省的权益也准备着手收回，怎么也不会甘心受日本军部的指使，更不会把关东军放在眼

里。日本军部因山梨大将的报告而对张作霖发生了极度的恶感。关东军甚至已经断定，不除掉张作霖就不可能解决满洲问题。

一九二八年五月，田中首相通过芳泽公使提出了强硬的劝告。之后张作霖于六月三日退出北京撤回满洲，他所乘专列在未到奉天站之前，由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的阴谋，同多数随员一起被炸死(六月四日)。日本顾问町野大佐中途在天津下车，平安无事。

继承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是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张作霖被炸死，是关东军参谋阴谋的结果，这件事后来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言才第一次公布于世。张学良在当时已经感觉到这是日本的阴谋，以致发誓日本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田中内阁采取的对华积极政策，天皇也极不满意。天皇屡次督促田中首相在解决济南事件的同时调查张作霖被炸案的真相。天皇在知道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后，命令首相追查责任严厉处罚，以维护日本的国际信义。如前所述，虽然济南事件已经解决，但对严厉处罚制造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责任者，因陆军的反对未能实现。陆军的理由是，如果公开此案，不仅严重影响对部属的统制及监督，而且将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不做公开处罚，只将直接负责人编入预备役，就此敷衍了事。天皇对田中首相信用扫地，以后再不听取首相的上奏。田中内阁也已经在议会上失去信任，终于不得不实行总辞职。军部对炸死张作霖事件敷衍了事的行动结果被得到承认，这是造成昭和动乱的一个动机，必须加以高度注意。

天皇的神化与宪法　关于处理炸死张作霖事件，日本

主权者天皇的心意如日月经天一样明白，直接辅佐天皇的元老的意见也很明确（参阅《原田日记》）。根据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天皇有统率陆海军的权限。即使是统帅权独立不属于一般的国务范围，但也很明白是属于天皇的。若天皇行使这个权限，严令统帅部即军部（指陆军）追究炸死张作霖的责任，问题也许可以直截了当地加以解决。但是，天皇如直接行使这个大权，又有违日本过去的传统。因此站在君主立宪的立场，只有将这种与政治有关案件，通过内阁总理大臣，经其辅弼之后才可处理。总理大臣可通过统帅部在内阁的代表军部大臣，实现主权者的意志。何况当时田中大将对军部保有相当的权威，是可以办得到的。

裕仁天皇即位之前，唯一的咨政元老是西园寺公爵。他是一位深受法国革命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西园向天皇讲的天皇学说是主张天皇应依照各负责地位人士的意见从事。一切政务经内阁大臣辅弼，至于统帅事项，应得陆海两总长（参谋总长及军令部长）的辅翼而行动。这是为了防止出现专制君主，当然符合宪法的主旨。天皇也非常忠实地按照这个学说行动，没有发布过依照自己意志的积极命令。这是非常好的君主立宪的态度。然而，天皇因此完全与实际政治隔离，他的地位也神化了，一切国务都由辅弼或辅翼负责人进言而决定。这是英国式的管理政治的方式，可惜日本的政治还没有进到英国那样的民主主义的地步。政治不直接与国民联系，而是由处于主权者与国民之间的势力所左右。主权者为取缔军部，而不能命令军部，要等军部的进言采取行动，由于这种矛盾关系是不可能取缔军部的。这样，宪法成了具文，问题还是存在，影响国家的存亡是当然的结果了。天皇神化，是企图代行天

皇权限的人所真正希望的事。

元老及其周围的上层人士为不损害万世一系的皇室，以最纯真的忠诚心促成天皇地位的神化。元老希望代替天皇而负起责任，但由于在宪法上无应负责任的规定，虽然能在背后批判政治，而不能站在国民之前以坦然的态度指导国家大政。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主权，不由天皇直接行使而让其搁置起来，实权已逐渐移到别处去了。《原田日记》(西园寺公与政局)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最好的记录。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迟缓，政党势力又小，尤其存在着英国式的立宪君主与国民之间插入中间势力的余地。

最欢迎这种状态的就是政府与议会都管不着的统帅部。昭和动乱期间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统帅部违反主权者天皇的意志按自己意见独断专行所致，天皇只不过将统帅部的意见事前或事后加以承认罢了（如满洲事变发生时，朝鲜军越境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天皇地位的神化，在古时产生了武人政治，而现在产生了军部政治。军部因此摆脱了最高的约束，而从最后羁绊中得到放任自主。军部为了取得实权，高唱统帅权独立与国粹论，也抨击天皇机关说，并迫害天皇身边的近臣，企图策划政变，进行暗杀和叛乱。这些行动本来相互之间没有意识上的关联，但都以实现军部独裁为其直接或间接的目的，实际上由于不断使用这些手段，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象宪法这样的国家基本法变成虚构的或死条文时，国家将变得危险。即使任何理想的好宪法，如不由该国家的成员即国民，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不以身体力行来维护它的话，那么宪法就会不知觉地不存在了。昭和动乱的原因，在于日本宪法死条文化，这对日本的将来是一个重大的警

告。历来对国家意志存在的立场不明了，或是国家意志分裂的时候，如果意志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对国家也是颇为危险的，自古以来经常由于这种情况而使国运倾落了。

无法统制军部 查明炸死张作霖的责任并予以严厉处罚，尽管是天皇的意向，但田中首相缺乏实行的能力，而且军部首脑也阻挠其实行。军部的实况，已经到了这种连基本名分都不遵守的无统制、无纪律的地步。而隐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理由，是唯恐对国际关系发生恶劣影响，因此就给了军部一个印象，今后凡是对国际关系有恶劣影响的阴谋，就是实行了，国家也可以默认。有关国际关系的阴谋成功了，当事人成了国家的功臣；即使失败，其恶劣影响国家也必定替他负责，当事人不受任何制裁。这种最危险的思想，不知不觉之间在军部里扎下根了。

武人政治自明治以后变成藩阀政治，武人以统帅权的权势想强行自己的意见，这种倾向已经在明治维新初期的征韩论上得到表现。参谋本部设立之后，台湾总督儿玉的《对岸计划》，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田中参谋次长时的西伯利亚出兵问题，都是军部强行自己的意见。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积极外交的首领田中首相不能对军部怎么样，也不能实现天皇的意旨。军部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终于导致了连天皇也不畏惧的状态。

五　满洲事变（三）

币原外交的复活与佐分利公使之死 田中政友会内阁之后，出现了滨口民政党内阁（一九二九年七月），恢复了

币原外交。芳泽公使的后任，内定以驻苏大使佐分利任驻华公使，笔者襄助之。

当时币原外交有两个重大任务：一是对中国问题，二是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都是华盛顿会议的延续。前者是币原外交恢复之后，根据华盛顿九国公约与决议的宗旨，将日中关系恢复到正常这一困难的事情；后者是根据华盛顿裁军条约，以规定的主力舰比例五：五：三，来决定如何解决补助舰的比例这一困难的问题。海军问题，是会议召开前的一项紧急事项，币原对之相当重视。

在中国，蒋介石的北伐总算成功（一九二八年六月），不久将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西山的香山寺移至南京，在紫金山的中山陵举行了盛大奉安典礼。各国借此机会承认南京政府，局势也渐渐安定下来。佐分利公使于刚恢复邦交之时就到中国上任，和当时取得革命成功的国民政府要人交换了意见，并到各地考察之后返国，准备向政府提出重要意见；但当时外务省忙于裁军会议的事，对于中国问题，没有充分地与新公使商议。佐分利公使在东京空费了时间，时时刻刻失去了改变对华政策对中国方面发生心理上影响的好机会。在这时候，佐分利在箱根自杀了。一般人难于了解佐分利自杀的原因，但有识之士已经感到解决对华问题是如何的困难了。

佐分利公使死后，中国问题的重担就落在笔者的肩上了。

全权代理公使　中国的舆论欢迎复活币原外交，因佐分利公使的突然死亡，发生了很大动摇。不少人认为佐分利公使长期逗留东京而后自杀，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没有能实现公使意见的结果。日本提出小幡大使作佐分利公

使的后任。小幡大使以前曾负责归还山东的交涉，对币原外交有深刻理解，而中国的报纸以此认为币原外交终于要倒转回田中外交而加以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小幡大使曾以公使资格驻华多年，曾任大使馆参事追随日置公使，并在大隈内阁与中国交涉二十一条问题时曾采取强硬态度。中国政府因此拒绝同意任命小幡。左倾的国民政府，当时在革命外交的旗帜下，所表示态度相当强硬，一直在恶化对日本的舆论，排日风潮又突然激烈起来。

当时日本已陷入不能派遣正式公使的窘境，币原外相为打开僵局，任命笔者为全权代理公使，负责一切交涉。这种任命是表示暂时不派正式公使。笔者为恢复日中邦交，数年来在南京、上海间富有波澜的外交生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期间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得到改善，笔者继而被任命为正式公使而留任。笔者的工作，当然要扫清田中外交时期的混乱，更要继续北京关税会议以来的币原外交，以期得到结果。

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　自从鸦片战争订立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以来，各国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享有治外法权、固定关税、租界的特权；这种特权又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各国都得到均沾。各国的特权，又因管理海关、义和团议定书中关于驻军、设立租借地的条款而越来越多，使中国几乎处于不能动弹的半殖民地状态。在北京英国公使领导下的各国公使团会议，事实上具有管理中国机关的权威。中国民族的国民运动，是将中国从各国特权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在这时具有强烈的排外色彩，特别在苏联革命之后，由于共产党的挑动，更变得非常有革命性了。

笔者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没有参加过北平的外交团，只留在南京、上海之间，为改善与国民政府的邦交，着手将两国间堆积如山的悬案，加以具体解决。中国方面亦熟知笔者至今处理中国问题持有怎样的态度，欢迎对笔者的任命，给笔者寄以全面的信任。笔者也将精力用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以调节日中利害。首先将关税问题作为最大的问题加以解决，西原借款的债务整理问题也有了眉目（此事得笔者的前任矢田总领事之力很多），并且将要着手进行处理不平等条约的法权问题。日中关系迅速得到改善。蒋介石为重建其军队，排除德国顾问，用日本顾问，从日本招聘了多数的教官。国民军统一了中国南北，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已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国内外人们都感觉到日中两国关系开始走上了轨道。各国也有很多渐渐仿照日本的做法，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得到了暂时实现，可惜这个时期未能长久继续下去。

英国对华新政策　英国是最保守又是最进步的国家。英国在华有许多权益，是最有势力的国家，英国公使事实上是北京外交团的首脑。但是，国民革命终于在中国取得成功，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公使开始在华中活动。自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以来，在华中设立公使馆的国家增多，以致北平公使团完全变成没有对象的外交机关，各国因此不得不对新形势加以深刻的考虑了。

英国为建立适应中国新事态的体系决定了新政策。这是采纳了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柏拉德的草案，由保守党内阁的外相张伯伦于一九二九年发表圣诞备忘录方式宣布的新政策。英国根据这个新政策，改变过去的保守政策，承认国民政府，接受中国的要求，实行改订不平等条约，并具体

商议将租界及其它权利交还中国的问题。这是英国洞察中国民族运动而决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是蓝普森。英国新政策的内容是和日本当时推行的对华政策完全一致的。美国以及其它欧洲各国，也同英国同一步调。因之，英国在对华政策上，常常保持着领导的地位。

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一旦确立了政策，就要彻底照这方针去实行，这表明英国政权行政机构的完善性，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在日本，虽然尽力制定了好的方针，但因政府机关的不统一，军部恣意干涉，政党不理解外交，没有舆论健全的支持，使币原外交一点也不能超越某种限度向前发展。民政党内阁由于已经受到反对党与军部的压迫，越来越损失政治力量，致使币原外交受到日本国内不断抬头的国粹论者的牵制，实行得非常不彻底。在这期间，英美和中国方面交涉迅速进展，修订不平等条约已有了眉目。若是这样，中国很容易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

中国想利用同英美交涉来促进同日本的交涉，但和英美交涉已经进到这样的程度，对于踌躇不定的日本方面交涉，已经没有重视的必要了。

中国的革命外交 日本过去屡次和中国方面交涉，都把困难的满洲问题摆在最后，不提有关满洲的问题，先就中国本土改订不平等条约交涉，以此力图全面改善日中关系，在改善后的气氛中按顺序来解决困难的满洲问题。

北京关税会议自然消失之后，中国政府趁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提出革命外交，宣布条约已届满期者一律无效，所以将已满期的与比利时条约首先废除。日本对于改订将要满期的日中通商条约的交涉，丝毫也没有异议，当时已在北京进行改订条约的预备交涉，芳泽公使与顾维钧外交

部长之间已开始谈判。其后笔者也和国民政府之间进行谈判。日本方面对条约之改订，先以公正的态度向中国方面表示，以此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前提条件。

中国方面尽管也充分理解日本的意向，但因英美方面和中国的交涉进行得非常顺利，致使其欲加速实行恢复国权政策。

外交部长王正廷是左倾军阀冯玉祥系统的人，是蒋介石旁系的能干的外交家。他看到大势已对中国有利，便发表了他的对中国革命外交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第一期是关税自主和收回海关，第二期是收回法权，第三期是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第四第五期是收回内河及沿海航行权、铁路以及其它权利。这个所谓革命外交的进度表，其宗旨是在极短的期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收回一切利权；和各国的交涉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中国将单方面废除条约并断然收回一切利权。王部长的革命外交全貌详细地刊登在报纸上。笔者鉴于以上形势，一方面向政府提出警告，以满洲问题为中心的日中关系遇到了危险，另方面决意回国向币原外相陈述意见。在此之前，为确知中国当局的意向，在南京到官邸拜访了王外交部长。这是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发生前半年的事。

王外长回答日本公使笔者的询问，确认报纸上所发表的内容，不但收回外国利权，且包括满洲；并说明中国方面对于旅大的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经营也都将按照公布的顺序准备收回。笔者当时非常忧虑，担心过去笔者所费的苦心也许将付诸流水。王外长的这个强力推行的革命外交方案的发表，引起内外舆论的重视，严重地刺激了日本的军部，并对正在进行的币原外交以致命的打击。

满洲的排日风潮 币原外交虽对日本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做出了划时代的改善，但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与日本最有关系的满洲，却未能得到改善。

从感情上说，继承张作霖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也不能象其父那样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他完全是在英美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时的顾问端纳是英国人。张的思想是极端排日的。他亲手枪杀亲日派杨宇廷以表明其态度，又参加国民党，撤销满洲半独立的状态，将五色旗降下改悬青天白日旗，树立了公然排日的方针，用很露骨的办法想把日本势力逐出满洲。

在这种形势下，满洲日中间纠纷日益增加，日中双方交涉案件堆积如山。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本来没有伸到满洲，但张学良为了发泄对日本方面的不满，以不是站在地方立场所能解决的为借口，拒绝进行交涉。交涉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不能解决，悬案一直在增加。日本在满洲取得了租借权，在铁路附属地以外也有土地租借权，但因中国官宪的压迫，日本人及长年居住的朝鲜人的租借土地，不用说重新申请，就是维持既有权利也已感到困难。同时也开始了收回满洲铁路的运动。中国方面要自己建设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并委托外国(荷兰)公司在葫芦岛进行大规模的筑港，企图使日本经营的铁路及大连商港失去价值。关东军的任务是保护日本权益及日本人与朝鲜人。鉴于这种现象，它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外交手段解决，已经除了使用武力别无办法了。

日本人口问题与满洲问题 当时，日本人对国家与民族的将来，具有非常的神经质。日本作为一个小岛国，当然耕地狭小，其它的矿物资源也不足。甲午日中战争时期

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如何保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海外贸易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也得有对象才可以进行。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日本人的勤奋并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准，而只是为了生存。

国际联盟否认战争，以维护世界现状作为方针，并根据这个方针实现裁减各国军备。但对应解决的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即经济问题，只有自由主义的空论，而世界实际上又回到以欧洲各国为中心的经济封锁的状态。

移民问题 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英帝国内部也有增强帝国主义倾向的趋势（一九三二年缔结了渥太华协定）。法国与荷兰这些殖民帝国，为维护本国的利益，只能越来越对外国进行封锁。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时期，各国的政策完全离开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相去太远了。国际联盟的自由经济原则的宗旨已完全被忘记了。日本为保养不断增加的人口，靠用自己汗水劳动来发展对外贸易已经行不通了，只好强逼降低生活水准了。

这个问题尤其对近邻中国有关系。日本对华贸易因中国排日风潮而受到重大打击，而且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纺织企业也因此受到了相当的妨害。共产党斗士李立三受过莫斯科训练，他以上海为中心煽动学生、工人运动，竭力掀起排日风潮。日本的权益不仅在中国本土，如前所述，在满洲也被置于张学良严厉的压迫之下。中国革命外交在王

正廷的主导下，已经在全国发挥作用了。

日本不仅有关东州的租借地，而且在铁路附属地有行政权，还有百万朝鲜人居住在满洲内地。日本的这些权益，在排日风浪中，在当地加以防卫，当然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日本不仅经济上在中国本土受到排斥，而且在满洲也被驱逐，日本人生活本身已经受到威胁。

笔者作为驻华公使对当时形态深表忧虑，认为要防止日中关系急速恶化，应在中国本土问题上让步，以解决满洲问题，因而尽力对日中冲突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笔者向政府郑重提出，应向国际联盟说明纠纷的情况，并明确表示日本的立场，尤其日本应迅速树立彻底的总括性的对华政策。总之，笔者相信，对于中国问题，日本内政外交正是应发挥强大的政治力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四月初，笔者返回东京，向币原外相直接报告一切情况，并补充说明上述的意见。

滨口首相被暗杀(一九三一年四月)之后，接着是若槻为首的内阁。当时前首相在执政末期表现出的征兆，已证实他无意站在大的治理立场来实行政策，这使笔者感到非常失望。笔者提出的具体方案之一是，如租界，先将价值较小的苏州、杭州租界从速归返中国，以表明日本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但连此主张也因不易得到枢密院的同意而被政府退回。有的阁僚以笔者的态度过于同情中国方面而向笔者提出警告，这使币原外相陷于困难的境地。日本的国粹主义，不仅充满军队，而且弥漫到反对党和枢密院。围绕伦敦海军条约问题，军部确立统帅权的主张成功了，而政府历尽艰辛才批准了条约，但由于已受到右翼势力的压迫，故丧失了政治力量。日本政界还在玩弄暗杀的手段。

当然，币原外交使外交走上正道是无可怀疑的，但它对与日本存亡有关的满洲问题却没有拿出使国民能接受的方案。政府在国家危急之秋，缺乏积极的指导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这是悲剧的序幕，也是日本自由主义破产的一大原因。这样的形势在发展，满洲问题从内外看都急待解决，而没有政治力的政府却束手无策，一方面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忧虑，一方面又在袖手旁观。

满洲事变爆发　从国内局势上看，笔者所提出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东京采纳。

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日本已面临国际危机。如人力不能防止的话，也至少应该尽力缩小危机。也就是在当地一旦发生任何不测事件，日本政府需要在对内对外上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并做好处理的准备。当然，政府与军部为了统制国内防止不轨，应极力避免日中关系的恶化，另一方要敲响警钟，应该全力使世界理解日本的公正态度。当前中国革命外交情况已经清楚，而日本政府还是缺少对策，已经很明显日中关系要走到死胡同。既然走到死胡同，从外交上考虑，除以“坚实的安排”作为方针外没有别的道路。所谓“坚实”，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在外交上日本的地位能得到世界上的理解。笔者以“坚实的安排”的口号，在失望之余，复由东京返回任所，但仍决心努力挽回颓势。

在满洲不断发生具有危险的事件，如压迫朝鲜人的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被暗杀事件等。张学良对日本的态度是强硬的而带侮辱性的。笔者为根本挽回在满洲的两国关系恶化，和当时南京政府的中枢人物财政部长宋子文协议，寻找缓和满洲紧张局势的方法。当时宋子文和笔者进行密切的联络，协力改善日中关系，商议同赴满洲，亲自调查

当地情形，找出解决的办法。宋部长的意见是途中顺便去北平，劝说在北平的张学良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再赴大连和前外务大臣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伯爵进行商谈，并制订有关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

笔者将这个意见上报日本政府，经许可预备和宋子文在九月二十日从上海乘船北上。船位已准备好，但终于没有来得及实行。满洲事变突然于九月十八日在奉天爆发了。当时笔者仍不灰心继续交涉，准备同宋子文一起到满洲，使事变能局部化，以期达到解决的目的；但在等候日本政府训令期间，事态如燎原之火迅速扩大，故没有办法可取。中国将此事变向国际联盟提诉，终于到了无从采取外交措施的余地了。

在满洲事变爆发时，笔者向日本政府发出的电报的一节如下：

> 一、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为国家将来计，不胜悲痛之至。既然如此，希望政府应从速禁止军部之独断专行，依照国家之意志，停止军部不负责之不利宣传，更应表明旗帜，确立政府的指导……
>
> 二、国民政府方面知此次事变之严重，照例采取军事上不抵抗主义，而进行军事行动以外所有之对抗手段。当然，在党政一致领导之下，过去受过训练之排日机关正在开始活动。如断绝经济往来还好，但连在朝鲜事件时也未动摇的全国学生运动受到了最大的刺激，反日感情之恶化有

甚于所谓二十一条时期，今后将更趋恶化。照目前情况，在满洲以外的各地，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有不幸事件的发生。关于此点，尤望海军自重，请政府充分留意。万一日军推进至北满，则将与俄国发生冲突，事态更趋严重。

三、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军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因此，应该认识到此次事件能使日中两国处于断绝邦交状态。长此放任，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策动，日本将受到世界舆论指责。（根据远东国际法庭记录）

明治以来，日本逐步形成的国际信誉是极高的。日本的国际地位一旦被破坏，日本的国际信誉也将一落千丈，这种情况是负责外交的人士所难忍受的。

事变的扩大与地方化 尽管三月事件失败了，但军队中的中坚分子及上层仍在积极进行对国家的革新运动。关东军参谋与陆军省军务局永田军事课长等商量，秘密地将旅顺要塞炮移至奉天驻屯军的兵营；并积极宣传大川周明等要求对满洲问题采取积极行动的方案。土肥原大佐用了数日旅行中国各地，关东军昼夜不停举行激烈的演习。为

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正当权益，军部早已下了决心，在不得已时采取自卫手段。

外务省看到这种不稳形势，极为注意形势的发展。驻奉天林总领事奉政府的训令，调查满洲危险的形势，并详细报告政府请其注意。币原外相接到报告后，将报告交给陆相要求妥善处理。南次郎陆相派遣建川少将去满洲，劝说关东军自重。建川直接领悟天皇意旨，使关东军勿做越轨行动，但旅行途中因访朝鲜军司令部，抵奉天时已较预定日程为迟。关东军幕僚正在饭馆里招待建川的时候，发生了柳条沟铁路爆炸，张学良的北大营兵营已受岛本大队的攻击，日本兵营的大炮已经向北大营开炮，满洲事变爆发了。

林总领事及森岛代领事将事件真相逐一电告政府。两人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冒生命危险四处奔走。森岛领事往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说明有用外交解决事件的希望，请军部中止行动。这时同座的花谷少佐（樱会会员）激昂地拔出长剑，对森岛领事威胁道："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军人已经傲慢自大了。森岛领事得到既然行动起来任何人不得干涉的回答，只好回去。这时，关东军事实上在石原次席参谋的领导之下，开始全力突进了。

日本政府对炸死张作霖的当事人不能进行处分，更没有什么力量来对待军部。统帅权的独立已在政治上得到确认，连枢密院也充满支持军部的浓厚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已经达到完全独立的地步。而且，军队内部形成了下克上的风气，关东军从军中央部脱离，变成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反对共产党的国粹运动主张统帅权独立，反对裁军及明征国体，主张建设国防国家及革新国家。在此期间，

现役及预备役的陆海军人运动，由于与一部分政友会党员及军部的结合，完全变成了政治运动。

若槻内阁虽用尽方法以防止事件扩大，但政府已不掌握日本军。当局还是认为最终军队也能追随政府政策，这是一种迂腐的想法。事实上，关东军无视政府的意向，北进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逐马占山至黑龙江，南进至锦州，终于成功地将张学良军队驱出满洲的最后据点。当时关东军威胁政府，如不支持军部，反而阻止军部行动，关东军将从日本独立，自己统治满洲。因此，若槻内阁只好从预算中支付军部越轨行动的费用。

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大佐，与板垣参谋等协议后，到了天津劝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并将其带到满洲，接着拥戴他，先推他为执政，后拥他做皇帝，急忙建立满洲国。驻欧美各国的日本使节，手持若槻内阁的满洲事变地方化的训电，反复向该任国政府说明。在不明真相的欧美当局看起来，这好象为军事行动制造烟幕的极为虚伪性的举动。

六　十月事件与血盟团

十月事件及"政变"的失败　满洲事变的爆发表示昭和动乱的箭已经离开弦射出了。军部的计划急速进展。他们认为，为了使计划有完满的收获，必须从速实现国内政治革新。以前，军中干部计划的政变即三月事件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受到训练的民众的参加，这次应不要民众只由军部实行。遂由桥本中佐等樱会会员中坚将校策划，制造了十月事件。它的目的与三月事件一样是推翻政府及议会，为了断然实行国家革新，必要时用暗杀手段，建立军政府；

所不同的，这次不是拥立宇垣大将而是荒木中将。这次政变计划，因一部分参加者变卦，事为南次郎陆相所知，陆相加以阻止终于失败了。

三月、十月事件的参加者中的著名人士例如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被捕后只在形式上受到审判。特别是军部的态度极为勉强，内部的赏罚已完全失掉权威。在压力之下，世间也只有默认，因此军部就越来越扩大自己的过失。

中坚将校与青年将校　军中内部以及外间终于知道了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的内容，这使天剑党单纯的青年将校及支持他们的人非常愤怒。天剑党的成员决心杀身救国，但中坚将校等军中干部策划的以政变形式进行的革新运动是以参加人自己的飞黄腾达为目的的。后者主张夺取政权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夺取政权后也决定只以自己在政府重要部门中发挥作用。总之，后者并无改造国家的神圣精神，只是做维新元勋的梦，夺取政权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现在前者指责这些人每天寻花问柳，溺于酒色，非常愤慨地称之为堕落的干部，不能与之共事。他们要挺身彻底改造国家，认为必须首先除掉障碍这一神圣事业的人，并以高山彦九郎与明治初年的神风连自任。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多数的天剑党员血书宣誓，组织了一人一刀的“血盟团”，并且和井上日召和尚领导的暗杀团合并起来。

这个宣誓表示，为了改造国家除掉有害分子，将以一人杀一人为目标进行暗杀。先从军校学生起，后扩大到青年将校。他们宣誓后立即开始行动。

有直接行动力的青年将校和右翼行动派会合进行暗杀，给社会带来异常不安与压力。同时，它成了推进以军部为中心胁迫性的国家革新运动的助力。

血盟团的活动 因血盟团而牺牲的人相继出现。当时率领民政党的井上准之助、财界的如三井首领团琢磨等，以及居重要地位的自由主义人士，相继被暗杀，社会上充满不安，以致出现实业界人士争穿防弹衣的情况。

司法部虽可以逮捕处罚暗杀者，但不可能根本消除以军部为背景的暗杀事件。对破坏国家秩序的最重大罪犯的裁判，以"体谅其精神"的非科学的温情主义进行有名无实的处罚，受裁判的人不久又从监狱放出来，再着手更大的"工作"。统治国家的大义名分，已经极端混淆不清了，有人怀疑司法部在法西斯化。一般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了。

军部的派阀斗争 天剑党的青年将校为达成革新国政所拥立的前辈，是国粹派的将军，如皇道派的荒木、真崎等将领。

这些皇道派愤慨于自由主义下的世道人心的颓废，注重国粹精神来处理思想问题，认为天皇的军队是神圣的存在，一旦国家处于紧急时期应牺牲自己。因此，应先明确国体，实行皇道，作为世道人心先驱的指导者。血气方刚的青年将校翕然集其门下，忧国慨世，高唱革新，连军部的统制也置之不顾了。当时，军部主流干部们认为这种风潮是产生军内部动乱之源，必须统制内部的秩序，排除极端分子，注重统制，因此产生了与皇道派对立的统制派。这一派分子，是以军部的干部为主组成的，继承过去军部的藩阀势力，对内外的政治阴谋感兴趣，其目的在于实现以军部为核心的军独裁政权，实施其革新政策，这一点在三月事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皇道派是从国粹复古的思想出发，主张革新，敌视共产党，自然而然是反苏的。统制派军部本来的动向是爱好政治谋略，当前则致力于对华

谋略。许多会讲汉语的驻华将校，以及和中国发生各种关系的人，组成了所谓中国派；而与苏联发生各种关系的人则属于所谓苏联派。

这样，在军队内部分为皇道派与统制派，进而更以个人势力分派。由于军人不善思考又行动力较强，因利害及感情的冲突，互相之间的斗争遂渐激烈。长官几乎无法统制，下克上风气严重，使日本军队完全失掉其本质。有些军人和右翼浪人，企图推出皇族出身的军人出来，施行所谓“锦旗革命”。

这样的军部，与外部的右翼及左翼分子建立了相互利用的关系。由于要进行国家的革新事业，其结果是更混乱，处于完全的无统制的状态。这些人乘着混乱，从内外来扰乱日本，这种策动是完全置日本的命运于不顾。

七　犬养内阁

犬养内阁的对华政策　若槻民政党内阁终于在满洲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底垮台。这时元老也还有自由民主主义时代的惰性，仍想以政党内阁来挽回时局，乃推田中大将死后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毅加入政友会任总裁不久即接受大命，即以当时政友会新势力代表森恪为书记官长，开始组阁。鉴于陆军部内青年将校的人望，邀请皇道派首领荒木将军为陆相；犬养的女婿芳泽谦吉，曾多年担任驻华公使，现任驻法大使，也被立即从法国召回担任外相；海相为大角大将。

森恪是政友会斗士，具有相当的势力。如前所述，田中内阁时期他曾任外务次官，与军部联系紧密，主张积极

政策。他对陆海军部的革新运动，不但赞同，而且鼓励，并具有实现独裁政治的野心，梦想扩大满洲事变，在东亚建立日本的霸权。

政友会为了维持政权，只好强拉森恪参加内阁。他处在书记官长的中枢地位，使很多人忧虑犬养毅内阁真正要采取怎样的政策，尤其对中国问题如何处理，将是人们所注视的目标。

犬养首相的真意　犬养首相本来是孙中山的朋友，对中国国民革命有不少了解。鉴于他多年的阅历，相信对内外形势的判断不会有多大错误。然而，他是反对藩阀的党人，也引起了军部强烈的反感，而且他曾在议会上做长篇演说攻击军部。所以，他的对华政策，和以前田中大将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也是西园寺公爵推荐他组阁的重要理由。他想迅速解决满洲事变以恢复日中关系，以这种意图进行准备，瞒着森恪派萱野长知浪人，秘密前往南京。但是对当前政策问题，政府内部与政友会森恪一派及军部之间已经发生磨擦。

芳泽大使经由莫斯科视察满洲之后，回国就任外务大臣。当时日军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大体上结束了，问题是如何处理日军占领下的统治形态。关东军为了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已经由土肥原大佐到天津进行溥仪工作，并有成果，于是做成了将来统治的方案。板垣副参谋长带着关东军的方案，回到东京。如何统治满洲是政府当前的重大问题，芳泽外相每日与军部协议。当然，政府无法拒绝关东军的意见。

八　上海战争

上海形势的危急　满洲事变的爆发推动了中国本土的排日运动。中国对外神经中枢的上海，突然发生了猛烈的排日风潮。上海最大企业的日商纱厂，由于共产党人的煽动发生了大规模罢工。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大会决定了中国问题的议案；又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发表宣言，要消灭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了排除在华的外国资本主义已经采取直接的行动。这次排日运动，较过去更明显带有政治色彩：预期扩大满洲事变，诱发日中间的骚乱。

驻防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由称之为左倾军阀蔡廷锴统率，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并不十分服从，是一支排日色彩浓厚的左翼军队。

上海日侨已从上海南京路事件即“五卅”事件以前饱受共产排日罢工的痛苦，这次罢工排日风潮使他们更加神经紧张起来。日军在满洲军事行动的成功，使日本人的意见逐渐强硬，连过去以稳健派闻名的大会社的分社经理，也和久居上海的日侨一样，主张对这次排日运动应采取断然的态度，对日本公使的笔者主张的忍耐自重意见不加理睬。笔者始终劝说他们，告诫不要轻举妄动而陷于诱发骚乱的阴谋，但他们竟派代表去满洲，拜访回国路过满洲的芳泽新外相，开始排斥笔者的运动。另一方面，内阁书记官长森恪公然发表暴力的强硬论，给一般人以为犬养新内阁对中国更有新的积极强硬政策的印象，终于使日中两国关系处于全面的危机。

东京协议 笔者对犬养新内阁的政策感到非常不安，并对芳泽新外相的意向也无从推测，遂呈准回东京，报告详细情况并陈述意见，同时也做好了不惜辞职的准备。这是芳泽就任外相一星期后的事，即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旬左右。

新外相忙于当时满洲建国的问题，没有时间注意上海问题。尽管笔者催促，但与笔者会见的日期仍然一天天拖延下去。笔者向当局力陈上海形势的严重及危险，并强调说政府应一改使内外误解的态度，应公然而且明确声明日本政府的公正方针，但政府当时忙于协议满洲建国问题，已没有精力处理这种对华的全局性问题。

正当陆军在中国北方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好象与陆军竞争似的，上海的海军也表示了强硬态度。驻上海的日本海军中，也有血盟团分子。因此，上海的空气更加紧张起来。上海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为了攻击被认作祸源的上海北站附近的排日总部，向海军省请求许可以强力封锁这些地区并奇袭排日总部。笔者知道日海军中央当局批准了这个意向后，不得不对这种毫无考虑的行为表示惊讶。如采取这种手段，不仅立即给排日团体最好的口实，而且事情本身就直接意味着日中两军的冲突。笔者不得不反问，仅仅七八百人的海军陆战队，其结果将如何处置？海军当局终于取消了这种做法。

上海事态已甚危急，故笔者才能与芳泽新外相会谈。新外相已从谷亚洲局长处知道了笔者意见，对笔者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感，望笔者从速返任，尽力防止上海不幸事件的发生；但对笔者关于声明新内阁对华方针以消除内外误解的提案，认为今日尚非其时，未予采纳。因此，一般对

新内阁的误解，即政友会内阁又要恢复田中内阁时期的积极政策的误解，尽管决定笔者返任也未因此消除。笔者迅速离开东京，前往上海返任了。

笔者离沪期间，上海的气氛不断急剧恶化。有一次，日莲宗的和尚唱着歌打着扇鼓，路过排日总部的中国街，被中国暴民打倒，附近的日本浪人拔刀相救。这种混乱情形，使排日运动激烈化，同时也使日本人方面的态度极度地强硬起来。

第一次上海战争 当时日中之间尚未开辟航空线，笔者由神户乘最近期的长崎丸前往上海。从报纸和广播的报导中知道上海情况恶化。笔者一行离开长崎港时，已经听到日中两军在上海发生冲突。

到了上海一看，那里的情况很悲惨。各国在上海的驻军认为，上海一带的排日运动过于危险，随时可引起上海治安混乱，协议各国派兵部署各自担负的地区，进行共同防卫，日本陆战队也因此采取了行动。这时，日本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终于发展到战争状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战争果真爆发了，可是这时候日本海军连同停泊的军舰中的救援部队仅仅不过一千名。第十九路军有德国顾问指导，据有坚固的战壕，装备有列车炮，由几个师组成，同它作战无论如何是不行的。陆战队虽然善战，但这样打下去势必全军覆灭。三万日侨及其财产，已面临中国军蹂躏的危险。侨民集中到马头乘船回国。中国人因日中开战带着家财衣物，纷纷逃到公共租界避难，并拥挤在日本领事馆附近的外白渡桥边。这时日本陆战队的防线已濒于危急，中国游击队已出没于日军的背后了。

日本海军负有保护上海日侨和日本权益的任务，如果没有陆军的支援，已不能完成任务。笔者为避免日侨的死亡，经询问陆海军双方意见之后，请求政府迅速派兵。

中国政府因上海战争的爆发，更指责日本为侵略者，向国际联盟控诉。当时日内瓦正开国联理事会，立即将此案列入了议程。日本自满洲事变后，在国际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又因上海战争爆发，陷入更困难的状况。笔者无论如何不甘心让没有武装的数万日本人和亿万的权益一起被排日军队消灭。日本在上海有保护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是当然的事。军部因上海陆海军机关的直接请求，决定增派军队。

停战协定 海军以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率领第三舰队运送久留米的下元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计一万名之陆军，急赴上海；而陆军则动员了第九师团，以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出征，并指挥在沪全部陆军。

为挽救上海危机，认为增派备有精锐炮兵的一个多师团部队足以应付，但以这些兵力仍不能将十九路军驱出上海地区。在大场镇以北展开了苦战。于是，更以白川大将为总司令官，率领三个师团增援。白川大将三月初抵达后，才将十九路军从上海附近击退。笔者认为既然日本军驱逐了中国军，便可恢复上海治安，决心必须立即停战，遂前往司令部，向白川大将商洽。笔者费了半天时间，才说服了白川大将，发出了停战令。和笔者同行的有松冈洋右，他也参加了谈话。白川大将的停战令起到了防止上海事件国际化的作用。国际联盟虽在三月三日举行大会，但上海已经停战，所以没有列入大会的议程上。

国际城市上海的防卫是由有关各国驻军共同负责的，

所以维持上海的治安，与各国有共同的利害。日本与中国的停战交涉，以有关国家英、美、法、意四国公使斡旋的形式，在日中之间开始了。中国方面，当时汪精卫继顾维钧之后担任外交部长，任命外交次长郭泰棋为全权代表。在日本方面，既然是停战协定，事关统帅权问题，根据军部主张，任命植田师团长为全权首席代表，日本公使的笔者为次席代表参加了交涉。但是，各国代表以及中国方面，因过去的关系，均以日本公使为交涉对手，所以事实上这次交涉不得不由笔者一人承担。

停战交涉由三月上旬开始一直进行到五月初。在日本陆海军统帅权独立的抑制与国际联盟的监视下，和中国方面及各国代表在这个国际城市进行交涉，决非一件容易的事。笔者为解决这一复杂与困难的交涉，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上海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政府似乎非常忧虑，犬养首相及芳泽外相特派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作为他们私人代表到上海。松冈洋右对笔者的工作，给予全面的理解和援助。停战协定的成立，除始终得到海军司令长官野村的理解与支持外，应特别提出有很多地方得到松冈的援助。

停战协定已达到成立阶段，上海气氛也恢复正常了，在四月二十九日天长节（天皇生日）那一天，举行了白川大将检阅日本军队的阅兵典礼。之后，日侨为庆祝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庆祝会，军队、学校、日侨，以及多数各国来宾，也都到会参加。在这次庆祝会中，朝鲜左翼独立党金九一派的尹奉吉投了一颗炸弹，当场将在上海的日本干部全部炸倒，终于把河端民团长与白川大将炸死。野村司令长官、村井总领事、植田师团长、民团书记

长都受了重伤。领事馆一个女职员也失掉一只眼睛，笔者亦受到濒死的重伤。

笔者没有屈服，仍在医院进行最后交涉，卒使停战协定于五月五日顺利成立。

停战协定的交涉地点在英国总领事馆。出席的各国公使制成文件。为签署这个协定，由日方冈崎书记官、英方伯剌克班秘书官及中国方面秘书张似旭，带了协定到福民医院笔者床前。当时笔者已处在危险状态，在痛苦中将许多文件签署之后，告诉中国方面的张似旭说："日中两国本来应当亲善的。希望这个文件能作为将来日中亲善的出发点。"当时能否抢救笔者的生命已成疑问。张秘书回到会场之后，以感动的心情将笔者的话转告给与会的代表。签名完毕之后，笔者即被抬进手术室，将受伤的一腿全部切断了。

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

九　犬养毅首相被暗杀

满洲的军事管理　犬养首相不能违背宿愿，但他又无力抑制军部解决满洲问题，也没有能力阻拦关东军建立"满洲国"的行动。军部建立"满洲国"的方针，内阁也不得不加以承认。后来，满洲问题不归外务省管理，另设了一个对满事务局(总裁由陆相兼任)，事实上归军部的管理之下。

上海战争结束之后，将不需要的兵力立即调到满洲，用于维持满洲的治安。锦州问题已经解决，"满洲国"以山

海关为起点，以长城为“国”境。日军扫荡了境内不满分子。当时，发生了是否将热河省并入“满洲国”的问题。因为热河省也在长城以北，故将其划入“满洲国”，于是关东军又出动讨伐热河的汤玉麟军队。

犬养首相被暗杀 犬养内阁甚至不能如若槻内阁那样，从正面反对军部对满洲的占领政策。非但如此，森恪书记官长等政友会一派人士，事实上与陆海军的极端派勾结在一起进行活动。然而，犬养首相本身的想法，实际上与军部的政策明显不一致。首相已是一个纯粹的党人，很早已被列入青年将校的黑名单中。五月十五日，血盟团的若干团员由一个海军中尉带领，闯入首相官邸，把老首相拉到日本房间来。首相说：“让我把话讲明白。”他想说服带枪的“贵客”，但这些“贵客”已经是铁了心肠的人，讲多少也不会使他们明白。“讲话没用！”“开枪！”号令一出，子弹已射出去了。

老首相身染鲜血，倒在榻榻咪上。初是政党内阁的首相、政友会总裁原敬（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接着是民政党内阁的滨口首相（一九三一年四月），都被右翼分子暗杀了，使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最后政党内阁的首领犬养老首相被暗杀，是最悲惨的一次了。

政友会内阁随老首相的命运同时垮台，森恪后来也因患病死去。

由于没有商量好，陆军军人很少参加暗杀犬养首相的血盟团团员的活动，主要是由海军人员干的。首谋者海军将校被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后来又将刑期缩短，不久即保释出狱又予重用。这就是当时现役军人闯入官邸惨杀政府最高首脑的制裁方式。

血盟团用直接行动暗杀犬养老首相，政党内阁已告寿终正寝。用恐怖手段，将站在反对军部势力立场上的政党及政党政治家打倒，以切断对内对外国政的防堤。军部的这种行动，已无人能正面加以阻止了。

然而，上层多数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忧虑到若不能阻止军部活动，至少也要将它缓和，使之不致破坏大局。元老或用海军的力量抑制陆军，或用外交的力量恢复对军部的节度。这就使得国内政治势力互相牵制，以期防止政治的极端化。这种姑息手段，不仅不能挽回大势，而且一旦堤防崩溃，将如洪水一般的激流，加速度地向前冲。特别是对外政策的混乱，逐次发生了破坏作用，已不知何时能停止了。

满洲事变发生时，币原外相曾用电话与金谷参谋总长商谈要事，因此中坚将校认为外相用电话来叫参谋总长，有损军部最高干部尊严，遂请闲院宫元帅担任参谋总长。军中中坚干部拥戴皇族作木偶，按自己的思想调动军队，利用皇族的威力，想威压政府及一般人。这种企图，和使天皇神化同出一辙。海军方面也加以仿效，请伏见宫担任军令部长。这样一来，由中坚将校推动的统帅部，对内阁更发挥了它的威力。

政党内阁终结　明治维新是日本受到世界潮流洗礼而发生的。在维新时期活跃的人物均是以德川时期外围诸侯为中心的。其结果，明治时期推翻幕府的，是以萨长为主的藩阀政治势力。反对藩阀的政党势力，最初在反藩阀势力中形成，以后随民权自由思想的普及，发展到有主张有主义的政党。政党的长足进步，是因为与继承藩阀势力军部对立的结果，近代化政党的出现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后的事。

日本终于随上了世界潮流，当然也使以国民为基础的政治机构得到发展，但还是发生了激烈的反动。有自由主义者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有政党与军阀的斗争。但是，政党的斗争，由于政党本身无力与过失，以及日本人一般缺乏政治训练，再加上反动势力的野蛮和直接行动，结果惨败。它的最后一幕，是犬养首相的被暗杀，这也意味着政党政治的最后终结。

第二章 “二·二六”叛乱

一 斋藤海军内阁

斋藤内阁成立 政友会总裁犬养被暗杀，如实地表明了军部革新分子对政党的敌视，也如实地表明了他们已下决心用无情暗杀的直接行动除掉企图妨碍革新的人。如果让政党单独组织内阁，将会连续发生暗杀事件。看到这种形势的元老等上层人士，煞费苦心地选择新内阁的组织者。

这时，有一种权道的议论，认为宁让军部掌权，令其善处大局，这是一个捷径；与此相反的常道论认为，这样的做法等于承认直接行动，应尽力避免。因此，为减少磨擦，起用了斋藤实。他是军部内海军出身的，是海军最老资格的将领，当过朝鲜总督，又是持有稳健主张的人物。同时，还考虑到处理海军裁军问题。斋藤内阁的任务，是抑制今后陆军对满洲问题和海军极端派对将要成立的裁军问题，以引导政治走上中间道路。陆相荒木留任，海相以大角大将代替冈田大将，外相则坚请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伯爵继任。而政友、民政两政党的高桥、山本两长老都入阁，以举国一致的态势，来处理国家危机。自斋藤内阁以后，内阁组织经常采取举国一致的态势。

日本因满洲问题受到国际上的谴责，在国内军部用杀

伐的直接行动进行威胁，人民受到军部煽动的国家危机的宣传而神经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内阁要执行安定与中间的政策，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个国民缺乏政治训练的国家里，舆论的力量很弱，只是追随强者；有识之士的呼声，是不能广泛发生反响的。

退出国际联盟 斋藤新首相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人，而是凡事都很被动的人。关东军与军部正竭尽全力进行满洲建国。由于甘愿采取放任政策，因此军部方面处于暂时的平静。政府对满洲问题作他人的事对待，但由满洲问题引起的日本责任问题决不是他人的事；军部的行动是日本的行动，日本政府自己必须负责地加以处理。根据明治宪法，总理大臣和其他国务大臣，均是直属天皇的辅弼之臣，总理只不过是立在统辖内阁的地位。一旦国家面临非常时机，需要对国政负责强力行使时，这样的组织就不合适了。特别对军部的满洲建国，事实上已脱离总理的管辖，无论在国际大局上有多大影响，总理也是不能控制了。

国际联盟派了李顿调查团，长期在满洲调查，并也来到日本，草拟了详细的报告。在此期间，关东军在当地加速进行满洲建国。板垣与土肥原从天津把溥仪带来，以执政的名义，让他就任“元首”之职（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于是，“满洲国”大致成立。之后，就是承认“满洲国”的问题。军部当然希望承认，但政府方面预料到承认之后在将来听取李顿报告和参加国际联盟会议时，日本的立场将更加困难，故朝野对于可否承认议论纷纷。内田外相在满洲事变时候是满铁总裁，深知满洲事变的真相，并推测将来的局面，认为宁可先承认“满洲国”，给满洲一个暂时的安定，让军部忙于满洲建国的大事业，这是一个贤明的办

法。于是，外务省照英国承认伊朗的前例，起草了《日满议定书》，签订了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由此决定了日本对满洲事变的态度。国际联盟根据李顿报告，在大会上得出一个结论，认定日本是侵略国。日本政府派遣松冈洋右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松冈用英语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日本为侵略国已是预料中的事了。决议之后，松冈终于放弃同国联合作，退出会议（一九三三年一月）。其后，日本政府发出退出国联的通告（二月二十七日）。这就表明，日本毅然独力建设“满洲国”，站在国际协调之外，决心开拓日本的将来道路。因为这是满洲事变之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措施，所以特发布诏书，指出日本前途的艰难，训谕文武百官恪守职责，宣布了退出国联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之基础，以便收拾满洲事变的时局。其目的不外是指出今后日本在国际立场上的艰难，以促进军部反省，并期待集中全国国民的努力来收拾时局。

毫无疑义，为使这富于自负心的孤立政策能够成功，需要国民绝大的正义感和当权者计划周到的措施。这也是天皇在退出国联时发出诏书的原因。然而，毫无统制而且傲慢的军部，并没有因诏书而改善，国民又缺乏忍耐与训练，内阁更没有自信与措施。内田外相中途因病辞职，由自莫斯科回国的驻苏大使广田继任。广田上任不久，即由笔者担任外务次官。

冈田内阁的出现　斋藤内阁宁可站在以无为为自豪的立场上，但它背后的军部及与军部有联系的革新分子决不是无为的。随着关东军满洲建国工作迅速开展，国内革新分子的活动更趋活跃，左翼的秘密活动与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也逐渐明显起来，甚至出现了法官被赤化现象。其间发生了司法法西斯化的“帝国人造丝事件”，使斋藤内阁进退维谷。这事件是以司法法西斯的有力分子的检事带头，检举了帝国人造丝事件的卑鄙贿赂问题，逮捕了大藏省黑田次官以下多数要员，以及前任大臣等，大大揭露了官场政界的腐败。连日来报纸上纷纷报导，在政界引起了一大波澜。事后才明白这是一个阴谋，但当时内阁却为了事件的责任不得不下台。经斋藤前首相的推荐，请曾在伦敦海军条约的达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冈田大将组织海军内阁。帝国人造丝事件的被告们，经数年的审判与争辩，也都无罪释放了。

冈田海军大将的新内阁虽然仅仅是斋藤内阁的延续，但随时局的进展，它的使命越来越重大而且困难。外相广田弘毅留任，海相也同样是大角大将，陆相由林铣十郎大将代替荒木大将继任。

冈田内阁在性格上采取旁观的消极主义，这与斋藤内阁相似，但这两个内阁三年间所做的事，成了把满洲事变推进到第二阶段的重要原因。这就是，第一，海军裁军问题出现了破裂；第二，进行华北工作与日中邦交的恶化；第三，国内激烈的倾轧。

二　海军裁军问题的破裂

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规定了主要海军国英、美、日的海军主力舰比例为五：五：三，这是以太平洋、东亚及中国方面国际形势为背景决定的。这个海上国防比例，可以使各国建立安全

感，以便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互相交易与协力。因此，海军比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使不规定比例，因为国力的差别，当然也会表现出这些国家的海军势力的差别。但当时的国际形势，由于把裁军本身放在异常重要的地位，硬性地规定了国际间的比例，结果使日本海军受到了不必要的刺激。

日本海军专家对这种比例非常不满：第一，对日本规定比它国处于劣势的比例不满；第二，对机动性的海军加以差别，就意味着绝对劣势，而且无法加以补救；第三，日本接受这种比例，不仅有损统帅权，而且损害日本的主权。他们只抓住形式上的比例，而不注意作为武力基础的资源有否与经济力的优劣，即国力如何。看到陆军在满洲问题上奏凯歌，海军也异常兴奋，态度也一直强硬。不论海军还是陆军，都根据自己认为必要的主张不顾一切地扩大自己的军备。而且这也意味着陆海两军部为掌握政权而展开的竞争。华盛顿会议时，海军专门委员加藤宽治中将(后升为大将)极力反对这种比例。后来，他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军令部总长等统帅系统的主要地位，仍然始终继续反对海军裁军，进一步推进统帅权独立的观念，认为没有统帅部赞同的裁军是违反宪法的。后来继承加藤大将的人，也是统帅系统的末次大将。

所谓舰队派的意见，是与海军省军政系统首脑部相对立的，以加藤、末次两大将为代表。这种意见流行于海军部内，以至舰队派的极端论与军政派的稳健论发生了感情上的对立。事实上，两派之间对于需要扩大海军这一主张，没有大的意见不同。然而，在批准规定补助舰比例的伦敦条约(一九三〇年四月)时，围绕着统帅权的宪法解释

上的争论，终于变成了政治上的重大问题。

统帅权问题与滨口首相被暗杀 海军方面的宣传运动极其激烈。陆军势力及反对政党的国粹派集中起来支持海军，连枢密院的以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为中心的一派也附和了海军极端派的论调。他们依宪法上对统帅权独立的解释，认为海军军令部没有同意条约可以暂缓批准。在这里他们忘记了统帅大权与政治大权一起都是归于天皇的。滨口首相及币原外相认为，伦敦条约的缔结是经过军令部协议的，决定军备力量（根据宪法第十条）的权力并不属于统帅部，而是属于政府责任，遂强硬地请求批准，一步也不退让。统帅权独立的理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经过空前的大争辩之后，条约在枢密院通过，但政府在与统帅部争辩中，受到无法恢复的重创。批准条约问题完全变成了政治问题。反对批准条约的议论在国内很普遍，响应统帅权独立的国粹主义者不加考虑地滥用了正在兴起的日本人的感伤论调。

滨口首相在这种气氛中终于被暗杀（一九三一年四月），由若槻礼次郎继任，这是军部策划政变的三月事件之后，又是满洲事变前的事。此后陆海军一起竞相对现状表示不满，而相继发生了种种事件。军部根据统帅权独立的理论，不管政府而独自行动了。

废除海军条约 根据华盛顿（一九二二年）及伦敦（一九三〇年）的裁军条约，一九三五年又在伦敦召开裁军会议，全面研究海军问题。这是冈田内阁当时的一个难题。

海军内部在伦敦条约批准后，由于满洲事变的刺激，舰队派的强硬论渐渐得势，海军稳健论失去地位。他们的要求的最后目标，是完全废除海军条约的束缚。为了达到

这一目标，海军不分左右地团结一致，将这强硬论向外宣传。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的危机宣传，是海军预料到可以完全废除海军条约并以此为目的而煽动起来的。冈田内阁中虽有床次竹二郎、山崎达之辅、内田信也等政友会的党员入阁，但他们都是以私人资格脱离了政党而入阁的。铃木总裁领导的政友会，完全以在野党的地位，是政府的反对党，并且迎合舆论，同军部一起煽动极端论，所以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的危机宣传，连同对美浓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说的批判运动竞相发展，结果是神化的明征国体论厚颜无耻地公然在政界横行起来。软弱的政府受这种论调的压力，不得不一而再地发表无理论根据的明征国体的声明。海军方面希望全部废除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外务省当局主张维持华盛顿会议的体制，双方发生激烈对立，但冈田内阁压制外务省的主张，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正式发出通告废除华盛顿海军军备条约。已经在伦敦举行的预备会议（代表为山本五十六）因此无结果而散。日本更以废除华盛顿条约的政府强硬态度为背景，于次年一九三五年派遣代表参加伦敦海军会议。在伦敦会议上（全权代表为永野海军大将、永井大使），日本提议设各国共同平等的制舰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各国可以自由造舰。但因英美两国的不同意，日本全权代表退出会议。到此，已经不可能成立新的海军条约约束日本，而且因日本通告废除华盛顿条约，全部海军裁军条约都已不能限制日本了。

废除海军裁军条约不仅是建造军舰的专门问题，而且在实际上也是有关国家基本的政策问题。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更要全面废除裁军条约，这是关系到根本动摇日本的

国际地位的大问题，是应该极为慎重处理的。尽管如此，冈田内阁既不能抑制海军的主张，又不问舆论的是非，只为避免国内发生风潮就变成了海军的辩护人。日本先因满洲问题而退出了国际联盟，现在又废除了作为华盛顿会议基础的裁军条约，于是日本在国际上最后的盾牌已经撤去了。日本不受国际上任何约束，站在独立的立场上，但这意味着日本在国际孤立，各国在外交上都视日本为敌人。孤立产生不安，而不安更招来自卑感与焦急感，所以日本危机说盛行，军国主义者更唱其高调。军国主义者认为，必须扩大军备，组织国民，以防备日本的危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日本陆海军备的发展了，从此为实施充实军备和国民总动员，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于是，陆海军部齐头并进地迈向国防国家建设。

废除裁军条约对中国问题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因废除裁军条约，就意味着破坏华盛顿会议的体制。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虽没有明文废除，但发生了对关于中国的决议也可以同样无视的风潮，陆军对大陆的行动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的约束。其直接的影响，出现了日军在华北的行动。各国都以锐利的眼光注视这一风潮。陆海两军虽然是日本国防的两翼，但双方同时是激烈的竞争者。它们的竞争不仅是争预算分配问题，而且在对内对外政策内容的决定上，双方都主张平等均衡。这意味着，陆海军势力在国际上已脱离了制约，在国内又没有抑制它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陆海军可以无限制地对内外政治采取自由行动了。

当时，军部强烈提倡对满洲事变论功行赏，政府也没有反对的意向，终于实行了。对于违反敕命、反抗政府方

针、谋叛式的满洲事变以国家行赏，竟公然由冈田内阁大规模实行了。其结果，要想立功，要想受国家的恩赏，只能发动第二、第三个满洲事变，这是最捷径的办法。国民以非常奇异的目光看待难以理解的关于满洲事变的授爵叙勋的功劳者。

三 “满洲国”与关东军

改造国家计划与国防国家 本来满洲事变和日本的革新运动是同根而生，许多地方采纳了大川周明博士等满铁调查部的理想论。什么“五族协和”、什么“王道乐土”、什么“反对财阀”等左倾及右倾的革新精神，都由关东军幕僚的倡导而加以实行。仿照纳粹，以一党一国为目标，组织了“协和会”。又成立了日“满”经济提携协定，后来又以日本产业会社为中心成立了满洲重工业会社，和南满洲铁道会社并行，经营满洲经济。

关东军的智囊就是当初的满铁调查部。在后藤任满铁总裁时期，成立了一个调查部，在大连及东京建立大规模的机构，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调查与设计。大川博士曾指导过调查部。关东军幕僚利用这个调查部，编制成了对内对外的广泛的详细的革新计划。这就是革新的蓝本，军部革新计划者之间称之为《虎卷》。鉴于制作者的性质，它的内容极为广泛，又带有理想化的纳粹式的色彩。对内，以实行纯粹全体主义的革新为目的；对外，则梦想极端的膨胀政策。这个《虎卷》的全部内容，只有数名核心人物（中坚将校）知道，他们将计划以同志的秘密联络方式，让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在它所管辖的范围内一部分地分别推行，以

后综合全体实现国家改造，以完成革新的目的。但是为达到目的，采取了左倾的战术。关东军是满洲事变的直接发动者，也是日本改造运动的策源地。

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问题 日本军部占领了满洲，建立了“满洲国”，并负起了共同防卫的责任；现在把眼睛向四方一看，才发现自己责任的重大。

张学良的残败军盘据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一带，策谋着恢复满洲。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以来，苏联实行五年计划，迅速地扩张武力，从三面包围满洲。苏联与混入共产分子的中国军队合作，威胁“满洲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共产党军队，更把瑞金作为苏维埃中心地区；它西征(即长征)以后，又把延安作为中心地区，不断地扩大势力。关东军面对东亚新形势，必须采取紧急对策。为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认为凡不与关东军合作的，对日本的大陆使命没有自觉的日本现政府，决不应允许存在；必须根本革新国政，整顿态势以完成日本在大陆的新使命，更应建设真正的国防国家。这种思想通过军部，取得了支配地位，而且成了国家的舆论。这种毫不负责的日本言论刺激了世界各国。

苏联对日本经营“满洲国”异常关心，对日本对苏强硬论的积极言论也非常神经紧张。它预料日本将以满洲为基地，侵入沿海地区及西伯利亚，遂急速地进行防御设施的建设。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注重远东的工业化和移民的定居。在西伯利亚各地进行工业建设，作为军需工业的中心地；并且努力完成铁路复线工程，在“满洲国”周围建立军事基地。还有为了防备日本的突然入侵，以及利用世界对犹太人同情的舆论，在苏联远东军事中心点哈巴罗

夫斯库附近，建立了毕罗毕将犹太国(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更为对抗《日'满'议定书》的共同防卫，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共同防卫协定，以外蒙古为对抗"满洲国"的军事基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在乌兰巴托签订《苏蒙互助条约》)。在此之前，苏联曾向中国提议签订同样的同盟协定(一九三五年七月)，但未被中国接受。这样，苏联以两次五年计划(即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三年)极快的速度充实了对东方的军事设施，"满洲国"在陆上几乎完全被苏联包围。此外，一九三四年苏联参加国际联盟，并加入反对日德的国际战线(一九三五年与法国签订《互助条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也日益激烈，共产国际的东方半殖民地民族运动亦不断取得成功。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为保卫苏联采用了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战术，策划与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联系，把德国与日本作为共产党的敌人。于是，反日德的斗争变成共产党世界性的一项运动，中国共产党公然对日本军表示了敌视。这样，苏联对日德的共产战术，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不断取得进展。

关东军急忙在满洲建国，迅速为担负起大陆上新的军事上的责任做准备。但苏联的军事建设的进程，不久便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军部还沉醉在满洲事变的一时成功，认为日军之所至无事不成，既骄傲且又诱于功名心，并受到左右混合的革新论的煽动，对国家大局不做慎重考虑就干起来。国防责任上的不安全感和带有反动思想的傲慢混合在一起，使军部对国家的大事不断用直接行动来进行，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这在当时已经为共产国际采用的从敌人内部进行搅乱的战术提供了最合适的机会。曹尔基、尾崎间谍团在日中两国的活动，就是于满洲事变前的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开始的。

关东军与华北内蒙问题 关东军对“满洲国”国防上最关心的，就是同中国的“国境”地带，即华北与内蒙地区。盘踞华北的张学良部队，很明显是扰乱“满洲国”治安的原动力。如果苏联的势力通过外蒙古，利用中国共产党军的势力进入到华北时，不仅“满洲国”完全被苏联包围，而且中国也会置于苏联势力之下。所以，华北与内蒙问题，是关东军极为重视的问题。关东军认为，必须进行工作使这个地区掌握在不和“满洲国”敌对的势力手里，所以在满洲建设时，已在华北、内蒙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关东军之所以对华北问题有兴趣，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还在于建设国防国家这点上。政府曾询问关东军，为对抗世界封锁经济的风潮，实现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只靠满洲究竟充分不充分呢？满铁调查部根据宫崎的报告，认为只靠满洲的资源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此绝对需要开发华北资源。关东军以此向军部写了意见。军部首脑中积极从事国防国家建设的人，立即采纳了这个意见。

本来满洲事变后的内阁都以不把满洲事变扩大到满洲以外作为方针，并将“满洲国”的建设严格规定在长城以北地区。然而，关东军并没有遵照政府的方针，在很短的时间里又把活动扩张到华北和内蒙去了。

斋藤、冈田两届内阁时期，军部违反政府的意见，仍向华北与内蒙施展工作，它起到了把满洲事变扩大到中国事变的纽带作用。

四 广田三原则

收拾满洲事变的趋势与东亚的觉醒 满洲事变爆发使

世界震惊，也使日本人民震惊。国民忧虑日本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政府虽然尽力采取善后措施，但政府的力量控制不了军部。直接主持事变的关东军幕僚，按既定的计划向前突进。本庄繁司令官也默默地追随着事件的发展。

日本政府对外无论如何也要对关东军的行动负全部的责任。政府虽然对外保证说，关东军的做法只是当然的自卫措施，而且行动只限于最小限度。但是，事态已经变成对内对外的“革命”，关东军如脱缰之马，发狂似的猛跑，事件不断在扩大。

国际联盟终于判定日本为侵略国，日本断然退出国联（一九三三年三月），采取单独行动，坚持主张进行“满洲国”的建设，表示了以世界为对手的不屈的姿态。如果随之适可而止，也还象极有实力的国家。本来，满洲事变是因中国方面极端的排日运动而爆发的，国际联盟及外国大致也不得不承认日本的理由。在国联反复举行会议期间，满洲建国已经出现了。日本的行动，如果只限于满洲的话，当时并不是没有希望使各国默认的。特别是英国在东亚或在国联居主导的地位，当时还抱有日英同盟时代之感情的有力人士在保守党里也为数不少。想设法弥补对华问题的破裂，不仅是日本，英国方面亦有人在。英国在李顿调查团调查之后，曾以私人方式派有力的般比使节团来日；为救济中国财政，英国政府派遣财政专家李滋罗斯赴华之前，先访日本与日本当局协议，要求日本协助。这些措施表明，英国政府仍在注重和日本的关系，还想设法努力调停日中关系。

中国看到日本这种毅然的态度，惊异得瞠目而视，而各国则预言：“日本的冒险，立即会招致日本国家的破产。”

但是，日本愈益发挥了本身强大的潜力。革命中的中国抱着必须见习的心情，对日本的这种威力进行研究。这种心情恰似甲午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心情一样。于是，许多留学生、见习生陆续从中国来到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家来日也突然增加起来。

若抓住这个机会，也许日中关系可以转祸为福。但是，为此日本方面必须忍耐、宽大与自制，尤其需要运用大智。

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条件与天羽声明 外务省当局立即借着这种趋势，准备着手解决满洲问题。为此，必须先确定基本条件。

外务省的大体方针是：第一，日本应遵照当时退出国联的方针，除满洲以外，严格禁止积极行动，以表示并无任何野心，特别应注意美国所注重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希望各国不要煽动中国不负责任地排日，也不要给予中国武器上或财政上的援助，以激化日中两国间的斗争。第三，要觉悟到日中两国正面临着共产党的扰乱与灾祸。日本表示态度应慎重行动，以期避免各国对日本的非难，同时使各国彻底理解日本为安定东亚势力所处的当然地位。满洲本来是中国的边境地区，常常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还没有成为中国的完全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曾以“何为中国？”为题提出讨论过。然而，要使中国立即承认“满洲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日本方面应注视满洲建国的推进，俟它日有机会时再请中国予以承认，而且“满洲国”本来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地区，因此只要中国方面避免采取恶化中国与满洲关系的政策，尽量设法改善双方的关系，听其自然发展，总是可有机会最后解决的。

日本应表示对中国本土绝无任何野心，同时对中国方面的要求亦应以宽大的态度对待之，以求得满洲问题的解决。这是日本过去的想法，这时又重新强烈地提出来了。

这个政策很有效进行之后，各国也逐渐增加对日本的谅解，同时也受到了内外舆论欢迎。然而，当时（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在列强中（主要是德国）排除了日本，对中国给予军事借款、供给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与教官、建筑机场等等，煽动反日抗日运动的情绪，因此有阻碍日中关系及扰乱东亚和平之危险。于是，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情报部长在日本记者定期招待会上，在回答询问时对以前的方针做了说明。这段说明在四月十七日以当局非正式谈话的形式，在报纸上刊载；可是海外各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对这个消息产生了误解，所谓《天羽声明》被恶意地宣传利用了。这段声明，只是对前述方针第二点的一种补充说明，其主旨并非完全无视九国公约或驱逐在华的外国人，而是阐明日本对中国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为防止中国事态恶化各国应有的态度。

总之，上述的方针不外是正当表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关于满洲问题在于调和日中两国以及各国的利害与感情，以期得到根本的解决。后来，在议会上发表了广田三原则的声明，以进一步表明这个方针。日本企图根据这个方针，在逐渐缓和的气氛中，日中两国，再加上代表外国利益的英国，进行交涉。这个企图，好象和解决上海事件的途径一样。

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英国的谅解和斡旋，这在理论上以及实际上，都已证实过了。这是因为除了英国（英国的后面还有美国）之外，其它国家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

任务的。如果根据前述的方针，用确实而统一的外交政策，由政府实行的话，可以毫无疑义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问题就能得到有利的解决。笔者后来在伦敦担任驻英大使时，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战后，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中国法官根据自己观察认为："如果这个政策继续执行的话，也许中日关系能得到全面的改善，但军部为阻止这个政策执行，用阴谋手段发动了二·二六叛乱。"这个结论正确与否，是另一个问题；而这个政策确因当时军部事实上的反对而未能贯彻。政府不但不积极实施抱负，反而采取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军部方面完全排除和英美的妥协，而且极力反对日本除在满洲以外保障对中国本土毫无野心的政策。

军部的反抗 如前所述，当时内阁不仅对军部极为缺乏政治力，而且冈田内阁忙于海军裁军问题的处理，对于满洲问题及日中一般问题任其发展。政府不敢抑制军部的行动，也缺乏指导军部行动的热情。不仅如此，由于通告废除海军条约，已经根本破坏了华盛顿会议体制，再放任军部对中国的行动，大局将更无法收拾。

关东军全然不顾而且无视政府的外交方针，秘密地推行对华北的工作。外交当局和政府也无从获悉其中的真相。外务省拟定的前述有关大局的外交方针，军中央部虽然表面上表示赞成，但贯彻时，军中央以及各地军事机关都强烈地反对。外务省根据既定的决定，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强化使节的地位，试图强力实行新的政策；但军部以大使升格问题事前未与陆军省协议为理由，用威胁态度进行抗议，并对外务省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军部的真意是，满洲问题不用说，就是中国问题本身也应脱离外务省，由

军部独自处理。因此，军部对华北乃至中国问题，决不允许外务省过问。对军部这种独断横行，政府不敢加以制止。

驻华陆军武官矶谷少将经常用日本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诽谤各国对中国的态度，表明日本军部处理中国问题的决心；谩骂中国政府，激烈攻击英国，完全站在与政府外交方针相反的立场。军部中央与之相呼应，使中国及列强的舆论因之沸腾。当时内外非常重视日本实权者军部的态度，随着事态之日趋恶化，政府的外交政策也越来越失去控制。

军部用这种态度进行华北工作，成了共产党最好的宣传材料。好不容易缓和起来的气氛，又告紧张，每次收拾满洲问题的外交尝试都受到破坏。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受到蒋介石的讨伐，不得已后退；但是有关日本军部在中国本土的工作却利用国际共产势力的反日风潮、策动捣乱，有效地而且隐密地实行起来了。

国际联盟自苏联加入后，共产分子逐渐增加，国联卫生部长莱西曼（波兰犹太人，共产党员）被派往中国，调查鸦片问题，以作为当时攻击日本的有力材料。他后来任中国政府的顾问，在中国政府内部最有效地为共产党服务。曹尔基间谍团，也长期在日中之间进行活动。共产国际以世界组织全力使日中纠纷扩大为国际性的问题。欧美各国的苏联第五纵队立即在政治上加以充分的利用。于是，美国对日态度，在史汀生主义之下，越来越趋于强硬，强迫日本实行理想的门户开放政策，即使细小的事情，也反复反对提出抗议。这都刺激着日本军部，终于使日本当局实现满洲事变的解决化为泡影了。如果英美接受日本和平主义者的提案，承认日本是东亚安定的势力，以政治眼光采

取暂先安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政局，那么世界形势恐怕也不会如今日这样危险吧。

五 “二·二六”叛乱

皇道派与统制派 立志革新国家的人是以天剑党和血盟团中的青年将校为中心的。他们大多数是崇拜国粹主义皇道派的前辈将领，企图由这些前辈来实现革新事业。如前所述，为开拓革新道路，中央与地方同志间相互串通，首先以自己率先，决心以直接行动铲除障碍改造国家的人物。荒木大将就任陆军大臣，真崎大将在闲院宫参谋总长之下，就任参谋次长之后，皇道派势力突然抬头。而后林大将代替荒木大将就任陆相之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斗争，公然在军部内激烈展开。

本来，从陆军系统看，萨摩派的上原元帅和长州派的田中大将是对立的。在田中全盛时期，继承上原元帅的有宇都宫、福田雅太郎两大将。后来有武藤元帅（“满洲国”建立后，第一任关东军司令官）继承这个势力，直至荒木、真崎两大将时，成为皇道派。皇道派里大多数都属于统帅系统的将领。另一方面，继承田中大将的是山梨、宇垣大将以下的上级及中坚军政系统有政治家气质的将领，后来称之为统制派，先后担任军中央的重要职务，成为军中的主流。

相泽事件 林大将代替荒木为陆相，深感维持军的统制是个重要问题，要严厉惩罚直接行动等不稳的行为，取缔青年将校，并采取镇压危险分子的方针。林陆相罢免了青年将校崇拜的真崎教育总监，青年将校非常愤怒，因此

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

相泽中佐是个单纯直性的人，和青年将校团体没有直接联系，但和他们志同道合。奉命调任台湾时，他认为真崎大将被免，是因为永田军务局长等把握实权的统制派的阴谋，决心自己代行天诛，白天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办公室，若无其事地将永田杀死。陆军内部的斗争，以最不法的手段，受到血的洗礼。

从此以后，军部内的派阀斗争，突然沸腾起来。对相泽中佐惨杀永田少将，认为义举而加以同情的人，都替相泽辩护；在军事法庭审判相泽时，利用左翼的战术，以辩护的形式大肆宣传。辩护人满井中佐等极力揭发日本政治的腐败，力主革新之必要，更指责军内的弊端，攻击统制派干部。这样一来，青年将校革新运动，和军内部的派阀斗争关联在一起，在北一辉、西田税暗中指导之下，愈来愈显采取直接行动的趋势了。

士官学校事件 军部的前辈为了使热血的青年将校头脑冷静，曾费了相当的苦心。单纯为国家着想的青年将校团体中，有全部士官学校的优秀生。他们对军的干部反感，也不愿上作为军人登龙门的陆军大学，等待着为改造国家而献身的时机。

然而，他们中的领导者村中大尉及矶部主计等人，终于倾听他们所信任的前辈的忠告，接受了劝告，停止直接行动，决心以模范军人为国家服务。村中进入陆军大学，作为学生认真专心从事军事研究。

但是，青年将校的一般政治运动一点也不衰落，士官学校学生中仍有不少受到政治运动的感染。军部当局确立了肃清祸根的方针，由士官学校干事（东条少将），根据中

队长(辻大尉)制订的计策，给青年将校同伙的叫佐藤的学生下指令，让他内探他们的行动。佐藤历访村中及矶部，用辱骂他们变心来试探他们的真意，结果发现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对国家的革新精神一点也没有改变。

军部当局得到内探的报告，以此为理由将全部有关学生开除出陆军大学，更令其退役。根据军部的内规，未达恩俸年限的将校，是不应使其退役的。同时，士官学校的学生也多数被整肃。这件事称之为士官学校事件。因此，青年将校对统制派的军首脑部反感达到极点，村中、矶部等满怀着复仇心，考虑着重新崛起的时机，秘密地与同志在一起研究计划。而他们的背后，有北一辉及西田税等革新主义者。

重臣被暗杀 第一师团突然奉到命令派驻满洲。根据军部的内规，只有东京师团不外调。他们猜疑，这突然调动是一个计谋，是要把与青年将校关系紧密的部队从东京赶出。于是，他们决定非先下手不可了。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大雪之夜，以第一师团野中率领的部队为中心，连同近卫师团及其它部队，举着旗帜，分头出发，按照周详秘密的计划，决定先行暗杀元老及重臣。主力部队袭击了首相官邸，占据了永田町、霞关及溜池一带地区，并占领了警视厅、内务省参谋本部及陆军省。

西园寺元老住在兴津，事前已避难去了；牧野前内大臣及家属住在河原野村别墅，夜间受到袭击，经护卫警官勇敢保护，勉脱虎口，警官殉职。斋藤内大臣、高桥藏相、真崎大将后任的渡边新教育总监，各自在住所被惨杀；铃木侍从长在官邸也受了濒死的重伤。

同冈田首相住在一起的堂弟是秘书松尾大佐，他因相貌很象首相，而被误杀，致冈田本人得免于难。冈田首相在松尾大佐祭葬搬运尸体的混乱时，脱出叛徒包围的官邸，演出了一场戏剧性的场面。

同叛徒交涉 叛乱部队将国家重臣分别血祭之后，到永田町的首相官邸集合，与总队会合。叛军以溜池的山王旅馆及饭店为根据地，以首相官邸为大本营，盘据附近一带，并设置警戒线，更追查所谓自由主义人士，向全国同志发出通电，促其发动暴动。因此，各地也发现有不稳情况，也有动员的军队附合叛乱，但终于大势未为所动，全国性的叛乱得以幸免。外相及次官之官邸也被搜查，但外相和次官均不在官邸居住。

叛乱发生之后，所有阁僚及重臣，都躲到皇宫中，住在宫内省。宫城门锁着，与外部的交通，除平常不使用的通过平河门宫城背后迂回路以外，都被遮断了。事件发生后，后藤内相就任临时首相。冈田首相逃出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约一两日后从隐避的家中前往皇宫，向天皇报告一切，并集合阁员，解除了后藤临时首相之职。

国家政治中枢的首相官邸被占之后，连首相生死也不明的时候，政府也无从公然发表东京所发生的事件，国民连政府的所在地也不知道。流言蜚语忽然在各方面传播，日本有陷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有识之士期待有人出来，竖起国旗，表明“日本政府在此”；但后来听说内阁诸公，甚至军部领导人物，与元老重臣一起，都在用河沟与铁丝网围起来与外部隔着的皇宫中躲起来，不免使国民非常失望。内阁在这危机中提出辞呈，政府就无形中自然消失，国民所依赖的指导国家的政府，在相当期间事实上就不存

在了。

躲在宫中的大将阶级的军事首脑人物前往叛徒占领的陆相官邸，和叛徒首领会谈，连日努力交涉，希望早日结束事件。在此期间，叛军自称"尊王军"，一般人称之曰"蜩起部队"，或"行动部队"，或"挺身队"。但川岛陆相晋谒天皇时，天皇严厉地询问："为什么还不镇压叛逆？"因此，把这些部队称为"叛乱军"，顺逆才开始明确。

在此期间，当时戒严司令部参谋石原大佐等，集合在帝国饭店，协议推举右翼运动人士山本英辅海军大将为后继内阁的首领。但叛乱军要求，以真崎大将为首领，建立以军为中心的政权，断然实行革新；如能贯彻其要求，则解散队伍服罪，并且自杀。

镇压叛乱 内阁是根据天皇大命而产生的，当然不是由真崎大将承认与否而决定的问题。随着时日荏苒一天一天过去，帝都东京的不安情形更加严重，又经过了数日的焦急不安。海军认为陆军若再犹豫的话，就由海军单独镇压，开始将海军省建筑物武装起来。这时为镇压叛乱，军队也终于在各地集合，陆军讨伐总部设在九段下的军人会馆，但因讨伐军参谋石原大佐等发表过鼓励叛徒的言论，使人们对讨伐的真意发生了疑问。真崎、荒木等各陆军大将连日向叛军说服，结果叛徒的首领决定实行自杀，并将十八具棺材运到陆相官邸，自杀用的手枪和日本刀等也准备好了。这时北一辉打来了电话反对自杀，宁可先投降，然后在法庭上斗争。经他劝告之后，叛徒们推翻了自杀的决定。戒严司令部对叛徒开火风声传出之后，队长野中在首相官邸庭前用手枪射击头部而死，其他人自首，兵员也返回兵营。这是二十九日的事。

军事法庭经秘密审判后开庭，宣判首谋者北一辉、西田税等处死刑；真崎大将约经一年的拘禁被释放了。

冈田内阁在事变中实行了总辞职。川岛陆相对军队的叛乱负有直接的责任，他的辞职理由也和其他阁僚一样，天皇对此表示惊异。西园寺立即奏请近卫公爵继任。近卫坚辞，使元老相当为难。当时重视国际关系，结果推荐为收买中东路与苏联交涉成功的广田外相担负收拾叛乱后政局的责任。

叛乱与外国使节 帝国军队直属天皇，天皇也说过军人"为朕之股肱"。帝国军人在天皇面前，连近卫兵也参加白天叛乱，杀害国家重臣，占据政府中枢达四天之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否为叛军？就连顺逆问题也很难决定。由此可见，军内部是如何混乱了。

在任何时代，正本为政治的根本目的。为维持国家社会秩序，极为需要明确顺逆，有条有理。在日本有一种说法是"憎其罪而不憎其人"，过于怜悯其单纯动机，而颠倒了本末，混淆了是非；甚至对扰乱社会共同生活组织的行为，或轻免其罪，或视叛贼为英雄行径。昭和时代的动乱，是不是明治初年以来，经过多少颠倒是非的史实的堆积而发生的呢？吾人不得不想起，常常听到由军人口中说出对天皇批评的话，说"二·二六"叛乱时，如果天皇反对革新的话，将拥立某宫殿下代替天皇。实行所谓天皇机关说的人，反而是批判这种学说的军部。军部的跋扈情形，常使人们回想起古代武士专横的时代。

叛乱发生后不久，有不少外国使节越过叛军包围的哨兵线，来到外务省慰问。因广田外相当时住在宫中，故笔者接待了他们。他们对此种状况深表同情，特别是东方的

两位代表阿富汗和泰国公使，他们流着热泪，握着笔者的手，说："东洋先进国家日本，发生此次事件，使我们感到非常可惜。"笔者只有感到惭愧，俯首致谢其善意与同情。在他们眼里，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可以靠得住的日本，秩序如此大乱，不胜惋惜。这是外国使节的直觉。对世界和平负有重大责任的东洋国家日本，今后究竟走向哪一个方向呢？覆盖着大雪的帝都，因军队的叛乱，到处留着鲜血淋漓的斑点，国家中枢机能已经完全丧失了。电车的响声今天也听不到。在寂静的天地中孤独地站着的笔者，在外务省会客室送走了友好国家的代表，越发涌出了无限的感慨！

广田内阁成立 广田内阁的组阁总部，是在永田町首相官邸对面的外相官邸。组阁因军部的阻碍，进展缓慢。军部任性地推出寺内大将，为川岛陆相的后任。寺内大将带着军务局的几名幕僚，来到组阁总部，提出了种种要求。当时，以组阁参谋长资格的吉田茂本来预备担任外相，但因军部的反对，吉田茂连组阁的工作也退掉了。后来与军部有联系的劝业银行马场总裁，担任了组阁参谋长。再后，军务局的武藤中佐(后来为军务局长)等中坚将校，又来到组阁总部，反对下村宏就任文相。组阁用了一周以上的时间，经军部的认可，才勉强成立。

广田首相之下，马场为藏相兼任副首相，寺内任陆相，永野任海相，外相起用刚赴华不久的有田大使。新外相就任后，笔者辞去次官，由欧美局长班内谦介继任。

广田内阁是在"二·二六"事件重压下产生的，它提出了"庶政一新"口号，但事实上是军部的傀儡。满洲事变使军部完全脱离政府羁绊，可采取独立行动；而"二·二六"

叛乱，终于使军部实事上夺取了日本的中央政府。

军部的首脑部的以寺内大将为陆相的统制派，借皇道派援助叛乱军为口实，在所有军部前辈应负责退休的名义下，将属于皇道派的将领全部清理出去了。青年将校中的极端论者多数调到国外或地方部队。但是，军部中坚将校依然继续其幕僚政治；而关于对内对外的所谓革新政策的方案，以《虎卷》为蓝本，仍由他们的手强力要求政府实行。

第三章　北进与南进

一　广田内阁

广田内阁的性质　在"二·二六"叛乱的重压下成立的广田内阁，事实上只不过是军部的工具。虽说是工具，但不是军部自造的，而是借用的，所以即使是军部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

广田首相原是玄洋社右翼出身，在外务省里算是一个异端分子，但他不是承认军部方针而衷心与其协力的。他的议论，有时听起来反动，并且他本身还是主张军部内阁的人。但其宗旨是：以实力来推动国政，让它负起表面上的责任，并使一般国民批判它；为防止背后的谋策，政治在任何时候都注重责任并使其明朗，而不致经常成为谋略的牺牲品。他个人的性格，已经领会到禅宗的思想，与其自己积极进取，毋宁顺着周围形势的发展，来处理一切。

他的外交政策绝不是好战的，相反却是希望和世界各国维持和平，不使日本硬干。他自一九三三年继内田为外相以后，所表现的成绩，可以明示他的主张。元老也认为，为收拾"二·二六"叛乱的混乱的政局，顺应世界大势，诱导军部，使内外政策不致发生错误，以广田为最适当，因此被选组阁。

广田内阁决不是军部能自由自在使用的工具，但是在

叛乱后军部重压及突变的社会形势下，事实上对军部策划也是非常无力的。若槻、币原政党内阁对军部是反抗的；斋藤、冈田的海军内阁对军部是旁观的；至于广田、林的软弱内阁，对军部是无能的。于是，接着推进到近卫和军部协力的内阁。

军部大臣的现役制 广田内阁以“庶政一新”为标榜，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根据军部的要求，恢复军部大臣的现役制。这是一件非常不如意的事。

军事专家的职业军人在保有军人资格时干预政治，进入内阁，这是除了德国威廉二世时期以外，在近世所不常见的例子。特别是近代国家，政治应以国民的代议机关为中心，由政治家来担任，通常是不允军人来干涉的。但在日本，除模仿德国的军国主义之外，加上八百年来的武士政治的流弊，在统帅权独立的观念下，有关军事的问题由军人处理已成定例，并由现役大将、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但随着国民舆论的开展，接着是政党的发达，对这种封建制度的残余开始表示不满了。

本来，这种制度不仅从正面违背了明治天皇诏书上讲的“军人不得参与政治”的意旨，而且不可思议地一直被默认，并作为藩阀的遗产，成了军部政治势力的源泉。第一次山本内阁时期，终于扩大范围，可以任命预备军人为陆海军大臣。这只不过是说不仅限于现役军人，也包含预备军人。但这已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了。因为预备军人已经被置于军队的普通组织之外，除必要时有应征的义务外，和普通国民没有不同。还有，原政友会内阁时，殖民地总督也采用文官制。

广田内阁根据陆海军一致的意见，由寺内陆相要求，

推翻了山本内阁时期的改革，改为陆海军大臣只限于现役军人。海军也利用了这个制度。其表面的理由是，"二·二六"事件之后被列入预备役的大将、中将，一旦再任大臣时，恐怕会扰乱军部的统制。事实上，这是统制派防备被赶走的皇道派复活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被恢复的制度本身，不言而喻的是如何使军部的政治势力变成为铁腕。

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身居特权地位的军人越来越向政治方向进展，逼使政治家步步后退。对政治无论有怎样密切关系，事关军事，除军人外，他人没有议论的资格。因有这考虑，所以军部思想上的观念和政治上的意图，原原本本地成了国家观念和国策了。一般国民对这点毫不感到奇怪，而有识之士对这种重压也渐渐驯服起来了。

军事预算的膨胀　广田内阁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军事预算的膨胀。虽说是军事预算，也是属于政府预算的一部分，应在政府立案，需要议会通过的。政府可以抑制军部行动的唯一手段，是编制军事预算。一直到冈田内阁时，历代的大藏大臣注重预算的平衡，对军部的巨额预算要求，每每予以反对。然而，军部要求预算的态度，每次都是极其强硬的。陆军方面要防备占领满洲后的大陆，海军方面要准备废除海军条约后的国防，都要求巨额军事费。因国粹主义的宣传、抽象的国体明征与危机说，所以军部提出了充实国防的口号，主张具体地扩大陆海军备。马场藏相放弃了过去冈田内阁藤井藏相死争的态度，对军部的预算要求，采取极其宽大的态度。

满洲事变后，因废除裁军条约以及华盛顿体制破裂而进行充实军备当然是国家的重大问题。就是说，日本退出国联之后，进入了微妙的国际关系时期，所以充实军备的

军事预算问题，应当作为国家最高度的政治问题来处理才对。然而，这重要的问题尽照军部的意图来做，对国家是相当危险的。

本来，因军事方面的极度压迫，日本军事预算与一般预算的比例，除了极权主义国家之外，比任何国家都高。要想维持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军事预算如再超过现状增加，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因此，为增加军事费，要进行种种宣传。而且，极权主义的理论认为，从现在起，国家财政可以用无限制地增发纸币来维持，只要采取适当收回发行的纸币的办法就是可行的。他们引用德国财政为实例，认为这种办法可以不断地进行。

为了达到增加军事费的目的，陆海军言论放肆，有关政策的主张很露骨。而且，这种倾向在满洲事变以及废除裁军条约后更加明显，陆海军为分配预算的竞争也上升到了新的阶段。

二 北进与南进

军备与预算 在日本的政治上，统帅权是独立的，但这个统帅权复被陆海军瓜分，这是国家的致命灾厄。因满洲事变，承认了军部的直接行动，因退出国联与废除裁军条约，军部不受国际制约之后，陆海军国防当局遂立即开始无限制扩充军备。同时，牵制此种行动的国内政治力量已经消耗尽了。

满洲事变发生后，陆军预算急速地膨胀。海军因废除裁军条约后无限制地建造军舰，因此与陆军保持着均衡的势力。陆军在“满洲国”建立后，不得不明确地以苏联为假

想敌国。海军在这一点上又必须与陆军对抗，满洲问题以来突然反英美思想盛行，认为不仅仅是满洲问题。陆海军的扩军竞争，甚至出现奇怪的现象：军部预算压倒了一般预算，并急剧增加，而军部预算又一分为二，以保持均势。陆军的态势是北进，海军的态势是南进。太平洋中一个小岛国的日本，竟以世界最大陆军国和海军国为目标。双方争取势力，因此造成可怜的日本因陆海军势力争夺自身已向南北分裂了。

海军无论对满洲事变，还是对华北工作，都是加以反对的，而陆军则认为南进政策既危险又蠢笨。象近卫那样的政治家百般苦心以海军牵制陆军，其结果是事实上不得不向陆军主张和海军的要求屈服。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与上海　北方的日中冲突立即影响到上海，这在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上海战争已经得到证明。陆军与海军作战的共同地点，就是上海。

陆海军统帅部每年制订对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且每到年度末上奏天皇请其裁决，秘密决定了这一年的作战准备。这是陆海军共同的计划，成案自然是陆海军两统帅部的一致要求。

作战计划是以各国为对象分别订立的，只是应付国家紧急时候的准备行为。这是专属军部的腹案，纯粹属于统帅处理的事项。但是，其中当然也反映了陆海军的政治意向。两统帅部各自向海外派遣武官，组织情报机构，调查研究设计有关的重要局部问题，因此常有独自的见解，产生他们独自的对外政策，这一点包含着很重大的意义。

对中国每年也订立作战计划。在制订昭和十一年和十二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海军

鉴于第一次上海战争，认为需要有华中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上海的用兵计划，主张将此项内容插入计划中，但陆军则加以反对。陆军的观点，向来只是重视苏联问题，而不重视对中国本土的作战；对中国的用兵，认为除对华北之小规模作战外，其余绝不需要。海军的意见则重视南方，认为一旦日中冲突，只出兵华北尚欠充分，必须出兵上海。每年制订作战计划时，海军早就知道陆军的反对意见，鉴于陆军向华北工作，认为需要及早地得到许诺。对海军来说上海被认为是重要的地区。

因为统帅部内对作战计划上的意见冲突包含了陆海军在国策上的意见分歧，所以双方不容易妥协，以致每次计划都赶不及年度末上奏天皇的期限。陆军采用了“必要时得向上海出兵”的妥协提议，从而完成了上奏。然而，参谋本部的真意却认为不需要向上海派兵。陆海军这种意见不同，不止在年度的作战计划问题上。由卢沟桥事变引起的日中战争，战事逐步向南进展，这是说明陆海军主张的一个重要关键。后来，对陆海军立场的说明，尽管也有重要的资料，但只因关系到对统帅部间的统帅事项，连首相也无权过问，对其间的消息也就无从探知了。

基本国策纲要　广田内阁时期举行过五相会议。除首相外，有外务、陆海军及大藏大臣参加，讨论有关对外问题的重要国策。对军部的大多数提案，均以原案形式予以讨论，并由陆海军军务局及外务省东亚局为中心进行工作。当时东京中央部所关心的事，是尽可能限制满洲事变以来过于强大的关东军的权力和活动，让它在“满洲国”国内，不向华北发展，专心从事对苏国防。对于这一点，不仅是外务省，陆军与海军均无异议。外务省对中国本土，企图

以南京政府为对象，用外交方式进行处理。但是，陆军的态度，如前所述，认为对中国已无外交可言，更无外务省活动的余地，所以对所谓大使馆升格问题强烈反对；虽然对关东军不向华北发展这一问题上，同外务省一致，但认为华北问题应由日本在华北的天津驻军处理。海军在决定一般国策基调时，一心想将年末的南进方针作为日本国策。基于以上的各自立场，决定了由陆海两军务局及外务省东亚局设计的协议案，作为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或称之曰《国策基准》，又称曰《国策大纲》。当时的潮流是，政府的事务当局与军部一起，经常为了推进"作业"，在许多这种场合下设计拟草有关国策，因此常常留下了后患，这个《国策大纲》就是最好的例子。

根据这个决定而制订的日本基本国策是使日本名副其实地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明确表明"在外交与国防密切配合之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并指出将大陆政策与南进政策两个方面作为手段。对大陆政策的基本点，是"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完成并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而在执行上述政策时，应注意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而对于南进政策，则决定"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外南洋（指荷属印尼）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它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并同'满洲国'的建设相配合，充实国力，加强国防。"至于以整备国防作为实现这个方针的手段，陆军决定"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朝的兵力，使其

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并明确写明“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充实足够兵力。”这个国策纲要对外交工作予以期待，并要求刷新内政及确立经济政策。它是以建设一个真正的超国防国家为目的的。

五相会议所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使海军方面从“二·二六”事件广田内阁成立后而一直计划着的南进政策 正 式被采用为国策，与满洲事变以来的陆军的北进政策并肩而进。这是海军方面的成功。

这个文件在有关者中得到谅解的宗旨是以北进来解决北方问题，以南进来伸张日本的权益。它的非常重大的内容在于决定以南进与北进作为对外政策。这个南进北进的决定是陆海军妥协的结果，它也为陆海军均分预算埋下了伏笔。也就是在议会上的说明，仅仅是预算上的措施。在内阁方面，马场藏相所表明的方针是在此之际不得不增加军费，而外务相有田强调的方针的宗旨是为使与列强诸国顺利开展邦交，当尽一切努力，故极力赞成此决定。

比五相会议还重要的是它的后面的陆海两军部间所达成的一致，但更为麻烦的是要在编制对华作战计划及年度方案时充分地加以体现。陆军固执北进，海军主张南进。各部内的激进派都强硬地坚持各自的立场，首脑部对此也做不出决定。经陆海军妥协，采用北进与南进并用的决定，其结果得到了一个极不合理的结论：陆海军同额均分预算。但是内阁不确实探究内幕，而摆出了务必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陆海军的妥协意见，从而决定了这一重大的国策。从此，陆军更从事北进，海军也急速南进。

当时正在交涉防共协定的驻德武官大岛接到参谋本部

发来的这个基本国策纲要，曾向中央部询问："其中北进南进并用的决定，不符合防共协定交涉的宗旨，今后对德国方面应如何进行交涉?"对此，陆军答复大岛武官说："陆军向来注重北方即北进方针，并未考虑到南进，防共协定的交涉应按既定方针进行。"但是，陆军的意见绝不能够丝毫制止海军的南进政策。

三　华北工作

华北工作的开始　满洲事变如果只限于满洲，事态也不会闹到在国际上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日本当初举国一致有计划地发动满洲事变，也是可有计划地将事变结束的。但是，满洲事变只是病态的日本的对内对外革新运动的一个大波动，而产生波动的根本病源是有区别的。

满洲问题如果照政府的意图，只限于长城以北的话，相信解决满洲及中国本土问题的外交方针可以得到相当的效果。进行华北工作，终于诱发了日中战争，变成了引导日本破裂的导火线。

如前所述，对华北工作可以说是自满洲建国后不久即开始的，在斋藤、冈田内阁时期已由关东军积极地进行了。外务省在当时虽努力探听华北工作真相，但未能得到实况，只是对形势推移忧虑而已。也如前所述，当时政府首脑部把满洲问题委给陆军，不仅不干预，而且宁可躲避满洲问题。

关东军之着手对华北工作，其宗旨在巩固"满洲国"的国防，而参谋本部赞同此工作的理由，是为了进一步建设国防国家，需要利用华北的资源这一附带的宗旨。日本华

北驻军所表示出的热望，是为了同关东军对抗，把华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华北工作的危险性　主张热河省是“满洲国”的理由是因为该省在长城以北。日本政府在满洲建国时，已经承认了此项主张，同时禁止关东军向长城以南进展。但是，关东军不顾政府的意旨，只是在军中央部的默认下，已向接近“满洲国”的长城南北地区，即河北、察哈尔两省，进行了所谓政治工作。对华北工作分为两项，一是内蒙工作，二是华北工作。其目的是在这些地区排除敌视“满洲国”的政权，而建立友好的政权。

满洲建国后，根据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塘沽协定，中国方面与关东军之间，以长城为界划定了停战线；讨伐热河之后，关东军从长城以南的蓟河方面撤出，奉天与平津间的交通、邮政也恢复了，秩序也渐渐恢复旧观，但关东军进一步着手华北工作后，形势再次逆转了。

对华北、内蒙的工作，因威胁张学良军队生存，不仅要受到张学良军队的反抗，而且逐渐会发生与刚统一中国本土的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国民军冲突的危险，再有河北及内蒙古都是以苏联为背景的共产势力的地区。不仅如此，因为平津地区是欧美各国神经错综复杂的国际地区，情况极其复杂，在此地区施展政治工作，是一件无可比拟的困难事。如前所述满洲事变以来，共产国际为扩大中国本土的祸乱，已经在秘密地寻找机会，所以日本军部在华北进行工作，正是给了他们一个良好的机会。

土肥原少将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资格再度出现于平津地区着手华北工作。这时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之间，发

生了管辖权限的争执。

华北驻屯军　满洲事变发生后，关东军一直在加强，变成庞大组织的大陆军队，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参谋长酒井)势力很弱，以两个大队为其主力(北平和天津各驻屯一个大队)，塘沽协定成立后，在一九三三年底增派了一混成旅团，从而加强了势力。此后，华北驻屯军对顿然增强势力的关东军把特务机关派到华北，着手政治工作，提出了抗议，认为是越权，有碍华北驻屯军的面子。因此，关东军不得已做了妥协，让土肥原少将兼任华北驻屯军幕僚，有关华北的工作，由华北驻屯军直接指挥。酒井参谋长是抱积极态度的人，他坚决地表示决心，自己动手进行华北工作。当时，驻华大使馆辅佐武官高桥旦大佐也在北平活动，与土肥原特务机关长、酒井参谋长协力合作。

酒井少将曾回到日本和中央部接洽。这时东京有人说，已经预感到华北什么时候一定要出事。酒井少将是同僚中至今唯一没有得到勋章的人，诚实人对此感到忧虑。

何应钦、梅津协定　当时，对中国问题，围绕着日本在华北的工作，有人在喧嚷。驻华使馆矶谷武官屡次在报上发表激烈的声明，俨然是日本政府发言人的样子。中国方面认为，日本的工作是进行华北独立运动，其目的是制造第二个"满洲国"，为对抗起见，让国民军北上，并派许多国民党宣传人员及CC分子等进入平津地区。共产党也发挥全部机能反抗日本军。由于分不清国民党反抗与共产党策动的配合与联系，因此华北的日中军事冲突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了。

酒井参谋长为挽救这种危险事态向驻天津的中国军总

司令何应钦上将要求，让国民军、国民党抗日宣传机关及CC团等的直接行动队由平津地区撤退。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为了向在满洲视察的陆军大臣林报告军情，前往奉天；起程之时，口头批准酒井参谋长用恳谈方式向何应钦提出这个要求。但酒井少将提出要求时，并没有照司令官意旨，而采用了类似胁迫的粗暴手段。中国方面被迫接受了酒井参谋长的要求，将国民军撤离华北。这被称之为何梅协定（一九三五年六月）。事实上这个协定就是把中国中央军势力驱出河北省，很明显地伤害了国民军及何应钦上将的面子。战争结束后，中国方面逮捕了酒井参谋长，并处以死刑。

南京政府的势力在华北消失之后，马上就开始树立军部所希望的政权。最初建立了冀察、冀东两个政权。在北平的中国方面的实权者，是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他和日本军方面及土肥原机关联络，组织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省平津地区及察哈尔省。"满洲国"与平津地区之间的河北省东部（包括港口），在关东军支持下建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北平东约十英里的通州为首府，由殷汝耕管理。这个政权被谴责为满洲与华北间的走私机构。

冀东、冀察两个政权在以后几年与王克敏为首领的在北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合并。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是后来汪精卫的南京中央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

内蒙工作　内蒙工作完全是经关东军之手进行的。最初，关东军以武力从热河向绥远进展的时候，被受中央援助的张学良方面的傅作义军队所阻止。

内蒙古位于长城以北，以察哈尔为中心，在外蒙古、

"满洲国"、华北之间，西望新疆的广大地区，有北平至包头的铁路贯通其间。在这个地区居住的是蒙古人，与在外蒙古、"满洲国"西部以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居住的伯里德蒙古族是同种，都是成吉思汗时代统治欧亚大陆蒙古人的子孙。他们的理想，是重新在亚洲中部建立一个蒙古人的国家，当时在内蒙古最有势力的蒙古人就是德王。

如上所述，很明显，在地政学上看，内蒙古地区在东亚大局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在这一地区培植新的势力，当然要受到有关国家的极力阻挠的。特别是以苏联为背景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同苏联联系，需要维护内蒙古的地盘，当然全力反对日本在内蒙的工作。

古时长城以外的关外是不毛之地，用兵打仗都在关内。长城外的沙漠草原，是难以动员大军的。戈壁沙漠是自然的国境，成了中国遮断俄国势力的防线。但在军队机械化、立体化的今日，关外的草原则变成了机动部队很好的活动场地。不仅在用兵方面形势完全变化，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将不可超越的障碍物变成起联结作用的地区，这种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化是不能忽视的。

秦德纯、土肥原协定 关东军的势力伸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内蒙古，因地区在长城以北，所以关于此项的交涉，当然由代表关东军的土肥原特务机关长来担任。土肥原少将利用每次日本兵与宋哲元部队小冲突的机会，要求宋哲元军从内蒙古地区的察哈尔撤退。其宗旨是防止日中两军在察哈尔的未然的冲突，结果宋哲元军同意了，这就是秦德纯（宋哲元军参谋长）、土肥原协定，它与何应钦、梅津协定一起成了双胞胎。关东军在内蒙成立了蒙古自治委员会，拥立德

王为委员长，并派满洲出身的日本人为顾问管理行政事务。

关东军对内蒙古工作与对华北工作并进，这等于在油田弄火异常危险。这些工作，在斋藤、冈田两届内阁时期，由军部一个接一个地单独进行，日本政府无从知其真相，就是知道也无任何制止的力量。“满洲国”的独立，事实上就意味着关东军的独立。于是，广田内阁继承冈田内阁之后，只是对军部所进行的事当作既成事实加以接受而已。

日本军部对关东军很早就开始华北工作不以为然，认为华北问题应该由天津驻屯军处理。天津驻屯军根据军部的意向，拟订了《处理华北纲要》(第一次)，向中央提出。其实质性的企图，是华北五省满洲化，外务省对此加以强烈的反对。当时南京政府在北平组织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得到日本方面了解的黄孚为委员长。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尽可能避免冲突，主张华北在南京政府管辖之下进行分治，作为自治体，施行特殊行政。其结果于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五相会议通过了《处理华北纲要》(第二次)，大致参考了中国方面的意向。但是，华北问题的处理，事实在政府及派出机关着手时，军部已进行处理了，因此完全不顾及外务省的意向，事情照旧按军部的要求进行。军部方面拿前定的北进南进并举的基本国策纲要，来作为决定处理华北纲要的前提。

根据形势进展的情况，广田内阁在八月十一日五相会议上，正式决定了完成华北五省的分治，其要点是：“在该地区建设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建立日‘满’华三国互相合作的基础。”这个所谓的《处理华北纲要》的纲要部分明确地表示其宗旨，是以全部华北五省为目标，企

图达到事实上的分离，更指出对冀察政权及冀东自治政府的指导方针，还分别规定了对山东、山西及绥远三省的地方政权的指导方针，其目的在于完成华北五省的分治政治及开发经济。

这样，“二·二六”叛乱压力下成立的广田内阁承认了军部在华北的分离活动，这种活动亦在形式上成了政府的方针加以贯彻。

总之，对华北及内蒙的工作成了日中全面冲突的导火线，也是满洲事变未能作为满洲问题解决的原因。

四 防共协定(一)

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问题 满洲建国之后，军部面临着国防的重大责任，变得非常神经过敏，对内要进行国防国家建设，对外也突然注视形势。

俄国横跨欧亚又被封闭在北方，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为向南寻求港口，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或向东或向西反复地扩张。因东进而酿成日俄战争，西进而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革命后，也没有改变俄国本质性的政策。革命刚成功后，向西扩张到波兰及匈牙利，还是如钟摆一样，对东方实行了托洛茨基、齐契林的政策，中国问题成了议论纷纷的问题。

苏联之实行东进或西进，是根据欧洲形势如何而决定的，因此东邻的日本，需要注视并认清苏联西邻各国的形势。这些苏联的西邻各国和苏联东邻的日本在国防安全上感到有共同利害，还是和苏联在国防安全上感到有共同利害，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

对抗苏联，而站在与日本同盟的立场，还是对抗日本，同苏联站在共同的立场上，是"满洲国"以至日本本身国防上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前，卑斯麦对帝俄采取了双重保险的善邻政策，使帝俄向东发展，很好地巩固了德国东部国境。威廉二世的亲俄政策，也使俄国东进，建筑西伯利亚铁路，伸进了满洲，终于成了日俄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陆军对苏联陆军的建设给予不少的援助。日本认为，今日苏联的直接国境，虽是与波兰相邻，但将来德国一旦复兴起来，新纳粹德国将采取怎样的对苏政策，这对日本是直接重大的问题。日本军部认为，日本同波兰对苏联感到有共同利害，日本军部对波兰也很重视，原来挟在德苏两大国之间的波兰的国力，绝不足以掣肘苏联的。然而，德国的将来就和波兰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正在复兴中的纳粹德国的政策如果和威廉二世时代的政策一样，接近苏联以保障西面，并让苏联向东发展，那么日苏冲突早晚是不可免的，日本必须单独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全部武力。反过来，如果日德协同对付苏联的话，那么就可以减轻日本的负担。苏联武力急速增大，同时纳粹德国国力也显著地上升，日本当然更要注视德国今后的东方政策。而且，这个问题不单是国防问题，对日本也是一个有关基本国策的问题。希特勒如何实现《我的奋斗》一书中的构想呢？原来希特勒关于人种问题的思想，是极度侮蔑雅利安以外的人种，颇可以联想起威廉二世的黄祸论。不能预测这种思想如何反映在远东问题上。日本军部当然颇为重视，遂密切观察德国政策，努力使它能和日本取同一步骤。为此目的，在纳粹政权成立不久，军部即派大岛少

将到柏林，担任驻德武官。

大岛驻德武官 日本近代陆军是仿效德国的，陆军首脑部也几乎都是德国见习将校出身，纳粹政权成立后陆军也派了许多研究人员。因此，日本陆军有许多德国通，对德国有一种特别亲热感。在陆军德国通中，大岛少将是第一位德国通。他是一位能讲流利德语的明朗豁达的武人。他是山县元帅之下使日本陆军德国化的陆军大臣大岛的儿子，受德国式的教育，并养成和德国人合得来的个性。

大岛武官到德国上任后，立即与德国军部接触，要求交换情报。德国军部对大岛的要求，提出一切有关政治事项，须与国社党外交主任里宾特洛甫的事务所联络。因此，大岛武官通过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总统及纳粹首领表示亲热。

里宾特洛甫系南德莱茵河边的酒商出身，因商业上的关系，曾久居英国及加拿大，是一位英语极其流利的商人。他以纳粹党外交代表的资格，是一个和希特勒对外政策最有关系的人。

纳粹政权初期，外交部长仍然是稳健派的牛赖特男爵，但在外交部之外，还有一个党外交代表的里宾特洛甫事务所，因此两者之间有不少磨擦。里宾特洛甫就任驻英大使，在英国几年，不断地来往于伦敦和柏林之间，以推动国社党的外交，并和日本交涉签订《防共协定》。一九三七年他继牛赖特为外交部长，从此从各方面推动德国的对外政策。过去德国外交部有许多施特莱斯曼系统的人，都抱着和日本外务省同样的意见，认为根据世界形势，日德直接结合的时机还没有到。但里宾特洛甫指导下的纳粹外交部起初就具有独自的见解，撇开两国的外交当局，直接与日本军部

开始交易了。无论日本军部还是里宾特洛甫，相互之间都采取了期货交易的形式。

五　纳粹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欧洲大陆的斯拉夫民族（俄国）与条顿民族（德国）之争开始的，终于变成条顿民族与盎格罗萨克逊民族之争。结果，斯拉夫和条顿两民族失败，盎格罗萨克逊民族掌握了世界的霸权，使资本帝国主义思想盛行。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革命，于一九一七年在俄国首都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始，也发动起来了。

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意图是赤化全世界，打倒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的一贯方针。为达到这个目的，经常采用极端的思想和政策。列宁之后，斯大林的现实政策，和托洛茨基的理论派不同，其目的是注重加强苏维埃共产祖国，以实力为基础赤化世界，日益具有斯拉夫集权主义的特色。共产党为达到目的，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及第五纵队自由活动，更运用了“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战术。

共产党革命运动在苏联力量所及的地方，或第五纵队势力强大的地方，当然是很发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及中欧各国的混乱，变成了共产革命的最好机会。

魏玛宪法与德国国民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气尚未扫清时，国际上出现了凡尔赛体系，德国在战胜国监视之下，根据魏玛民主宪法，建立了共和国。当时

战胜国方面，一部分稳健派仍想拥立霍亨索伦系建立德国，以维系德国民族的信念，但这种稳健派的政策未被采用。战胜国直接进行建立理论的民主主义的政府，以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组织民主主义政府，以此来维持凡尔赛体系。

德国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参加了罗加诺条约，不仅承认了以维持欧洲现状为前提的安全保障，而且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国际联盟。施特莱斯曼外长在这个国际机构的范围内，实行了中庸渐进主义的民主政策。但是，英法式的民主主义，仅仅是由于战败而强制德国民族接受的，并不适合德国国民性格，也不为德国国民所欢迎。德国的政治还不能无视容克传统的势力，而且德国民族的政治性同以盎格罗萨克逊个性为主的民主主义比较，具有不同的自己的协同体。

战后，德国人的思想非常动摇。国际联盟是根据惩罚和束缚德国的凡尔赛条约而成立的，德国政策必须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运用，使德国国民感到永远不能摆脱因战败而遭受的惩罚和负担。支付赔款，就使德国国民感觉到自己已被置于奴隶的地位，而且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安大为增加。

凡尔赛体系后不能轻视的事实，就是因苏联革命而造成的世界动荡局面。当时英国不用说，就是法国也是处于安全状态，使英法各国顽固地不去注意因为布尔什维克赤化世界计划而引起的火一般的东欧形势，以及充满危险的旧敌国的形势。另方面，共产党利用散布在世界的成员，诱导英法美及其舆论对自己有利，并不断地向东（中国）西（东欧及西班牙）扩张自己的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赤化匈牙利的贝拉坤革命

终于失败，托哈柴夫斯基军向波兰的进军则被皮尔斯茨基等击败。但在德国，由波兰共产党出身的犹太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领导的共产党运动却日益白热化，使德国如同在赤化革命前夕的状态。遵守秩序的德国民族，对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形势感到日益不满，所谓民主主义的魏玛宪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挽救战败后的德国，感到它只是强制的无用的东西。

此外，战胜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也趁着战后的经济困难急速壮大，使国内发生了混乱。

希特勒掌握政权 在德国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一九二一年凡尔赛条约成立不久，希特勒担任了该党的首领。这时德国在魏玛宪法下民主主义政治运动开始动摇，由于赔偿造成了通货膨胀，经济正处在混乱中，纳粹党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激化，决心立即开始应付的行动。一九二三年纳粹党在慕尼黑的暴动失败，希特勒也被捕入狱；但纳粹的大众国粹主义，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处于混乱状态的国民的感情，势力逐年增大。一九三三年选举，希特勒获大胜，在兴登堡总统之下担任总理掌握了政权。他之所以掌握政权，并不是依照魏玛宪法进行行动，而是无视它而采取的“革命”行动的结果。

纳粹统治德国正如上面所述，它是发生在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十年之后，也是满洲事变之后两年的事。纳粹德国立即以日本为例，退出国际联盟，开始踏上国际性“革命”的第一步。希特勒对于凡尔赛战胜国对德国的压迫开始进行激烈的复仇活动。

西班牙也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出现了佛朗哥的右倾势力，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援助下，终于打倒了苏联援助

的赤色政权(一九三七年)。这样，欧洲大陆很明显地出现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势力与意、德、西法西斯势力的对立，英、法民主主义国家居于其间，采取了仲裁的立场，但其感情表现在处理西班牙问题的伦敦大使级会议上，大致是偏于苏联的。

欧洲的赤化势力与法西斯势力　纳粹和法西斯在政治上是一个左、右思想的混合体，它的实体是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建立的独裁集权主义。它与共产主义不同之点，是站在国粹主义立场上；与资本主义不同之点，是在努力实行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同之点，是排斥个人的独裁集权主义。

无论纳粹还是法西斯，都是对德意赤化势力而产生的反动，在用稳健的中庸民主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挽救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出现法西斯或纳粹势力的话，恐怕整个欧洲大陆不可避免地被赤化。这一点从当时西班牙的赤化斗争中，可以想象得到的。当时，西班牙已完全陷于赤化，处在赤军包围中，由于佛朗哥方面的阿尔加萨守将，如莫斯加鲁特大佐的英勇奋斗，才得救的。

法西斯与纳粹在防止欧洲赤化以及挽救本国破裂中急速抬头了。民主主义的法国因共产党人的人民阵线战术而出现削弱；英国在鲍尔温及麦唐纳首相领导之下，专心应付着国内问题，无暇顾及欧洲大陆的激烈变化；所有国际问题，都交给了半个左派的宣传机关国际联盟来处理。

《我的奋斗》　纳粹掌握了政权之后，立即恢复征兵制度，重建军队；对魏玛民主宪法及凡尔赛条约，都熟视无睹了。英法已经感觉到纳粹对欧洲现状的威胁了。

希特勒的思想及政策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有极明白的叙述。对内要建设集权社会主义的独裁国家，对外则实现民族国家的飞跃发展。换言之，就是实行国粹的超国家主义。所以，纳粹思想和中世纪的帝国主义有很多共同点。

希特勒站在这种根本的观念上明确主张：第一、决心先保持“优秀”德国民族的纯洁性，其次集结全体德国民族。为了防止德国民族的堕落，将堕落的根源的犹太人驱逐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外；再进而把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德国人的力量集合起来，着手建立一个大德国。第二、德国人口众多，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以大国之资格，当然要向外发展，所以德国民族需要一个适当的民族舞台。然而，这个活动舞台必须在德国本土能容易顾及的地方。海外领土因本国不易加以保护，故不希望获得这样的领土。但是，邻国的苏联进行扰乱世界为目的的共产革命时间尚短，人民赤化程度亦低，故它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地区应是德国民族的殖民地，必须作为德国的活动舞台。德国向东扩展系基于天命，任何国家也不应加以阻止。

希特勒主张是东进，其想法是尽量避免与英美冲突，这一点是最初的想法。

纳粹抬头与英美法民主主义国家　独裁的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于欧洲的中部，其本身已被民主国家英法视为危险。而且，希特勒的这种超国主义的发展政策，又和英法的政策绝对不能共存的。因为集合比法国多一倍的民族，建立一个独裁的国家，威胁着法国的生存；而且当会和英国对欧洲大陆根本方针的势力均衡政策，发生正面冲突。况且，如希特勒公开宣布的那样，德国要突破其民族界线，征服

白俄罗斯及乌克兰，这意味着东欧巴尔干置于德国统治下，其结果全部西欧大陆也将在它的统治下。这种政策不仅对苏联，而且也是对英法的挑战。同时，它如何对待美国也是不言而喻的。

希特勒本人很了解英国的实力，至少要努力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因此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与英国签订了海军条约，承认英国海军力量的绝对优势，以证明德国没有对海外领土的野心，努力取得英国的谅解。他对英国的要求是，德国承认英国在海上的优越权，从而英国承认德国在陆上的优越权，并默认德国的东进。根据里宾特洛甫的判断，认定英国会对此予以默认的。但这很明显表示，里宾特洛甫以他对英国经验，做出了对英国根本错误的判断，这个错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很大的关系。在打倒威廉二世不久的时期，英国根据当时的国情，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关于欧洲的势力均衡政策的。

对英国来说，承认德国在陆上的优越权，不仅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势力均衡政策，而且纳粹德国得到了陆上优越权，最后意味着也将得到海上的优越权。因此，希特勒只要不改变所公布的基本政策，德国早晚只得同英（包括美国）、法、苏等大国发生冲突。而且无疑地说，纳粹及法西斯并不止在利害上，而在思想的根本方面，与美英的民主主义也绝难并立的。

希特勒的突进　纳粹德国成立初期，国内还有很多异端分子，民心很不容易一致。在这种情况上，希特勒一口气断然动员德国的人力及物力，向着所期待的目标突进。

独裁者是不允许失败的，为此更加独裁，而且必须向国民经常夸张独裁的成功，讴歌独裁的成就。所以独裁因

急于立功，往往无暇顾到对象的立场和四周的环境。特别是国内缺乏基础的独裁者更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因此什么事都变成单方面的，独断的，盲目的。关于国内问题，在其把握着权力时期，也许可以继续或不能继续其方针；但关于国际问题，在实行政策上一旦发生阻碍，就清楚地意味着独裁本身的没落。以前的拿破仑就是如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结局也必然如此。但是希特勒曾向大岛少将说过："责难实行太急、实行太急，似乎合乎道理。但独裁者有不得不急的情况。在自己的一生中如不一下子将其完成的话，将来说不定要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意志薄弱的继承人，也许就会失败。"这段话里没有从民族百年大计着想，是为过急辩解，也是失败的理由。独裁者单方面必须遵守其自订的时间表，不仅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也是自身失败的根源。

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夺取政权以来，以一泻千里之势急忙从事，五年多的时间即突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过于激烈的步骤。

希特勒的时间表　如前所述，希特勒的行动完全是"革命式"的。他不顾过去一切传统，在国内废除魏玛民主宪法，施行独裁政治，粗暴地排斥犹太人，而高唱德国民族优越论；对外则废除罗迦诺条约的安全保障体系，退出国际联盟，无视凡尔赛条约，断然实行单方面的再武装，令戈林建设庞大空军，重建陆军，也企图复兴海军。希特勒确实把握了国内的一切。随着扩军备战的进行，他的对外方略也如同时钟的针一样，准确地前进。

一九三四年，奥地利发生内乱，首相陶尔菲被暗杀；一九三五年萨尔地区根据人民投票，重归德国，德国势力因

之越来越强大；一九三六年对莱茵河一带实行了武装占领。一九三五年是德国恢复征兵制度的第一年，也就是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的一年。

希特勒先进行收复失地、集结德国民族的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合并了奥地利，同年九月合并了捷克及苏台德地区。希特勒已经照着时间表，按照预定的计划准确地行动了。希特勒以如同破竹之势威压着欧洲，使世界感到惊讶。结果，反纳粹的势力在国际上急速地联合起来，终于成了欧洲大战爆发的原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希特勒与斯大林　希特勒德国公然反苏的态度和日本进入满洲，当然都直接予苏联以威胁。苏联的情报机关，确实详细知道了纳粹德国与日本军部怎样的腹案与如何进行协议。苏联动员了党与政府的机构计划对策。为此，在共产国际指挥下，各国共产党作为第五纵队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共产国际已在一九二八年预言过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动摇，要策动帝国主义互相冲突；更于一九三五年采用了人民战线的战术，在维护和平的名义下，尽全力将英美法等民主主义各国引入自己这方面来。这样，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共产国际都在尽力使德英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互相冲突。

斯大林宣传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一九二八年着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努力扩充苏联武力，建设苏联的军事国家，为其一切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起用讨好英美的李维诺夫担任外交部长，一九三三年策动罗斯福总统，使美国承认了苏联，进而在日、德、意退出国联不久的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国联，担任了常任理事国。在国联会场上，苏联宣传和平主义，李维诺夫高呼“和平有一无二”的口

号，完全吸引了参加国联的各个国家。在德意法西斯国家及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不满现状，采取反动政策，不断侵害它国权益，树立很多敌人之期间，苏联利用旧世界的分裂，参加到民主国家中间，利用他们反对轴心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了对轴心国家进行包围的体制。

六　防共协定(二)

军部与德国的联系　大岛武官在柏林与里宾特洛甫接触之后，探知希特勒坚决依照《我的奋斗》一书的宗旨，不动摇地执行东进政策，更明确日德需要军事上共同防卫措施，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德国与苏联之间，在当时尚有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介乎其间，因此大岛与里宾特洛甫所交换的意见，无疑地具有相当远大的政治意义。军部毕竟不让政府过问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这问题是在冈田内阁后期发生的，到广田内阁时始由军部以防共问题名义提了出来。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攻击日德两国为侵略国，中国共产党仍以日本军为敌，以华北地区为中心开始策动了。因此，防共问题变成日本政策上重大问题，在广田三原则里已经提出了。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军事上的问题了。

政府将这个重大的政治交涉任务从大岛武官移到小路大使之手，认为由该驻国大使一面与日政府联络一面与德接洽比较安全。但是，这个交涉本来是由大岛武官与里宾特洛甫之间进行的，所以在交涉时仍然要靠大岛武官的活动。军部在东京推动内阁，在柏林经过大岛武官推动武者小路大使。至于德国方面，详悉日本最近国内形势的发展，清楚知道军部亲德反英美，而外务省与军部不同而重视美

英；并了解满洲事变后军部势力压倒一切，且有日趋增大的倾向，推动日本外交政策的只是军部。德国对于此项交涉，都依靠里宾特洛甫与大岛这条线进行，其原因亦在此。在日本方面，军部对大岛武官的电报报告，当然极为重视，甚至以大岛武官的意见，作为军部判断欧洲形势的基础。军部不明世界形势，而且对其判断不负责任，以自己的理由不假思索地相信大岛情报，结果更加偏倚德国，感情上当然不用说，甚至政策上实际已采取同一步骤了。

军部推动国内政治，并进行轴心外交，结果支配了政府，以致左右了日本。一国政府的意志，在另一个国家这样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没有先例的。

军部独占外交是其革新手段之一，计划将国家对内对外的指导权移于军部也是统帅权独立观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致。

滥用统帅权　军部坚持统帅权独立，不仅使其彻底，而且将其观念不断扩大。这种统帅权独立不止在一般政治问题上，甚至对于日常生活行动上，军部都要求特权。军人与非军人，乃至与普通人或当地人都有区别，要求优待军人（恩俸制度、宫中待遇只是其中的一例）。军人以为自己是属于一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阶级。德国式的日本军队行军时，是靠右边走，但一般民众是靠左边走，军队以统帅权独立为口实不遵守一般的交通规则，所以军队经过街道时交通发生混乱，使一般交通只好停止。一个士兵无视交通信号，其理由是统帅权独立，结果发生了事故。军部这种毫无常识的傲慢态度，直至战争结束止。由于种种高傲不知发生过多少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一般民众对军部产生了不可想象的反感。

至于对外国政府交涉，军部也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持有特殊的见解，认为所有属于统帅权事项或与统帅权有关的外国交涉，都不是政府外交机关权限的事，可绕过代表日本的大使、公使等，主张由军部派的武官，直接进行交涉。国外的日本大使、公使馆，因有大公使馆附属陆海军武官制度，在国际惯例上武官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武官(或驻屯军)本来应在大使、公使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所有责任应由大使、公使担负，这是国际的惯例。但只有日本武官除了礼节以外是完全独立的，他们的工作直接与中央军部联络，也与大使、公使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武官与驻在国政府机关之间进行什么交涉，除了问武官本人或交涉对方之外，大使、公使无法知道。武官认为属军部统帅事项，就任性与对方政府交涉。然而，交涉问题虽只属于军事事项的范围，由军部本身对事情的判断来决定，但经常随着军部力量的扩张，必然有伸展到重要政治问题的倾向。

日本已经有统帅部(参谋本部)与内阁两个并立的政府，而且各有各的独立的对外交涉机关。国家意志不统一，发表国家意志由两个机构讲出来，结果没有所得只有招致国家的毁灭。由日本宪法解释、承认的统帅权独立，其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军部的政治力急速增强，以致其行动自满洲事变后逐步扩张，对外交涉头绪多而且变得严重起来。

签订防共协定 大岛武官根据中央军部的热望，以针对苏联的日德两国防共军事协定为大目标，和德国进行交涉，然后将交涉移到正常的外交渠道上。对此项交涉，德国方面本来并不想将其变成军事政治上协定，而只限于防共为目标。日本外务省也具有同样的意向，交涉顺利达成，

缔结了只限于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并签了字。但是，日本军部对此仍不满足，另外和德国交换了关于减轻防苏军事负担的秘密文件。这是因为日本军部始终害怕德国采取驱逐苏联至远东的缘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笔者赴任驻苏大使刚抵达莫斯科之日，日德签订了防共协定，这是广田内阁时期的产物。当时，日本参事官正与苏联远东部长加斯罗夫斯基在莫斯科进行交涉，将要订立日苏渔业条约。苏联政府为了对抗防共协定，中断了渔业条约的交涉。

日本外务省对防共谈判如何开始不十分了解，以为它不外是以防备共产党破坏运动为目的的相互援助协议。依苏联的官方声明，共产国际与苏联并无任何关系，所以大致没有理由妨碍对苏邦交。诸如此类的秘密协定，不过包含极消极的意义，而并无重大政治意义。日本军部对此宁愿偏重于秘密协定，以防共协定为对苏的军事协定。然而，在德国方面也许纯粹偏重于全面利用日本的力量，而把这视为一种外交战术的产物，故于一九三九年欧洲事态紧迫时，也未与日本进行任何协议，就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原委之所在，也就是极端蹂躏防共协定秘密附件的行为。

另一方面，苏联探悉大岛与里宾特洛甫之间交涉经过，却把它解释为对苏夹攻的德日军事联盟并立即采取对策。苏联自此开始，将其工业的中心区选定在领土中央部的乌拉尔及西伯利亚西部，特别着重促进五年计划的实现。

希特勒在兴登堡死后，被选为总统（一九三四年八月）。不久（同年九月），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常任理事国之身份开始活动；日德防共协定订立后，断定日德为侵略国，

计划通过国际联盟建立国际共同战线，努力动员国际舆论反对日德。一九三六年，采用了所谓民主主义的宪法，广泛地宣传苏联的民主主义，制定国旗以淡薄党的色彩，集中一切措施于国防；同时，在国际间更努力争取英、法、美等民主主义国家的好感。苏联与共产国际互相呼应，破坏德、意、日的轴心，而不断提高其国际地位。

七　国防国家

新体制运动与广田内阁总辞职　军部幕僚不断宣传改造国家的具体方案，在此之前，依照十年计划所产生的充实国防计划已出现了。"二·二六"事件以后，一般人突然增加了对军部的反感，政党党员则借此在议会攻击军部，策动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政党的旧势力。军部对此加以反击，并不感到困难。军部吸收了左右两翼思想，急速地把国防国家建设腹案加以具体化。他们的方案是，解散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议会，建立站在强有力政党之上的独裁政治，顺利而灵活地运用国政，建设极权主义的国防国家，这就是后来的所谓新体制运动。

政党在对军部怀着反感的议会上攻击广田内阁，特别谴责防共协定。政党知道军部想通过防共协定推进到日德军事同盟，以此间接地表示对军部的反感，使内阁陷于困境。但是，寺内陆相为了实现军部对内对外的政策，以不惜牺牲广田内阁的态度，不断地以粗暴方式与议会冲突。军部企图达到一举解散议会的目的，寺内陆相屡次强迫广田首相解散议会。首相认为与其解散议会不如决定总辞职。

当时的参谋本部以石原第一部长为中心势力，而左翼

斗士浅原健三则带着改造国家的方案进出于参谋本部。此案的意图是以军部拥立林铣十郎大将，建立事实上独裁的军部政府，解散议会，创立一个纳粹式的政党。他们强烈主张对苏以国防为中心，并密切与德意两国的联系。

宇垣内阁的流产　广田内阁总辞职后，元老推荐宇垣大将继任。宇垣大将是军人出身，也是政党方面怀有好感的人物，所以被认为适宜于收拾多难的政局。上层部的想法认为，用于收拾时局的方法，应始终尽量避免极端的变动，特别是右翼的变动。

推荐宇垣大将是对改造国家派的一个打击，所以他们极力阻碍其组阁。宇垣大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民政党内阁的陆相，继续前陆相山梨实行裁军，更是断然实行第二次裁军，完全迎合了政党，阻碍了军部的机能，而忽视了国防。当时反对宇垣的空气，弥漫于军部，整个陆军终于不支持宇垣组阁。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首脑部照例一致拒绝陆相的提名。换言之，军部根据现役军部大臣制，使陆相的任命陷于不可能，并劝告宇垣大将中止组阁。于是，宇垣大将不得不放弃组阁的念头。这样，元老除推荐军部所希望的林铣十郎大将外，别无可循之道。因为囿于当时的形势，除遴选军人出身者外，再无其它办法。

林内阁成立与纠纷　元老推荐林铣十郎绝非完全屈服于军部的激进派。上层部对林大将的希望在于把稳健分子配为阁员；林大将因此物色杉山为陆相，米内为海相，起用归国途中的佐藤大使为外相，激进派所瞩望的板垣中将与末次海军大将，俱被排于内阁之外。

从艰难成立的林大将内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观之，不仅它的性质与广田前内阁无任何不同，而且甚至连

军部也感到不免在开倒车，故主张改造国家派的参谋本部石原部长与浅原建三访问林大将时，对其组阁姿态提出了严重抗议。林内阁组阁伊始，备受军部激进派的重压，他们屡次强调对苏关系有一触即发的危机，期待实现“临战体制”，使建设国防国家的空气更趋浓厚。政府所为也正是军部所期望的：承认了陆军五年实业计划，并新设企划厅作为国防国家的基础设施。

在这种形势下，林新首相的政治极为拙劣，不孚舆论，与议会之间斗争重重。尽管如此，议会最后以妥协的态度，通过了政府提出的预算案，会期也临到安然终了阶段。然而，政府却抢先解散议会，断然实行总选举。林大将接受军部要求，为了尝试改造国家的新的飞跃步骤，突然解散议会，向政党势力挑战。但是，在政府解散议会之后，建立一个支配日本的政党准备，尚未具体化。

舆论遂激昂，接着压迫、宣传甚至干涉相辅而行。国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诉诸民意来个总选举呢？总选举的结果，表示了国民完全背离林内阁，因而议会势力取得了胜利，政党以旧势力的原有姿态被选出了。关于林大将的政治运用，不仅国民不能理解，而且对这位大将超现实的政纲，如“祭政一致”、“总亲和”等口号，表示了激烈的反感。林内阁进退维谷，成立后仅仅数月，便不得不后退了。

广田内阁以来，发动了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以军部的一部分人为中心势力，主张解散既成政党。这时候已在进行推举近卫公爵为新政党党魁的计划了。

第四章　芦沟桥事变

一　近卫文麿

西元寺与天皇学　元老西园寺公爵十分了解立宪自由主义。藩阀政治由民主的政党政治所取代，而政党政治又将逐步发展到英美诸国的各党轮流执政的制度，这是大势所趋。因此，藩阀元老衰落后，就出现了政友、民政两党的兴盛时期。经常代表西园寺公爵的牧野伸显伯爵以及继他之后的一木、汤浅两人，均唯元老的马首是瞻。西园寺公爵年事已高，从他的晚年开始，近卫文麿公爵和木户侯爵掌握了实权，并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西园寺曾把这两位贵族出身的年轻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事实上现已成为西园寺的继承者了。然而，新一代的近卫、木户在政治见解上与西园寺不同，他们知道要排挤军部是不可能的，倒不如与之齐心协力，尽量少发生冲突。尤其是近卫公爵，他和西园寺公爵志趣各异，与英美诸国的民主政治缺乏共鸣。

明治天皇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藩阀政治走向立宪政治。明治的开国元勋虽少，但有天皇的睿智领导作靠山。完成日本立宪后，国家机器靠宪法运转。西园寺认为，在立宪政治下，天皇的工作应由领导集团来辅佐。他把这一想法作为天皇学的主要内容向明治天皇的继承者——昭和

天皇进言。昭和天皇聪明睿智，从摄政时起就悉心研究内外政务，由于他胸怀开阔，政务常由领导集团来辅佐进行。这里说的领导集团，指的是内阁和统帅部。

昭和天皇通过群臣和政务了解国内外形势，多年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在他继位后，群臣很少向他提出可能被他认为是愚蠢的主张和建议。另外，天皇对当今的领导集团提出批评虽是常有的事，但他并没忘记他是在这些人的辅佐下执政的。

当然，昭和天皇也曾当机立断地亲自处理政务，那就是在政府平定“二·二六”叛乱和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终战的时候。在日本宣布终战时，所有的领导人包括陆相在内都在终战的诏书上署名，他们只是在形式上起了辅助作用。

近卫文麿 在昭和政坛上，最重要的人物是与西园寺同为公卿出身的近卫公爵。他天资聪颖、伶俐机敏，深受众人钦佩。其政治见解广博而开明，不喜好军阀政治，但又不敢完全排斥右翼思想或完全反对左翼见解，他在政治活动中或在个人趣味上都有四通八达的通融性，尤其对于政治非常感兴趣，以经常活跃在政治舞台为乐趣。由于他出身于皇室最亲近的公卿家族，因而上下左右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才能救国。从他的个性来看，他不是充当军部傀儡的适当人选，他自己也不期望成为军部的傀儡，而是要担负重任。

在平定“二·二六”叛乱时，近卫受命组阁。虽然推辞了，但不久由于西园寺的举荐，成了政坛上的活跃人物，或当贵族院议员，或任枢密院议长，集昭和天皇的信赖于一身。他和深得明治天皇信任的伊藤博文在政治见解上不同，他是在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的。

第一次近卫内阁除了陆相杉山、海相米内留任外，前外相广田以及政界、实业界、官僚和出身于军部的有势者中，多以阁僚或内阁参议而入阁。众望所归的近卫内阁成立后，军部内外均利用内阁加紧开展工作。

二 芦沟桥事变

陆军内部的对苏派和对华派 由于“二·二六”叛乱，陆军内部的皇道派的主要力量遭到打击而销声匿迹。那以后，陆军内部引人瞩目的问题是随着华北工作的展开，出现了对苏派和对华派的对立。

陆军统帅系统的人们从国防上考虑，当然更重视对苏关系。当时，如何布置对苏军备是主要问题，因而参谋本部的人多数是对苏派。他们认可从满洲事变到华北的全部工作并予以协助，但却强烈反对把华北工作扩展到华南。他们认为华北工作只是为了保卫满洲国和防范苏联的势力渗透到整个中国。在参谋本部内，石原第一部长和多田参谋次长是这一派的代表。

然而，军部内那些与中国问题有关系的人们，则把华北工作、进而把整个中国问题的处理，放在重要位置上。那些一向关注中国问题的将校也赞同这一观点。很多人想通过第二次满洲事变，建立“功勋”，成就功名心。对华派以陆军省为根据地，陆军省里有杉山陆相、矶谷中将以及后宫军务局长等人。当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之间，不仅在军事政策上意见相左，就是在私人感情上也多有不和。军部内的派系斗争，已病入膏肓。

以陆军省为代表的对华派的意见非常强硬，其急先锋

当然是那些当时在华北问题上很激进的幕僚将校们。如前所述，政府认为陆相的意见是代表了军方的意见的，尊重其强硬态度的军部各派，也都热心主张日德提携。

华北工作和排日　自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以来，华北工作加快了步伐，京奉铁路沿线的满铁势力也增强了。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发华北资源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所有这一切使中国各界极为愤慨，为向民众宣传抗日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满洲事变后公开敌视日德两国的共产国际，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其敌视活动更加高涨。中共军队已公然对日宣战，华北地区的抗日战线已非常巩固。有人认为，要缓解由于《日德防共协定》引起的来自苏联的压力，扩大华北事变是唯一的办法。加剧日中冲突，使中国陷入混乱，这是东方赤化的捷径。

军部的华北工作已形成不把日中冲突引向全面战争誓不罢休的形势。

西安事变　张学良从满洲逃至北平，迫于日本的压力，又离开北平转移到陕西省，北平由宋哲元接管。陕西省是毛泽东、朱德以及贺龙等中共军队的根据地，张学良与中共军队妥协并结盟，形成抗日战线的一股力量。换言之，他被日军赶出满洲后，陷入了非联共便没有出路的窘境。当时的中共军队，作为军队来说还不强大，但党的活动非常活跃。他们发动农民运动，不断壮大力量，其地下工作遍及华北一带，提出解放中华民族的口号，抗日之势异常迅猛。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宣传，得到了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同情。

一九三六年底，蒋介石为了视察抵抗日军的傅作义部

队，在飞往绥远的途中在西安停留，并会见了张学良。

张学良热心地向蒋介石游说：国内各派应一致抗击外敌日本的入侵。蒋介石则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深知共产党之患的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讨伐共产党，甚至不顾满洲事变的爆发，仍然先行考虑消灭共产党以完成中国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发动兵变监禁了蒋介石。

蒋介石生命危在旦夕，但他和南京政府仍然持强硬态度。于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顾问后又成为蒋介石顾问的澳洲人端纳急忙从中斡旋，使蒋介石得以平安回到南京（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但是，从这时起，南京方面、共产党方面和张学良的军队终于组成了抗日战线，确立一致抗日的原则。日中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正式声明国共合作；九月二十三日，共产党也声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张学良当时随蒋介石回南京负荆请罪，那以后他长期过着被软禁的生活。

满洲事变迫使张学良和蒋介石不得不抗日。张学良在西安采用非常手段铺好桥梁，从此国共两党开始了合作。

被日本占领华北所激起的中国举国一致抗日的形势，大大影响了日中关系。进入一九三七年以后，随着日本更加积极地实行华北政策，中国的抗日形势日趋明朗，对峙中的日中两国军队的冲突日趋白热化。在北平附近的丰台首先发生了冲突，紧接着，一部分日军在靠近平汉铁路起点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的时候，又发生了冲突。虽经交涉暂时停战了，但不久又是炮火相接，日中战争终于爆发，这时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在此，有必要对抗击日本的中国之近代史做一番回顾和研究。

三　中国革命简史

中国解放运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革命的传统。人们一般都认为，王朝政权维持了几代之后就渐渐丧失民心而衰落，与此同时涌现出的英雄豪杰奋力将其推翻，又建立起新的王朝，正所谓知天命而得人心者得天下。

如前所述，从秦始皇统一天下时起，经文化昌盛的汉、唐，直至宋、元、明、清各王朝，中国一直是革命不停之国、群雄争霸之地。拥有辽阔土地、丰富资源和众多人口的中国，这许多因素使它长久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战场。然而，由于长年饱受自然和战争灾难的锻炼，中国人不论在体力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人类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因此，尽管中国常有祸乱，但中华民族仍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发展壮大。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辽、元、清都是北方的通古斯族，他们虽然统治着汉民族，但却接受了中国文化。清朝产生了康熙、乾隆等历史上罕见的英明君主，因而使其政权得以维持了三个世纪。尽管如此，清朝也无法避免受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产业革命后欧洲各国的侵略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想，不仅仅是源于王朝兴亡的权力之争，而是建立在受欧洲自由思想影响而兴起的要求人类进步的自由解放运动之基础上的。

十九世纪中叶，信奉基督教的洪秀全在长江流域（原文如此——译者注）发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由于受到自

由解放思想的影响，从而成为反抗外国侵略、摆脱异族清朝的统治的中国解放运动的先驱。清朝末年的革命运动，不外是以下三种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三种思想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发生在王朝衰亡时期的改朝换代思想、摆脱异民族的统治从而解放汉民族的思想和反抗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从而解放中国的思想。同时，中国近代还产生了阶级斗争思想，兴起了把无产阶级大众从封建特权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的局势。

孙中山的思想　号称中国解放运动之父的孙文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及后来的反清志士影响下崛起的。孙文在香港学医时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后来他在广东一边行医一边组织同志会，发起革命运动，企图夺取广东地区的政权。行动失败后，他只身逃往国外，许多战友被处决。孙文在流亡期间多次奔走于日本及欧美各国，招募同志，制订计划和筹集资金。

他早期的思想是使中国强大以防外侮，就象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他坚持以实现政治现代化为目的的富国强兵主义，不认为非推翻清朝不可。因此，他的思想同康有为等旨在复兴清朝的革新运动没多大差别。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终于同维护清朝的革新运动不能相容。孙文认识到，革命的第一步应是推翻清朝，恢复汉民族的自由统治（即“灭清兴汉”），建立民主主义的新国家。他和战友一起组织兴中会，站在与康有为截然不同的立场上，公然主张颠覆清朝的革命。这是孙文领导之革命的第二个时期。

孙文长期流亡国外，这以后他建立了国民党，献身于

革命事业。

袁世凯　一九一一年，兴中会的黄兴等人在武汉发起辛亥革命(原文如此——译者注)，终于推翻了清朝。武汉的革命行动以破竹之势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孙文领导的国民党于是定都南京，宣告成立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并在南京召开国民议会，制定中国式的民主主义国民宪法(约法)，定五色旗为国旗，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在北京的清朝政府为了镇压国民党，决定起用被罢官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怪杰袁世凯曾因企图推翻清朝自立为帝，建立新王朝，被清朝罢免直隶总督的官职。他这时正隐居在河南，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当接到重新起用他的诏书时，他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进军北京，乘机逼宣统皇帝退位。他表面上与革命党达成妥协，迫使孙文让位，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着手在北京建立新王朝。他暗杀了反对他这一企图的国民党急先锋宋教仁，镇压了黄兴、李烈均发起的二次革命，导致与孙文的国民党的正面冲突。袁世凯见形势危急，郁闷而死(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皇帝梦终于破灭。那以后，袁世凯手下的武将纷纷仿效他，争夺中央权力，而当时国民党力量薄弱，因而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军阀斗争时代。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北洋军阀”。

护法运动与排外运动　推翻清朝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国民革命党建立民主主义政府的主张，却因军阀混战无法实现。在袁世凯露出称帝野心的同时，国民党在南京掀起了护宪(国民约法)运动。护法运动在袁世凯死后，主要是针对各地掌握实权的军阀的。

在孙文的领导下，国民党声言通过护法运动打击军阀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同时借此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打

倒军阀和打倒列强应同时进行，这一观点已为知识分子和一般国民所接受。各国列强不断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府的军阀进行交涉，事实上是在援助军阀；后者则从列强中寻找靠山。因此，他们认为收回列强在华权力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前提条件，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使排外热潮更加高涨。

国民党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解放运动不但得到了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美国民主主义者的声援和同情，而美国政府本身始终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解放运动的。自十九世纪末海约翰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直保持这种同情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排外运动日趋明朗而激烈。

本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排外运动主要是针对以英国为首的那些在中国获得利益的列强的，但自从大隈内阁向袁世凯提出实行所谓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五月）、寺内内阁向段祺瑞安福系政府提出"西原借款"（一九一七年七月）和田中内阁时期两次出兵山东以来，日本就被中国视为帝国主义的代表者而遭排斥和攻击。这一切，成了那以后日中冲突的导火线。

在共产党的煽动下，中国的排外思想越来越明显。苏联十月革命后，中国受其影响，也开始采取行动收回外国在华的权力。

中国军阀的盛衰　拥有武力、处于群雄割据状态的军阀也不能扭转中国社会变革的趋势，中国的解放运动顺应时势，谁也不能与之抗衡。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时也不得不利用民众的排外运动。如上所述，在中国，民族国家思想和爱国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一九一七年的苏联十月革命给中国以巨大影响，一九一九年建立的共产国际

的活动也很有成效。苏联在与国民党联系之前，就已经与中国军阀的实权派建立了联系。

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二十多年兴亡盛衰的军阀的势力已从旧式军阀转到新式军阀手里。清朝覆没后，中央政权维持着民国政体，树起了代表五族的五色旗。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等各届中央政府虽徒有其名，但各国仍不断向北京派遣使臣，并与之维持外交关系。这期间，一九二二年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发生了张勋复辟，张勋解散了国会。孙文于是在广东建立了国民政府。张勋复辟很快就被曹锟、段祺瑞推翻，但各地又陷入军阀割据局面。特别是在满洲，依靠日本的张作霖大权在握，宣称东北三省独立（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因冯玉祥倒戈使得吴佩孚败北，张作霖获胜。但依靠苏联而又自称是基督徒的冯玉祥与张作霖势不两立，张作霖于是又联合吴佩孚挟击冯玉祥（即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最后把军队撤到张家口，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张作霖派张学良的部下郭松龄入关讨阀赤色军阀冯玉祥，结果郭松龄在冯玉祥的说服下倒戈率部反攻满洲，奉天（沈阳）处于危险之中。张作霖在日本的援助下击败了郭松龄，并乘胜侵入关内。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后，张作霖在北京自立为大元帅，并派军沿津浦线南下，直至与占领南京的蒋介石的国民军相遇。张作霖留守关内与国民军对峙的时候，华北治安很乱，如果张作霖败退回满洲的话，满洲就将沦为战场，这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田中大将认为，中国本土可以由国民军去统一，但满洲这个特殊地区必须置于张作霖的势力之下，使之与日本保持密切联系，这是解决满洲问题的关键。因此，田中首相竭力奉劝张作霖撤回满洲，避免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张

作霖最后听从了日本的劝告，撤离北京。

冯玉祥打算依靠苏联并利用共产国际的势力，乘内乱之机控制华北和与苏联接壤的地区，所以背叛了吴佩孚，不久又取而代之，完全变成了左倾的赤色军阀。他把部下鹿钟麟调驻北京，自己则占据张家口，通过外蒙古与苏联联系，并在自己的地盘内实行共产主义政策，训练抗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军队。他亲自去莫斯科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张作霖则反苏反共，敢于废除苏联在满洲的特权。为了讨伐依靠苏联的冯玉祥，便派张学良的部下郭松龄进军关内。郭松龄认为当时日本是反对张作霖的，便利用这个机会与冯玉祥策划反叛张作霖，回师攻入满洲，结果大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这在前面已叙述过。这样一来，冯玉祥企图占领华北、蒙古以及满洲等与苏联国境接壤的广大地区的计划，也随郭松龄部队的被消灭而告失败。蒋介石的北阀军占领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后，冯玉祥与阎锡山一起仍占据着北方地区。不久，在陇海线一带开战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和阎锡山战败，双双向蒋介石投降，并以此达成妥协。从此，蒋介石统一中国的计划终于实现，军阀混战时代终于结束。

赤色军阀冯玉祥的立场始终站在苏联一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与蒋介石齐心协力对日作战，但二战结束后，他见蒋介石不与共产党合作，便到美国去进行反蒋宣传，并与在香港的李济深等反蒋的广西派联系，企图排除蒋介石。为了等待时机与共产党合作，便打算经苏联回国。一九四九年初，他从纽约出发，乘苏联船只经海路到敖德萨，但途经黑海时死于船中。当时的局势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加紧对满洲和华北进攻并计划占据这一地区，赤色

军阀作为过渡时期的产物，他的存在不论是对苏联还是对中共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言归正传，我继续来讲孙文的护法运动和中国的国民党革命。

孙文的三民主义和容共政策 孙文从一九〇〇年开始提倡三民主义，同年八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华革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辛亥革命至倒袁运动以来的十几年中，孙文常流亡海外，此后的国民党运动全都表现为权势之争，中国的一般民众看不出这与军阀间的权势之争有什么差别。孙文的思想逐步发展，直到他明确提出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思想从而指明了国内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时，三民主义才深入人心。

直接起因于反对凡尔赛条约的"五四"运动是以处于当时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圣殿地位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为开端的，"五四"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把工人、农民和商人都卷了进去。

正当"五四"运动之火熊熊燃烧的时候，苏联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卡拉罕发表声明：废除帝俄时代所取得的一切在华特权，愿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恢复邦交（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翌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东亚部长维辛斯基来到中国，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然后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于是，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年七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宣告正式成立。陈独秀、陈公博、邵力子、周佛海、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维辛斯基和马林列席了大会。

然后，苏联政府派越飞到中国。他在会见孙文时说：革命至今尚未成功是因为忽视了民众的力量，国民革命不

仅是政治革命，还必须是社会革命，必须以工农为友，以地主、资本家为敌，用武力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因此，国民党要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团结民众，进行革命斗争，这才是革命成功的捷径。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上，通过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纲领，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些战略措施很适用于中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以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基本方针，实行国共合作。同时，从根本上改组国民党。这次大会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陈独秀等有威望的共产党已经加入国民党)。结果在共产党员中，谭平山担任了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等要职，国民党几乎被共产党员控制了。

孙中山等在广东借助旧军阀陈炯明的力量建立了广东军政府(一九二三年)，苏联根据托洛茨基、契切林的政策，派遣在美国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鲍罗廷任广东军政府的政治顾问，远东军总司令布留赫尔任军事顾问，并指示他们同驻中国大使卡拉罕一起协助工作。鲍罗廷作为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党务最高领导者握有实权，加伦则负责军事计划和组织训练，在军事学校推行苏式军事教育(一九二四年)。广东国民党政府完全按照苏联顾问的指导进行工作。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在全国开始了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参加的大革命运动，大有一举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势头。这时的中国革命运动与过去完全不同，从要求政治解放走向要求社会解放，直到再次爆发了过火的阶级斗争。

蒋介石的北伐和汉口政权　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接受北京临时政府首脑段祺瑞的邀请，经神户到北京与之会谈，不久在京因病逝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广东政府根据孙中山的遗嘱改称为国民政府(七月一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举兵北伐(一九二六年)，这就是著名的"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出身于政学系，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在广东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是从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国民党领袖。

孙中山死后，在广东国民党政府内部，国民党系的人同以共产党员身份新加入的人之间不断倾轧；对苏联顾问的专横，国民党人也开始反感。蒋介石虽然曾在一九二三年访问过苏联，但他和宋子文、何应钦等的立场都站在国民党元老一边，密谋驱逐共产党分子。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廖仲恺这时被暗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就是在内部已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开始的。北伐完全采用了共产党的战略战术，打倒土豪劣绅，到处开展民众革命运动。由于共产党领导组织的民众斗争声势浩大，国民革命军乘此东风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地向长江流域推进，控制着唐继尧云南军的共产党分子率先占领汉口，并在这里建立了红色汉口政权。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的领导下，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胡霖、陈独秀等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宋庆龄、孙科等国民党左派也在这个政权中任职。

北伐结束和南京政府　另一方面，蒋介石等国民党系分子攻入江西的南昌，继而沿长江占领南京。这时(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发生了"南京事件"，各国领事馆被洗劫，导致外国军舰炮击南京。据说日本军舰没有出动。由

于北伐军采用的是共产党的暴力战略战术，所以到处引起恐慌。上海在青红帮头子杜月笙的协助下，才阻止了共产党的暴乱。杜月笙与蒋介石部队妥协，并与何应钦合作清洗赤化分子，因此那以后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蒋介石曾一度下野，这期间他访问了日本，窥视朝野动向，回南京后东山再起，终于发兵北伐。但他的军队在济南与日军发生冲突，这在前面已叙述过。北伐军的主力离开济南后直扑天津，张作霖在日本政府的劝说下撤军返回满洲，蒋介石由此平定了北方。

北伐完成后，南京政府把孙中山的遗体从北平运到南京，并改组了政府，重新开始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处在创建初期，但已放弃联苏容共的方针而与日本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上海为中心的财界和经济界即所谓江浙财阀，都是极力排斥共产党的，南京政府依靠他们的势力作为支柱。这些财阀与农村的地主关系极为密切，他们都非常憎恨江浙及其它江南地区的共产党。蒋介石利用这些资本家地主的势力，以南京为大本营来巩固其政权，实行稳健的政策，这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这时已十分清楚共产党究竟是什么组织。

共产党军队的长征　国民党在汉口建立了政府，占领了外国租界，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其势力颇为强大，但得不到附近的地主和实力派的支持，因而粮食紧张，经济陷于全面瘫痪，完全暴露了共产党政府的真面目。由于产生内讧，汪精卫免去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汉口政府于是衰落下去。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彻底破裂，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此后的几年间，蒋介石倾全力讨伐共产党军队，推行全面反共的政策。

这样，托洛茨基派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随着汉口政府的衰落，鲍罗廷、加伦等被召回莫斯科。握有实权的斯大林同理论家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已形成尖锐对立，托洛茨基派的卡拉罕、加伦都被判刑，鲍罗廷也失宠了。

汉口政府瓦解后，残余的共产党军队在毛泽东、贺龙、朱德等的率领下，在湖南一带与蒋介石进行了数年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六月，共产党占领了汉口附近的嘉鱼，并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于十一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一九三三年，共产党声言与国民党合作，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并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讨伐。共产党见形势危急，一九三五年六月开始向与苏联联系方便的西北地区转移。他们经西藏附近北上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其间行程达二万五千里，这就是著名的红军长征。由于这次长征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陕北时，红军由原来的七万人减至一万人。红军以陕西地区为根据地，又在延安建立了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其势力又强大起来，并开展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共产党军队竟能发展到百万大军，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依靠贫民，消灭地主和一切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并在西北地区直接与日军作战。当时，共产党军队已完全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并已对日宣战。而日本也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搜捕和镇压。

逃到西北的共产党军队同蒋介石的中央军之间，由于地理条件没有交战。但蒋介石始终是持反共态度的，国共之间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产生的隔阂并没有消除，直至西安事变，敌对关系仍没有改变。

在上海进行抗日宣传的李立三于一九三〇年逃到苏

联。李立三领导的共产党以工人为基础，主要是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则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其势力主要在农村。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李立三领导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积极进行斗争，此时恰好是托洛茨基派领导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势力兴盛时期，也是以上海、天津为中心不断发生排外罢工的时期。

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仍然学习斯大林的实干精神，其领导的农民运动，与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成功地夺取了满洲、华北和华中等地区，接管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并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战后，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了满洲。

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大多数城市都归属于国民党，因而共产党在城市的势力逐渐衰弱，但其在农村的势力却急剧增强。美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军队，不过是土地改革主义者，这一宣传蒙蔽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以陕西省延安为根据地，不断在农村发展势力。他们感到自豪的是，这场战争不是靠正规军而是靠游击战来进行的。他们的分田分地共产主义政策和对民众的深切关怀态度，是其势力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他们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而从北平转移到陕西省西安，能够同共产党军队合作并不奇怪。华北一带是共产党军队和被赶出满洲的张学良军队齐心协力、共同抗战的地方。西安事变中，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不是张学良，而是周恩来。张学良完全听从并接受共产党的意见。一九三六年

的西安事变后，中国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半年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导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张学良随蒋介石回南京后又迁至重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争又重新开始，结果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和张学良只得逃往台湾。一九五〇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缔结了中苏同盟，确定了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针。

中国革命的未来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从富国强兵的革新运动开始，发展到推翻清朝，进而又进行了反对军阀的护法运动。其最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依靠民众的力量，实行了联俄容共的政策。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领导北伐一举成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统一。但不久，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在以西安事变为转折而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暂时得到缓和。因两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其斗争即使在对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对日战争结束之后，两党终于爆发了全面内战。

中国革命运动同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一样，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解放运动。它从反抗专制暴政开始，发展到把汉民族从满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解放出来，进而发展到把人民从军阀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历程，中国革命的基础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坚实。唤起广大民众，调动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恐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国民党在依靠民众之前，不论是孙中山的革命军，还是军阀的军队，其性质大同小异。即使是在对日战争中胜利的

蒋介石，也抵挡不住动员了民众力量的共产党的进攻而陷入悲惨境地。

今后即使共产党统一中国，中国革命的种子也将依然存在。

四　日中战争爆发

“膺惩中国”　日本应极力隐忍自重，不该插手满洲以外的地区；但由于政府的无能和军部的鲁莽，在华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满洲事变发展到卢沟桥事变，进而扩大成日中全面战争。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的政治机构遭到破坏，而这又是因为日本国民政治力量不足。以卢沟桥事变作为导火线的日中战争，导致日本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利欲熏心的日本军队肆无忌惮地在华北这样复杂而危险的地区活动，不仅国际上无此前例而且极其危险。

由于排日事件接连不断发生，虽然导因于日本守备军夜间演习的卢沟桥小规模冲突，经交涉后平静一时，但不久廊坊又起火，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根据何梅协定从河北撤退的国民军，又和来自中央的援军同时北上，直接与日军对抗。由于冲突迭生，就好象各处放火，随风助势，形成火灾一样，小冲突渐次变成了大冲突。日军人数虽少，但他们立功心切，一旦出兵，如离弦之箭，其势迅猛。

刚成立不久的近卫内阁为了应付这一紧急事态，便根据统帅部的要求，立即决定增援三个师团，而后又增至五个师团。内阁发言人没经深思熟虑，再三表露日本的强硬态度，声言这次不是“事件”而是“事变”。政府一边决定坚

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一边又不断把事态扩大。结果，政府和军部最后都宣布要进行"膺惩中国"的"圣战"，近卫首相也在呼吁建立东亚"新秩序"。这样一来，战争的扩大便势不可挡。结果是华北战争并没局限于永定河一带，日中战争全面展开了。

华北战争 日本军部的态度极其强硬。华北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在卢沟桥事变时已病，不久死去。作为华北军的统帅，军部认为与其选用阿部大将，不如起用寺内大将。寺内是积极鼓动对华战争的急先锋。不幸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竟与军方的预测背道而驰，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战线终于从平津地区向内地各方延伸。

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及世界形势稍有了解的人均可做出判断，但日本却不予理睬。日本之所以不能防止第二次满洲事变发生，不论怎么说都是政治上的失败和国家的不幸。军部轻举妄动，声言数月便可收拾局面，悍然突进。近卫内阁鉴于满洲事变的惨痛教训，试图把对事变的领导权从军部手中收回，因而对军部的主张，先行表示了强硬态度。

华北的日中冲突立即反映到华中。回顾满洲事变时的上海战争，按理政府应竭力防止在上海发生事端，因为上海一旦发生事端，就不会仅止于此，走错一步，战争就会波及华中和华南，成为海军南进的开端。但卢沟桥事变后几个月，上海竟然真燃起战火，实在是不幸之至。

第二次上海战争的爆发 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华北的日中冲突，敏感地反映于上海，排日侮日的风潮立即在那里泛滥。日本从大局着想，该如何容忍这一切，是个大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缔结的淞沪战争的停战协定规定，为了确保列强军队所共卫的上海和平，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一定的地区。中国方面却认为这一协定是为暂时停战而订的，并没有限制中国主权，便不顾日本方面的抗议，挥军直入。驻沪的中国军队很左倾，现在驻的是张发奎的第二十九路军。卢沟桥冲突发生后，这支军队排日气氛很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同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

冲突终于发生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大尉在中国军用机场附近被杀，成了事件之开端，随后中国军队同日本海军接火，出现了如前次上海战争开始时同样的形势。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在上海的海军也必然要挑起某些事端，其责任属谁姑且不论，这样的日中冲突不是海军一手能处理的，这是在第一次上海战争时就已显露出的性质。

出兵上海与反对出兵论　米内海军大臣坚持要求陆军出兵，过去在统帅部年度作战计划中，曾形成陆海军妥协的方案——必要时应向上海派兵。而且第一次上海战争发生时，陆军就曾马上派兵前往上海。海军在不能单独处理陆上战斗时又要求陆军出兵，被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以石原第一部长、多田参谋次长为首的参谋本部对此则坚决反对。代表北方派的参谋本部，认为把日中事变扩大到华中及华南，会分散日本的战斗力，削弱了北方的防御使之处于危险之中；在国家国防尚未完善的今天，用兵应尽量加以限制，对华北以外的事件，宁可牺牲亦不应出兵。这是北方派的意见，也是负有统帅责任者最有理由的意见。

但是，上海战争已经开始，现已无暇问及战争发生的原因了。数万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濒临危险。在感情上与

参谋本部相对立的陆军部里，杉山陆相和后宫军务局长认为在责任上必须由陆军出兵。政府在与陆海军商协之后，决定最小限度地出兵，仅以三个师团编成上海登陆军，由预备役的松井大将指挥，与抗日情绪高涨的中国军队开战。

由于日本内部意见不一致，其结果，第二次上海战争只不过是把五年前第一次上海战争的过失扩大和重演一次而已。在吴淞登陆的日军由于连续苦战而难以前进，蒙受重大损失而被拖住在上海。由于这是以国际城市为中心不宣而战的战斗，所以事故百出，引起世界各国对日本的恶感与日俱增。日本政府不顾参谋本部的强烈反对，再增派由数师编成的柳川部队，从杭州方面登陆，冲到中国军队的背后进军南京。因此，上海的中国军队退却了。上海日军与杭州登陆军相呼应，突袭南京，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中国首都。

攻入南京后，以中岛师团为主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在南京强奸妇女等)被张扬于世成了国际问题，遂使日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

占领中国南北各地　日军攻陷南京后，蒋介石把政府移到汉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移至重庆，丝毫没有求和的表示。日中战争完全出乎军部的预料，事态不断扩大。在华北，被免去陆军大臣之职的杉山大将继寺内大将任华北日军司令官；在华中，由烟大将接替松井大将。华北日军在济南、徐州苦战后北进至山西省，华中日军则沿着长江进攻汉口。另外，还有在台湾组织的古庄司令官率领的南方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东。这样，到一九三八年底，日军已夺取汉口和广州。在广阔的中国领土

上，日军占领了北有平绥线、中有平汉、津浦、陇海等铁路线以及长江沿岸各要地。日军只有保住这些点和线，才能维持对中国这片广阔领土的统治。而在这一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非常活跃。

日中事变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正向全中国扩展的时候，又发生了另一起重大国际事变。这就是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有关张鼓峰归属的日苏纠纷。

占领地的统治 随着华北方面军事行动的推进，满铁势力也拥入华北。军部为了直接运用北平、天津、山海关、奉天(沈阳)的铁路，不得不借重满铁的力量，把在满洲取得的宝贵经营经验直接应用于华北，开始实行对华北地区的经济计划。

但是，华北的“满洲化”将关东军的势力引进华北，进而使前此独霸满洲的关东军势力再延伸到全中国，这对日本中央军部、政府、民间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中央所有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先恐后地进入华北。

政府和军部都采取将华北和满洲划分开管理的方针，中央军部的意思是把包括华北的中国本土的经营与关东军、满洲脱离开，因此应新设一个特别机构来管理。象原来对满洲的经营已设对满事务局一样，对中国本土的经营，也应设立同样性质的规模更大的机构。这就是后来引起争议的兴亚院。随着华中、华南方面的战事日益推进，兴亚院终于成为统管日本在中国除军事以外的全部工作的机构。

五　和平工作

日中和平斡旋　日中关系从华北问题扩至全面冲突，战火从上海蔓延到长江沿线。日本政府发表"膺惩中国"的宣言，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实际上，日本政府原本制订的是使事变控制在局部地区的方针，试图再次恢复日中之间的和平。而且在军部中，以石原少将为中心的缺乏侵华信心的参谋本部，也不愿把战祸波及到华中地区，热切希望尽早实现和平，并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从整个军部来看，也不是完全反对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部曾在战地单独向蒋介石试探和平，但中国方面对日军部早就不信任了，对此置之不理。军部还企图希望德国居中调停，以解决日中争端。近卫组阁初始，杉山陆相代表的侵华派势力强大，但听到参谋本部的和平论也表示赞同，近卫便想利用参谋本部的势力来牵制陆军省。因此，石原第一部长对近卫的影响力急剧增大。

当时英美两国曾向广田外相建议由他们来调停日中纠纷。英、美两国不论是为保护自己在华贸易及权益，还是为防止东亚战争的扩大，站出来调停日中纠纷，毕竟是上策。以广田外相为首的外务省知道中国问题的解决非依靠英、美力量不可，更知道单靠德国来调停，从德国在华权益来看，根本不能使调停获得成功。但是，军部当时对英、美非常反感，自满洲事变以来，英美一直反对日本军队的行动，因而在感情上日军与英、美发生激烈冲突。而今天若依靠英美来调停日中纠纷，认为无疑是把日本的命运交给敌人，因此竭力反对。近卫对与军部接近的德国参

加调停一事也没有异议。有识之士都知道：接受英美提议，请他们调停日中纠纷，是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并打开未来局面的唯一途径。但是，日本实权掌握在军部手中，在这个时候依靠英美，就意味着改变日本过去政策的方向，与军部唱反调，这在当时是绝对行不通的。

德国的调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在中国商业上苦心经营，战后虽然废除了原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仍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政府从德国招聘军事顾问，从德国购入在别国买不到的武器。德国在中国的地盘，是希特勒政权以前的反纳粹的德国人所占据的。他们在商业上，是站在与日本竞争的立场上，而且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抱有反感。到了希特勒时代，这种情况也未改变。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也强烈希望结束日中纠纷。希特勒也认为日中纠纷持续下去，不过是把中国一味赶向苏联的怀抱，故极力劝告日本军部结束战争。德国的这种态度与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北方派的看法完全一致，所以他们让德国调停，尽力解决日中纠纷。当时，参谋本部与德国大使馆奥德武官间的联络员，是第二部员马奈木中佐，马奈木后又在石原第一部长之下兼职，石原部长因此派马奈木中佐和奥德武官联络，进行日中和平的交涉。根据德国方面的记录，早在一九三六年底，就开始进行以全面解决日中问题为目的的交涉，中国方面以如下两点为条件同意和平，即(一)同意内蒙古自治；(二)承认满洲的中国主权，建立亲日政权。日中战争爆发以后，奥德武官在马奈木中佐的陪同下，到上海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磋商日中斡旋。同德国方面保持密切联系的参谋本部，对日中和平非常热心，其意见被政府采纳，陆军省对此也表示赞同，这

些已在前面叙述过了。

陶德曼斡旋和平 广田外相按照政府及统帅部的意见，正式向德国驻东京大使狄根逊提出，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代为斡旋日中和平，并提出了共同防共、禁止排日、经济提携以及赔偿损失等为主要内容的妥协案。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认为中国方面目前无法办到，故暂缓提出。热心于和平工作的参谋本部已和驻东京的德国武官奥德少将联络，进行日中和平的秘密工作，表达了对中国不必赔偿损失的意图。多田参谋次长则通过日本驻德武官大岛向在华首席军事顾问法尔根豪森上将进行侧面斡旋。但是参谋本部与德国方面的接洽内容，日本政府一无所知，因此外交上各行其道，不能一致。

陆军省所代表的军部中国派的态度在和平交涉的条件上非常强硬，使之缓和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攻陷南京之后，这种态度日益强硬。在汉口的中国政府，对通过狄根逊大使接到的广田外相提案表示根本怀疑，随即又通过陶德曼大使，要求日本政府对提案做出详细具体的说明。中国对设立华北非武装区的要求，明确表示不予承认的意向。广田外相鉴于这一点，又看到军部的态度这般强硬，遂认为和平交涉没有成功的希望，内阁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军部强硬派所计划的占领中国政策，便迅速地具体化了。

结果，政府公然发表了有名的"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的声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决定另找交涉对象，按自己的意图实行对华政策，并在议会上对此做出说明。广田外相在议会答辩的时候，宣称日本的态度比宣战时还要强硬，博得了一片掌声。于是，为实行占领中国的政策，

匆匆设立了兴亚院。

近卫内阁大改组　与近卫关系密切、意见常受近卫重视的石原第一部长等参谋本部的人们，对事态如此发展非常愤慨，期望改组内阁更换陆军省的首脑部，确立新的方针，以挽救此种局势。他们推荐当时正在山西作战的第五师团长板垣中将或多田参谋次长担任陆相，板垣中将是石原部长自满洲事变以来的志同道合者。

近卫首相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国征求板垣中将的意见，同时为处理严重的时局，使内阁能容纳各方面的实力人物，断然进行内阁的大改组。杉山陆相辞职，由板垣中将继任；由宇垣大将继任外相；由荒木大将继任海相；由三井会社首脑池田成彬继任藏相；由末次海军大将继任内相。新外相宇垣接受了陆军的要求，将大岛武官提升为驻德大使，白鸟公使提升为驻意大使。近卫首相本来想让与陆军保持联系的白鸟氏任外务次官，但未能如愿。大岛武官升任大使，德国相应也把驻东京武官奥德升为大使。陆军省见是梅津陆军次官后辈的板垣中将有可能继任新陆相，不等新陆相任命发表，就将梅津先调到华北任司令官了，任命统制派的东条中将为其后任，以阻止石原担任陆军次官。

因此，满洲派的板垣、石原的势力和东条统制派的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在对外方面，统制派的强硬对华政策和满洲派的德日结盟方案，都以整个军部的主张出现。为实现德、意、日三国同盟而任命大岛、白鸟为大使，但近卫首相以皇道派来牵制统制派的企图也因此而失败了。

近卫内阁大改组的主要目标，是将杉山陆相和与之关

系密切的广田外相以及陆军省的中国派驱逐出内阁，使参谋本部能借此机会致力于日中和平的交涉。近卫发表了以防共、经济提携、善邻友好为主要内容的“近卫三原则”，表示要改变“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的方针；军部也在背后想方设法与蒋介石方面取得联系。这些动向除使汪精卫一派产生脱离重庆中央政府的念头外，在中央政府那里并没有多大实际的反响。和平工作一无进展。中国派的中坚将校如脱缰野马。日中战争在握有实权的军部鼓动之下，进展非常之快。

由德国出面调停日中问题虽没有实现，但因此德日关系更加密切了。军部里不论是哪一派别，都欢迎德日两国接近。在东京有板垣与奥德联系，在柏林有里宾特洛甫与大岛联系，再加上意大利，使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谈判逐步有所进展。大岛武官为根据防共协定而建立军事关系回国向军部汇报，但却得到日德关系密切化的训令而再次回柏林任职。不久，他便被升任大使，进行缔结三国同盟的交涉。

六 海军的南进

海军与三国同盟 当时日德关系之所以密切，不论是德国，还是以北方派为中心的日本军部都是因为在对苏关系上有共同语言。然而东亚的日中战争不断向南扩展，在欧洲，德意与英法之间的磨擦也极度恶化。因此在研究日德关系紧密化时，不考虑与英（美）法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日本海军对三国同盟，向来都持反对态度，但因军事行动的逐步南进，其态度也有所变化，并对三国同盟产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

海军的南进策略 上海是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接触点，也是联络点。海军对于满洲和华北不但不关心，而且对陆军的积极政策持反对态度。但是，上海战事发生后，海军在束手无策时积极要求陆军出兵，则亦表露绝不后退的积极态度。因此产生了陆海军共同的立场。在上海及长江沿岸一带共同作战，使陆军和海军得以相率南进而不断扩大战事。

上海以南地区受海军管辖。海军成功地让海军现役人员任南洋厅长官，而且在广田内阁时期也把台湾总督控制在海军手中，与陆相的朝鲜总督相抗衡。台湾对面的福建，因与台湾人民有密切联系，所以把设在福州、厦门的总领事馆和兴亚院的联络部，都置于海军的势力之下。后来，在进攻菲律宾时，就是以台湾为基地，此前为进攻广东在大亚湾登陆的古庄部队，也是在台湾组编的。台湾是南进的跳板。

日中战争扩大到华中以后，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的海岸，这时的海军已不再是陆军进攻中国大陆的旁观者，而是南进的一个主力军。对满洲事变持反对态度的海军，现在对日中战争已和陆军齐心协力了。

海军的南进和英美的态度 海军是实行南进政策的。以前，海军占领南海的无人岛并插上日本国旗，曾遭到法国的抗议，现在又筹划占领广东南面的海南岛。这是为了实现陆军占领广东后的整个南进战略，使之成为南进的要冲——第二个台湾，并由海军直接占领。占领海南岛，当然会引起越南问题。

第二次上海战争以来，陆军和海军之间或互相携手协

力或相互竞争，不断南进。陆海军联合南进政策，决定了日本同英美关系的大势，使日本的国际关系陷入难以拯救的境地。这种形势，更加促进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

七　三国同盟（一）

日、德基于中国问题的结合　让德国出面解决中国问题——军部的这一想法对昭和动乱的全局具有深刻的意义。日本与纳粹德国之间，自一九三六年《防共协定》缔结以来，在柏林有大岛和里宾特洛甫的联络，在东京有奥德武官与日本军部的接触，使两国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军部对英美缺少理解，满洲事变以来更对其有恶感。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兴纳粹德国在各方面都是军部的榜样和合作者。德国向蒋介石派遣有力的军事顾问，日本军部认为，这是想通过这个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有利于实现日中和平。

防共协定签订后，欧洲形势更加紧迫，德国也越来越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并注意两国间的接近。为了利用日本，德国认为上策是必须在中国问题上讨得日本人的欢心，因此希特勒排除保守分子的反对，承认“满洲国”，断然撤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军部要求德国人在华经济活动的特殊待遇。

英、美仍不断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并给中国以更多的支援。与此相反，德国则对日本的政策表示好感，尽量尊重日本军部的情感。这种对比，在日本军部要人的脑中越来越鲜明。

日德和英(美)法的对立 本来，日德关系在《防共协定》缔结过程中已很明显，盖由于苏联对两国均有关系。如果没有对苏问题，两国的关系也不至于会如此密切。然而，在中国的日德之间的利害，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过去的趋向对立想法发生了大变化。一方面，日本随着中国问题的扩大，极力要求请德国来协助解决；另一方面，德国随着欧洲形势的紧张，更加注重和日本军部的关系。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愈加深入，陆海两军齐头并进而南下，一发而不可收。陆军过去以苏联为对象的想法，通过中国问题渐渐发生变化，并逐渐将英美作为其作战对象。德国也由于欧洲形势紧迫，除对苏问题外，对英美法的问题也不得不认真地加以考虑。这种局面最为共产国际所欢迎。作为共产党的世界性组织，它对此尽量加以利用。曹尔基、尾崎在东京频繁活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曹尔基曾向苏联密告，日本对苏联构成的危险已消除了，也是因为看到这种形势。通过中国问题而使日、德两国接近，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深入，奠定了日本南进政策的基础。

中国问题对日本来说，最后成了对英、美的问题。在中国，日、德间消除过去的障碍而能齐心协力，这是日、德能够联合起来对付英、美的前提。在这种气氛中，日本军部开始着手于三国同盟的交涉。这种情况和满洲事变后日、德签订《防共军事协定》的情况相似。

军事同盟的对象 在柏林，大岛武官自防共协定签订以来，根据中央军部的意向尽量和德国密切联络，开拓亲善关系。本来，《防共协定》是抵抗共产党搅乱世界工作的，所以感到有这种危险的国家，理应加入这个协定。意大利很早就加入了这一协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后来西班牙

及德国各卫星国也陆续加入。在《防共协定》上，日、德、意三国已形成紧密的团结。但从缔结防共协定时各自对苏联在军事上的地位来说，日、德和意大利之间在地理上有根本不同。因此，防共协定的附属密件，只与日、德有关，意大利及其它加入的国家，对此均不知道。

然而，现在正当日、德之间进行强化防共协定以缔结新军事同盟之时，当然不能将意大利除外；同时，从欧洲形势看，军事同盟所对付的对象，也不能只限于苏联了。

从军事政治关系来看，意大利所对付的对象是英国。墨索里尼以地中海为中心，正在向建设“大罗马”帝国迈进。一九三六年五月征服埃塞俄比亚之后，意大利准备建立包括非洲各地的意属领地在内的规模庞大的殖民地。意大利在地中海东隅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土耳其接近的地方，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已占有许多岛屿。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北非、巴利亚利群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都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对象。墨索里尼野心勃勃，做起复兴罗马帝国的美梦。在墨索里尼的指挥下，意大利急速向外扩张。其野心必将与英国的利害发生冲突，因为墨索里尼的这个计划意味着要排除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夺取英国在地中海的统治地位。

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极力反对法西斯意大利的扩张政策；同时为了维护其在欧洲的直接领导权，也不能默认希特勒的东进政策。法国的地位仅次于英国，德、意扩张政策的推行，使英、法的反抗日益加剧。毫无疑问，英、法的政策是为了阻止德、意的这种扩张。在思想上，英、法与法西斯、纳粹根本不一致。德国越是东进，越觉得有必要对付背后的英、法；而意大利越向外

扩张，就越需要德国的援助。因此随着英、法的接近，德、意的轴心提携，更感到有加强的必要。也就是说，欧洲的形势是德国已把英、法作为德、意两国共同的对手，因而和日本交涉三国同盟时，若不考虑意大利对英国的关系，同盟就会失去意义。

但是，日本的立场与德意有根本的不同。一般认为，缔结以苏、英、法(最终也包括美国)为对手的军事同盟，把日本引入世界战争，推行毁灭性政策，这种愚蠢的做法并不是日本愿意干的。

日德同盟案的交涉　带着板垣陆相等军部首脑的训令回柏林就职的大岛武官，同里宾特洛甫继续交涉加强防共协定，其宗旨是以苏联为唯一的对手。日本军部最初认为这是防共协定的延续，没有考虑苏联以外的国家，只不过是将过去的思想协定，改为三国间的军事协定，以此加强日、德、意三国的联系罢了。

这个交涉当时除军部知道外，内阁对此事一无所知，就象不知道军队南进计划一样。军部以外的人士并没想到，在与德国的军事协定里会考虑苏联以外的对手。日本传统的思想，是重视与英、美的关系。除了军部以外，这种倾向表现得相当明显。即使中国战争扩大了，也没人认真考虑过与英、美开战。除了海军极端派的故意宣传外，任何人也没谈及此问题。缔结三国同盟，其结果是以英、美为敌。要不产生这种结局，最好是放弃缔结三国同盟的想法，这么认为不能说没道理。

但日本的情况是以军部为中心迫不及待地要实现军事同盟，忽略了形势已有所变化。请德国调停日中问题失败后，军部丧失了靠自力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中国战争日

益发展、激化，其原因主要是英、美、法所持的态度。解决日中纠纷的困难，完全是由于英、美的妨碍——他们支援蒋介石，强烈要求对日战争继续下去——所造成的。因此，日本的舆论，渐渐变成"真正敌人并非中国，而是英、美"的调子，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英、美。最能危及日本国家命运的反英、美宣传如此有效，完全超出了理性的判断。

大岛武官在和里宾特洛甫外长交涉时，了解到德国的观点并不象日本那样狭窄，它与双方缔结防共协定时完全不同。德国方面提出的日、德、意同盟方案，是缔结国之任何一国受到其它国家攻击时，其它缔约国应立即给予援助，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大岛武官特派驻德官员笠原少将返回日本，摸清日本中央部的意向，请示有关今后的对策。

同盟交涉的准备 听到笠原少将的报告之后，板垣陆相等军部首脑看到了实现同盟的可能性颇为满意，并当即将此情况在五相会议（近卫首相、宇垣外相、板垣陆相、米内海相和池田藏相）上做了汇报，并做了研究。结果，五相会议一致通过。根据惯例，决定今后的交涉将以此为基础，并从武官转到政府的代表者——驻德大使来进行这项交涉。

笠原少将向大岛武官报告了中央的命令，大岛武官据此将交涉经过报告给东乡大使，并将交涉事宜移交给大使。但不久，大岛武官升任大使，接替东乡继续进行三国同盟的交涉。持同盟论的白鸟公使也被提升为驻意大利大使以替代天羽大使。白鸟大使协助大岛大使，致力于从欧洲向本国政府施加影响。这些都是近卫首相接受板垣陆相

的请求所采取的措施。近卫内阁为交涉三国同盟而组成的外交阵容，将会使在柏林的交涉大有进展。这是一九三八年底的事情。东乡大使由柏林调往莫斯科，笔者作为吉田大使的后任，从莫斯科调往伦敦任职。

三国同盟的交涉不久便从近卫内阁转交到平沼内阁。

八　对华问题

设置大本营、新设兴亚院及其活动　日本政府为解决同中国的争端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而且，日中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日本事实上不得不对中国全面开战。按过去甲午、日俄战争的先例，在东京宫城设立了大本营，内分陆军部和海军部，作为指挥战争的中心机关。此后，一般政治也更加依从统帅部的领导了。以石原将军为首的北方派的势力日益衰落，军部完全被中国派势力控制住了。

军部已准备好占领中国的具体措施，想使中国迅速“满洲化”，并使军部势力能控制整个中国。对华问题全部脱离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下组织“兴亚院”，并由其管理中国问题，这个方案也已向内阁提呈。外务省处理国际问题的观念和军部致力于加强同德国联系以及使中国“满洲化”的观念完全相反，这一点已很明显。没有军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对设立兴亚院而辞职，外相由有田八郎来继任，这是近卫内阁的第三任外相。新任外相的想法也和军部不一致。可见近卫内阁的外交已经是日暮途穷了。

宇垣外相辞职后，兴亚院成立了。其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管理经济，并在中国的北平、青岛、上海、汉口、

厦门等地设立了兴亚院联络部。在庞大的组织下，指导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并亲自处理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必要的行政事务。厦门、青岛的联络部属海军，北平、汉口、广州的联络部属陆军，上海联络部则属于陆海两军共管的势力。各地的外交机关的存在，不过是应付国际关系的装饰品罢了。

为了统辖经济上的事业，北平有“华北开发会社”，上海有“华中振兴会社”。这些会社都是经议会通过、具有日本法人资格的特殊会社。在这两大会社之下，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生产性会社，以日中合办的形式出现，并合并了原来已有的会社。总会社是在兴亚院联络部指导监督之下，担负经济开发的事务。而且，又在北平设立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在上海设立储备银行，发行与日本货币等价的华北联银券和五点五比一的储备银行券，成为财政上的中心机关。

长江以北的中国本土大体上以徐州为界分为两部分，北部以北平为中心，南部以上海为中心。这个界线是按照华北军和华中军的守备区域来划分的，完全是人为的分界。南北两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象是两个国家，货币不能流通，华北的铁路属于满铁系，而华中则属于日本铁道省的势力范围。总之，北方带有强烈的满洲色彩，而华中则形同日本各官厅各自的派出机构。这样，中国的行政机关，都在兴亚院联络部和日军司令部的双重监督之下。

以上组织的基础，是在近卫内阁时期打下的，以后便迅速完善起来。这些大体相同的组织，是随着日军的南进，从中国向南方不断建立的，并成为军部管理占领地区

行政的样板。

《近卫声明》和军部对华工作 后来发表的"近卫三原则"声明虽然使局势有所缓和，但过去日本所声明的"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象"的影响已无法取消，政府虽然采取了种种恢复和平的手段，但蒋介石对日本军部已极不信任，决心对日本军部所提出的任何交涉都不予理睬。因此，日本只有考虑在中国设立"满洲式"的行政机构了。自塘沽协定以来，在华北设立了冀东、冀察两个自治政府，这本是过渡性的，军部却认为有必要设立基础牢固的行政机构。因此，为管理中国内部工作，五相会议决定设立"特殊委员会"，赋予其在中国的广泛的权限，使之与陆军特务机关相互配合。陆军的特务工作由土肥原中将领导，由设在上海的土肥原机关(后称影佐机关)具体实行。

五相会议所设立的特殊委员会主要由两位"中国通"领导，他们是已退役的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贵族院议员)和预备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其任务是与陆军特务工作保持联系，在中国积极活动。

土肥原中将在华北时打算起用吴佩孚，随后想利用齐燮元等直系军阀，在上海时又想请唐绍仪出山，但这些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由于这个缘故，在华北，让当时在香港的政治家王克敏出马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在华中，扶植属于福建派的梁鸿志在南京组织过渡性的"维新政府"。

不久，日本军部发现移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内部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对立。这就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抗战论，主张与共产党分手的对日妥协论。

而在军部内外，既有反对汪精卫的论调，也有将会影响与蒋介石实现和平的议论，但大多数人认为利用与蒋介

石意见相左的汪精卫是上策。这项工作由土肥原中将的后任影佐少将来进行。汪精卫逃出重庆，由影佐少将迎接，经河内到上海。等他到东京时，已是平沼内阁时期。但军部的对华工作，素与内阁无关，而是根据军部自己的意思继续进行。

确定临时军费 对给予军部的预算比例，自从“二·二六”事件以来，政府已明显放宽。日中战争设立大本营，政府中枢处于战时状态后，对军部的预算就变为无限制了。由于日中战争不断扩大，若以普通预算来对待是行不通的，因此采用战时体制的预算。也就是与以往的战争一样，设立“临时军费制度”。军费随着战事的扩大，根据军队的需要，可以无限制地支出，近卫内阁贺屋藏相时便是如此。

因此，日中战争开始后，日本财政已不健全，遂实行通过滥印纸币来弥补战时财政空缺的经济方针。陆军和海军要求巨额开支，互相竞争，但大藏省已无力应付。拥有无限制的军事预算的陆海军，除了战时费用之外，将大部分的费用耗费在国家国防建设和军备扩张上。海军与英、美竞争建造舰艇，陆军则在满洲加紧军备建设，对苏联给予不必要的刺激。

无限制地使用军费使国内经济发生了异常的变动。在日本经济活动的地区内，已不能提供与军费等值的物资。由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结果不得不实行经济管制。再加上世界市场完全被隔断，日本经济活动范围只限于东亚一角，致使日本国内经济不断萎缩，这样一来，日本对占领地区的经济压迫不得不强化。日本为了让军队在占领地区搜集所需物资、原料，不得不在华北、华中滥发联银券和

储备银行券。为了补充纸币的实际价值，日本曾将金块和生产成品输往中国，但因数量有限，所输出的物品全被中国商人包购，使被占领的中国地区急速发生通货膨胀，低值的中国纸币按既定的换算率，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后来虽然禁止流入，但更加促进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在日本，就连中国也是物资十分紧缺。随着军事行动的扩展，日本在东亚的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这些经济政策，在中国及其它的占领地所产生的恶劣的政治影响是无法想象的。

军部有军费而无物资——结果造成有钱无处用的局面。尽管如此，还要把预算用于充实军备上，所以军部无视物资统制法，自行向民间征购物资。日本经济由于无限制的支出于军事而逐渐瘫痪，最终走向崩溃的穷途。

近卫内阁制定临时军费并转向战时财政，这在财政上意味着日本已不是面对“事变”，而是面对“战争”了。从这一点来看，海外贸易受到限制、资源匮乏的日本，其经济已面临枯竭的命运。

近卫的责任　近卫内阁对国内的政策一时被日中战争的爆发所压倒，但军部的国防建设计划却在这一时期一步一步地进行着。近卫新设立的私人调查机关昭和研究会及其它各种半公半私的调查机关，和原有的调查机关一起协助军部，提出种种改造国家的新方案，商讨重要国策。这些机关是既有左翼方面的头脑参加，也有军部的中坚分子的直接参与。国家秘密在这里可透露出来，予以自由讨论。

当时近卫智囊团的成员尾崎秀实是苏联间谍，他和苏联共产党员曹尔基一起搞间谍活动，从近卫及其周围的人

们那儿探听日本最高国家机密，了解到日本由北向南进军路线、日本避免和苏联冲突而将与美、英发生冲突等。

第一次近卫内阁引起日中战争，又由于其松散的政策使日本的内外政治破产，其责任甚大。成为太平洋战争直接起因的日、德、意三国同盟，也是发端于第一次近卫内阁，而完成于第二次近卫内阁的。

九　张鼓峰事件

“满洲国”的国境地带　满洲事变以后，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日德签订防共协定，而共产国际则报以把日、德视为共产党的敌人。

“满洲国”为开发边境地区而着手建设军事铁路后，苏联将北满铁路卖给满洲，并将国防力量集结在边境，加速完成西伯利亚复线工程，全力开发东西伯利亚。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注重建设东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干线东自沿海州，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着“满洲国”。而且“满洲国”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因此常常发生边境问题。

与苏联边境纠纷　苏联在边境一带建筑碉堡、布置哨兵，凡遇越境者，当即开枪打死。发生在东部边境绥芬河的日本兵被枪杀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本来“满洲国”国境早就由中俄双方在《瑷珲条约》和《珲春条约》中划定。当时，因那里较为偏僻而不受双方重

视，因此有很多地段的国境并不明确，当地居民常越过边境自由出入。东部国境的东宁珲春地区，更是如此。举例来说，东宁地区靠近一条河流，当地居民认为河对岸的山峰是国境，所以常常在河里洗东西，并与河对岸的居民自由往来。但苏联方面却主张以河流为国界，以至将过河的居民枪杀。因此，当地居民为避危险，纷纷迁至距国境较远的地区居住了。

"满洲国"与苏联的国境，北面以黑龙江为界，东边较为复杂：兴凯湖以北是乌苏里江，以南是朝鲜国境的山岳地带。国境地区不断发生事端及飞机和间谍越境的问题，多数在当地便可解决，但有时也发生在当地难以解决的重大冲突。一九三七年的乾岔子岛事件便是如此。

乾岔子岛是黑龙江中的一个岛群，位于黑河之东，河源出于该岛之北，也即是在苏联一侧。

苏联方面主张以该岛南侧的水面为国境，并认为这些岛屿属于苏联领土；而"满洲国"则主张该河流为国际河流，应以河流正中为国境，不允许侵犯属于满洲方面的水域。就这个问题，笔者作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曾与苏联政府交涉过。但苏联舰艇仍无视"满洲国"的主张，强行通过"满洲国"一方的水面，所以发生过被击沉的事件。这一事件通过外交途径，好不容易才得到解决。

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使国界纠纷更加严重起来。

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是靠近朝鲜、满洲以及沿海州的边境，位于图们江北边的间岛地区的一座山峰。它与朝鲜北部相联，并有从罗津至珲春的铁路线绕过。该峰东边有一个被称作长湖的小湖。

事件的起因出于对规定这一地区国境的原《珲春条约》的解释不同。苏联方面根据俄文文本，解释国境经过长湖西边的山峰，而日本方面则根据中文文本，解释国界在从图们江边开始，通过山峰经长湖西岸向北延伸的这一条线上。俄中两种文本，都是条约的正文。根据苏联方面的解释，国境应经过张鼓峰之峰巅，而根据日本方面的主张，张鼓峰整个属于"满洲国"的领土，国境在这座山峰的东边。自古以来，满洲人就在张鼓峰上放牧。

苏联对国境的防备逐渐加强。一九三八年夏，苏军突然占领了张鼓峰山顶，并掘战壕、布铁丝网。这刺激了日本和"满洲国"，因为这里被苏军占领，等于让苏军得到一个控制北朝鲜的战略要地。同时，张鼓峰北方草山地带，常有日本士兵被枪杀，这使国境守备队的神经更加紧张。日本政府认为苏军占领张鼓峰是侵犯国境，并训令作为驻莫斯科大使的笔者就此问题向苏联政府交涉，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否则一切后果由苏联承担。

外交交涉 笔者接到训令后，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涉，但进展非常缓慢。李维诺夫认为：国境经过张鼓峰山顶，所以苏联国境守备队的行动是符合条约规定的。日本不该对此干涉。作为证据，可以看看《珲春条约》的附属地图。笔者当时对此进行了辩驳：现在问题的着眼点是防止日、苏两军发生冲突。日、满方面根据《珲春条约》，相信该地属于"满洲国"领土，日本军队对"满洲国"领土有加以防卫的权力和义务。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在那里单方设防也是不合适的。现在为了避免两军再发生冲突，应将强占山顶的苏军撤出，恢复原状；然后组织联合委员会，这时再来慎重研究

条约内容和地图，以最后确定国界。

但苏联方面无论如何也不撤去张鼓峰上的军队。在双方的主张仍坚持对立时，张鼓峰又发生冲突。日军计划以武力夺回该山峰，而苏军则大举动用机械化部队，使用很多坦克、飞机着手破坏日本后方之交通线。发生冲突的是朝鲜军，正是在中村司令官继小矶司令官之任不久。这里的边防军，有从中央被驱逐的中坚将校，都是与满洲事变有密切关系的人。樱花会的长勇（任步兵连队长）是急先锋。日本方面，约出动了一个师团的兵力，也有炮兵参加。但和大规模的苏军对抗，必有一番苦战。这时日本对这个事件是按一般边境冲突处理还是继续扩大战事？如何抉择，形势已相当严重。

板垣陆相奏请天皇为防备苏联的进攻，请允许派遣军队。但天皇认为这有悖于由政府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方针，并叱责了陆相。

莫斯科的外交交涉总算达成协议，决定两军维持现状而停战。具体负责交涉的笔者以及大使馆的武官，对于当地的战事情况，只知道日军完全恢复了张鼓峰的原状，但实际情况如何，并没得到通知。日本政府的态度，对笔者来说，虽然不大容易接受，但笔者在交涉中始终一贯主张停战撤军，公正地确定国界，以结束纷争。实际上，除站在公正立场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外——即提议为避免冲突，双方各退出一定距离而停止战斗，是没有什么办法同苏联政府进行交涉的。谈判最后以决定双方军队维持现状、停止战斗而告结束。

苏联军队知道已到达他们所主张的国境线——苏联方面承认了这一点。停战后，日军自动离开战斗地区。而国

境，事实上最后还是依照苏联当初的主张来划定了。

张鼓峰冲突的意义 对张鼓峰冲突，战后(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东京成立的国际军事法庭(由包括苏联代表在内的十一国代表组成)上，以多数票判定此事为日本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这个判决正确与否，只有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来研究了。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都认为那里(张鼓峰)没有多少战略上的价值，所以也没计划进行侵略苏联的战争，这确是事实。不仅如此，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以极度的忧虑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在军部方面，当时在中国为攻下武汉已动用不少军队，非常希望在其它地区能不发生冲突，因而绝对不想与苏联发生纠纷。国外有人认为日本的行动是试探苏联的实力，这决不可信。因为日本军部对苏联的实力在一九二九年苏联侵入北满时就做了充分的估价；而对自己实力之不足的情况，已在中国战争中充分意识到了。所以，与其说是试探苏军的实力，毋宁说是在偶然的地点发生的偶然的冲突。不过这次冲突，虽然完全起因于国境的不明确，但朝鲜军队将校欠慎重而导致事态恶化，是不能否认的。欠慎重的军事行动，是昭和动乱的一贯作风。

张鼓峰事件经一个多月的交涉好不容易才得到解决，但因此也在日苏关系上投下了一个阴影。尽管日本更意识到对“满洲国”国境防备的重要性，但其南进的态势一点也没有因此而缓和。

第五章　复杂离奇的局势

一　平沼中间内阁

近卫内阁辞职与平沼中间内阁　近卫内阁是所谓的大人物内阁，虽然经过多次改组，但仍然不能辅佐国政，大人物反而成了多余的绊脚石。组阁初期所爆发的日中事变演变为全面战争，给国家的前途投下了阴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来行事的近卫，对权势已经厌腻。过去对国会曾夸下的海口，如今不能兑现，而下一届国会又即将开始，可仍然难以对付这种形势，最后只好总辞职。

第一次近卫内阁辞职的理由在名分上欠缺明确。由于中国事变的扩大，对内对外各种政策都已经无法实施，因此只好提出总辞职，以更新人心。但是，继任的平沼内阁，完全是近卫内阁的延长。

平沼男爵、从枢府议长出任组阁了（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过去国粹运动的主力之一国本社是在山本内阁虎门事件以后成立的，由平沼领导，活动遍及全国。平沼在组阁之前，特别辞去国本社的领导职务。平沼内阁里仍然留用近卫内阁时期的阁僚，他们是有田外相、板垣陆相、米内海相、荒木文相、木户内相等人，以处理近卫内阁遗留的重要问题。

从平沼内阁又经过了阿部陆军内阁和米内海军内阁。

这三个内阁期间，是日中战争爆发后，比较平稳的时期，也正是与满洲事变后的斋藤、冈田海军内阁相似的时期。这个时期，军部埋头于中国大陆的经营，而这个经营成了后来祸乱的温床，这都恰巧和满洲事变的情形相吻合。在这中间内阁时期，日本对内实行国家改造，对外则是讨论建设东亚共荣圈问题。海军实行南进，使日中战争向南方推移。

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存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第二次的近卫内阁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介于两次之间的平沼、阿部、米内内阁，都不过是过渡性的存在而已。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三国同盟问题，尤其是如何决定与德、意的关系。这早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就已开始进行，后经下届内阁期间，由于欧洲形势的突变，曾产生过动摇，始终没有结果，直至第二次近卫内阁才开始解决。为了说明三国同盟成立的整个过程，对于给日本国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欧洲局势，有必要做一个梗概介绍。

平沼内阁与军部的活动 平沼内阁成立后不久，海军占领了海南岛。平沼首相从米内海相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颇感惊讶。海军占领海南岛，是执行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它将对越南以及东南亚，产生何种政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华问题已经开始向南方发展，这种气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中国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是由于日本自身的软弱。本来，应该通过日本的强烈反省来解决问题，可是却抱有这种思想，即蒋介石之所以与日本对抗到底，是因为得到英美各国的援助，英美还鼓动蒋介石与日本继续作战。因此，日本就突起反英、美的风潮，迫不及待地要与德国接近。

汪精卫逃出重庆，决定来日本。板垣陆相请求首相会见。平沼听到这话后，再次感到吃惊。这是因为平沼向来站在局外，对军部的活动一无所知的缘故。

军部继续进行对华经营。新设立的兴亚院已开始着手开发华北经济。通过特别委员会，策划中国方面的政治组织，土肥原及影佐两位将军相继在中国活动。

二　汪精卫

汪精卫的对日观　汪精卫在革命初期就是孙中山的同志。在北京为打倒清朝政府，企图用炸弹炸死宣统幼帝的摄政王，而遭到逮捕；但由于肃亲王赞赏汪的才华，他才幸免一死。他作为当代稀有的“文化人士”，代表国民党的思想，其声望仅次于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遗嘱就是由汪精卫起草的。因此，和蒋介石相比，汪是国民党以及革命运动的先驱。他长期旅居日本、法国以及其它国家。蒋介石北伐之际，他参加汉口左派政府。此后，还积极建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南京国民革命政府时期，他辅助蒋介石，就任行政院长。这是在满洲事变以后的事情了。

汪精卫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左倾“革命家”，但作为一个实际活动者，他的思想已经达到成熟。他的基本思想是亚洲解放，他的政策则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所谓“亚洲主义”。他的主张是希望亚洲人民团结起来，为亚洲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这种思想所产生的结果是使他寻找到了一条与日本相妥协的道路，全心全意地要建立共同方针。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左派”，在早期便与共产党相妥协，后来逐渐

远离了共产党，最后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在中国推行共产党方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上海事变时，汪精卫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对于笔者的停战主张，曾积极协助。在这以后，又不惜代价积极从事日中的妥协活动。最初，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从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被迫和共产党相妥协，不得不实行举国抗日的方针。因此，汪精卫终于和蒋介石分道扬镳。

逃出重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汪精卫的思想仍然没有改变。他主张应该和日本妥协，共同兴旺亚洲。对此，蒋介石抱有共同想法，但认为凭过去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日本军部相妥协，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借助美、英的援助，和共产党配合，抗日到底。此外别无它路。

汪蒋除在政治见解上有以上的差异之外，即使在个人情感上，也有水火不相容的地方。这个因素对他们的分裂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蒋介石不能容忍汪精卫在政治上的指手划脚，而汪精卫已察觉到他作为国民党的老一辈的威望和立场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日中战争的发展，两人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终于发展到互不相让、势不两立的境地。

汪精卫在重庆感到不能施展自己的才智，而且感到大难临头。因此，决心逃离重庆。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曾仲鸣、梅思平等人都相继逃出重庆，来到河内。这时，重庆刺客将曾仲鸣暗杀，汪精卫保住性命，逃出虎口。汪精卫在河内呼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于十二月三十日也发表声明，表示和日本妥协，决心挽救东亚大局。日本军部特务机关的影佐少将派日本船把他接到上海。不久汪精卫为了和日本主要领导人接触，再一次

来到东京。他了解了日方的妥协条件后，便在日本占领区开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

日本对华扩张政策的危害　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这是因为首先要取得日方的了解，必须有一个长久忍耐和努力的过程。

当时，日本方面的强有力者认为，不能放弃与蒋介石的妥协。他们认为仅仅凭着汪的威望，在这种状况下的中国，建立汪政权是不会成功的。而且，新政府的建立，表明与蒋介石的妥协完全结束。这在日本政策上，毫无意义。在与蒋介石的妥协之前，不如先暂时采取一个过渡性的方针政策。这种思想与扶植汪政权的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汪已来到日本，会见了平沼首相以及政府的要人。此外，还得到近卫的了解。军中枢部主张是由汪建立新政权，以施行占领地区的行政。

在支持建立汪政权的人们里，也有软硬不同的意见。了解中国国情的人，主张应当给予汪一个机会，使他多年主张的政策得以实现，利用他的威望来取得民心，使他放开膀子大干一场。这仅仅是政府以及有见地的人们的主张。但军部以及兴亚院的意见，则是要乘此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式的傀儡政府，巩固日本在中国不可动摇的权益。而实际上，日本的军、官、民各个机关，都想借此机会，争先恐后地介入中国问题，而最初对汪许下的诺言都被糟踏了。

汪政府成立后，得到日本承认是第二次近卫内阁时期，它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日中基本协定”签订的结果。

建立汪政权是从平沼内阁时期开始，直至米内内阁时

期，共间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为建立汪政权而积极准备。内阁虽然多次更换，但军部的对华工作却从未间断过。

汪精卫的国内工作 中国国内的准备工作对汪精卫来说也是极其复杂。活动在上海的特别委员会和军特务机关的共同成果——维新政府，在福建派的梁鸿志主持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已被决定和新国民政府合并。汪精卫和主持北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克敏在青岛会谈，仅仅在形式上把"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入汪的新政府；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后面，有许多日本军部以及其他各种分子的庇护和支持，因此给合并工作设置了障碍，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经过几次磋商才达到目的。这样，华北政务委员会得以长久存在，并以日华北军为坚强的后盾。事实上，直到最后，它仍然保持独立的状态。

三　三国同盟(二)

板垣陆相 近卫听取了参谋本部石原第一部长等人的建议，排斥杉山陆相，把满洲事变的主要人物板垣中将选进内阁，这并不只是处理中国问题，而且也是企图利用参谋本部的力量，控制对华强硬派的陆军省。然而，却不能实现这一愿望。板垣陆相的存在，不过是形式上的存在而已。中坚将校的计划如愿实施，与满洲事变和日中战争有关的人，都相继担任内阁要职。近卫组阁的原先打算，是想方设法避免陆军所宣传的北方国防危机，利用军部内中国派的力量。这反使中国战争不断扩大。现在为了牵制中国派，便利用北方派，恢复并利用皇道派的势力。但是，

用这样的方法，是不能收拾战争残局的，而且助长了军部个人的势力，军部的愿望都如愿以偿，近卫的个性和地位完全被军部利用了。

解决中国问题是参谋本部热切希望的，但是把握统帅大权的参谋本部，并不想立即从中国撤兵。虽说要解决中国问题，但要想缓和军部的解决条件，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对华强硬派的思想，控制了整个军部，加上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日中战争日趋复杂。

德国的和平调停虽然失败了，但是经过了日中战争，日本对德国的信任感日益增强，而对英、美的反感，也在与日俱增，这正好形成反比。德国为了承认"满洲国"，断然撤回派往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团，牺牲对华通商利益。德国的对日政策，自从承认满洲事变以来的日本军部大陆政策之后，对于日本的政策均明确表示支持；而英、美则相反，英美的政策始终都是反对日本、支持中国的，并且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断继续，而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则设置障碍进行扰乱。这时，德国在日本的反英、美宣传活动，是何等的有效，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柏林和东京的联系则更加密切。

自满洲事变以来，军部的主张是日、德、意三国军事合作，不论皇道派还是统制派，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同观点。这也是北方派的积极主张，对华派则热切希望能实现这一愿望。指导这种主张并使之向前发展的就是板垣陆相。

日本的纳粹势力与反对三国同盟势力 白鸟公使自从任驻瑞典公使时期以来，与三国同盟这一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白鸟作为一个激进论者，在日本和军部一起积极主张

三国同盟。板垣陆相和近卫首相原先都想让他担任外务次官而进入中央任职，但宇垣外相任命大岛武官作为大使驻德国，同时任命了白鸟为驻意大使。大岛武官特派笠原少将回到东京，报告三国同盟的交涉，并经过五相会议通过后，大岛中将即以新任驻德大使的身份，和白鸟相互呼应，正式开始三国同盟的交涉。

在海军方面，以末次大将为首的反英、美激进派，为德国纳粹歌功颂德，他们自然拥护三国同盟。在末次大臣的领导下，日本的内务行政已急速趋于纳粹化。以军部为中心的亲德意、反英美的宣传，常常不顾一般常识，报纸和其它的舆论也都紧跟这种形势。因此，三国同盟论竟一时传遍整个日本。但在另一方面，政府的一部分上层人物和有远见的人，都坚决反对这种论调。

近卫内阁所承认的三国同盟的交涉方针在平沼内阁时期已有了充分的理由，并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但中央和派出机关之间，意见开始分歧，同时外务省和军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这一现象的暴露，的确是日本外交的一大憾事。短命的平沼内阁，完全是继承了近卫而从事三国同盟交涉的内阁。

反对三国同盟的中心是有田外相领导的外务省。这里除了白鸟大使和军部妥协分子之外，大部分都是不赞同三国同盟的。外务省本来就反对轴心外交，它认为应该坚持三国同盟的《防共协定》这一指导思想，而三国同盟正是这一根本思想的产物。因此，目标只能限于苏联，而不适用于其它国家。如果把矛头指向美英的话，那就是以英美为敌人，使日本对英美的关系逐渐恶化，把日本的活动推向危险地带，这是必须防止和避免的。

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或对国际常识有所了解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利害关系，是很容易判断的。外务省各重要机关，都十分赞同这个意见。在日本对欧洲问题正孕育着危险的时候，以英、法、美为敌，而加入德、意同盟，采取暴政，稍有头脑的人都决不会这样做。日本的上层人物中，许多人还没有改变英日同盟时期的观念，他们认为不能太轻信德国，因此不赞同与德国结成同盟，而放弃与英美结成友好关系。天皇是最反对与德国同盟的一个人。

海军积极搜集石油和其它军需物资，从总的来看，他们已决心南进，但不希望立即与英美发起战争。当时海军当局的米内海相、山本次官以及稳重派的海军前辈都强烈反对三国同盟；这个反对意见和海军所一致支持的南进政策，在根本上是互相矛盾的。南进政策是由海军里的极端论者所领导，对于三国同盟的缔结，海军内部有远见的人们，分析了日本海军和日本国力，从大局出发，都一直坚持反对意见，这种态度一直坚持到第二次近卫内阁。

欧洲的政局随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对外加速扩张，变得十分险恶，达到一触即发的境地。而日本却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加入三国同盟，卷入欧洲战争，这实在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不仅如此，而且当三国同盟遭到国内上层阶级反对时，一些有远见的人们对此感到不放心。在这样的时候，军部却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强行己见，立即向德国靠拢，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

三国同盟的高歌猛进　以军部为中心的三国同盟的交涉活动，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终于在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以及六月四日的五相会议上审议了国家的根本大策。为了使日、德关系更加密切，决定开始这方面

的交涉工作。但是，涉及到这方面工作的具体方案时，意见不能统一。军部的意见是无条件地支持三国同盟，而外务省的意见，则是要把同盟的目标仅仅限于苏联。彼此之间不但不能取得一致观点，反而增加了感情上的隔阂。

大岛大使在中央军部的指示下，为三国同盟的成立，积极活动着。他还根据德国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建议，必须采取一般同盟条约的形式。此外，驻意的白鸟大使，在离开东京前往意大利任职的时候就已悉心观察了军部的意图，和陆海军武官共同从侧面援助，与反对三国同盟的有田外相相对抗，无视政府的训令，独自行动。因此，这两位大使的活动，与外务省的观点是相违背的。天皇认为这两位大使和军部串联活动，因此召见板垣陆相，斥责军部不应干涉受到宪法保护的外交大权。

在日本国内，三国同盟的缔结活动已相当显露，其残余势力进一步地演变为反英美示威运动，国内的社会很不安定，以致木户内相对平沼首相警告说："如果不加以管制，首都东京的社会秩序恐怕不能保持了。"

自满洲事变以后，不负责任的右派和有计划的左派互相合作，组成反英队伍，闯入英国大使馆。这种缺乏冷静批判的狂乱行为，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应该感到羞耻。但是，不论是军部还是一般国民的狂态已达到不能自制的地步。

五相会议与三国同盟的赞成与否定 每次举行五相会议，对于同一问题，总要反复讨论而没有结果。许多报纸为了迎奉军部，登载有刺激性的评论和新闻，达到宣传目的。自从满洲事变以来，一些有见识的人均受到军部的镇压，因此使他们都不敢抛头露面。虽然这是一般的形势，

但在背面的反对力量也决不是软弱的。天皇一开始就反对三国同盟，元老以及在外使臣也都积极反对。在数十次的五相会议中，有田外相得到米内海相的支持，自始至终反对三国同盟。

但是，为了讨论三国同盟，五相会议经历了七十多次的讨论，仍无结果，随着亲德运动的高涨，政府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妥协于军部。平沼首相发出电报，向希特勒表示亲善友好。随着欧洲局势日益危急，里宾特洛甫对大岛大使有关同盟的督促也紧迫起来。

日本政府斟酌德国的意图，同意签定一般同盟条约，即缔约的一方在受到第三国的攻击时，其它协约国有援助的义务。同时认为，第三国只能限于苏联，对受害国的援助时期和方式，应由各协约国自行决定。对于后一种意见，德国不甚满意。日本中央军部只注重三国同盟本身的缔结。第三国，不论是指苏联，还是指自满洲事变以来敌视日本、支援中国的英美，一旦发生战争，其它协约国都有援助的义务。军部鉴于中国当前的形势，认为不必对英美和苏联加以区分，这是对战争极其轻视的态度。负责三国同盟交涉工作的大岛大使和白鸟大使，与德国的主张相一致，都企图以三国同盟的成立，迫使英、法屈服。

在意见尚未一致的时候，欧洲形势已经急速地向前发展。德国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不久，就吞并了捷克，进而进攻波兰，并与三国同盟斗争的对象——苏联，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与英法宣战。这时，在柏林的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交涉，也就化为乌有了。

平沼内阁称欧洲的政局为“复杂离奇”，抗议德国和苏联所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是违反反共协定的，因此提

出总辞职。对于欧洲形势尚未充分考虑，就开始三国同盟的交涉，并被德国的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世界大局视而不见，这正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

被平沼内阁说成是“复杂离奇”的欧洲政局，其结果又是怎样呢？

四 欧洲风云（一）

世界政局展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德国的势力，俄国也因处于革命的初期而一时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因此，英帝国借此在战后得到了充分的休养。以调整世界上国际关系为目的组成的国际联盟，由于美国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由英国支配的。

统治欧洲、控制着国际联盟的英国至少在战后休养期间，是可以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国际联盟上并通过它开展外交活动的。这一时期主要是指战后的工党内阁、工联内阁和保守党内阁，也即从麦克唐纳执政到鲍尔温执政的时期。这期间，英国致力于调整战后经济、处理国内问题。保守党在鲍尔温的领导下，在选举活动中占有优势。

在国际联盟外交破产和德、意兴盛起来的新形势下，一九三七年英国继鲍尔温内阁之后，又成立了张伯伦内阁。美国在这一时期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了“新政”，摆脱了经济危机，使他再次当选为总统。在他第二任总统期间，美国国内得到充实，由孤立消极主义转向自信积极主义。一九三七年，东亚爆发了日中战争。在欧洲，希特勒吞并了莱茵区。墨索里尼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征服了埃塞俄比亚。日、德、意三个大国，在一九三三年就退出了国

际联盟。

当时，英国大多数人仍做着和平之梦，没有很好进行战争准备。但作为岛国，它拥有强大的海军，并正在实施防空计划。保守党的丘吉尔经常就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国防问题向政府发出警告，并敦促英国人民觉醒。他特别强调加强空军力量，并亲自致力于这个事业。

英国的激进派和稳重派 当时掌握英国政权的保守党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张伯伦为首的正统保守派，另一派是丘吉尔的自由保守派。两派在政治观点上有不少差异。后者是倾向于联合美国的世界政策理论派，而前者则是倾向于维持英国传统的局部政策实际派。

率领艾登、达佛·库柏等所谓反对派的丘吉尔认为：英国和德意誓不两立，不久必将发生冲突。他主张英国对此必须全力以赴，严阵以待，不但要增强本国军备，也必须强化法国的军备，过去要求法国裁军是错误的；英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必须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应接受美国的援助，尽早准备与美国加强合作。丘吉尔还认为国际联盟是支持这一观点的，而德、意、日则会尽力防止上述情况发生。领导保守党的张伯伦一边肯定了英德发生冲突的危险，一边又认为必须想方设法避免这一冲突的发生。特别是在英国武装力量准备得还不充分时，更须寻找与日、德、意的妥协办法，以防战争发生。他希望既能和平解决欧洲问题和东亚问题，又能维护英帝国的权威；并且认为，不管怎样，英国站在独立的欧洲立场上思考问题是明智的，如果过早地与苏联、美国站在一边，将会使战争提前爆发；应极力避免战争，世界大战必将动摇英帝国的地位，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到。罗斯福建议在华盛顿召开与欧洲问题有

关的国家首脑会议，张伯伦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便婉言谢绝。他们对苏联也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

张伯伦的妥协中立政策如果成功的话，也许能避免战争。但不幸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这些政策是行不通的，德、意两国急于采取激进的行动，张伯伦被逼得走投无路。

希特勒东进与英国的态度 希特勒不敢轻视英国，他了解英国具有雄厚的实力，这在《我的奋斗》中写得清清楚楚。他希望和英国妥协，并且把共产主义苏联作为两国共同之敌。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希特勒与英国签订了令英国满意的《海军协定》，承认了英国的海上优越权。他希望英国能因此认可德国向东扩张，因为这不但对英国的安全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苏联也是它的共同的敌人。希特勒断定英国将默认德国的东进，这不能不说是过于轻率。

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在伦敦德国大使馆会见了英国强硬派丘吉尔，经过长时间的试探，最后直率地阐明了德国东进的意图。里宾特洛甫强调说明，进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德国的宿愿，希望了解英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丘吉尔说如果实行上述政策的话，就意味着英德战争。丘吉尔等自由保守派由此看穿了德国的真正意图，认为英德冲突不可避免，必须严阵以待。

里宾特洛甫不接受丘吉尔的警告，认为英国的态度不会如此强硬，多少还有一些妥协的可能。他把这个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向希特勒汇报了，结果这个判断给德国以后的行动以较大的影响。德国人向来不善于了解别人的心理，这次德国对别国做出错误判断，并不是第一次。

张伯伦与丘吉尔 保守党中张伯伦派的霍尔外长因在

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乱等问题上处理不当而下台。继霍尔任外长的艾登和海军大臣达佛·库柏，因反对张伯伦向德意妥协的政策而辞职。由此可见，张伯伦派和丘吉尔派在对外政策上有明显的分歧。

继艾登任外长的前印度总督哈利法克斯支持张伯伦，张伯伦还不会被大多数英国人抛弃。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张伯伦积极推行妥协政策，他不顾年事已高，时而亲临戈德斯堡，时而去萨尔斯堡山庄拜访希特勒，为恢复欧洲和平而奔忙。但希特勒不理这些，仍一意孤行，一九三八年吞并了奥地利，进而向捷克要求苏台德地区。正是这个捷克问题，卷起了欧洲风云。

五　欧洲风云（二）

捷克的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是夹在德、奥、波兰、匈牙利中间，居于欧洲大陆中部的斯拉夫国家，它连接着西欧和东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获得了独立，总统贝奈斯是仅次于第一任总统马塞里克的开国元勋。作为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的政治家，他是最拥护国际联盟的，因为捷克的独立和繁荣，完全依靠国际联盟的保护。贝奈斯反德亲法，还亲近苏联。

捷克和法国有同盟关系，也与以法国为盟主共同反对德的各小国保持着亲密关系，这些国家是国际联盟内的欧洲和平组织的重要力量。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为期五年的互助友好条约。这样，法、捷、苏三国形成了共同防范新兴纳粹德国的战线。

苏联对西班牙的赤化案以莫大的希望，并对此提供援

助，把西班牙作为赤化欧洲的基地，但西班牙的内乱越来越不利于共产党，因此把西欧赤化的中心移到巴黎，接着又移到布拉格。人民战线运动蔓延了整个欧洲。在反共的纳粹眼里，布拉格成为策划反德的中心地区，捷克是东西欧的连接点，将被用于实现包围德国的目的。

贝奈斯总统和托哈契夫斯基元帅事件 对希特勒来说，破坏法捷包围圈是至关重要的。苏法协约签订不久，希特勒向贝奈斯提出缔结中立条约的提案，也就是要求捷克在法德发生战争时严守中立。这个提案目的在于使法捷共同防卫同盟条约失效。

贝奈斯对此提案正犹豫不决时，德国军部传出话来说，应督促贝奈斯迅速做出决定，因为在苏联发生内讧后再承接德国的提案就太迟了，此时不能再踌躇应当机立断。贝奈斯派人四处打听德国军部传出的苏联将发生内讧的情况，结果从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来往文件和使馆人员口中得知：苏联国内有人正在密谋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密谋者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德国军部有密切关系的苏联军部中的实权人物。他们企图在德国军部的协助下，颠覆斯大林政权。贝奈斯立即把这一消息通报给斯大林。这时，他已不惧于德国军部的压力并把德国政府的提案置于脑后。

苏联于是立即开始肃反，国内外与上述阴谋有关的人被一网打尽，这就是著名的托哈契夫斯基事件。在伦敦服役的苏联陆军武官甫德纳和苏驻德国大使馆武官修米德大校等人，也因与这一阴谋有牵连而被捕（一九三七年六月）。通过这次肃反，斯大林扫清了国内以军部为中心的反斯大林派。同时，随着所谓托洛茨基派被消灭，斯大林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曾被派到中国的加伦和任西伯利亚军区司

令的甫鲁海尔将军的销声匿迹，也是与此有关。

贝奈斯对苏联如此忠诚，斯大林非常感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对他深表同情并让他复职，据说就是因为这一缘故。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九四八年捷克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在二战后复兴的捷克实际上已被苏联吞并。马塞里克外长自杀后，贝奈斯总统也随之郁闷而死，捷克终于成了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特首相一人的天下。

斯大林在感谢贝奈斯的同时，希特勒对贝奈斯恨之入骨，伺机进攻捷克。

这样一来，捷克问题就成了德、苏、法三国间最敏感的问题。

苏联的对捷政策 奥地利被吞并后，对原属奥地利领土的德意志民族居住地区，德国要求将其中划归捷克的地域归还给德国。这就是包括马利恩斯克的苏台德地区问题。

希特勒要求归还苏台德地区，主动挑起了捷克危机。捷克在苏台德问题上能否与德国抗争，是一块试金石。捷克对德国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法国和苏联的态度，甚至会左右整个欧洲的形势。

作为捷克同盟国的法国，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通过驻苏代理大使询问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如果捷克受到德国的进攻，苏联将做出何种反应？法国同苏联和捷克都有互助同盟关系，但苏联除了在国际联盟中与捷克有关系外，并没有对捷克承担任何履行条约的义务。李维诺夫反问道：苏联对捷克承担的义务，是一种间接的义务，即只有在法国援助捷克的情况下，苏联才能给予援助。当捷克遭到德国进攻时，法国应持何种态度？法国代理大使对此不能做

出明确的回答。李维诺夫建议：为了协商这些问题，应该召开有关国家的军事专家会议，苏联也将参加。他进一步说，在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为了使波兰和罗马尼亚能够放弃中立立场而与我们站在一边，通过国际联盟对其施加影响是最为有效的。同时，苏、法、英应对欧洲政局发表共同声明，对德国提出警告。这样做对美国也会产生深刻影响。苏联的这些提议，显然是怂恿英法采取积极行动，目的在于使法、英、苏三国联合起来包围纳粹德国并与之作战。

于是，李维诺夫出席国际联盟大会，并在会上呼吁一切为了和平，呼吁各国支持对德国实行包围的政策。他试图通过国际联盟这个舞台动员世界舆论，并给美国以巨大影响。

慕尼黑会议 法国和英国在苏台德问题上都没想涉足太深，达拉第和张伯伦在英法对德战备上也没有达成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协议，反而认为与德国实现妥协不是不可能的，目前策划对德军事行动为时尚早。

因此，张伯伦接受了达拉第关于与希特勒直接交涉是适当的建议。结果，达拉第、张伯伦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谈，召开英、法、德、意四国会议以解决捷克问题。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底的事。而在这之前，英法就已劝告捷克接受德国的要求，并明确表示如果捷克不听从这一劝告，德国采取行动时别指望法英会给予援助，因此捷克毫无办法。九月三日，德国迅速占领了苏台德地区。

慕尼黑会议于九月底召开，仅仅一两天就收场了。苏台德地区被吞并得到会议的正式承认，英、法在没给捷克任何援助的情况下解决了捷克问题，欧洲暂时免于战祸。

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期间特别单独会见希特勒并与之交换意见。希特勒表示，今后在与两国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单方不能表态，而应由两国共同协商。希特勒还声称他的领土要求到此为止。

墨索里尼从慕尼黑返回罗马时，象凯旋将军那样受到热烈欢迎。张伯伦也因解除了欧洲的危机而受到民众的欢迎，他和皇帝一起走出白金汉宫，接受市民的欢呼和祝福。

世界各地反对慕尼黑会议 慕尼黑会议看起来似乎一时避免了欧洲的战祸，但它实际上成了欧洲战争以至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

在苏台德问题上，英、法背叛了捷克，使捷克的未来陷入黑暗之中。尽管如此，捷克仍与法国保持着互助条约所规定的同盟关系。

慕尼黑会议激怒了苏联。苏联与法国有互助同盟关系，并曾向法、英提议在政治、军事战略上共同组成对德国的包围圈。苏联认为这是国际联盟对待侵略国的当然立场，理应受到英、法的欢迎。然而，英、法不响应苏联的号召，却提出对德妥协政策，并抛开国际联盟与德、意接触，背着苏联由他们四国决定欧洲的重大问题，以至不惜牺牲与自己有同盟关系的小国利益。苏联不承认英法与纳粹妥协、背叛正义的政策，因此通过人民战线，动员世界各国组织强有力的宣传机关，开始攻击慕尼黑会议，使全世界都知道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对德妥协政策的种种罪恶。苏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反对英、法妥协政策，才能更有效地向美国施加影响。张伯伦、达拉第无视苏联的建议并背着苏联玩勾当，这使苏联怀恨在心，伺机加以报复。

对慕尼黑会议的不满在法、英两国国内也日益强烈。这种不满，不仅仅是由于左派的宣传。特别是在英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的危害，并从各个方面加以反对和抵制。张伯伦则竭力辩解，说希特勒的领土要求到此为止，与之妥协是正确的，因为这是维持欧洲和平、防止战争的唯一办法。保守党中丘吉尔派和国内其它强硬派，指出纳粹德国不可相信，激烈地攻击张伯伦等出卖小国利益的不义行为。英国的舆论为之哗然。

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和达拉第只得倾全力备战。再做出比与德国妥协更卑鄙的勾当，这是英法舆论决不会允许的。

六　欧洲风云（三）

斯洛伐克独立运动　慕尼黑会议后不久，希特勒终于找到了再给贝奈斯一击的机会，这就是斯洛伐克的独立问题。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里，以工业为主的捷克地区比以农业为主的斯洛伐克地区文化水平高，因而实际上捷克统治着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运动，是捷克斯洛伐克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旨在摆脱捷克统治的斯洛伐克独立运动，是由独立党领导的，其领袖是提索。德国吞并奥地利、索还苏台德地区后，捷克处于德国领土的半包围中，已难于统辖斯洛伐克，因此越对其进行镇压，其独立运动就越加高涨，以至蔓延到全国。斯洛伐克独立派甚至求助于奥地利的统治者赛斯因夸特。他是接替奥地利最后一任首相舒士尼格而被希特

勒任命为奥地利总督的。赛斯因夸特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柏林汇报。提索亲赴柏林，直接向希特勒求援，希望希特勒帮助他们达到独立的目的。一九三九年春天，希特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解决捷克问题，赶贝奈斯下台。

占领捷克及其反响 三月十五日，德国军队突然入侵捷克。在德军开进布拉格时，希特勒宣布把捷克并入德国，捷克成为德国的玻希米亚、摩尔拉维亚保护区，即恢复到一九一四年时的状况。贝奈斯总统流亡国外。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提索就任总统，都卡任总理。他们都曾因参与独立运动而被贝奈斯投进过监狱。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波兰外长毕克曾多次与德国联系和磋商，结果在德军侵入捷克后，波兰也在德国的许可下，出兵占领了捷克靠近波兰特申工业区的利什地区，并将它吞并。捷克完全被德国和波兰瓜分了。德国用牺牲捷克来满足波兰的要求，作为回报，德国不久就要求波兰在其北方的但泽走廊问题上做出让步。

希特勒侵略非德意志民族的捷克并将其划入德国版图，这不仅震撼了欧洲，也使世界震惊。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向张伯伦做出的不再有领土要求的许诺，已被事实证明是假的。张伯伦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当德军侵入捷克时，他立即声明给波兰提供安全保障(三月三十日)。丘吉尔等反德派对此持嘲笑态度。在英国，不论是保守党、工党，还是自由主义者，举国上下都已忍无可忍，立即征兵，日夜备战。法国也在达拉第的领导下抓紧备战，镇压频频发生的罢工事件，彻底修复“马奇诺防线”，并把防线延伸修筑到比利时边境附近的沿海地带。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反德宣传都已达到

高潮。不用说，资本主义各国与纳粹德国发生冲突，正是苏联求之不得的。

但泽走廊问题的交涉和英法的决心 希特勒在作战计划中考虑到英法的形势，决定继续向东扩张。这次，波兰成了进攻的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为给波兰一个出海口，把通往波罗的海的地区划给了波兰。由于这个原因，普鲁士的发祥地东普鲁士便与德国分隔开了。波兰在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但泽港之外，又在格但·斯克地区大规模地建设港口，并即将竣工。这是因为波兰急需有一个完全是自己的海港。但泽走廊问题一直是德、波两国间的重大问题，这早就可以料到。

把东普鲁士从德国本土分离出去，这对德意志民族来说，在感情上是不堪忍受的。此外，这个德意志人的重要地区被分离，便不能沟通德国与海外的直接联系。且不说这对德国向东扩张这个大目的不利，就是对一般情况下的内外交通也是不便至极。占领捷克之后，德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同波兰进行交涉。

德国提出的方案是要解决如下问题：恢复波兰走廊地带原属德国那一部分领土的德国主权，波兰仍保留海港通往这里的交通线路，并在这条线路与德国通往东普鲁士的铁路和公路的交会处建筑立体交叉桥。德国对波兰走廊的要求，不过是要恢复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的原德国领土，并且还给波兰留下一个海港，所以这一提案并不过分。而且，德国在此之前承认了波兰对捷克的瓜分，波兰对此理应付出相应的补偿。因此，里宾特洛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英、法不会以战争作赌注。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捷克已被德国吞并，如果通往东普鲁士的道路被德国打通，那么波兰就处于德国的半包围中，挡在德国向东扩张道路上的波兰的命运肯定会完全和捷克一样。因此，在波兰走廊问题上让步与否，实际上是波兰向德国屈服与否的问题。

过去曾不断与德国接触的毕克外长现在穿梭于巴黎和伦敦之间，听取英、法政府的意见。

波兰问题已不仅是德、波两国之间的问题了，它已成为左右欧洲全局的各强国所关心的重大问题。由于捷克被吞并，欧洲各国首都都掀起了反德热潮，张伯伦、达拉第也都下决心不能让慕尼黑丑剧重演。英、法都警告波兰当心变成第二个捷克，并对毕克表示：英、法均愿为维护波兰的独立和领土主权而做出努力。英、法已经决心毫不犹豫地保卫波兰及东欧各小国，抗击德国的侵略。由于得到这一有力的支持，波兰对德国的态度强硬起来，丝毫没有妥协之意。德国也下定决心，把军队集结到东部边境。

七　欧洲风云(四)

英法派军事专家到莫斯科　如上所述，德国占领捷克以来，英、法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决心全力以赴充实军备，同时改变政策，即放弃妥协政策，采取直接包围德国的政策。保卫挡在德国向东扩张道路上的东欧各小国并巩固它们对德国的反抗，同时确保同苏联的合作，这是实现包围德国计划的首要条件。

苏联是法国的同盟国，其立场一贯反德，在国际联盟中不断要求共同制裁法西斯反动势力。李维诺夫呼吁一切为

了和平。为形成对德国的包围圈，曾提议聚集各国军事专家进行研究，这在前面已叙述过。现在，德国突破波兰的屏障，正向苏联逼进。德国企图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目的已非常明显。苏联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当然愿意与英、法携手御敌，苏联政府和共产党决心全力以赴抗击德国，这一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英、法抓住时机，决心与苏联缔结反德军事同盟，先是向莫斯科派出外交官员，随后于八月份又派出军事专家组。这与李维诺夫以前的提议互相吻合。但苏、英、法三国军事专家在莫斯科的会谈迟迟没有取得进展，只是在欧洲日益危急的形势下空耗时间。这期间，苏德关系突然出现了新变化。

苏联改变对德政策 苏联在德国入侵捷克后改变了政策的基调，出乎英、法的意料之外。实际上，被拒于慕尼黑会议之门外的苏联在看到捷克的命运后，便开始暗中了解英、法对德国向东扩张的态度，及至与法国的同盟条约被清算，苏联便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不久，自己单独采取行动的机会终于来了。苏联没有忘记要对慕尼黑会议进行报复。而且对苏联来说，站在局外看着英、法同德国死拼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实在是太上算了。

现在正是给英、法反德战争点火的好时候。苏联如果这时同德国妥协而使正在东进的德国大军调转方向的话，就会巩固其在东欧的地盘。更有甚者，如果能够把德军向西引去，就会一举歼灭西欧敌视共产党的国家的军事力量，而给资本主义以彻底的打击。这样，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的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上提出的让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火并的战略战术就会开花结果。如今，苏联终于找到了鹬蚌

相争渔翁得利，玩弄一箭双雕花招的好机会。

为了使这一策略具体化，苏联撤了李维诺夫的职，改由人民委员会议长莫洛托夫兼任外务人民委员（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莫洛托夫外长已于五月三十一日发表首次外交演说，透露出拒绝与英、法缔结互助协定之意，暗示将与德国签约。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由于德国占领了捷克，在军事上直接受影响的是斯克坦军工厂。据说这家军工厂比弗拉斯规模还大，是法国投资兴建的，现在已落入德国手中。在捷克被占领之前，斯克坦军工厂有不少苏联的订货，苏联要求德国把这些订货产品还给苏联，德国答应了这一要求。德、苏关系以此为开端初露好转之曙光，随后德、苏间缔结了通商信贷协定（八月十九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说，德、苏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妨碍两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暗示了德、苏关系将向新方向发展。苏联驻德大使就这一声明向德国政府做了解释，并将此事敷衍过去。这样，德、苏亲近的谈判就和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法军事同盟谈判同时进行着。

当时美国的外交机关摸清了这一底细，并向英、法告了密，英、法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情况。因此，苏联把英、法和德国都操纵在自己手里，处于可以在缜密思考之后自由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伙伴和最有利的时机的地位。

德苏谈判的结果，使德苏关系比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改《德苏中立条约》（一九二六年签字）时更进了一步，达成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德苏谈判在波兰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结束。里宾特洛甫外长赴莫斯科签署新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报导，使欧洲各国茫然不知所措。许

多报纸很快就刊出如下消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八月二十三日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签署并公开发表，德国外长作为克里姆林宫贵宾大受欢迎。英、法两国的谈判委员们见此悄悄地离开了苏联首都。苏联终于达到了对慕尼黑会议进行报复的目的。

斯大林在战争后期的德黑兰会议上曾对罗斯福谈及此事。他透露说，当时苏联与德国妥协，只是暂时的战术。实际上，苏联是想利用这一妥协来巩固自己在东欧的地位，以便进一步向巴尔干地区扩张。

与日本签有防共协定的德国，可能也是作为暂时的战术才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因为一年半后，德苏便因巴尔干问题而发出了规模巨大的军事冲突。

瓜分波兰及德苏新边界 这时，德国已扫清入侵波兰的一切障碍。形势越来越紧迫，英、法正式给予波兰以安全保障，《英波互相协定》八月二十五日在伦敦由波兰外长毕克和英国外长正式签字。波兰仍然不屈服于德国。集结在东部边境的德军，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如潮水一般涌入波兰。英、法随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恰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相隔二十五年。

德军袭击波兰，进行的是闪电战。波兰军队措手不及。德国机械化部队三个星期内便粉碎了波军，一个月内便占领了波兰的西半部。与德军入侵相呼应，苏联军队也立即出动，占领了波兰领土的东半部。在此之前，里宾特洛甫于九月份再次飞抵莫斯科，与苏联达成了如下协定：沿立陶宛西部边境南下至波兰中部直至普克威那一线，大体划为德苏势力的分界线（九月二十八日德苏边境及友好条

约签字)。由此，几经周折的瓜分波兰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不幸的波兰，遭到了任由大国宰割的厄运。东欧的德苏新边境，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划分完毕后便公布了。

宣战与英国 英国议会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听取了张伯伦首相的报告及其决定，通过了决定英国命运的对德宣战的决议。但会场气氛淡漠，应召前来的议员和军人很少，场内空席很多。英国国民则早已斗志昂扬，因而对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议会会议并没看得很重，认为它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例如，听说有一位贵族出身的青年，他是个政府公务员，对纳粹德国的暴行无比愤慨，为此终日坐立不安。但在议会会场上见不到他，因为那时他已志愿参军了。后来，他成了战场上最早牺牲的一名勇士。

在对德宣战的同时，伦敦上空飘起了无数鲸鱼般大小的气球，以防备敌机的空袭。开战后第一天，向全国国民发放了防毒面罩，并命令外出时必须佩戴。但过了一年，敌机也没来空袭，简直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根据防共协定，德国要求日本牵制住苏联，但它却同苏联缔结条约，向苏联保证友好和互不侵犯；与此同时，日本平沼内阁极力避免同英法关系破裂，而德国却突然与英法处于战争状态。平沼内阁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向德国提出抗议，并声言因欧洲政局复杂多变而下台。但不久，日本又同德国缔结同盟，组成共同战线。从参与三国同盟的过程来看，平沼内阁比近卫内阁更加持久和始终如一。

八 诺门坎冲突

外蒙古的立国 蒙古族过去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元代

时征服了整个亚欧大陆，远征的足迹南至印度、阿拉伯，西至莱茵河和以俄国为中心的北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从它的语言看，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日本、朝鲜、土耳其等国家属于同一语系，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种族联系。

蒙古族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是唯一残留的集团游牧民族，它以外蒙草原为中心，活动在北至西伯利亚、东至满洲、南至内蒙古、西至新疆的广大地区，政治上、经济上都较为落后。

内蒙古和外蒙古都是中国的领土。在国际上，中国对蒙古的主权是得到承认的。但实际上，在清朝时就允许这个民族自治了。辛亥革命以后，曾有过企图脱离中国统治的分立运动。后来在苏联革命时，苏联占领了外蒙古一带，蓄意建立唐努土文和外蒙古两个独立国家，并把它们并入苏维埃组织当中（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外蒙古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并在莫斯科签字）。因此，外蒙古完全同中国脱离了。在莫斯科，还驻有蒙古国的代表。中国对发生在革命时期的这一情况非常不满，屡次向苏联提出抗议，但苏联的答复是：外蒙古是与苏联不相关的独立国。当时正是苏联声明废除旧俄帝国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时候。

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了蒙古的独立。中国在战后，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里，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满”蒙国境的纠纷　外蒙古、内蒙古、满洲一带是靠近沙漠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蒙古民族一直在这个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外蒙古和满洲的分界线并不明确，因为这些地

区原来都是中国境内的地区，当时即使有边界也没什么意义。但自从以苏联为背景的外蒙古和以日本为背景的“满洲国”成立以来，国界就开始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日苏间的国境问题，随着“满洲国”的实力增强和日苏关系的紧张，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根据《日满协议书》规定，“满洲国”的国防由日军承担，而苏联也以同样的苏蒙协约，对外蒙古的安全负责。因此，外蒙古与满洲的国境争端，意味着日苏两国军队直接发生冲突的危险。

关东军的力量逐渐增强后，它的一部分军队担负着海拉尔以南和外蒙、满洲国境地带的守卫任务。诺门坎地区的边界，日本方面认为应以哈尔哈河为边界，而不是该河以外的地区。而以苏联为背景的外蒙古方面则主张以哈尔哈河东边的平原地区为国界，并认为自古以来就以这里为国界。这就是争端的起因。

日苏武装冲突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本占领了哈尔哈河一带。苏蒙军队对此予以反击。随着冲突的激化，苏联集结了优秀的机械化部队，出动了空军。蒙古草原是机械化部队的理想战场。

由于苏联动用的是现代化部队，日军第六军被击溃，小松原第二十三师团全军覆没。关东军义愤填膺，司令官植田大将和参谋长矶谷中将计划从大部队抽调兵力，企图一举歼灭敌人，但由于天皇的阻止，没能进行这场决战，司令官和参谋长被撤职，由梅津接任司令官。

为收拾诺门坎之战的残局，东乡大使和莫洛托夫继续交涉，运回尸体、交换俘虏、设立确定国境委员会，达成了停战协议（九月十五日）。这是欧洲已燃起战火、德苏签订了互

不侵犯条约、德军进驻波兰之后发生的事件。最后，满蒙国境大致按照苏联的主张被确定下来。

诺门坎冲突是在中国战争已告一段落、坂垣任陆相时发生的。国外舆论认为：因为日本参谋本部的北方派势力日益增强，所以象张鼓峰事件一样，它们急于试探一下苏联这方面的实力。但当时的参谋本部只顾充实军备，既没全力也没决心与苏联硬拼下去，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诺门坎冲突本是因国境不明确而发生的一个国境争端事件，但因当地日军考虑不周，行动过火，致使事态恶化了。

第六章　军部的轻举妄动

一　最好的转变时机

平沼内阁的总辞职和改变政策的时机　欧洲中部成了德英争霸的中心，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大战争，这对世界政局究竟有什么意义？对东亚及日本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作为这个时期的日本领导者应该要比其它任何国家的领导者更加关心，谨慎考虑，研究对策。因为欧洲的战祸，使日本深受影响，尤其是经过了从满洲事变突变为日中战争的日本。

对于正在建设“满洲国”的日本当时应该调整国策，确保国家安全，这是很明显但又不是冒险的工作。由于各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其势力在东亚势必减弱，美国的力量也因欧洲大战而受牵制，战争的前途是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结束，而且日趋复杂。列强对孤立无援的日本的压迫，暂时能够减轻，这正是日本从满洲事变走向日中战争后，在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的苦境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时机。同时，日本也不会失体面。换句话说，这正是日本维持生存的唯一出路，是把政策引向正轨，使国家得以安全的最好机会。

三国同盟的谈判为什么会途中分解？平沼内阁又为什么以欧洲政局为由抗议进而总辞职？很显然，德国无视和日本所结缔的重要条约，不顾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日德双方继

续交涉已毫无意义。此外，德日之间想法各异，对利害关系的看法也不一致。防共协定既然变成一张空文，就应该清算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重新开始恢复日本的独立行动。平沼内阁的总辞职，是军部的亲德政策在日本国内的破产，也是对左右日本政策的军部进行抗议。因此，今后的日本领导者，应从新的起点出发，正视极其重大的政治局势。

平沼内阁称欧洲战争是"复杂离奇"的战争，并以此为由提出总辞职，是向日本国民表达内阁对欧洲政局不能看透的歉意，也暗示了日本卷入这不可思议的欧洲政局的危险性；鉴于世界重大事件的发生，日本从满洲事变以来的对外政策，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也是笔者从伦敦多次向政府提出的建议。

由于军部的横加干涉，日本着手突击超出国力的事业，自满洲事变以后，就一直抱有自卑感和孤独感。一旦向中国大陆扩张时，日本在各方面都显得力量不够。实质上，根本不具备一个世界大国的资格。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更加向外扩张，结果是在表面上一直有着优越感的军部，失去了自信心。军部的计划是不断地对外扩张。军部这种失去自信的表现，是焦躁、莽撞的行动。由于莽撞，政策变得排他，是自我夸大的妄想；由于自卑，则滥用武力，实行恐吓政治。宣传德善的日本第一思想，使国民狂妄，造成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大陆政策的混乱。然而，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欧洲局势发生了疾风骤雨的变化，给日本敲起警钟，这对日本是一个进行深刻反省的好机会。这也是恢复自信，深刻反省，从根本上改变政策，使自己能在东亚保持自然长久地位的好机会。

失去改变政策的良机　随着东亚的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东亚的领导地位产生了空缺。由日本去填补这一空缺，则是极其自然的。但是，为了真正成为东亚的领导者，就不能再推行过去帝国主义列强所实行的政策，因为与觉醒的东亚人民为敌，就不能获得领导地位。日本只有成为东亚各国人民信赖的朋友，东亚各国人民才会敬佩日本这个先进的国家。亚洲作为欧美殖民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里实行民族主义，势不可挡。而这次大战，正是实行民族主义的好机会。日本只有站在亚洲的先列，主张并施行东亚各族人民所渴望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才能使日本成为东亚的领导者。如果日本错学过去欧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与东亚各族人民相对立，那么，由于地理接近的关系，把日本当作侵略者，和欧美帝国主义相比，他们会更加憎恨日本。因此，日本决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其根本意义在于这不是单纯的国际关系上所谓的伦理、道德以及人权上的感情问题，而是现实利害的关系问题。如果从根本上说就没有睦邻友好的观念，那么，谁会相信日本？谁又会来开发资源、协助贸易，欢迎日本的产品呢？

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看，必须迅速圆满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在国际关系上，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的原因是什么？不言而喻，这就是不能调节好日中关系而造成的。由于欧洲大战，减轻了英美对日本的压力。这时，日本和中国妥协正是时候，也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对于中国问题，提出一个既为中国，也为英美等国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是排除自卑感和孤独感的唯一办法。这样可以恢复我国的国际常态，维持通商贸易，解决人口问题，维持日本国民生活的水平；不仅如此，还是解决满洲问题、打开多年僵局的

关键。总之，日本应改变过去的国策，使之走向正轨，排除与列强之间不必要的摩擦，重建友好关系，确保国家安全。

不论欧洲战争的趋势如何，以上方针是日本所必须采纳的最好方案。如果从欧洲战势来判断的话，德国在陆军上占优势，英国则在海军上占优势；如果空军势力不相上下，那么战争势必长久。一旦长久战，美国必然会帮助英国，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欧洲战争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了。这决不是奇谈怪论，而是根据国际常识来判定的。笔者在伦敦，曾屡次向政府指出过。日本作为东亚的守卫者，应该彻底防止欧洲战争波及东亚，应主动与东亚各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去寻找日本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得以生存的道路。

软弱的阿部陆军内阁 日本在亲德军部的支配下，已无暇冷静思考，清楚地判断国际形势，只是根据军部单方面的主观判断，盲目地执行极端论者所制定的计划。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日本领导者已无暇顾及。在欧洲危机之际，平沼内阁所提出的总辞职，也没有认真考虑平沼内阁辞职的理由，只是盲目地应付当前的国内政治，把更换内阁作为一般的日常工作来处理。

因此，在这个时期里，日本出现了从未有过如此软弱无能的陆军内阁。内阁在陆军安置首相，同时也在海军里起用外相。阿部陆军的内阁除了起用海军大将野山任外相以外，在其它方面没有做出什么变更。以陆海两军大将为核心的内阁，虽然他们都有稳健的性格，但是，在无为混乱中，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半年之后，内阁便垮台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问题和南进策略，至今仍

象继续运转的机械，在世界的大变动中，由海陆两军漫不经心地支撑着。不仅如此，他们乘英美势力衰落之机，得陇望蜀，错误地认为这是进一步加紧推行其错误政策的好时机；而且，在这泥潭里面越陷越深，这的确是国家的一大憾事。元老们都已年老体弱，虽说军部对国内的事务横加干涉，但从一般国际政治形势水准看，日本国民自身的政治性也是很差的。这一点不能否认。

二 米内海军内阁

米内海军内阁 当时，如果有人能从日本看到国际形势的话，他就应该不论海军还是陆军都站在最高领导阶层上坚决果断，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日本当时难道真是缺乏对国际形势及日本的未来这样一种有远见的、强有力的人？或是陷于败战的精神之中而满腹忧虑，不敢挺身而出？结果，被指名任职的首相，是所谓的“稳健分子”，其地位并不是处于陆海两军之上的掌握国家方向盘的领导者。日本就象是一条船，它已驶入国际关系的大海之中，虽然没有舵手，但由于功率很大的发动机的作用，航船仍在继续前进。

汤浅内府和前首相冈田协议推米内海军大将继任阿部组阁。这个内阁好象是陆军海军势力相斗的内阁。按照天皇的意旨，陆相仍由稳健派的畑大将留任。这使军部十分不满。在国际局势的紧要关头的米内内阁，只能是在陆海两大势力中，求得平衡，实行稳健的政策而已。因此，军部的行动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内阁的精神谐调进行。

有田外相为了调整外交而奋斗，但军部的积极态度毫

无反省，更无暇放眼国际政治大局，也没有这种愿望，只是为所欲为，致使日中事变向南扩张。“共荣圈”的观念在德国的家长制的观念下，从日满扩张到东亚地区。国防国家是要求实现一党专制的德国纳粹分子的口号。

一九四〇年一月成立的米内内阁在同年七月就垮台了。它也是无暇建立新的政策，只是应付军部的行动；既受到国内潮流的压迫，又耗费了半年的宝贵时间。

日英关系的调节　笔者在伦敦作为大使曾竭尽全力，调和日英两国政府的关系。当时笔者确信，只有借欧洲战争爆发之时，才能疏通日英问题，制定解决日中战争的方针；避免战祸波及东亚，才能确保日本在东亚的地位，这是日本唯一的出路。

本来，保守党的张伯伦内阁对于调整日英关系不但没有异议，而且依照日本的态度同意调整和日本的关系，并迫切希望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但主要是看日本政策有没有合理的转变。哈里法克斯外长特派巴特勒政务次官作为私人代表和笔者接触，谨慎地处理日本关系。不仅如此，英国政府的有力阁僚罗德·汉奇和罗德洛特都时常和日本大使会谈，积极研究对策。双方的共同愿望都是防止历史上曾有过的日英关系恶化，并借此机会适当地调整日英的关系。对于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以及在东京湾检查英国军舰并逮捕英国人的这些事件，最后都能得到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此外，对日本向英国输出商品及向德国输出军需物资，英国都同意让步。双方都考虑到日英大局的利益，最后谈判取得成功。

英国的这个对日政策即使在非难日本的丘吉尔取代张

伯伦的执政期间，也能够继续执行。丘吉尔曾多次与笔者会谈，逐渐加深理解，以致暂行封锁援助中国的缅甸公路，甚至希望在日中之间发现一条妥协的道路。丘吉尔说，英国绝不反对日中之间的合理妥协。在他执政期间，对日的批判，只是针对日本极端的积极政策。他是首先赞同英日同盟的一个人。根据日本方面的要求，英国将在雨季前三个月，封闭缅甸公路，在这个时期里希望日本能为日中妥协而努力，去寻找日中妥协的道路。这是英国所欢迎的。鉴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物质上的力量相距甚远，日本攻打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就象从纽约向直布罗陀海峡进攻一样。丘吉尔还说，他相信日本不是会进攻新加坡那样如此愚蠢的国家。缅甸公路的封锁，从当时的世界形势上看，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不论是在英国、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中国驻英大使抗议了英国对日政策的宽大。但是，日本政府对此却毫无反应。米内内阁已经没有能力抓住时机，挽回大势，而是忙于应付日军部的压力和策动，对于当时的国际根本问题已经没有能力关照了。

法国战败后，日本低估了英国的实力，夸大了对德国成功的评价，不能对世界形势做冷静的判断，军部所施行的政策犹如脱僵的野马。

日本政策的混乱　日本的政策在非整顿不可的最后阶段日益混乱。军部的推动力已被控制在侵华中坚分子的手中。畑陆相不过是一顶帽子而已。军部领导的兴亚院和其它各机关的联络部制定的侵华政策，已进入极度的混乱；影佐少将正在扶植汪精卫，另立中央政权，毫无远见的中国满洲化政策致使日本人误认为成功的时刻已经到来。

随着愚蠢的侵华政策的推行，南进政策的实施也在快马加鞭，海军引诱着陆军日益向南进攻。这时陆海共同南进的势态，还不是理论的时代，而是作为政策执行的时期。这种势态，随着欧洲大战的进行，使日本进入了死胡同。

取消政党与一党政治　当时，日本国内的国家改造运动，日益模仿纳粹德国，与国家国防的建设相提并论，迫切希望一国一党的强行统治政治。

满洲的协和会、华北的新民会都是这一主张的先驱。基于满洲的国家改造方案，并鉴于过去政党争权夺力的丑态，为了渡过国家的难关，必须建立纳粹式的强有力的政党，并加强这方面的策略。军部认为，应以在乡军人为中心，筹划新党的成立，建议解散旧的政党。但政党的人们对抗军部的这一主张，以保存政党为基础，也来提倡各党联合运动。近卫抓住这一时机，策划建立以近卫为中心的政党。他重申顺应时代的要求，得到了各界拥护。

由于这种分解组合的作用，政界混乱杂然，一方面，使左右极端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在另一方面，使日本政界的力量更加衰竭，只是加强了追随军部势力，并甘心受军部的统治这种战败主义的倾向。

共荣圈的扩大　与此同时，德国式的人生哲学大受欢迎，德国式家族观念以及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流行起来。

为了国防国家的建设，重要的军事资源必须在本国范围内取得。但是，当时世界各国在经济上采取封锁政策。日本为了维持国民生活，虽然要进行通商贸易，但当时的世界形势已不允许这样了。为了维持国民生活，确保军事资源的供给，仅仅通过满洲是不行的，而必须通过开发华北资源，才能保证日中满的"共荣圈"的建立。但是，仅有这些是不

够的。日本海军急需石油，但自从失去欧美贸易之后，只能在东亚得到补偿，这在当时似乎是颇有理由的依据。

日军的占领区越是扩展，日本的经济就越需要增长。于是，从日满华共荣圈的思想，发展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经济活动范围扩张的理论，促使军部扩大占领区，而占领区的扩大，使军部的胃口又增大了。日本军这种毫无统制、不假思索的盲目行动，被列强在东方的势力暂时退却的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世界经济封锁的影响，使日本扩大势力范围的观念加强了。

如果日本能自省、忍耐、顾全大局，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圆满解决日中问题，立足于东亚民族主义，逐步调整与列强的关系的话，东亚共存共荣的经济利益便自然可以得到。但是，日本选择的则是霸道而不是王道。行使武力，迫不急待地要着手于国防国家建设。日本人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宁肯错过时机，而不愿顺应时势，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

三国同盟论的再现　从阿部内阁到米内内阁都受到军部势力的控制。他们不顾世界大势，在国内进行改造运动，对外则继续盲目进行对华占领，失去了平沼内阁辞职而重新调整日本政策的机会，白白浪费了一年多宝贵的时间。与德国的关系已被清算了，但不知何时又由军部恢复起来，德国式的主义和宣传又毫无限制地在日本再次出现。

有关德国的宣传主要是以德国必胜、英国必败为中心内容，而且宣传不论是对华问题还是日本将来的发展问题，英国肯定不会援助日本，日本真正的朋友是德国。这种宣传在日本极其有效。

有孤独感的日本军部为了完成所制定的计划，正急于

寻求援助者。军部的目的，不只是满洲的国防问题，而是日本在整个东亚的地位维护问题。因此，军部想恢复由于平沼内阁而瓦解的三国同盟，希望早日进行三国同盟的谈判。

这个时期的三国同盟问题已经不是平沼内阁时代以苏联或英美为同盟对象的问题。在英法德进入短兵相接的急战的时候，恢复三国同盟的谈判，日本必须站在德国一边，必须有与德并肩作战的决心，否则，恢复三国同盟是不可能实现的。德国极力劝说日本以德国为同盟，共同作战，并主张均分面临瓦解的英国的权益。接受这一要求的日本军部，立即向内阁提出，要求开始三国同盟的谈判。当时，大岛大使已返回日本，来栖大使接替驻德大使一职。

米内内阁强烈反对这种以参战为条件的三国同盟的谈判。为此，军部发起了倒阁运动。

关于欧洲战争的两种观点 当时，对于欧洲战争的趋势，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驻德意的陆军武官为中心的意见。他们认为，纳粹德国伟大的陆军、空军的威力已奏效，战争在短期内，将以德国胜利而告终。特别是意大利参战，加速了英帝国地位的崩溃。因此，应该立即与德国联系，决不能错过共享战争胜利后的机会，认为这是确立东亚共荣圈，取得世界大国自给自足地位的良机。

第二种意见则是驻英大使馆的陆海军武官的意见。他们认为德国虽然在陆军方面占优势的地位，但是英国却在海军方面占优势。德国的空军不足以控制英国的领空。此外，德国的潜艇也不足以封锁英国。因此，战争势必长久，美国必然参战。被围困的德国，最终必定失败。所以，日本不要被德国的暂时优势所迷惑。日本应该在欧洲战争之时，去寻找与英美妥协的道路，解决中国问题，制止欧洲

的战火蔓延东亚，通过各种途径使东亚成为非战争区域。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应该考虑东亚各国的愿望，制定富有同情的东亚政策，坚持永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态度。这样才能维护日本地位，在国际上自然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它是在战后使日本成为大国的途径，并强调即使在这以后，也应是始终不变的方针。

米内内阁对这两种意见更赞同后者：支持始终不介入战争的意见。战争的趋势问题是世界各国以及有见识的人们所关心的大事。日本也不例外。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主张，但是，对于冷静详细观察世界形势的人来说，判断是非并不困难，特别是德苏战争爆发以后，胜负的趋势已相当明显了。

在欧洲大陆与德国势力接近的各国都不是旁观者，所以不能很好地观察战争发展的趋势，判断失误的有法国、比利时以及其它东欧各国。这些国家对战争发展的结局已无暇判定，为了避免目前危机而急于制定国策。但是，其它的欧洲各国，如土耳其、西班牙，都能透过这“复杂离奇”的局势，正确判断。日本远离战争的中心地，对欧洲战争的判断，并非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值得悲叹的是日本看不见世界大势，只是一味地抓住眼前的势态，对大局的判断产生失误，采取了错误的措施。

三　欧洲政局的突变

“奇怪的战争”　米内内阁总是忙于应付国内军部的势力，荏苒时日。这期间，欧洲局势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一九四〇年的初夏，米内内阁末期的事情。

深知德国闪电战术的英国一开战就立即备战，以防德国的空袭。但是，德国却没来袭击，德国的作战比前一次有了很大进步。

德国宣称对英国执行海上的反封锁，开始了潜艇战，就连破坏贸易船也出动了。然而，英国的海军比前次大战更充满了信心。德国对法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占领了波兰以后就着手加强东线，注视苏联的举动，静静地等待了一个冬天，为下一次作战做了准备。

在甘末林将军率领下的法国军队对德军的进攻严阵以待。这时，英法的陆海空三军正在加紧备战。从一九三九年暮到一九四〇年春，英国人把这毫无动静的战争称之为“虚张声势”的战争。英法共同作战的准备已经完成，马奇诺防线以及海峡的守卫，都已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希特勒在这个时期的沉默行为，失去了进攻西方的机会。因此，战争的局势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张伯伦在国会上做战争经过报告时说：希特勒这次失去了良机。

希特勒没有碰壁　希特勒并没有错过时机，他自有想法和准备。一旦决定了自己的想法，完成了自己的准备，他就会突然展开德国式的闪电战。

希特勒早已探明丘吉尔在挪威和丹麦各地企图进行军事活动，以阻止德国由瑞典输入必需的矿石。他判断，这次欧洲战争，欧洲不会出现中立国家，因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占领丹麦，然后向挪威采取军事行动。四月九日，突入首都奥斯陆，发动第五纵队，使吉斯林成立了挪威傀儡政权，向北占领了德伦的英吉纳维克。英法两军虽然都已在这两个地区登陆，但突遭德国的闪电战，不得不分别撤退。对于希特勒这次挪威作战，德国

海军雷德长官曾指出，没有制海权的劣弱军队参加海上作战是不明智的。但是希特勒以政治上的理由，没有听从雷德的劝告。挪威战役的胜利，更加提高了希特勒在海军的威信。德国占领挪威的目的，是要排除北方对德国的威胁，也是德国对西线作战的开始。希特勒在当时已充分认识到了大战的世界性。

继挪威战役之后，五月十日，德军突破国境，根据许利芬传统的战术，先入侵比利时和荷兰，将抵抗的阿姆斯特丹及罗维特丹付之一炬，瞬时间占领了北海沿岸地区。

荷兰比利时两国政府都迁往伦敦。但比利时国王留在故国，于五月二十八日向德国投降，把国民从战祸中拯救出来。

英法联军这时下了很大决心，各自部署。希特勒的武力比一九一四年的威廉军队更加强悍。这种事实已摆在眼前，德国的战策仍然是电光石火的奇迹般战术。

英国的举国一致的内阁 对欧洲大陆开始攻势，使英、法两国的政治起了很大震动。国家处于危殆之中，英国国民表现了真正的面貌。只有这个时候，才是必须成立举国一致的内阁的时候。张伯伦树敌过多，他所领导的正统保守党的纲领，与工党左倾政策相距甚远，格格不入；他的妥协外交政策，自慕尼黑会议以来，受到各方面的谴责。张伯伦为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而努力，但是，工党明确表明了在张伯伦首相之下决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张为了取得工党的合作，不得不更换占多数的保守党及党魁；为了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决定自己引退，推举保守党的主要党人哈里法克斯外长或海军大臣丘吉尔继任。迫于当时英国的政治形势，占下议院席位的丘吉尔担任首相是当之无

愧的。

领导保守党左翼的丘吉尔与工党联系，不论在资格上还是在实力上，都是最合适的人。保守党排除私人情感，一致推举丘吉尔作为拯救国家的领导人，渡过英国从未有过的难关。

工党和自由党都积极支持丘吉尔的内阁。阁僚中有保守党的张伯伦、自由党的辛克莱、工党的艾德礼。外相先由哈里法克斯留任，后因调往驻美大使，由艾登接任。达佛·库柏作为情报处长列入阁僚后，被派往新加坡，为处理与日关系兼管东亚文武官员。

丘吉尔于五月十三日召开新内阁成员会议，以英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促使英国国民下定决心。他在发表演说时说道："在这个时候，向英国同胞献出的，只有血、泪和汗。"这使沉静的英国国民热血沸腾了。

突破马奇诺防线 要突破"百摧不毁"的马奇诺防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那就必将失败。德国参谋总部根据许利芬的作战指导，命令占据荷兰、比利时的右翼德军沿海岸南下，突破防御最薄弱的比利时国境线，从这儿打开缺口，再深入达拉第防线。第一次大战时的军曹希特勒，现在以总统兼大元帅的身份，选择了色丹北部的作战路线。德军参谋部对于这个计划，认为背后的阿尔登山林地带，对军队行动极为不便，很难执行军部的作战计划。然而，希特勒对此充耳不闻，决意实行这项计划。

到了预定发起攻势的这一天，德国的精锐部队集中了空中和地上的势力，全力开始进攻。战争成为立体战。拥有优势空军的德国军队，和苏联一样在立体战中取得了经

验，并以德国参谋总部的周密计划为基础，发挥了猛烈果敢的战斗力。法国军队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中，奋勇苦战。但是法军以以往的地上平面战术，怎么也敌不过德军。德国的机械化部队突破了最坚固的法军阵地，利用完整的公路设备，象雪崩一样突破了英法联军的后方，搅乱了后方阵地。

德国的进攻比法国的退却更加迅猛，而法军的行动却受到了难民的严重干扰。大势已趋，“百摧不毁”的马奇诺防线、达拉第防线都由于德军从背后突破而失去作用。突破而进的德国机械化部队，从巴黎向海岸逼进，把英法联军逼向海岸线。英军善于作战，逃出德军的包围，退到敦刻尔克阵地的海岸线上。

敦刻尔克阵地 法国的生命线马奇诺防线被突破的消息传来，对英法不但是晴天霹雳，而且也是致命的打击。

法国军队已经失去统一的步调，被派往欧洲大陆的英国军队的命运也极其悲惨，在法、比军的协助下才得以退到海岸。这是为越过海峡返回英国做准备。德军则集中陆上和空中的兵力猛烈追击，而英军则奋力抵抗这种集中的立体战。退到敦刻尔克的英军为了渡过海峡，在进行最后的拼命抵抗。但德国优势的空军已越过海峡，刻不容缓地追击英军。

夏季的北海正风平浪静。英法海峡一带无风无浪，平如明镜。若在平时，这里充满了游泳的游客。每当五、六月时，站在海边依稀可见近在咫尺的帆船和游艇在白色烟霞之中的景色。然而，现在退到海边的英军冒着随时都可能遭受空袭的危险，在极度疲劳和饥渴之中，绝望地向西望去。正在这时，他们发现从英国的海岸驶来了各种船只，

逐渐向他们靠近。其中有机帆，有货船，有军用艇，还有泰晤士河上的游览船。这些船只不顾德军的轰炸，不断地向敦刻尔克海滨靠近。这些在英国男女驾驶下的船帆，多如蚂蚁，是为营救英军而来的。士兵们幸运地乘上大小船只，返回英国。这时，他们不得不放弃手中的武器。由于英国人民的英勇抢救，约三十三万的军队人员得救。据英国海军公布，从五月底到六月初，前往敦刻尔克营救士兵的大小船只，共有八百五十艘(只)，其中有七百是英国的。

从荷兰海岸到布列塔尼半岛地区，德军注视着对岸失去陆军的英国。英国随时都有可能被德军的降落伞部队从空中袭击。德国认为，组织一个师团，便足以征服空虚的英国。陆军大臣艾登召集民兵，建立了义勇队，对街道的各个要所都实行戒严。毫无防卫能力的英国本土，能依靠的只有海军、英法海峡和少量的空军。在一百多年前，拿破仑在英国的对岸，集中了无数只船只，窥视着英国。而这次希特勒在相同的地方，豪迈地说道："当今的海路，畅通无阻。"如果英国丧失了治空领域权，那么就等于失去了海上的防卫。英国这时的命运，就象风前残烛了。

法国投降　甘末林将军败退后，由殖民地召回来的原福煦元帅的名参谋长魏刚将军指挥作战，然而，他也束手无策。法军已丧失强大的预备军的补充，变成支离破碎。当时任陆军大臣的贝当元帅断言，要拯救法国人民和巴黎，唯一的办法就是投降。而雷诺首相通过广播，向美国总统和人民呼吁，希望他们能拯救法国，援助法国，其呼声悲壮之至。

英国对法国表示同情，发誓要给予援助，并鼓励法国继续作战。罗斯福总统对雷诺六月十日的来电于十三日复

电，暗示美国将给予法国以物质上的一切援助，激励法国继续作战，表示了美国也将参战的决心。除了这些之外，美国还不能做出更进一步的援助。英国政府向法国提议，形成共同市民权，使两国在既成事实的合作下，共存共亡，想方设法防止法国的降服。但是，这一建议的作用，只是伤害了富有自负心的法国人的感情。

对英国没有好感的贝当元帅决心向德国降服，他认为继续作战是不可能的了。雷诺、达拉第、欧利奥、勃鲁姆相继逃到了北非。担任雷诺和贝当联络员的戴高乐将军曾经强调过马奇诺防线不足以依靠，建议采用新战术。这次，他和雷诺共同行动，逃往北非，又转至伦敦，毅然继续抗战，成为抗战的急先锋。

战局日趋扩大，巴黎已被德军占领，整个法国即将沦陷，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看到这种形势的意大利，不顾德国的异议，向英法宣战（六月六日），占领了萨培国境的山岳地带。由此，意大利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德国认为，既无实力又缺乏物质的意大利，为赢得轴心的胜利，必须在这时保持中立，而不应该参战。

几周之内就占领波兰而震惊世界的德国军队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又席卷法国，打垮了法国的所谓世界第一陆军国的力量，使世界更为战栗，然而却从此产生了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就是使美国下决心要援助英国和使日本军部对德国的最终胜利确信无疑。

贝当元帅于六月二十二日降服于德国，同时还在维希与达尔兰、赖伐尔共同建立法国政府。贝当政府把法国人民从战祸中拯救出来，虽然投降，但仍然统治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深得法国国民的信赖。因此，许多国家仍然承认

贝当政府为法国的正式政府，保留在外使节，日本就是承认这个政府的一个国家。美国为了观察欧洲形势的发展，向维希派遣罗斯福最高军事顾问李希，作为驻法大使。

欧洲战争与中立国 罗斯福深信英法是保障美国安全的前哨。他行使自己的最大权限，决心援救英法。无愧于代表英国人精神的丘吉尔向罗斯福总统保证，一旦发生英国被德军占领的最恶情形，英国将率领全部海军舰队，移向大西洋的彼岸，动员英帝国一切力量，继续抗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英美两国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利害关系上，都步调一致。英国的灭亡就意味着美国的灭亡。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信任英国的决心和实力，两国以共同安全为前提采取行动。英美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领导下，限于战争，采用了合体政策，这就决定了战争的去向。

欧洲战争的趋势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命运。当时，有两个国家不被德国暂时的胜利而眼花缭乱。一个是西班牙，另一个则是土耳其。西班牙的佛兰哥，在德意的帮助下，防止了西班牙的赤化，而且是加入防共协定的轴心国。战争时，西班牙深受希特勒的压迫，被强迫参战，进攻直布罗陀地区。但是，机敏的佛兰哥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后，对于战争的趋势并没有判断失误，虽然他受多次引诱和压迫，但是始终冷静地作为战争的旁观者，正确估计英国的实力，使西班牙的地位安全地保持在国际之间，直至今日。

土耳其处于德、苏、英三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它具有连系亚欧大陆的海峡。土耳其这种地理位置，使其在战争中处境相当困难。土耳其的政治家基于多年的经验，在列强之间，能够看穿任何事物，并冷静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土

耳其和英国保持密切联系，得到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并始终保持中立的地位，丝毫没有迷失方向。当德国的势力向巴尔干涌入，进攻中东埃及，驱逐英国的势力，要实现瓦解英国的时候，土耳其丝毫没有动摇。此外，在这以后，战势逆转，又受到苏联的压迫。尽管这样，不但没有使土耳其动摇，反而使土耳其能够正确判断战争的结果。这两个国家虽距离不远，但却能看清楚欧洲形势，(其实，在近距离，反而容易产生判断失误。)而日本的领导阶层，只是盲从德国的宣传，最后把国家引向灭亡。这不能不说是鲜明的对比。

四　历史上的伟观

丘吉尔与英国国会　了解英国人的为人，便可以想象到当他们的国家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笔者在前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逗留期间，已对英国人有所了解。越是国家危难的时刻，他们就越加沉着，越加自信，非常平静地顶住困难。在敦刻尔克之后的危机中，不论是执政者还是平民，不论男女，不论工人和贵族，他们对最后的胜利，都没有丧失信心。外国人反而为他们担心和焦急，但他们自己则与平时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都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这种情景实在令人钦佩。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英国召开国会。在历史上最紧要的关头，英全国国民的代表们刻不容缓地审议敦刻尔克之后的形势问题，把英国的决心阐明于天下。高高地耸立在泰晤士河畔威斯特敏斯特的英国国会大楼，集中了世界耳目。国会会场座无缺席。旁听者、外交官、妇女们也

都挤满了整个会场。国会议员们头带假发，身穿古袍，排着队伍，悠然地步入会场。议长入席之后，很有秩序地开始了当天的议程。之后，整个会场静静地等待着丘吉尔的登场。

丘吉尔就任首相之后,开始了第一次战况报告的演说。整个会场紧张严肃，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

丘吉尔不慌不忙地如实叙述北法战败的详细经过，并陈述德军优异的战术和成功。联军虽然善战，但仍惨败，使得英军不得不退到海边。丘吉尔还讲到敦刻尔克英勇救助英军的经过。英勇奋战的法军,对最后也终于竭尽全力,败于德军。他的一字一句，都是据实陈述，使听众深受感动。他继续说道，法国战败，只有英国必须和顽敌抗争到底。敌人就在对岸，随时都有可能入侵英国。今天，英国处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自己曾经征求陆海空三军首脑部专家的意见，他们都没有放弃胜利的信念。应该相信英国人的抗战决心，可以超越德国物力的优越性。英国人与其向独裁专制的敌人屈服，不如战斗到底。我相信英国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正在展开大不列颠之战，人类文明的安危就在此一举。所有的自治领及属领都全面支持我们的战争。是选择胜利还是灭亡,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如果说，要使英帝国万世永存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最光辉的时期。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一时期去赢得后人对我们的赞颂呢？丘吉尔说到这里，热泪盈眶，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是听众所不能忘怀的一个场面。

英国的国会会场与日本的不同，议员席是面对面地排列两旁，演讲人在中间演讲。中央的另一方，是议长席，而两边的议员席是由政府党和反对党各占一边。但丘吉尔

的内阁，除了一位共产党员议员以外，其他全都是政府党议员。

丘吉尔演说后退回到自己的座位，就在这一瞬间，会场立即沸腾起来了。邻席的张伯伦也站起身来，向丘吉尔热烈鼓掌，挥动手帕。整个会场的听众也立即欢呼雀跃，有的挥舞手帕，有的拍手跺脚。这个场面和一年前发表宣战时的冷静场面相比较，真是大不相同。英国人有时也会这样热血沸腾。

国会所表示的决心就是英国每个人的决心。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殆之际，表示了国民的决心。这一刹那，的确是光辉的场面。兴奋之后，英国人又回到原来的镇静，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工厂、家庭，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笔者目睹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之后，向日本政府报告说，这是“历史上的伟观”。

对英作战的失败　德国席卷法军，所取得的战绩超过预定的计划，而且是在尚未准备侵略英国时完成的。这时，德军加强英国对岸的力量，忙于登陆作战的准备。连日来，英国上空及海峡沿岸，不断受到德国侦察机的侦察和袭击。

德国对英作战的准备工作完成于夏季。到了九月，空袭更加激烈。丘吉尔所说的“大不列颠之战”，也就是德国对英开战。德军是否侵入英国将决定英国的命运。戈林的空军首先破坏英国各地的军事基地，不分昼夜地进行轰炸，以夺取制空权。而英国空军则以仅有德国空军三分之一的劣势来抵抗。虽然感到战斗机的不足，但陆上的防空设备却十分充分。英国的飞机虽然不断被击落，但空军仍在艰苦奋战。一两周之后，英国就宣布每天击落敌机在一百架以上。击落敌机的数目越过了德军所能补充的能力。从此

以后，德国已没有能力来掌握英国的制空权了。

英吉利海峡进入了风浪季节。丧失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德军于一九四〇年不得不放弃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英国的空军不仅是防守，而且也利用夜间进行轰炸。德军为了报复亦在夜间还击。德国的夜间空袭，先是集中在伦敦，后又转向英国的各大城市。然而，这些空袭并没有直接影响对英作战。

对英作战，英国必将胜利。英国以小规模的空军协同海军共同抵制德军的侵略，这是英国军事上的基本成功。次年，英国的战备，尤其是空军的比例，将要上升到非常有利的程度。拯救敦刻尔克后的英国的危机，是英国英勇的小空军——英国人民决心的结晶。一九四〇年德对英开战失败之后，第二年的作战则更加困难。那时，人们认为德对英的开战，终将还要以失败告终。德国虽然宣称次年一定再战，但这种宣传已无人相信了。

英美与科学武器　英国的空军和德国的空军相比之下是劣势的，但决不是毫无准备。英国早就按照丘吉尔的主张，着手防空设备和加强空军力量。例如，象雷达这一科学武器，在战前就已制成。开战时，就在海峡彼岸的地区开始使用。有了这一武器，就可以探明到七八十里之内地区敌机的活动情况。此后，使用这种更加发达、完善的雷达，在作战中防止空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如此，而且在海上封锁大西洋潜艇战中，也都收到良好的效果。美国在运用这种武器后，使之更加完善。在太平洋的阿留申中途岛之战和阿兹岛日美军玉碎战的时候，美国使用这一武器，击沉日军在浓雾之中的驱逐舰队，使日本海军在当时深为恐惧。

在这次大战中，德国虽然发明了许多优秀的新式武器，但英美也在这方面狠下功夫，成为英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有力条件。雷达的发明不过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后来，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都是由于当时科学武器发展达到了最高峰。

五　军部的轻举妄动

对战争的判断与国策的意见　笔者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就认为对欧洲战争结局的判断没有必要更改。德国在欧洲大陆仍然保持优势的地位，而英国在海上则是绝对的优势，而且在空中防卫上，有充分的准备，使德军登上英国本土进行陆上作战的希望不能实现。对殖民地的战争，英国比德国更加擅长。在相互的封锁战争中，德国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美国对英国积极援助，使英国的力量急剧增强。德国的占领政策前途暗淡。从这个形势上看，英国在得到美国的援助之后，将从不败的地位转为胜利的地位。因此，笔者更加坚信了过去所判断的一切。

由于欧洲战争，欧美各国的力量必然从东亚减退。这期间，日本将取代他们的势力也是必然的，但在这一程序里，日本必须十分谨慎。这次战争，将是促使东亚人民的觉醒，实现东亚民族主义的机会。因此，日本不能以东亚民族为踏板而加以践踏，更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日本必须表现出以东亚人民为友的态度，东亚人民的愿望也就是日本的愿望。因此，在这个机会里，不论条件如何，都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建立与东亚人民亲善的关系，实施这一政策。否则的话，日本无论表面上如何发展，其结果不过

是使日本崩溃的因素而已。因为以武力来使自己发展，绝不会使东亚民族理解，更不会为战后的强国所承认。日本的对外发展，必须通过世界承认的外交手段，调整与列强之间的关系，按自然趋势，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论欧洲战争的结果如何，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有利地位，都能得到发展。这是笔者一贯的思想，也是在东京军事审判时被指责过的。

这个意见在日本的上层及有见地的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共鸣，这是事实。但实际控制日本的军部，对上述事实却无心观察。日本所推行的政策，与实际情况背道而驰，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

德国的胜利与日本的前途　德国的胜利在国际上尤其在日本具有深刻的印象。这是形势所迫。不仅如此，对德国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材料。绝对优势的德国陆军，盘踞在英国的对岸，宣称对英的作战暂时延期，占领英国本土，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英帝国的崩溃迫在眉睫。这种宣传对日本特别有效。军部以及政府内部对此不加以认真研究，被德军的这种表面上的辉煌胜利冲昏了头脑。希特勒宣告：最后的胜利属于德国。里宾特洛甫外长也向大岛大使公开表示：英帝国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日本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然而，日本方面却又担心起来，如果胜利属于德国，英在东方的殖民地又将如何处置？荷兰、法国的殖民地一旦落到德国人手中，那么日本又将如何对待？日本不时地表现出替人担忧的神情。

然而，他们把解决中国这样的根本问题却置之脑后，反而空谈新的南方问题。他们认为，日本为建设国防国家，

必须获得必需的资源，因而，需要设定一个以日本为大国的生活圈。为达到这个目的，主张单方面地行使武力。他们把德国的胜利和英国的崩溃，作为既定的事实，而对于反对意见却充耳不闻。

当德国取得胜利、英国被瓦解的时候，日本如果袖手旁观的话，英国的领土就会完全归于德国。这时，日本的地位和上次战前相比，更为不利。整个东洋，如果置于德国的势力之下，德国将会毫无忌惮地采取行动。而日本由于盲目轻信德国的胜利，势必又会在这样的前提下，产生对德国胜利的恐惧。

在战争胜败的结局尚未决定之前，日本必须和德国协约，确定战后的势力范围，否则，将不得安宁。第一次大战时，日本从德国取得了南洋委任统治地区以后，不知招来了多少麻烦，唯恐德国的势力向东亚扩张。现在对这种扩张，若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日本将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日本应见机参战，否则，就会坐失良机，而忧心忡忡。这是军部及政府的想法。

日本不能冷静的判断，而迷信德国的胜利，并且开始研究与德国胜利后的对策。军部相信德国的这种宣传，姑且不论，但是，就连日本的领导阶层的大多数人也成为他们宣传的最好对象，实在是日本的一大耻辱。

三国同盟与中国问题　盲目相信德国胜利的军部为了对付胜利后的德国势力，便急忙和德国联系。军部的首脑已经认为不论是解决中国问题，还是确保日本将来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有必要和德国发生联系，扩充占领中国的政策。陆海两军采取南进的态度，都是中断三国同盟交涉的原因。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反而对日苏关系产生了良

好影响，减少了北方对日本的威胁。但是，现在对恢复三国同盟的交涉，各种障碍都不存在了。这时，对德国胜利抱有幻想的日本军部，态度越来越傲慢，仿佛目中无人。

军部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却日益坚定了抗战的决心。这完全是因为英、美、法等国援助的结果。他们通过香港的秘密走私、云南铁路的输送以及通过缅甸公路增添新的血液，使蒋介石政府的生命得以保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认为这是对日本军侮辱的行为。

军部对英国的恫吓 一九四〇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英国外交大臣向日本驻英大使要求星期天立即进行会见。这在伦敦是少见的。会见是在英国外交部的大臣办公室里举行的。从这里可以见到公园。哈里法克斯外长说，他收到克莱琪从东京发来的重要急电。电报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召见了英国驻日武官，要求英国停止从香港向重庆政府提供援助，并说："英国已经败北，英帝国即将瓦解，却还在向重庆提供援助，要与日本相抗衡。日本现在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日本军队在香港的对岸已经布置好炮阵，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进攻香港。因此，英国最好停止援助中国，取缔香港的秘密走私活动。当今的日本，是军部把握实权，英国交涉的对手——日本外务省是不足以信赖的。因此，英国应立即接受日本军部的要求。"对这样毫无常识的举动，连笔者都不敢相信。英国方面已观察到日本对英的领权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哈里法克斯外长在读完克莱琪大使的来电后，便质问笔者说："我们和阁下正在共同为改善英日邦交而努力的今天，日本参谋本部当局对英政

府提出这一要求，究竟是什么意思？”

笔者一边听着哈里法克斯念着克莱琪大使的电报，一边感到军部的态度蛮不讲理，内心不由得感到暗淡。不论参谋本部的威胁是采取何种形式，对待象英国这样的大国是毫无效果的。军部的这种行为，使宝贵的日英邦交走向破产，这实在令人深感遗憾。对这件事，如果从正面去处理的话，必将使邦交彻底破坏。但笔者确信，日本的真意是不希望这样的，于是反问道：“这个关系到邦交的重要政治问题，贵国大使馆武官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哈里法克斯回答说：“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手下的一个人说的。”笔者说：“日本对于这个问题，能够处理的人在东京是外务大臣，在伦敦只有日本大使的笔者。对参谋本部某人的一派胡言，实在是感到遗憾之至。但这不负责任的胡言，不能代表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是根据负责人所说的维护日英邦交，因此，对参谋本部个别人的胡言乱语，不值得全然听取。”

哈里法克斯外长听到这一席话以后，态度变得冷静而恳切。从此之后，英外交部和日本大使都在继续努力改善日英关系。英国外交大臣由艾登继任。此后，他为了处理地中海的战事，长期调往近东。这期间，日本大使频频和丘吉尔首相直接接触，使英国取缔了香港的走私活动，封锁缅甸公路三个月，还明确了英国希望和解日中两国问题的方针。日本要顾全大局，使日中关系走上正轨，进一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是使日本的对外政策恢复正轨的一个最后仅有的机会。

笔者因此曾多次向政府进言和警告过。

然而，今天回顾起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确如参谋

本部第二部长对英国武官所说的，日本的实权掌握在军部的手里，政府已无能为力了，不论英国和笔者怎样努力，结果都是白费劲。

笔者感到日本的情形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在伦敦烦闷不安地过着日子。

军部推倒米内内阁的活动 军部为了不误时机，决定从速与德、意缔结同盟，以一致的态度对米内内阁施加压力。内阁虽然受到反对军部政策的有识之士及上层人士的支持，但对于军部的横行霸道已无可奈何。

军部不但要求加紧恢复德、意、日三国同盟的交涉，而且为了仿效德国纳粹党的一国一党制度，迫切希望解散既成的政党。这种呼声越来越高。军部对国内改造的压力十分迅猛，并认为内阁已不适于处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问题，拒绝和内阁齐心协力。武腾军务局长也在暗中活动。畑陆相提出辞职，但不答应推荐继任陆相。从此，米内内阁也就不得不进行总辞职。

近卫公爵过去就辞去枢密院议长的职务，公开发表解散已存政党，自行成立另一大党，因此一直得到军部的拥护。

第七章 日德意轴心

一 近卫文麿与松冈洋右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 日本人很健忘，第一次近卫内阁做了些什么，日本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全都忘记了。令人遗憾的是，一般日本人的政治责任感很淡薄，他们认为政治归根到底是国家的事，也就是说并未意识到国民的责任，简单地认为政治家一旦辞职，也就被解除了责任。日本人看待政治，就象看戏一样，只是欣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舞台上的一员。怎样让人欣赏到技巧娴熟的舞台剧，这是政治家的事，很少有人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近卫文麿担任总理大臣却例外。他历任贵族院议长和枢密院议长这种角色，国民必然对他抱予莫大期望。不仅如此，近卫宣布亲自建立令人瞩目的大政党，也提高了他的威望。政界人士希望由他建立强有力的政党，镇压军部暴乱，活跃国民的政治力量；相反，军部企图靠他确立一国一党的政治体制，以实现控制强有力的国防国家。这样，博得各方面赞誉的近卫文麿，由内府和重臣推荐，去掌握日本领导权是当时政治的必然趋势。那时，木户侯已经接替了汤浅内府。

由于日中战争爆发，第一次近卫内阁是使日本外交破产的划时代的内阁；同样，由于缔结了三国同盟，第二次

近卫内阁是加快日本覆灭的又一划时代意义的内阁。无论是国民，还是近卫，都没有从第一次近卫内阁时代吸取什么教训。第二次近卫内阁热闹地登场了，其人员组成为：航空总监东条英机任陆军大臣，吉田（善吾）大将为海军大臣，不久改由及川（古志郎）大将继任。最大的特点是，满洲事变后十分活跃的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担任外相。

松冈洋右 提起近卫内阁的特点，值得提起的是不亚于近卫而声名显赫的松冈洋右。松冈是长州荻人，具有比较浓厚的藩阀思想，可他又曾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大学学习，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政治家，他的英语和日语一样好。他受到美国教育，思想既不右倾，更不左倾，持地道的日本爱国主义，对满洲问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而在第一次上海战争期间，他进行帮助日中停战谈判的活动，开始明确表示对中国问题应采取自由主义稳健派的主张。

松冈就任外相不久，对中国及东亚问题发表了不赔款、不吞并及尊重主权的政策。笔者等从欧洲一角密切期待着：由理解自由主义的近卫和松冈联合起来，压制军部的力量，把日本引回正道。松冈除在外交方面有许多经验外，无论作为政党政治家，还是作为大陆的实业家，曾负有更大的责任，所以当初有识之士中也有不少人对他抱予殷切的期望。

然而，这种希望落空了。松冈吸取了先辈藩阀政治家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田中（义一）等人的经验，因此想在建设新日本中成就功名的心很强。他窥探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想乘机实现其政治野心，只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健康，是国家的不幸。

他急于成功，因此跑到了军部政策的前面，与其说他

是军部的傀儡，不如说他在驱使军部。终于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松冈外相比近卫更加引人注目。这两个政界人物最终势不两立了。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性质 近卫在组阁前，召集陆海两相及候补外相，商讨新内阁的施政方针，一直到达成了一致意见，才正式组阁并付诸实施。新内阁采取的是军部要求的内外全面革新的政策。目前，对内确立一国一党的制度，对外建设日德意轴心，并推行占领中国的政策。

军部一些人向外相介绍的白鸟大使又由近卫首相推荐，担任了松冈外相的外交顾问；大岛陆军中将（前驻德大使）和野村海军大将（前外务大臣）分别由陆海军的有力推举，担任了驻德大使和驻美大使，并决定起用建川陆军中将（三月事件和满洲事变的参与者）为驻苏大使。不言而喻，陆军特别重视与德国的联系。因过去的关系，大岛中将再任驻德大使。另外海军最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因此选出海军出身的人担任驻美大使。

近卫谨慎地操纵陆海军的势力，任命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大将为工商大臣，任命陆军出身的铃木（贞一）担任企划院总裁，和海军保持均衡，平沼男后来也入阁坐上了内相的交椅。

二　大政翼赞会

新体制运动 近卫如果没有一大政党为背景，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政治，所以他发表了要求解散现有政党，亲自组织一大政党的主张，并辞去了枢密院议长的职务。如前所述，恰在这时发生了政变，人们自然就增添了

对他的期望。当时，新闻界报导了近卫要创建一大政党，并亲任党魁，由木户侯作副总裁。一般人认为，大概近卫要审时度势，建成新政党，吸收军部的力量，或操纵它，或把其势力压下去。

于是在组成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时候，根据军部的计划，立即着手组建一大政党。可是，政友、民政两党的干部，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解散本政党，更不赞成军部操纵这一大政党，实现其建立法西斯政治的目的。当时，反对军部法西斯政治的势力很强，普遍存在着对幕府的反感。政党方面，不仅限于反对由军部组织新政党，而且也强烈反对军部提出的建立政治新体制以及经济新体制。经济新体制的基本主张就是，建立军部要求的、政府指挥监督的最高经济机关，政府向该机关发布产业命令、方案，来改革企业形态，使资本和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全产业排除金融统治，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是一个经济全部赤化的方案，引起了实业界和财界的强烈反对，平沼男、池田成彬就是反对者的代表。近卫看到这种情况，急忙转方向，虽然这样，还是迈向了军部企图建立的一国一党制度。

实践臣道 到处布满了对现有政党的不信任情绪，实际上现存政党作为满洲事变以来的政治势力，已经逐渐衰落了，但是他们仍独占议会的席位。军部认为全体国民必须参与政治，政治家的态度应该明朗，应该使领导者和国民直接地、自如地行使政治权力，因此有必要实践以东洋思想为基础的“臣道”，如果用之于议会制度就是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只要建立适当的政治机构，全体国民就能实践“臣道”、翼赞（翼赞是协助、辅佐、辅弼的意思。——译者

注）大政。然而，在这种机构中，应尽可能包括政府机构成员、政党党员、有识之士、军人、地方代表、报社记者等人物，也就是说去实现日本封建思想的德国版，因此建立了拥有庞大机构和地方支部的大政翼赞会，近卫的好友马赖宁伯为事务总长。大政翼赞会的活动，完全得到了军部的承认。大政翼赞的日本理论很难理解，据它的领导者自己解释说，就是采取许多极端的反动的行动。

作为大政翼赞会的一部分，陆续建立了象纳粹特工处、苏联劳动互助之类的壮年团、生产联盟、产业报国运动等组织。对外则在东亚共荣圈内扩张日本的力量，为了统治这些地区，大规模地组织了大政翼赞会的辅助机关——兴亚联盟。纳粹制度日本翻版的大政翼赞会，在与满洲产的具有共同思想的"满洲国"的协和会、华北的新民会一样，都是混合左右思想，由军部、政府、民间人士混杂在一起组成的。真正拥有实力、左右大政翼赞会的，是以陆军省军务局为中心的军部中坚层。实质上，大政翼赞会只是装饰军部力量的组织，和纳粹组织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精神活力，不过是得到军部好处的壮年团等的极端活动特别显眼罢了。

政党的解散与翼赞政治会　企图改造国家的军部，强烈要求已经把持了内政机关大权的陆军大臣兼任内务大臣，但由于反对者很多未能如愿。近卫首相让平沼男和在国本社运动中与平沼男接近的皇道派的柳川中将入阁（司法大臣），来改变军部的力量，由接近皇道派的平沼男任内相。平沼内相在议会中，不顾军部的意向，说："大政翼赞会并非政治结社，而是公共事务团体，日本决不效仿纳粹的一党专制的制度，而要靠实践东洋的'臣道'、万民

辅政的思想治国。”如果大政翼赞会不是政治结社，只是一个公共事务团体，仅仅作为与政治思想有关的团体而存在，那它实际毫无用处。

由于军队一国一党的宣传和近卫建立大政党运动，一些原有的政党就和新政党运动合流，逐渐地解散了，最后连踌躇不前的民政党也不例外。然而，大政翼赞会不是政治结社，没有被解散。可是近卫这时已经打消了建立大政党的念头，不想解散政党。只要存在宪法，就要使用议会，必须要让政党存在下去。于是近卫集合了过去的旧政党，创建了大政翼赞政治会，使之成为政治结社，占据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这样就可以灵活地与政府联络，操纵国政，也满足了军界的愿望。

大政翼赞政治会被解释为与大政翼赞会没有任何联系的团体，可是两者由同样的人组成，名称也很类似，一个被说成是公共事务团体，一个被解释成政治结社，国民一直很不理解，也没有多少人关心它。大政翼赞政治会除了包括以前的政党外，还网罗了一些军人和其他官界、实业方面有影响的人物，但其主体仍然是旧政党和军部及官僚。

解散了政党，大政翼赞政治会变为操纵议会和政府的机关之后，以议会为中心的政党政治全部被破坏了。因而，与大政翼赞会同时存在的大政翼赞政治会，终于抛弃了政党政治，这实质上不过是把议会变成傀儡的一种手段。军部最后除去了其为所欲为的政治障碍。无论大政翼赞会，还是大政翼赞政治会，都和德国的纳粹党、苏联的共产党一样，并没有成为推进党国政治活跃的力量，不过是为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军部所左右的一个庞杂的机构，国民的意识只能缩小、沉滞。

三　汪精卫政府

对重庆工作与汪精卫　第二次近卫内阁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爆发的日中战争早日结束，这也是近卫个人感到应做的工作。

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曾一度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企图将中国问题由日本片面做"满洲式"的解决，但不久又广播了"近卫三原则"，暗示将与蒋介石妥协，这是军部的一种意见。军部中的"中国派"推行对中国的占领政策，创立"兴亚院"，准备扶持汪精卫政权。可是，军部的另一部分人则主张设法说服重庆国民政府，在此期间将日中问题早日解决。板垣辞去陆军大臣职务，改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后，一再设法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开始谈判，但是中国方面始终置之不理。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之初，这两派依然对立，汪政权建立之后仍旧继续存在。第二次近卫内阁知道中国政府已完全不相信日本军部，所以松冈外相特派外交官和民间有声望者赴香港，通过中国方面有影响的报界人士张织章，进行和重庆方面的妥协工作。

《日中基本协定》　近卫内阁成立时，汪精卫政权已成立了。它以还都的形式，仍旧采取旧的组织法，政府保持五院制度，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虽然得到日本的承认，国旗仍用青天白日旗，但旗的上面须加一条三角形的黄布条，上写"和平、建国、反共"六个字，也以此六个字作为汪政权的政纲。

于是，汪政权在近卫内阁成立之际，等待着日本政府

正式承认。

日本政府派前首相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为特派大使赴南京与汪政权谈判，从事调整日中间的基本关系的工作。经过长期谈判，汪精卫代表要求解放中国，希望日本废除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日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占领政策，就是要求承认日军的广泛权益。最后，把妥协条款杂乱地摆在一起，签订了一个莫明其妙的复杂而离奇的协定书，即所谓《日中基本协定》。于是，日本正式承认汪政权为中国中央政府，而汪政权也对日本需要的军事行动予以援助。日本表明尊重中国主权，而汪政权也根据中日提携的原则，给日本以广泛的权益。同时，又发表了“日、中、满”三国共同宣言，声明三国共同提携，“满洲国”政府与汪政权互派大使，互相承认，企图将多年的满洲问题，由日本和汪政权予以解决。

新南京“国民政府”的初期活动 《日中基本协定》达成后，送至日本枢密院审议期间，松冈外相仍派人到香港继续进行对重庆方面的妥协工作，因为毫无进展，只好放弃。日本政府将此基本协定审议完毕后，于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双方在南京正式签署，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得到了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精卫的主要助手，有前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担任过蒋介石秘书长的周佛海，另外还有前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等参加。

影佐少将被聘为最高军事顾问，他实际上就是汪政权的最高主宰者。另外，在财政经济方面担任最高顾问的，是前日本藏相青木一男，他带了许多专家，在各部门任职。中央银行的储备银行的实权也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本海军为指导汪政权的海军与陆军分立，另派一位海军少

将担任顾问。

由此可知，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以占据中国点和线的日本军阀势力为背景，在日军督导下建立的，在北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也在其统治下。汪政府成为形式上占领区的中央行政机构，开始了前途多难的行程。

四　三国同盟(三)

荻洼会谈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最大的使命在外交方面，换句话说，就是怎样满足军部的希望。对于国内改造的所谓大政翼赞会，是纳粹在日本的翻版，与对外问题的三国同盟互为表里。海军推倒了米内内阁，山本(五十六)次长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海相和丰田次官都已对三国同盟无异议。海军的实力，已被“南进论”的强硬派所控制。而松冈外相对德国毫无认识，对欧洲局势更不明了，他早已成了军部的俘虏，无视外务省驻外使节的意见，盲目听信军部的判断和意见，完全相信德国的宣传。

德国已放弃了一九四〇年度对英登陆作战，这意味着完全放弃了登陆作战，表明英国实际上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德国深知登陆作战的意义重大，所以百般努力使世人相信，德国并未放弃进攻英伦三岛，不过是暂时延期而已。德国宣称，有信心随时取得对英登陆作战的胜利，一九四一年进行的作战之日，就是大英帝国崩溃之时。尤其竭尽全力向日本宣传。此外，德国政府向日本游说：“日本应利用这个形势，向东南亚推进，进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际，应该获得充分瓜分英国的权力，日本万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日本国内笼罩着不要耽误了公共汽车，应该赶快行动的气氛，所以早在荻洼近卫官邸召开的组阁会上，就制定了缔结三国同盟的草案。近卫、松冈、东条、吉田等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只有海军表现出对这个重要决定的忧虑，吉田海相称病辞职，及川大将接任海相，表示赞成三国同盟。

东京谈判 松冈外相就任伊始就电令驻柏林的来栖大使，向里宾特洛甫外长试探德国方面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意向。里宾特洛甫外长马上做出反应，他洞悉日本方面的时机已经成熟，急忙派心腹斯塔玛作为私人代表赴东京。斯塔玛特使到日本后，和奥特大使一起与松冈外相会晤，立即进行三国同盟的谈判，与意大利的关系由德方负责接洽。

非常富有自信的松冈外相依靠已经由政府首脑部决定的方针，亲自草拟方案，并由外务省外交顾问斋藤帮助谈判。松冈草案，实质上与前次平沼内阁时期，里宾特洛甫提出的一般军事同盟是一样的。至于条约以何国为对象问题，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谈判非常顺利。条约的内容是，缔约国的一方，遭受第三国攻击的时候，其它缔约国必须立即援助，援助的方法及发动，属于主权问题，由缔约国自行决定。

三国同盟与苏联 德国当时正与英法两国做殊死的战斗。德国与苏联又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利用此条约，在处理波罗的海及东欧问题时，屡次做了不光彩的交易，如今在东方又获得了安全保障，正与意大利一起竭尽全力，共同对付西方的英法两国。日本与北方苏联的关系，自平沼内阁时代以来毫无改善，但是由于采取南进政策，在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上，越发与德国利害一致，似乎感到遭遇

了共同的敌人，而且日本相信由于德苏关系的好转，北方的危险业已暂时消失。

德国在东方仅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德苏关系并未根本好转；但是，自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后，苏联和日本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苏联也常常尊重德国的意见，所以，对日苏两国的关系德国表示可以从中代为斡旋，使苏联了解日本并表示友好的态度；这也并非难事。德国又称，三国同盟缔结以后，要设法使苏联加入同盟。

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日本颇受欢迎，特别是给军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长时间地支配了他们的态度。当时，日本以为经过共产革命的苏联，仍旧保持着帝俄时代的传统，也过于相信德国所夸耀的对苏指导力量。日本更认为，德国若以今日战胜的余威，不难说服苏联。日本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判断而实行其计划的。

三国同盟条约第五条把与苏联有关的问题全部删掉，这是因为防共协定仍然存在，而且德国和苏联之间新缔结了互不侵犯协定。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内心里更希望把苏联也拉进来。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及其反响　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松冈外相与奥特大使及斯塔玛特使终在东京谈判成功；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德、意三国在柏林正式签署。

本来，天皇和元老派非常反对三国同盟，由于近卫的谏争游说，才听从了内阁的意见。于是，天皇特别颁发“诏书”，表明今后以三国同盟为国策基础，依照轴心政策去实行。

意外的三国同盟发表以后，给予世界深刻的反响。世界显然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德、意及日本的轴心国，另

一个为英、美、法的民主国，而共产主义的苏联则保持有利的中立立场。此后，日本与英、美、法三国的关系，自然急转直下，日趋恶化。

但是，近卫内阁向枢密院做了违背一般常识的说明，他说："三国同盟的缔结，是与改善美、苏两国邦交的目的相一致的。"近卫可能相信了德国的诱说，可经德国从中斡旋，改善与苏联的邦交；而美国也可能因三国同盟的压力，踌躇不敢参战。对三国同盟不会成为与英、美邦交的障碍、反而是改善邦交的途径之说，一直反对三国同盟的笔者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松冈访欧归来，途经莫斯科，会见了美国大使许泰尔哈特，讨论了日美邦交问题；不久，近卫也善意地开始与美国谈判。松冈当时一再电令任驻英大使的笔者，设法努力改善与英国的邦交，与丘吉尔首相交换意见时要表明重视日英邦交的宗旨。但是笔者感到，三国同盟条约缔结以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无法挽救，不能不表露出极度的失望。

随着德、英战争的深化，日本军部的反英亲德气氛更为浓厚。近卫组阁不久，滞留在日本的许多英国人，均以间谍嫌疑的罪名被监禁起来，比如路透社的记者考克斯在宪兵司令部里自杀等不幸事件的发生等，与英国的关系也终于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军部方面渐渐也象预料到的一样，对日英关系不可避免地恶化进行了歪曲的解释。

五　松冈的外交

松冈的革新外交　松冈外交在日本首先表现为具有某种"革命"意义的外交，正如松冈所想的要进行改革日本国

家的革新一样，以日、德、意三国同盟为出发点，革新内外，实行纳粹式的扩张。他看到以军部为中心的革新时机已经成熟，企图趁机领导这项运动。

松冈按照缔结的三国同盟实行其政策，使外务省的首脑机关掌握在支持轴心政策的人手中；同时，罢免了不是历来外交主流派的外交官，特别是几乎全部的驻外大使。为此，一时停止了日本驻外外交机构的职能，也在所不辞。由于他过多地相信了军部掌握的国际情报，认为外交驻外机关是不必要的。他竟成了日本革新运动的先驱，把这种荒唐的做法先在所管辖的外务省示范，而军部、其它政府机构却几乎没有人效仿。

松冈外交缔结了三国同盟，决定了日本的方向，又根据《日中基本协定》，处理了对华问题，接着就按照军部的愿望，立即南进。在陆军及海军的政策以及松冈外交三方面条件均已确定后，开始解决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

松冈外交相信德国的胜利，并为此付出了一切，且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成功的前提，在东亚积极地稳固日本的地位。把“东亚”称为“大东亚”，就是扩张的意思，推行希特勒的扩张外交。松冈外相缔结了三国同盟后，积极争取日苏中立条约，批准《日中基本协定》及推行的南方政策，都是基于这个根本方针。

与法属印支的谈判　从法属印支的云南铁路，运送了大量的援蒋物资，河内简直成了援助重庆的港口。日本认为，不能让这种对日不友好状况存在下去。占领中国南部的日本军队已经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的边境。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古至少在表面上奉行维希政府的命令。维希政府是德国势力卵翼下的法国政府，不得不对

日本采取友好的态度，不许法属印支继续采取对日敌对行动，援助重庆政府。日本为了不使云南铁路援助重庆，认为必须用军队占领河内等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所以特遣陆军的西原少将与德古总督谈判，松冈外相也让安里大使和维希政府直接交涉。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迫于日方压力，不得不采取让步的态度。先前那种消极的、不妥协的态度，给日本军部不小的刺激；可是法属印度支那最后还是答应了日军进驻其北部。

就在这时，军队内部发生了过火的行为。政府制定的和平进驻的方针，由于军部的中坚将校的策动被歪曲了。派往印度支那北部的陆军参谋将校，和中央取得了联系，要求武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采取满洲事变以来的方式，直接管理。安藤司令长官的总参谋长、从海军进入陆军的长勇参谋长、参谋本部的富永第一部长均直接策划了这个计划。他们不满负责谈判的西原少将的稳健态度，采取了无视谈判的行动。海军强烈抗议违反大本营命令的陆军的行动，而已经出动的陆军根本不听。这样，尽管达成和平进驻的方针，陆军却仍有意进行飞机轰炸，采取了军事行动。天皇陛下知道这种情况后，感叹道："陆军误国。"为弥补这次过失，只有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地区采取和平进驻的方针。而且，随后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进行了的经济通商。

国际民主主义和经济解放　欧洲的文艺复兴及产业革命的对外影响就是新大陆的发现和对东方的远征。世界被看作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各国的扩张也到达了沉睡的东洋。日本进行了自主反击成为大国，在东亚完全摆脱了欧洲殖民地的状态。可是，无论在菲律宾，在法

属印度支那，还是在婆罗洲、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区，不言而喻，日本人的活动均受到严格的禁止，就连单纯的贸易活动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地区，不过是宗主国的附属物而已。这个时代，国际上已看不到民主主义的一鳞半爪了，到处笼罩着资本帝国主义的迷雾。如果东亚各民族被解放，他们以自主的原则，进行通商、协作、贸易活动，这些地区必然获得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对世界和平亦能做出贡献。

即使原来发生了满洲事变，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的经济封锁，也必须把日本经济从崩溃中解救出来，这是当时的背景。而且为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与确保大国地位，也必须首先考虑出路。但是，日本不了解世界局势，并不知道被夹在了国际联盟严格的维持现状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扰乱政策中间。日本应逐渐地运用英美及世界做法，经慎重考虑，力主东亚的经济解放，以实现国际民主主义的理想。日本缺乏灵敏和忍耐性，只顾眼前的需要，而一再盲进，效仿过去时代的欧洲帝国主义。对依靠日本军部力量的大肆活动，欧洲反响是非常明确的，其反应首先表现在从日本最感痛苦的经济战争开始。于是，日本逐渐陷于绝境。日本为了开辟周围的地方，又在盲进。日本感到，欧美一再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因而不得不扩张日本的生活范围。这种经济战争，和以军国思想为基础的武力侵略恶性循环，逐渐使日本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日本高唱理想，主张理念，针对英美的条约主义高唱自卫论，以维持现状政策，主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松冈外相时期，日本军队已经深入法属印度支那，这种恶性循环已不能改变，这是当时的大致形势。

同法属印支和荷属印尼的交涉　法国的殖民地政策，比美英的政策更为反动。法国征服了越南、柬埔寨，使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的政策是极端榨取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独立运动，剥夺所在地人民的政治自由。经济上，把法属印度支那完全置于法国的从属地位，禁止其它国家介入，就连本应与近邻日本进行的有利的交通、贸易，也大大受到了限制。企图把地处东亚一角的法属印度支那，完全从东亚分离出去，置于法国的直接统治之下。日本与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和它大同小异。

在东亚也终于开始出现了民族解放的风暴。欧洲战争的爆发断绝了与宗主国的交通，而且宗主国或忙于战争，或者被敌国占领，殖民地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以前为殖民者统治的东亚各民族迅速觉醒。独立运动的志士多逃到海外，不少人来到东京。随着日本的势力向南方伸长，东亚民族日益觉醒，酝酿着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这些殖民地的宗主国都疑惑地注视着日本，认为日本的经济要求常常伴随着政治目的。

反对日本的诸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压迫，所以日本要在与其地理位置接近的东亚各国中寻找经济出路，就必须在这些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寻求经济突破口，可是东亚各国被关闭了门户。然而，这时日本的经济要求，被看作是与武力侵入南方一样的行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抵抗。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谈判，在日军进驻前就开始了，最后达成了协议，但是日本并不满足。日本政府又向和法属印度支那处于同样状态的荷属印度尼西亚，先派小林商相，接着又派前外相芳泽谦吉，去调节经济关系，可是日本政府不满足达成的结果。国内不负责任的强硬论和徒劳无益的日本

南进政策，增加了国际政治混乱，使日荷关系恶化了。

调整泰国和法属印支的国境争议　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国界大体是沿湄公河而定的，可是对河岸地域一向有争议，泰国一直想收复法国靠武力割去的柬埔寨。结果，欧洲战争爆发后，就发生了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冲突，从边境到海上都发生了战斗。松冈外相提出："在东亚发生这种战争，有碍东亚的和平，要在两国之间调停。"于是得到了赞同。

在东京，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所以松冈外相提出了调停案，在两国间斡旋。在日本的压力下，谈判成功。结果，泰国实现了一部分的愿望，非常满意。新国境由长期担任国境划定委员的日本委员来决定。

东亚的纷争由日本出面主动地解决了，这显示了日本的权威，也受到了枢密院的欢迎。这个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新国境，在日本战败后也与战时决定的泰国和其它国家的国界一样，失去效力。旧国境又恢复了。

松冈外相的外交攻势与他对英美势力攻击的言论一样，是以陆海军的武力为背景的，这招致了英、美、法、荷等国的憎恨，他们更加强了团结，实现了对付日本的政治、军事合作。

在中国及东亚问题上，英国把美国推到了前头。欧洲战争开始后，美国在东亚成了欧洲的代表，其它国家都跟随着美国的指导，互相结合，一致行动。这样，在美国的指导下，日益加强了对日本的A、B、C、D的包围阵。

松冈外相在调解了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国境纷争后，为访问德、意，又踏上了赴欧洲旅途。（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

六 松冈外相访欧(一)

松冈外相访问德、意的动机 第二次近卫内阁时期，松冈外相的活动确是令人瞩目的。三国同盟不但决定了日、德、意三国的协力提携，并且还划定了轴心国战胜后的势力范围。日本将成为包括南洋的整个东亚领导国家，而德、意暂定了欧洲及非洲为其活动范围。日本当时已经南进，不但在华南，而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也拥有兵力，已与英美势力范围发生直接的冲突了。德国在欧洲，以压倒的胜利，席卷了整个西欧大陆。在北非，意军虽被击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但是德国又越过了埃及的国境，直捣大英帝国在非洲的心脏。所以，今后如何运用三国同盟，三国首脑有必要密切联系。

近卫内阁的首脑部特别是军部对三国同盟缔结后的世界局势及日本的方向并无疑问。他们相信战争的胜利属于轴心国，同时并不担心善后措施，因为三国缔结同盟时对此已大致获得了谅解。甚至关于战后日本的地位，他们也因感到有了保障而更加安心。应军部中枢的要求，松冈认为若这时访问德意，与两国首脑密切磋商，检讨轴心国取胜的途径，可作今后日本决策的参考资料，而且对他个人将来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非常有利的。

确保轴心胜利的另一手段是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协助轴心国，是三国同盟缔结时日、德双方的默契，也是双方的希望。所以，松冈外相也想能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松冈访欧，各方面以种种理由普遍加以反对。海军对于松冈秉承陆军的旨意将对德国许下攻击新加坡的过

分的诺言表示忧虑，所以军部特别警告松冈，关于军事行动尤其是进攻新加坡的问题，万勿给德国任何方式的诺言。对于统帅权，与军部无关的人，陆海军也是绝对排斥的。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松冈未带任何礼物，由陆海军武官陪同前往德、意两国访问。

日苏关系与松冈外相 平沼内阁自从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抗议而下台后，已经一年半，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也逐渐采取南进态势，因此确有必要力求与苏联妥协。换句话说，就是北守南进。这也是日本与德国签订三国同盟时的默契，并以为由德国从中斡旋，使苏联加入同盟也并不困难。

松冈于三月下旬抵达莫斯科时，日本新任驻苏大使建川美次中将已经就职。松冈以前曾令建川大使与苏联洽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便成为日本南进政策的后盾；但是，由于苏联方面要求种种代价，未能如愿。松冈藉此访苏的机会，又向苏方重提旧事，而苏联却提议以中立条约代替不侵犯条约，并仍坚持要求相当的代价。松冈未得结果，即去了柏林。

松冈的头脑中仍记着三国同盟缔结时德方的谈话，以为还有将苏联拉进来的可能，而且他预料德国也许同意从中斡旋此事，所以前往柏林。日本认为，向苏联要求缔结一个如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的条约，是很自然的事，而松冈本人更相信缔结这个条约，与缔结三国同盟当初的意图并不违背，预料德国必定能表示欢迎。

《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 松冈外相在柏林作为贵宾，备受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外长及其他要人的特别欢迎。三月二十七日谒见希特勒后，又与德国要人举行了数次会谈。

后于四月一日访问了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首相及齐亚诺外长。回德国又住数日，即离德取道莫斯科返日。

在柏林，松冈曾与里宾特洛甫外长讨论日苏关系的改善，希望德国从中斡旋，日苏之间也能缔结一个如德苏之间同样的协定。可是，关于这几点，不但未能得到任何要领，反而遭到德国的反对。

松冈归途中到达莫斯科后，再次提出了提案。苏联仍坚持原议，不希望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可缔结中立条约。不过日本必须把在库页岛所获得的石油、煤炭的权益归还苏联。松冈原则上予以接受，并表示希望日苏之间缔结渔业正式条约，于是达成了《日苏中立条约》。显然的，苏联认为互不侵犯条约与中立条约是有区别的(苏联与德国也是先缔结中立条约，以后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其实苏联与波罗的海诸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都被肆意践踏，和日本缔结的中立条约也早晚注定要遭同样的命运。从这种结局看，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意义的。

美国当时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之下，审慎地注视着以欧战为中心的世界局势的演变。美国指摘德、日的政策为侵略，积极研讨防备的对策；另一方面，给英国以全面的援助，包括援助对德战争。在太平洋方面，对日本的南进，表示莫大的关心，对于三国同盟后的日、德、意间的共同行动，则特别予以戒备。为对抗这个轴心势力，不但援助英国，同时为大势所趋，有必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将它拉入英美阵营。它绞尽脑汁，想造成这种情势。在华盛顿，副国务卿威尔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断地与苏联大使乌孟斯基洽商。美国当时最怕的是苏联参加三国同盟的阵营，

尤其松冈访欧的归途，突然又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给美国很大的刺激；前次苏联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等于欧战开了火，这次和日本缔结《中立条约》又何异支援日本的南进？认为这完全是同工异曲，因此，太平洋的危机，恐怕不可挽救。这种忧虑，即使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仍然存在。松冈在莫斯科与老友美国大使许泰尔哈特谈日美邦交的时候，很坦白地对他说："日本外交的基调仍在三国同盟。"他企图一方面利用三国同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利用刚签订的日苏条约的威力，阻止美国参加欧战。

经松冈外相之手，日苏中立条约终于签订了。松冈由莫斯科启程时，斯大林突然出现在车站送行，拥抱着松冈说："我也是亚洲人。"表露出亲密之意。由此可知，斯大林当时获悉德国进攻苏联已经迫在眉睫，对于这个《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他无疑地认为相当满意。

松冈访德的真相　松冈外相在德国曾听到很多德苏关系日渐恶化的消息，也发觉德国对苏联的态度与三国同盟缔结时的情形不同。但是，他却不知道苏德战争已箭在弦上。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中，松冈静静地回想，访问柏林及莫斯科的情景中有很多令他感到不安和矛盾的地方。他在思索着将来，结论是：三国同盟无论何时，总是日本政策的准绳。松冈到达"满洲国"时，已知道日美谈判在东京开始了。然而，他却不急，悠然自得，四月底才返回东京，受到了国民的盛大欢迎。因为日本人民以为《日苏中立条约》至少可以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

天皇陛下对日苏关系的改善也表示欢迎。松冈分别向政府及天皇报告其访欧情况。对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说得很详细，但是关于访问德、意的情况，仅做简短的形

式上的报告。天皇发觉了这一点，近卫首相等也无法理解松冈的这种态度。而松冈对于他不在期间，由近卫负责发起的日美谈判，却表示非常冷淡。

在日比谷公园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松冈做了希特勒式的演说，严厉批评了近卫和其他大臣，对政界表示出目中无人的态度。关于松冈的访德，日本官方现在已无正式记录，松冈本人也未遗留记录而死去。因此，关于松冈访欧，尚有许多真相，也就无从获悉了。比如：根据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官所提出的德方记录，证实了松冈与希特勒约定日本进攻新加坡，松冈回到日本对任何人都秘而不宣，只专心进行倒阁运动，企图自己掌握政权，以便实施与德国相配合的政策。这种判断，也许言过其实。此外，据德国一部分可靠人士说："松冈在柏林时已从德国方面获悉攻苏的计划。路过莫斯科时，将此计划泄露给斯大林，而换取了中立条约。"这恐怕也不会是事实吧！

松冈从日本出发时，欧洲局势的变化尚未传到日本；而日本依旧保持着三国同盟缔结时的想法，作为日本政策的基础；根据这个同盟，松冈的脑海中想了很多计划。其实，松冈去欧洲时，他并不知道欧洲已和三国同盟缔结时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日本方面对欧洲问题的判断，完全是根据表面上的现象，而资料的取舍，也只凭其所好和希望。所以，日本的看法总是落后于形势一年半载。这也足见日本人对国际形势的感觉是相当迟钝的。在德国早已放弃对英作战之际，日本仍误信德国的宣传，以为立刻就要开始对英登陆作战；再有，德国已决心对苏开战，而仍误信德国与苏联亲善。有些日本政治家说：由于欧洲问题的复杂离奇，从地理方面来讲也离得过远，日本不易把握其真

相，所以重大的政策有时也就盲目地决定了。但是，这种辩解是不能成为正当的理由的。这更证明了日本的领导者对世界的基本政治形势是如何地疏远，而松冈对德国的知识尤其缺乏。

七　德苏关系的激变

德国的世界战略与对苏联的拉拢　一九四〇年，德国从北自挪威、南至西班牙的国境，攻占了整个西欧大陆各国；然而对英国的作战始终未能实行，且已失去了机会。既然放弃对英作战，为了防止今后的破裂，首先应在欧洲大陆方面，巩固德意两国轴心的地位，使其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对英国的登陆作战，既然不可能，则必须放弃进攻，改变方针，从速研究促使英国崩溃的方策。因此，必须着眼于英国要害所在地埃及、印度及马来亚方面。日、德、意三国同盟，从德国方面来看，原想以此集中全力瓦解英国。于是，它以为能将对波斯湾及印度多年来即有野心的苏联也拉进三国同盟，共同协力击溃英国，是最为适当的战略。这个计划，不但符合日、意两国的希望，就是苏联也必受欢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希特勒的战略指导方针是依此方向而行，这个方针也左右了日本军部。这个策略当然也是英美方面最忧虑的。

巴尔干对于德国的重要性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的秘密协定书里，已经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对关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也规定了双方应相互协议。巴尔干四国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分割波兰，承认塞尔维亚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东南欧洲(巴尔干)方面，

规定德国只有经济的利益，而没有政治权力。但事实上，德国仍重视巴尔干，始终不愿放弃。

德国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攻占捷克，意大利也于同年四月占领阿尔巴尼亚，此后德意两国在巴尔干已具有压倒的势力。同年九月，德苏瓜分波兰。此后德国又告苏联，承认它合并北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南到比萨拉比亚及北布高维纳地区。于是德苏关系逐渐调整，双方的势力范围，从米米尔经过波兰的中央，到罗马尼亚北方国境为止，以此线为双方确定的划分界限。自此以后，匈牙利(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罗马尼亚(同上)、捷克(同上)、保加利亚(一九四一年三月)、南斯拉夫(一九四一年三月)及克罗西亚(一九四一年六月)等国，都相继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参加了轴心国阵营。

德国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为了特伦西鲁巴尼亚的领土主权，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调停(维也纳协定)；十月间进驻罗马尼亚，继而侵占保加利亚。一九四一年四月占领了南斯拉夫，继而占领了希腊。德国也不管一九三九年的德苏秘密议定书的内容规定如何，又把巴尔干划为德国的当然势力范围。

中欧及巴尔干不但是柏林、巴格达及哈姆布鲁、巴斯拉必经之路，也是德国攻击英国殖民地的要道，正如意大利半岛经由北非昔兰尼加，可以直捣埃及一样。经过希腊各岛，是冲出小亚细亚的路线。如果土耳其保持中立，这几条线都是攻击英国殖民地的重要路线。换句话说，德国无视一九三九年德苏秘密议定书的规定：不但是为维持其生命必须拥有巴尔干，而且，在对英作战的战术上，巴尔干也是不可缺的。侵略英国本土的登陆作战终告失败。除了经意

大利及巴尔干，跨过地中海，而直捣大英帝国的心脏之外，德国已别无胜利之途。

苏联对巴尔干的野心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达成妥协以来，苏联利用欧战，将它在东欧方面的地位逐渐巩固起来。如前所述，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逐渐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及北布高维纳，在东欧全线与德国的势力范围对峙(一九四一年)。

苏联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向芬兰要求重划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境及设置军事基地，更要求培洽莫地区的交通权利。芬兰予以拒绝，于是苏联废弃了《互不侵犯条约》，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立即开始进攻芬兰，但芬兰军英勇善战，因此苏联终未达到侵略的目的，宣布休战(一九四〇年三月)。苏联因为对芬兰的侵略，被国际联盟开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不过，芬兰参加了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战争结束时，只得屈服于苏联(一九四五年九月)。

战争初期决定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时，固然不可能预见战争的结局。双方的谅解，都是战术上的，所以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产生了以后的战术。苏联趁着德国忙于西欧战争的机会，企图把波罗的海、黑海，划为其内海。尤其是获得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两个海峡，是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政策。因此，苏联在巴尔干半岛想鼓动帝俄时代由来已久的潜在势力，已经利用希腊正教而掀起宗教运动，特别是对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方面提倡泛斯拉夫运动。不仅如此，巴尔干各国参加防共协定和加入三国同盟，都是苏联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决心打倒这些政府，将德国的势力由巴尔干驱逐出去，由苏联取而代之。同时，苏联企图把在芬兰的失败在巴尔干收回来。

苏联冷静地分析：趁着德国对英埋头苦战之时，这个计划并非不能成功。

莫洛托夫访问柏林　德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后，表面上两国的关系很协调，通商协定也很顺利地进行着，苏联物资不断地供给德国。在势力范围问题上，如里兹亚尼亚问题，由于德国的撤手，问题也得到解决。表面上看，这两个极权主义的独裁国家都很满足各自得到了势力范围，似乎真有互相协助的互不侵犯的关系。凡发生新的事态，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双方常表示互让的态度而获致协议。里宾特洛甫外长再度访问克里姆林宫后，两国关系更见融洽。

一九四〇年末，德国由于军事上的成功，其国际权威达到最高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缔结了有一年之久，为了交换整个的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的意见，希特勒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

莫洛托夫外长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抵达柏林，立刻去谒见希特勒。希特勒依其早已考虑好的想法，很热诚地劝导苏联，应加入三国同盟，并说现今是破坏英国的最好机会，希望苏联从高加索冲出伊朗、伊拉克、波斯湾，德国当必协助。

莫洛托夫的回答相当冷淡。他说："对希特勒总统的远大高明的提案，并非不感兴趣，原则上极赞成。但是苏联今日要求，在实现这个久远的计划之前，应首先解决这些目前的现实问题。苏联想在黑海的出口达达尼尔及博斯普鲁斯两个海峡，设立军事基地，并且要求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保障，所以希望德国先承诺这些问题。然而，德国不但进兵罗马尼亚，并且对它提出领土的保障，究竟

这些保障是对哪一个的保障呢？就这几点，我愿听取德国的详细说明。”莫洛托夫提出苏联对海峡方面以上的要求后，即催促希特勒立即答复，因而激怒了希特勒。虽然后来又谒见了一次，但是没有达成任何根本的协议。里宾特洛甫外长反提出关于苏联加入三国同盟的具体方案，莫洛托夫未得到他所要求事项的答复，离开了柏林。

控制巴尔干的国家就能调动土耳其，巴尔干不但是东欧的关键，也是地中海及小亚细亚的关键。

德苏在巴尔干发生的异变　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因为由此更加清楚了苏联究竟是轴心的朋友，还是轴心的敌人？希特勒知道苏联对巴尔干野心甚大，更明确地意识到，在欧战中德苏势将两立。巴尔干不但是英德的角逐地，也将是德苏的战场。

德苏的关系从此越发恶化，苏联虽然对加入三国同盟的德方提案曾答复原则上予以同意，但德国对此并未认真地回答，反而开始在东面积极备战。德国于一九四一年一月派二十万军队侵入了罗马尼亚，又进驻了保加利亚。德国占领巴尔干的目的，一方面是救援在阿尔巴尼亚被希腊军击败的意大利军队，企图破坏英国在希腊的基地；另一方面，则巩固德国在巴尔干的势力，以防苏联的进攻。苏联对海峡及保加利亚方面，通过莫洛托夫已经表示这些地区划定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意思，以后又对德国进入巴尔干明确表明了反对的立场。苏联为抵抗德国在巴尔干以及东面的行动，开始在边境集结大军，援助巴尔干的民族运动。一九四一年四月松冈访问德国期间，南斯拉夫发生了反德的政变，德国立即出兵镇压，从此更证实巴尔干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苏两民族利害冲突的地方。

德苏关系的恶化逐渐传到欧洲及其它地区，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经过，也相当准确地报导于世界各国的首都，引起各国的注意。人们都感到了德苏之间必将发生新的事态。一九四一年春，德苏国境双方大军云集、大战一触即发的消息，终于报导出来了。

八　战争大势

欧洲战争局势　英帝国的危急处除本土外，还有地中海方面、波斯方面、印度方面及东南亚方面。德国将苏联拉入三国同盟，使其冲入波斯、印度方面的计划破产后，又引诱日本南进。意大利溃败后，更是如此。

希特勒未能攻取英国本土，即使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战争形势也不容乐观。对英作战失败后，德国眼前的目标，就是靠大西洋战争对英国实行海上封锁战，以及地中海方面的战争。据观察，大西洋战争是海上势力的战争，无论如何从开始就看不出德国之成功，结果不过是把美国引入了战争。

为了判断松冈外相出访时的战争局势，必须说明当时地中海方面的战争。

意大利的败绩　意大利埋头于确立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一大势力，一九三五年以东非意属厄立特里亚为基地，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英属埃及、苏丹处于为意属殖民地包围的形势。一九三九年四月，与德国侵占捷克相呼应，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接着进入希腊，遭到了希腊强烈的反击。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正式参加大战，更在地中海驱逐英国的势力，梦想建立“新罗马帝国”。在库拉奇阿里将

军的指挥下，集中北非的黎波里、昔兰尼加陆军的精锐，沿海岸大路向埃及进击。如前所述，埃及处于意大利的北非军和埃塞俄比亚的东非军两面夹攻的态势，又隔着地中海。库拉奇阿里的北非军构成意大利的右翼，侵占希腊的军队构成左翼。轴心集团的地中海战争，目前就是意大利战争。

意大利军在各处都不是英国的对手。希腊军受英援助英勇善战，打败了进入希腊的意大利的巴尔干军。因此，意大利的权威在巴尔干已经衰落，德国不能坐视，急忙救援，所以派兵占领了希腊，空降部队奇袭，在多岛的海上占领佐泽卡尼斯及控制了海峡入口的诸岛。德国一九四〇年八月进兵匈牙利，十月进占罗马尼亚，又侵略保加利亚，终于与意大利一起将巴尔干全部划为其势力范围。

意大利军在北非主战场遭到了比巴尔干更惨重的失败。库拉奇阿里的几十万远征埃及的军队顺着沿海大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蛊惑宣传，一方面驱逐英军东进，终于越过了埃及国境。英国方面，韦维尔将军指挥下的威尔逊参谋长等人正秘密地准备反击。反击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开始，横穿过沙漠突进的英军切断了靠海岸的意军的后方，与舰队协同作战，将西迪巴拉尼附近的意军围歼，还在各地歼灭其残部。意大利陆军的精锐就这样在巴尔干及北非无影无踪了。

意大利的海军、空军并不比陆军幸运。英国地中海舰队一发现意大利的舰队，就在海上对其攻击。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空袭了意大利南部重要的海军港口塔兰托，消灭其主力舰队的大部。被断绝燃料供给的意大利的空军势力急剧减弱。

这样，一九四一年初意大利参战后半年多，其战斗力

已全部被击溃。所以，德国取代意大利，也不得不背着地中海战争的全部负担。意大利战败是整个欧洲战局的转折点。

欧战初期，意大利驻日武官曾断言："如果意大利参战，地中海的英国势力马上就会消失。"然而，意大利战斗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和"新罗马帝国"梦一起破灭了。墨索里尼苦心经营的意大利近代化的陆海空军的战式，的确是不幸的。

西班牙的态度 一九四一年初，德军已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因此希特勒在对英的地中海战争中，稳固了其左翼。右翼当然就是意大利半岛。希特勒如果能控制佛朗哥，把战线延长到西班牙国境，再向西班牙延长，进攻直布罗陀，地中海战争的右翼当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如果德军和西班牙军共同进攻直布罗陀，穿过摩洛哥，完全将佛朗哥纳入轴心集团方面，就能够取得地中海战争胜利的机会。

佛朗哥将军有很大的野心。在北非，想恢复以佛朗哥为中心的"大西班牙"。希特勒再三与他谈判，怂恿他放弃中立而参战，为了德军进攻直布罗陀，要求同意德军通过。佛朗哥没看出希特勒在战争中能取胜，巧妙地应付希特勒，采取拖延的策略，最后也没答应这些要求。

法国的动向 在地中海战争中，法国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尽管法国政府已经投降，但是法国国民并未投降。在此基础上，戴高乐将军继续维持法国的生命。即使相信德国胜利的贝当政府主要目的也是把法国国民从战祸中解救出来，并不完全是德国的傀儡。根据一九四〇年六月的投降条约，贝当政府还管辖着本土的一半及北非的殖民地。

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法属北非的广大地区，是重要的港湾，也控制着西地中海。阿尔及利亚总督韦卡恩将军等多数法国人，决心不让德国染指北非，并完全与美英联系，因此得到了美国不少的物质援助。尽管维希政府中，达鲁拉恩及拉巴尔的势力加强，屈从于德国的压力，且韦卡恩将军被免职，但也没有改变这种形势。

美国认为，法属北非如果置于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的势力就会直接波及大西洋沿岸，危害美国的安全。为了尽量防止这种情况，多次派驻利比大使向维希政府首脑贝当元帅提出警告：如果维希政府的行动越出对德投降条约一步，就会被认为是对美国表示敌意。美国已经采取参战的立场，坚决不让德国插手法属北非。这种态度，与在东亚对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态度是同样的。由于北非成为实际的战场，形势就更加紧迫了。

希特勒在意大利败退后，派隆美尔的军队到北非，救援意大利残军。隆美尔的军队已经打败了进入的黎波里的英军，追击到埃及国境，并越过国境侵入埃及。

希特勒为了地中海战争的完全胜利，坚持压迫法国，要同法海军一起利用北非基地。因此，他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维希政府在达鲁拉恩及巴拉尔的怂恿下，终于屈服于德国的压力。

对法国的压迫与东方问题　德国对法国的压迫不仅关系到控制西地中海的法属北非。希特勒向维希政府提紧急要求，将在东地中海占有重要地位的、由法国委任统治的叙利亚、小亚细亚方面，作为政治、战略两方面的基地。达鲁拉恩在巴黎答应了德国代表阿贝斯的要求(一九四一年五月)，叙利亚就成了策动对伊拉克的反英政变基地。丘

吉尔毫不迟疑地占领了叙利亚。可是，东方由于苏、德、英三大势力之间夹着的土耳其始终保持中立，终于未发生动荡。

当时，由于日本的要求，德国就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多次向法国施加压力。美英认为，德国对法国的压迫，是与轴心总体下的一定计划有联系的。换句话说，德国在地中海战争中取胜，进入埃及和小亚细亚，在这里与日本的势力汇合，破坏英帝国，所以法国问题具有世界意义要重视。另一方面，德国默认了为了把美国的注意力牵制在东亚，由维希政府向美国大使泄露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要求。

北非战争已经不只是英国的战争，美国安全保障的前线也在北非，并在法属印度支那。

德国的困难处境 对英战争失败后，希特勒计划在一九四〇年美国参战前，一定要取得地中海战争的胜利，实现与南进的日本的联系。可是，由于对苏战争这已经不可能了。希特勒本想按预定计划对苏战争，并运用其兵力使地中海的战争也按预定的去进行。可是都未按计划进行。隆美尔的远征军在西迪巴拉尼战线遭到英军反击，重蹈意大利军的覆辙，向的黎波里方面退却。德国不得不埋头于对苏战争，终于没有余力投入地中海战争。而美国的参战终于使德军在地中海全面地败北了。

松冈外相访问欧洲的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意大利事实上已经失败。希特勒决定对苏战争的时候，美国实质上采取了参战的立场，从而决定了世界战争的一般形势。

九　松冈外相访欧(二)

松冈外相与统帅部　松冈外相从日本出发前，在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上，就关于访欧的使命与内阁和统帅部首脑人士交换了意见。各方面一致认为：德国对英战争具有优势，英国本土的登陆作战，也将在本年（一九四一年）成功，英帝国的崩溃就在眼前；对苏联方面允许它向波斯湾伸展，更促德国力劝苏联参加三国同盟。这仍是三国同盟缔结时的观察。如前所述，松冈的想法也是这样。

据德国的官方记录，在东京，德国曾通告日本军部，向苏联提出关于三国同盟的问题，但苏联并未同意。然而，日本政府对于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详情毫无所知。对德苏关系的恶化，全然不信。

在联席会上，军部曾警告松冈外相，无论德方如何强烈要求，关于日本进攻新加坡的军事行动，凡有关统帅问题都不能给任何许诺。另外，松冈外相的军部随员，也接受了军部的密令，在这方面监视松冈的言论行动。在这种形势下，松冈对这方面特别注意。

与松冈外相的会见计划　松冈外相是外交大员，很熟悉外国事情，但对德国情况知之甚少。如前所述，对德国的情况他相信军部的判断，轻信德国的宣传。他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的力量，相信德国吹嘘的英国本土登陆作战，早已决定在本年(一九四一年)进行，这将决定英帝国的崩溃。在德国，与德方要人会谈时，很想获悉关于对英作战的计划，尤其是对英登陆作战开始的时间。当时日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笔者曾从伦敦发出有关欧战情况的电报，政

府首脑部似乎并未注意。过去日本由驻外使节向外交部报告有关时局的电报，一般将副本呈递宫中，首相及有关大臣传阅。但是事后才发现，当时笔者任驻英大使期间重要的电报，竟未采用这种办法，只有驻轴心国的大使所拍电报才可得到传阅。

松冈的随员加濑俊一（当时在英大使馆工作）对笔者的观察和意见知道得很详细，也知道松冈与笔者的意见完全不同，所以他向松冈建议与笔者会谈，交换意见。结果，松冈告诉笔者，愿在欧洲大陆适当的地点会谈。笔者虽知道在战火中的西欧旅行，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但是仍准备排除万难去赴会。幸赖英国政府及丘吉尔首相的帮助，给笔者提供飞机等方便。由于松冈外相缩短了旅程，不能在中立国瑞士举行会谈，而笔者又拒绝赴柏林，此事即作罢。笔者不久要求回国的原因，是想将自己直接见到的情况，坦白地告诉松冈，以完成自己的心愿。

松冈外相囫囵吞枣式地理解军部对形势的判断。仅靠对德的访问来看欧洲的真相的确是不容易的。他与德国的首脑们就各种问题会谈，但是他对德国方面关于德苏关系突变的说明却不够理解。

进攻新加坡问题 松冈在德国时，从未获得关于对英作战问题的新情报，相反，德国曾向松冈试探日本进攻新加坡的日期。当时希特勒已决定对苏开战，所以一再命令里宾特洛甫外长，设法与英国获致媾和的协议，而里宾特洛甫以为使日本在远东方面压迫英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根据纽伦堡军事法庭里宾特洛甫的供词）。德国预料如同大岛大使预告的一样，松冈访德的礼物将是攻击新加坡的协定；但是松冈表明的对英态度的强化不过是抽象的，并

未给德国任何诺言。然而，德国方面认为，至少松冈个人已许下进攻新加坡的诺言，德国官方的记录也是如此。至于在柏林，德方与松冈所讨论的关于对英问题，双方都未达成具体的结果。

关于德苏问题大致相同。里宾特洛甫表示不满意日本提出的对苏互不侵犯条约，可是松冈外相不太理解突变的形势。如前所述，反而向里宾特洛甫提出按照三国同盟的原则，依靠德国的斡旋，来调整日苏关系。并且，松冈外相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与苏缔结了《中立条约》，使德国目瞪口呆。

斯大林当时已获悉德国的阴谋，美国政府也在这年一月，将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提供给了苏联政府。此外，在东京的曹尔基间谍组织，也将从德国大使馆获悉的最可靠的情报报告给了莫斯科。松冈访问德国的归途中，在莫斯科又要求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恐怕也出乎苏联的意料。克里姆林宫目前要控制德苏冲突，与日本缔结中立条约可削弱防共协定及三国同盟的锐气，在东方获得支持，所以苏联当然很欢迎。而且，苏联经常驱使日本南进。可是，这点又与德国对日态度相符合。东京的曹尔基间谍团与德国大使奥特的行动，在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德苏在塞尔维亚的冲突　德苏冲突的前哨战在松冈在柏林时就已开始了。巴尔干中部的塞尔维亚政治形势，由于德、英、苏的势力压迫而相当复杂，以后又发生了由它国支持的叛乱，颠覆了亲德政府。德国立刻派兵进入塞尔维亚，采取镇压手段。里宾特洛甫外长为处理此问题，不得不变更与松冈预期的谈判。苏联为保障塞尔维亚的领土主权，大肆鼓吹泛斯拉夫运动。巴尔干半岛无论在第一次

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德苏冲突的导火线，从塞尔维亚问题的动机可以说明巴尔干问题是多么复杂而困难。

笔者坚持日本不应介入战争政策，感到有必要回东京说明欧洲形势，并想将原来预定在欧洲与松冈会谈时所讨论的各种问题，拿回日本和他讨论。结果，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于一九四一年六月离开伦敦返日。在笔者将要起程的前一个月，德苏国境两国大军继续集结时，发生了一件罕有的事。

十 赫斯事件

赫斯飞到苏格兰 一九四一年初夏的一天，碧空无云，轻风徐徐，一架德国美塞式单叶飞机从德国飞过北海，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附近时，驾驶员乘降落伞跳下，飞机却被烧毁。这天是五月十二日。

乘降落伞跳下的德国人态度极为镇静，徒步想找汉密尔登公爵的官邸。这是一位能讲英语，颇有绅士风度的人。他就是被德国元首希特勒指定为第一位继承人的赫斯，所以此事轰动了世界。他并非一位逃亡者。

过去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大会时，出席的英国代表中有个叫汉密尔登的人。作为德方主人的赫斯，和他成了朋友。以后，两人曾约定一同攀登阿尔卑斯山，继续交往。赫斯根据这个关系，现在飞来找他，是希望通过他的协助，与英国政府当局就重要问题交换意见。英国政府虽然公布将他以俘虏看待，但实际如何处理，从未有任何公布。

赫斯其人 赫斯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助手，他生于埃及，

受过英国式教育，能流利地讲英语。他富有宗教家的深沉和认真，以热烈的感激性格，帮助希特勒领导纳粹。有人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就是他秉承希特勒的旨意而写的。他经常负责党部的工作，很少在政府公开露面，希特勒对他极为信任，在战争初期，已经指定他为总统第一继承人，戈林元帅被指定为第二继承人。

他把《我的奋斗》指出的政策，当作金科玉律，认为苏联是德国的敌人，把处置苏联看作各种政策的先决条件，相反认为对英国必须继续维持增进亲善关系。然而，事与愿违，现在德国与英国正在血战，这并非纳粹的本来愿望，而是由于里宾特洛甫等的错误措施把德国引入了歧途。如有机会，他总想设法将这些错误予以更正补救。

赫斯在政府及党的首脑部的力量逐渐减弱，而里宾特洛甫的势力日渐扩大。自己的地位已经孤立，他深感寂寞。然而，德国现在似乎又想恢复到《我的奋斗》的基本政策，已经处于与苏联决一雌雄的形势。他想这时应挺身而出，为报答希特勒知遇之恩，也应该孤注一掷。

赫斯的失败　赫斯以后不断通过与汉密尔登公爵的通信联系，希望与英国当局接触，就德国向东方的扩张政策取得英国的谅解，尽快与英国恢复正常的关系。鉴于一年的战争结果，他认为不但可以使英国动摇，而且必要的时候，可将英国政府推翻。

赫斯秉性刚直，为此忧心忡忡。他利用曾当过空军军官的技术，在飞机场用奇计骗到一架飞机，独自驾驶，跨过北海，顺利地降落在苏格兰。汉密尔登公爵当时服务于军界，不在苏格兰。赫斯被捕后，英国政府已搞清了他的来意，但没采纳他的意见，却把他拘留起来。他有高明的

驾驶飞机技术，经常使用它，后来希特勒发觉他行动可疑，曾下令禁止他飞行。希特勒愤怒地骂他太糊涂，把他看作精神病患者，而他的副官则以不能阻止他的行动为罪名被判了刑。

赫斯在战后纽伦堡的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无期徒刑。虽然赫斯事件仅仅如此，但是英国却从此知道希特勒阵营内已发生了重大的分裂。当时，德国驻苏大使许廉布鲁赫伯爵及其他了解苏联内幕的人，都一致谏言对苏开战无益，即是德国陆军部内也有很多人赞同这种意见，但希特勒认为如果现在不将苏联解决，德国将来必受大祸，难获最后的胜利，所以他不改初衷，继续准备开战。德国对英登陆作战失败后，解决苏联问题成了德国的燃眉问题。

德苏战争　笔者离开伦敦返国，路过里斯本，等候飞往美国的飞机，时逢日本驻西欧各国外交官举行会议，讨论德苏两国局势的问题。六月二十一日传来了德苏开战的消息。笔者离开伦敦前，曾拜访丘吉尔首相，告别时丘吉尔透露德苏不久恐怕即将开战。

在东京的人对德苏开战都感到意外。当时，松冈为欢迎来日的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在歌舞伎剧场举行观剧会。听到这个报告后，立刻离开会场，进宫晋谒天皇，报告德苏开战的消息，并对天皇补充他的意见说："日本这时也许有必要与德国采取共同行动。"天皇立即召见近卫首相，了解政府的意见。近卫奏明政府对苏联的关系，仍想严格遵守中立条约，松冈的意见不过是他个人的私见而已。天皇这才放心。由此可知，松冈的政策仍是以三国同盟为基调的。

十一　日美谈判(一)

三国同盟与美苏关系　关于缔结三国同盟，近卫和松冈对政府的枢密院的说明是：为了调整日苏两国的关系，也是为了改善与美国的邦交，这并不是骗人的话，当初就是那么想的。

如前所述，德国当时对将苏联拉入三国同盟非常自信，同时为了防止美国参战要尽了手段。据德国观察：由于三国同盟的缔结，日本可以在远东牵制美国，使它在欧洲不敢参战，而且认为如果日本在美国军备尚未完成以前，向与德、意两国交战中的英国宣战，先发制人进攻新加坡，相机制服美国，再加上国内舆论的反对，那么美国就很可能错过参战的机会。

日本陆军的首脑部也相信了这种德国式的想法。但在日本也有一派与军部根本不同的意见，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虽为大势所迫，但仍应尽量避免参战，与英美维持邦交。他们完全相信日本政府的正式声明：三国同盟的缔结，并不是将矛头对准苏联或英国，实际上，日本更想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所以他们即使在三国同盟缔结后，仍想稳定住与英美的关系。

松冈外相和近卫首相的意见　松冈的意见与军部一样相信德国能大胜，以日德同盟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好象过去的日英同盟一样；而且认为，无论日美英关系，还是《日苏中立条约》，都应在三国同盟运用的范围内实行。所以德苏开战后，甚至主张参加德方进攻苏联。但是，近卫认为应见机行事，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决定政策，三国同

盟缔结不过是军部操纵的一个过程，尤其德国事先未与日本协商，就开始对苏进攻，日本对三国同盟应负的义务也发生了变化。另外，对美邦交的调节，松冈外相按照三国同盟缔结的宗旨，以防止美国参战为重点；近卫则主张，要离开三国同盟，维持日美和平。近卫的做法在总的原则上是适合的。

美国神甫的提案 当时，对日美关系表示忧虑的人逐渐增多。美国天主教神甫德劳特及大主教沃尔什过去为传教常来东方各地旅行，在日本常居住在京都。他们对日美关系甚表忧虑。他们以宗教上的地位，与美国财界、政界的教徒保持联系。一九四〇年底，他们曾携带了一个日美邦交调整方案来日本，开始与日本朝野人士交换意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当时美国门罗主义适用范围所规定的关于西半球的定义，在太平洋地区以一百八十度的日期变更线为界，在这以西美国不得干涉，而日本不得干涉这线以东地区。也就是说这个谅解方案是将太平洋分为东西两部分，美国既不得干涉西太平洋的事，而日本也不得干涉东太平洋及欧洲的事。根据这个方案，虽然不能阻止美国的参战，但事实上美国要放弃多年来所采取的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对此很感兴趣；但很明显的，美国政府对此方案表示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方案未能正式提出，两位美国神甫也就回去了。但一部分日本人误以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意见。

两位神甫在日本时，除与松冈外相及近卫首相会谈外，也常与曾在纽约财务官办事处任职的日本人川井接洽此事。

川井也将会谈的情形不断地转告军部或其它方面，力

说日美邦交调整是可能的。陆军军务局的军事课长岩畔大佐接受近卫首相的命令负责接洽。军部当然知道日本对于大规模的战争尚无充分准备，也未预料要和美国作战，经过检讨美国传教士的提案后表示赞成，所以就很热心地开始日美邦交的调整。海军方面也表示同意。

松冈外相的训令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从一九四〇年八月以来屡次被松冈外相邀请出任驻美大使，后经海军大臣推荐，他才接受了这任务。野村大使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自东京动身，在起程的前一天曾收到松冈亲笔训令。这个训令明确地规定了野村大使的任务和松冈外相的方针（根据外务省记录）。

一、如果不下决心改变我国国策，要想和美国达成谅解，确保太平洋的和平，进而为恢复世界和平谋求合作，终究是不可能的。

二、如果按目前情况发展下去，终将难保美国不参加欧战或对日开战。

三、如果这样，将发展成为可怕的世界战争，其灾难将数倍于上次大战，或将终于毁灭现代文明。

四、如果没有达成日美直接谅解合作的办法，帝国将与英美以外的国家携手合作，即使向这些国家施加压迫和威胁，也必须防止其对日开战或参加欧战。这不只是为了皇国自卫，实际上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

五、无论为了保卫我国或是为了防止世界大战，因为已别无它途可走，所以终于签订了日德

意同盟。

六、既然已经签订了这个同盟，我国的外交就将以同盟为轴心来进行，和当年的日英同盟一样。

七、如果三国政府认为发生了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条规定的第三国的进攻，日本当然要忠于同盟。

对于这点不允许有丝毫怀疑。日本下这一重大决心时，当然要经过极为慎重的御前会议。

八、有人认为日本现在在中国的行动是不正当的，或是侵略的行为，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我国终有一天会实行日华平等互惠，实现开国以来传统的宏伟理想——八纮一宇。

九、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也是出自八纮一宇的理想，"没有掠夺，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是我们的宗旨。

总之，首先要在大东亚创造国际上睦邻互助的天地，以树立世界大同的模范。

十、这种理想暂且不谈，就眼前的现实问题来说，我国也迫不得已选择在大东亚圈内走自给自足的道路。对君临西半球，进而向大西洋、太平洋扩张的美国来说，以上日本的理想和愿望能说没有道理吗？允许日本做这样的事情都不可以吗？

我国所考虑的绝不是要排斥别人，美国也应该来协助开发大东亚圈。诸如担心我们会断绝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橡胶、锡等物资，那是很可笑的。

> 希望将上述各项连同我在不久前在日美协会上的即席讲话，以及这次帝国会议上的外交演说等内容，向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美国朝野实权人物透彻地说明。

在这训令中，松冈说明三国同盟缔结的经过及意义，并清楚地规定野村大使抵美后的方策。在训令的末段，将他个人的见解，坦诚地表明给美国朝野人士。松冈指示的重点是：对美国依靠我们轴心政策的压力，防止其参战，决不可使他们认为我们是要求妥协去的。

野村大使上任时，美国对日感情已经恶化，尤其罗斯福总统的反轴心政策已经很露骨，举国扩张军备，参加欧战已不可避免。野村大使奉着这个训令，到这样形势的国家作为日本代表上任，其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野村大使的工作　野村大使赴任时，为重视陆军关系，特别要求陆军派一位有力的助手。结果，中坚将校任军部要职的岩畔军事课长被派任此职。

岩畔上校秉承近卫首相的旨意，让一直与德劳特、沃尔什两神甫保持联系的井川同去担任翻译。两人随后到了美国。他们抵美后，立即和两位神甫会谈，着手起草日美邦交调节的具体方案。这些日美的有志者，以岩畔上校的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也采纳了野村大使的意见，完成了一个日美调整方案。野村大使就职后，早已对松冈外相的训令置之不理。而且，他也不允许驻美大使馆中其他官员参加这些私人谈判。

野村大使一再收到松冈的警告电报，要他对井川等人不负责任的行动必须加以注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又

收到严重的警告：不可与井川等往来。然而，野村大使不但仍准许岩畔井川二人继续活动，而且他自己也参加了与两位神甫的调整方案的会谈。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大概井川仍与近卫保持联络，岩畔上校是陆军最有力的代表，松冈的强硬方针早晚使日美关系难免破裂，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或许是出于至诚只好这样做。驻外大使不受直接上司松冈的命令，而去尊重间接代表近卫首相和军部的私人意见，因此所谓日美谈判根本就是一件分裂的外交，其失败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后世史家认为，与其把批判重点放在交涉的经过与方式上，倒不如放在交涉开始的原委上。

所谓《日美谅解案》和赫尔国务卿 德劳德和沃尔什两神甫的热诚已经感动了美国政府内的天主教徒们，遂开始说服罗斯福总统，尤其是邮政部部长乌卡赞成两神甫的见解。两位神甫与岩畔和井川所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已向罗斯福总统提出(根据岩畔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供述)。两神甫特别强调，必须采用此方案，才能挽救两国关系的危机。罗斯福总统又邀请赫尔国务卿，听取两神甫的意见。据赫尔所著的书中说，他本人当时对两神甫所言，即如能采取这个方案，必能加强日本国内的温和派势力，更能变更日本政府轴心政策，抱有很大的怀疑。他主张无论何时，都要奉行美国民主主义，也就是反对侵略政策；同时必须维持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的政策，决不能变更这些政策。求得与日本的妥协，也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才有可能。所以，他在日美谈判开始时，就断定成功的希望只有二十分之一。但是，那时美国对德、日两国并无准备。罗斯福总统及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希望利用日美双方非正式的谈

判，以争取时间，从而明了其真相。美国国防部也想尽量使日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晚些出现。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赫尔国务卿接见野村大使，将“日美民间有志者”所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取出来交给他，并问他：“这个方案，是由美国民间人士提出来的、日美两国民间人士所草拟的两国谅解方案，听说贵大使也参与了此事，不知是不是事实？”野村大使承认此事后，赫尔国务卿告诉他：“这个方案，可以作为野村大使的提案，美国政府准备开始非正式谈判，并列入议程。”赫尔国务卿表示，在外交谈判上，不负责任的提案决不接受。野村大使答应，立刻将此方案和赫尔国务卿的意见报告给本国政府，请示方针（根据赫尔写的著作）。

在这以前，罗斯福总统在野村大使就职时曾问野村，为什么美日两国的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表示应当常与国务院详细讨论，除去恶化的原因，这是调整两国关系的最好办法。

四月十六日，由赫尔国务卿交给野村大使的《日美谅解方案》的其内容如下：

一、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二、两国政府对欧洲战争的态度。

三、两国政府对日中战争的关系。

四、在太平洋地区海军兵力及空军兵力和海运关系。

五、两国间的通商及金融合作问题。

六、两国在南太平洋的经济活动。

七、两国政府有关太平洋地区政治安定的方针。

如果日美两国政府能就以上各项正式达成谅解，那么罗斯福总统就准备与近卫首相在夏威夷会见，商讨签订其它具体协定。

野村大使的信念　野村大使将四月十六日与赫尔国务卿会见的详细经过和《日美谅解案》即刻电告日本政府。当时，松冈外相不在日本，由近卫兼代外相。为了向政府询问《日美谅解案》，野村大使四月二十一日又致电政府。在电报末尾，他吐露了自己的信念。

> “总之，本谅解案与日苏中立条约的情况一样，充分考虑了帝国国策之基础——轴心同盟的发展，并重新指出轴心同盟基础的三国条约第三条的效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以本大使所见，应该认识到，美国在现在的状况下，迟早会发生参战及爆发日美战争的最坏的情况，所以现在与美国谈判，与轴心各国大局的利益是一致的。”

野村认为三国同盟及轴心政策的基础虽不能改变，但如果不与美国进行什么谈判，必然导致日美开战，所以如能使美国了解日本与三国同盟的立场，防止其参战，对轴心各国是有利的。幸而现在已有谅解方案，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如果谈判的结果未达成谅解，“日美关系逐渐恶化，日本受到更严重的经济压迫，必然增加战争的危险”，所以一定要达成这种谅解。也就是说，野村大使想利用松冈外相轴心政策的威力，通过谈判达到避免日美战争的目的。但是，要知道主张开始谈判的野村大使的意见与赫尔国务卿的立场，是不能相容的。日本企图一方面实行轴

心政策，一方面调整日美邦交，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两国当政者既然知道不可能，而硬要去尝试，这完全是无谋的冒险。美国方面是备战的一种拖延政策，而对日本来说是寻找开战的机会，各有不得已的苦衷罢了。

日美两国的根本立场 日美两国多年来根本主张不同，要使其妥协成为可能，必须或是一方改变其政策基调，或是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仍坚持其对华政策和南进政策，妥协是困难的；而美国仍坚持其对日政治、经济上的压迫政策，使日本屈服也是困难的。关于这些基本问题，两国进程的变化是谈判成功的重要条件。

如前所述，鉴于欧战两年的情况，罗斯福总统已决定了美国的态度，公开宣布欧洲及美国西海岸是美国国防的前线，英国本土是前哨站，废除了中立法。又向面临崩溃的法国暗示参战并给予援助，接着应丘吉尔的要求，按照《租借法案》，向英国直接提供武器借贷，赠送五十艘驱逐舰；同时，在西半球的英国本土，取得了建设国防基地的权力，事实上已与英国站在共同的国防立场上。罗斯福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连任第三届总统，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表示加强英国的战斗力，同时决心实际上参战。他命令运输军需品到欧洲的美国舰船，如果在空中、海上受到攻击时，护卫的美国军舰应立刻进行还击。以上事实，已经把美国置于宣战参战的状态。

日德意三国同盟可能起到了牵制美国参战准备的作用，但是想靠谈判使美国承诺不参加欧洲战争，从美国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靠轴心政策的压力，达到其目的更是不可能的。可是，关于三国同盟，美国方面想使日本明确表态：在美国参战的时候，日本

采取中立立场。也就是说要尽快搞清日本是不是敌人，是最重要的。因此，美国对日美谈判的基本立场是：对美国参加欧战，日本保证不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一定要挫伤三国同盟的锐气，而且使日本一改历来的积极政策，转向与美英协调的和平政策；关于东亚诸问题，只要不损害美国一贯奉行的原则，美国也不妨采取让步的立场。这是日美谈判的关键。

由此看来，日美谈判能否成功取决于日本是否事实上抛弃三国同盟，根本改变在亚洲的武力政策。而这对刚刚缔结三国同盟的日本来说，是极重大的问题。作为三国同盟的当事者，刚刚访问德、意的松冈外相，知道了近卫首相及其他人关于谈判的意向很苦闷。日本方面如果不十分理解这种情况，漫不经心地开始谈判，结果必然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谈判明显地将成为危险的国际游戏。

日本对谈判的根本错误 如前所述，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赫尔国务卿对野村大使说：这是"日美民间有志者"的方案。并提示了日美邦交调节案。可是他说野村大使也参加了起草方案，确定把此案作为野村大使的提案并作为谈判的基础，进入非正式谈判。

然而，野村大使向政府进言，此案是由美国国务卿提出，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他在电报中说："达成本谅解案，反复进行了背后工作，美国政府表示赞成，赫尔国务卿也没有异议就确定了，本大使也参与了背后工作，经过种种交涉形成本案。"至少，日本政府认为这是美国方面承认的美国草案，日本方面想以此为基础，更提出相应的方案，才能进入谈判。在华盛顿也有同样的方案，但美国和日本却对此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这里有根本的分歧。

近卫首相接到野村的电报后，表示非常满意，日本政府立刻召开联席会议协商。因为军部也曾接到岩畔上校的详细报告，所以对此事很谅解。联席会议上统帅部及政府的意见完全一致，决定即与美国政府开始谈判。另一方面，赫尔国务卿四月十八日又向野村提出所谓赫尔四原则，要求日本承认这四原则作为谈判的前提，并询问日本是否有放弃现在军事侵略的意志。赫尔四原则是：一、尊重各国的主权；二、不干涉它国的内政；三、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四、维持太平洋方面的现状。所以赫尔国务卿在谈判开始时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时松冈外相刚结束对德、意的访问，在归途中到了满洲。大桥外务次官主张应将这个要做出重要决议的联席会议延期到外相回来后召开，近卫首相也决定等外相回京。

松冈外相的态度　近卫到羽田机场欢迎松冈外相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一方面听取松冈的回国报告，另一方面也想决定日美谈判如何开始。松冈外相却口称太疲劳，会议没完就回家休息了。近卫及军部对松冈的态度极为不满。松冈外相对于不在国内期间而决定的这个重大问题感到不理解。近卫指责松冈的态度不可理解。

松冈访问德、意两国与其首脑交换意见后，抱着满腹经纶而回；而对《日苏中立条约》缔结成功，国民也寄予极大期待，他象英雄似的受到欢迎。在西伯利亚铁路途中，据说他曾静静思索各种问题，不只是外交方面，有关国家革新的全般问题也加以考虑。回国后，想将日本完全变成纳粹式的国家。因此，一部分人预想，松冈可能企图自己掌握政权，以实行其计划。事实上，第二次近卫内阁早已成为他一人的活动舞台。敏感的近卫对松冈的态度也有很

大的怀疑而加以监视。两人对日美谈判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不仅如此，左右日本命运的陆海军部的行动也逐渐表示出与外交谈判无关。军部的想法是，谈判尽管谈判，军事行动是军事行动，甚至认为外交谈判不过是军事行动的辅助。

近卫及松冈对日美谈判 松冈外相的态度是明朗的。他在访欧归途在莫斯科曾和美国驻苏大使许泰哈尔特会谈，强调日本外交的基础仍在三国同盟。他说："日德之间，绝无任何特别秘密协定，日本并无立刻参加的义务。但是，如果美国参战，则情形就不同了。德国既然无向美国宣战的意图，我希望美国最好不要动。"并告诉许泰哈尔特大使，已经在五月二十四日将与许大使会谈情形电告大岛驻德大使："已转请美国考虑三点：一、不参战；二、设法劝蒋介石和平；三、决不许有影响三国同盟的举动，假如美国参战，日本也立刻参战。将此作为松冈个人的备忘录，请其电告罗斯福总统。"此外，他又告诉许泰哈尔特大使，德国必胜，促请美国首脑部应当慎重。他自己还宣称要亲自出马赴美，改善日美关系。因为松冈自己长在美国，为日美两国邦交倾其全力并不为奇；这也是他自己应尽的义务，他甚至认为除去自己毫无办法。然而，现在和美国的谈判，在自己离开日本期间已经开始。他最初以为这次在美国的谈判，也是自己播下种子所生的芽，但仔细调查后才知道谈判是由一些完全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所主持，近卫首相及军部也从中发动。这个日美谈判方案和他想的以三国同盟为基础，强迫美国不参加战争相去太远。尤其是关于将来近卫和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的建议，他更不能同意。

松冈认为现在进行的谈判无论从一般国际形势来看，

还是从日本目前的政策来看，实际上是不会成功的。也就是说，松冈无法解决：如何能使日美谈判与他访问的德意同盟之间的矛盾相调和。关于这一点，近卫因为已经忘掉了三国同盟的高潮，因而并不感到痛苦。

近卫与军部认为岩畔上校起草的原案，是美国政府的提案，主张根据此案举行近卫、罗斯福会谈。他们认为不能丧失这个日美邦交的最好机会。但是，松冈不同意。针对美国的提案，他自已另外草拟了一个方案。

接到赫尔国务卿提案以后，因为松冈回电需要两个星期的考虑才能答复，使野村大使的立场愈感困难，他向本国政府如箭似的电催早日答复。

日本这时早已脱离了轨道。五月三日联席会议上又决定作为正式回答的中间措施，命令野村大使将日美间的中立条约提出来，就说是野村个人的见解，或者将松冈外相访欧后德意必胜的谈话，设法传到美国首脑部，并说明美国参战无益，日本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决不动摇，以期牵制美国的积极政策。可是美国毫无反应。同时，日美谈判之事也被透露，五月四日松冈外相秘密地将赫尔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的大要通告了德、意两国，所以德、意爆发了激烈反对运动。松冈接到了驻德大岛大使的反对及里宾特洛甫的抗议。他严肃保证日本决定以三国同盟为中心，运用国策到底，并声明绝对不改变方针。这样，松冈外相表示了意见：日美谈判是在三国同盟范围之内，其意义仅是我们轴心外交的辅助手段。五月九日，松冈电令野村：以强硬的态度促使美国反省，美国不能参加欧战，并要停止对中国政府的援助（美国五月六日已决定中国适用军火租借法），以缓和日美关系；如果美国对德国采取敌对态度，日

本也必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即日本进攻美国)。

尽管松冈的态度如此，而德国又对日本加以明显的压力，奥特大使还是于五月十七日在东京又向松冈提出德国政府的训令：

> “德国政府认为阻止美国参战之最佳方法，是日本必须拒绝对美国提案进行谈判。日本政府在答复美国政府前，未征求德国政府的意见，诚属遗憾。去年，三国条约之缔结，是德、意、日三国的政治的、道德的结合，其最大目标，在于阻止第三国参加战争。”

三国同盟条约确有这样的明文规定，松冈外相也尊重这项义务。德国的压力又通过驻德大岛大使直接反映给日本核心势力的军部。由此可见，日美谈判的开始，使三国同盟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日本方面的反提案 五月十二日，松冈外相完成了日本政府对赫尔提出的《日美谅解案》的反提案，其大致内容是：三国同盟的宗旨是防止欧战扩大，希望美国不要介入欧战，提议日、美两国在欧洲重建和平；关于中国问题，希望美国出面调解，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应停止对中国援助；日本对菲律宾的安全保障及经济均等主义。反提案对罗斯福总统和近卫的会谈，只字未提。美国所得到的答复与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松冈外相又训令野村大使，提出答复时“可向赫尔国务卿提两个条件：一、美国不参战，二、美国应劝告中国政府和平”。但野村大使并未照办。显然关于日美谈判，松冈和野村从开始就采取了完全不同

的立场。

美国认为是否参加欧战是美国的自卫权力。美国想通过谈判试探日本是否能改变其轴心政策，承认美国可以运用自卫权。松冈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如果美国参加欧战，日本为了三国同盟的友谊，也必不得已而参战，所以最好双方均不参战，即可解决许多的悬案。这个答复使美国颇为失望。松冈不承认美国为援助英国而参战是美国自卫权的运用。最后，美国知道松冈和德国企图阻止美国发动自卫战争，更断定妨碍日美谈判的人就是松冈。

美国政府的口头备忘录　关于日美谈判，日本政府内部的分裂已无法掩盖，无论在东京，还是在华盛顿，支持日美谈判的人都指责松冈。野村曾暗示美国政府，这次日美谈判，除松冈外，已得到日本军部及天皇本人的支持。因此日美两国排斥松冈的呼声日益强烈。松冈和野村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不能调和。

针对五月十二日的日本提案，五月三十一日赫尔国务卿也将美国的反提案面交野村大使，但野村并没将此案报告日本就进行谈判。日本政府得到驻美武官的报告后，才知道此事。政府与驻外使节的关系更加疏远。野村大使六月二十一日把从赫尔手里得到的美国对五月三十一日提案的进一步修正案，作为五月十二日对日本提案的美国政府答复案，正式报告给政府。

美国政府早已料到德苏战争必将爆发，遂在德苏开战的当日即六月二十一日对日本提出的提案中又附加了交换公文及美国政府的质问函(野村大使对交换公文书，表示不能代为传递，但这并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意志)。这个方案也可说是自从四月十六日日美有志者所草拟的日美谅解案

以后，美国政府的最初提案，其内容与日美谅解方案相差甚大：坚持美国可以发动自卫权，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日本从中国撤兵，一般通商问题等，全是美国历来主张。对日本最重视的承认“满洲国”问题，仅表示应由日中两国间友好地谈判解决。对日本所希望的答案，似乎置之不理。在这个提案中还附有一份备忘录。

六月二十一日，赫尔国务卿面交野村大使备忘录一份，其内容如下（六月二十三日野村大使电报第四六二号）：

“国务卿认为，日本大使及其同僚因欲达成日美两国间更进一步的良好了解及在太平洋地区树立和平所表现出的真诚努力甚大，尤其在多次会谈中，国务卿认为几位态度甚为恳切。

“本国政府对于谋求美日两国间达成更好之关系及太平洋地区维持和平形势的愿望，不次于各位，而且本人基于以上精神，对日本提案中之各项观点均审慎加以研究。

“国务卿相信日本的领导者与日本大使及其同僚的见解完全相同，同时也相信日本领导者支持为达到这个崇高目标的行动。不幸的是，日本政府有力的领导者中，有人已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订约，支持其征服政策。本国政府从世界各地不断得到报告，其中包括多年来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人。他们说日本与美国谅解的唯一方式是美国仍实行目前的自卫政策，如卷入欧洲战争时，日本势必加入希特勒方面的战争。

“最近日本政府发言人发表的不仅毫无道理，

而且强调三国同盟日本的誓约及方针的官方声明，是不可忽视的一例。面对这种领导者公然表明、且公开地煽动日本舆论的态度，如果还期待目前讨论的提案得到具体的结果，岂不是幻想？

“日本提案中尤令人怀疑的是，关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条件中和日本政府的要求中希望以抵抗共产运动作为协助中国的措施，并承认日本可以在内蒙古及华北的一定区域内驻兵。

“本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提案已经过审慎的研究，虽然对提案的实质不愿加以批评，但对日本大使及其同僚一再说明，美国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各种政策决不允许美国步入任何与此政策相违背的方向。如果是只对本国有影响的事，那么在权利的决定上还有商量的余地，但现在所讨论的是影响第三国主权的事，本国政府认为，处理这样的事应当更加慎重。

“因此，国务卿和本国政府已经得到一个结论：日本政府如希望达成谅解方案的目的，似应明确地表示。本国政府确实希望日本政府表明这种态度。”

赫尔口头备忘录的意义 美国政府的口头备忘录不但是对松冈外相的警告，也是对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任何人从文件中都可以看出：松冈在职一日，谈判就不会得到结果；而日本不根本改变过去的主张，谈判也无希望。

这件口头备忘录表明日美谈判已触暗礁，所以这是关

于谈判前途的一份重要文献。但当时日本的领导者似乎认为这仅是排斥松冈的文件。

以此看来，美国政府已经断定，松冈对美国恫吓威胁的言论，仅是松冈个人的，日本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所以不但不理会松冈的威胁，并暗示为继续举行美日谈判必须将松冈外相踢开，甚而要求日本政府，对于美日谈判的政策全面加以改变。

松冈外相七月十日在政府大本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认为赫尔国务卿的口头备忘录简直是干涉日本政府的内政，无视独立国的尊严，我方必须予以拒绝。至于谅解案，如以日本五月提出的方案为基础，恐无达成协议的希望，如果决定停止谈判的话，应审慎地考虑其时间及方法。当即电令野村大使将口头备忘录退回。在十二日的联席会议上，海军提议最好将谈判拖延到占领越南为止。

日美谈判急转直下，日趋恶化。如果日美之间无论发生任何事件都足以发展至影响两国的邦交，那么也就无法再维持目前的局势。

美国认为希特勒是侵略者，是和平安全的敌人。美国虽未参战，但对英国已予以援助。一九四一年初，获悉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确切情报，欧战胜败谁属就要见分晓的时候，日美谈判实际上已到了除非日本全面的让步，否则决不能成功的地步。

近卫虽然也是缔结三国同盟的负责人，但不象松冈把三国同盟看得那么重要，仍想将日美的关系在华盛顿以谈判的方式加以调整。于是，近卫为排挤松冈，决心自己指导日美谈判，遂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呈请总辞职。天

皇再命近卫组阁。这是天皇希望日美谈判继续进行并使其成功的旨意。

七月十八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将松冈逐出，任命原任商相的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希望丰田外相能与海军出身的野村大使合作，负责日美谈判，并由近卫亲自指导。其他阁员均未更动。对于陆军所主张的三国同盟，海军一向有采取反对态度的迹象，尤其是在海军的稳健派中始终有此主张。近卫首相过去曾支持陆军的主张而缔结三国同盟，这次企图利用反对三国同盟的海军稳健派的势力，早日使日美谈判获得成功。近卫的想法是，三国同盟的存在和日美关系的调整并不矛盾。这也是近卫急于寻找和平方法的挣扎，但仍不能改变军部所坚持的轴心政策。

十二　御前会议（一）

日美两国的立场日趋背离　欧战爆发后两年，英国尚未脱离险境前，张伯伦首相曾企图诱使德国东进攻击苏联，但未能成功。两年后，英国才完成了这个东西两面包围德国的态势，使自己获得了宝贵的时间。这确实是战争胜败的转折点。英国趁此毫不迟疑地与苏联妥协，签订了不单独媾和的协定(即七月十二日《莫斯科协定》)，又进一步缔结同盟条约(一九四二年五月)，规定了各项的援助。同时，美国根据《租借法案》，经过波斯湾、姆尔曼斯库及西伯利亚各地，也对苏联予以大规模的援助。

由于苏联参战，英国的负担迅速减轻，同时在英国背后的美国支配世界政局的地位也日益加强，美国的世界政策更日渐进展。在远东方面，美国不但对于日本毫无一丝

让步，甚而认为其从满洲事变以来所坚持的政策可以实行的机会来到了，遂对日美谈判的态度更强硬了。当初谈判时，赫尔国务卿提出的日美民间有志者的方案，完全被提高了。

第二次近卫内阁时期的日美谈判虽然屡次遇到挫折，但近卫内阁的末期，日本政府的国策又给这次谈判以致命的打击。第二次近卫内阁表示决不改变成为日美谈判主题的三国同盟和南进政策，不改变过去的方针。所以，六月十五日野村大使向赫尔国务卿提出的新提案，对五月十二日所提出的方案并无变更。

日美谈判和日军的南进 军部的南进政策不顾日本对外关系是否调整仍继续进行。占领越南北部以后，日本陆海军已经感到这不是单纯的中国问题。而且英美的态度，不但援助中国继续抗日，而且为着直接对日本施加压力，已经准备开始经济战。

为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达到使日本屈服的目的，美国首先实行贸易方面的限制，禁止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一九三九年七月，公布了废弃通商条约。英国也追随此政策，在南洋方面拥有领土的各国也相继仿效美国，日益加强对日本进行所谓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诸国的政治经济的包围政策。针对这种形势，军部认为需要下大的决心，除了需要作战外，在经济方面来讲，为防备紧急事件的发生，必须将南洋的石油及其它重要资源控制在手。所以，陆海军都同意日军由越南北部开始侵占越南南部。据近卫事后对笔者说："当时日本首脑部认为，即使实行这个计划，对日美谈判也不致有何影响。"另一方面，在华盛顿的谈判，美国虽然一再说明美国政府的态度，但东

京却毫无反应。

由于军部过于相信德国的实力，即使在六月二十二日德苏开战的时候，也完全相信它的宣传。当时德国曾梦想一举即可粉碎集结国境的苏军，三个星期可占领莫斯科，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整个苏联。

日本军部的北方派人士主张，德国大胜以后必将其实力向西伯利亚方面推进，如果在海参崴成立根据地，那时日本所受的威胁，或许较苏联更大，所以必须研究对策。因此，动员了百万大军，送往满洲，以防万一。对外则宣称举行关东军特别演习。松冈外相回答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的询问时说，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两者之中，日本宁愿尊重三国同盟。

可是，德军的进攻并不顺利，在满洲的形势也随之变化，军部又将集结满洲的军队输送往南方。于是，开始实行陆海军主张的南进政策。

七月二日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时做出了重大的决定，这就是：进攻越南南部，“不惜对英美一战”，并为缓和北方派的主张另补充决定：“北方问题在适当的时机给予解决。”这次会议决定南进，而为了缓和北方派的主张，插入了在适当时机解决北方问题的词句。看得出来，近卫在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满洲增兵的时候，非常害怕北方派的主张，而现在他说：“因为七月二日的决定，对北方已经不担心了。”这次御前会议的决定终于决定了日本的命运。日本决定南进以后，如果英美不让步，冲突就不可避免。但是近卫仍希望日美谈判能成功，如果谈判能成功，他想军部方面他有办法予以控制。虽然这是不合逻辑的解释，但只能这样解释。然而，一方面进行谈

判，另一方面又随随便便地决定了这样重大的国策，如果不是恫吓，便是疯狂，等于右手做的事，用左手去破坏一样。虽然是善意的，可是充满了紊乱与矛盾。御前会议的秘密决定，立刻被美国方面获悉。美国知道日本南进的态度以后，断定日本对谈判绝无诚意，谈判的形势极度地恶化了。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达到日美谈判的目的，近卫排斥了松冈，组成了第三次内阁。

七月二日御前会议的结果，决定了新的海军作战计划，由永野军令部总长于七月三十一日面呈天皇。天皇看到其中的对美作战计划时非常惊讶，责问永野："敢与美国作战么？"永野答复说："对美战争不能维持一年半以上，胜利就无把握。"由此可知，日美战争是日本首脑部所不愿意的。

十三　回国与进言

与松冈的会谈　笔者离开伦敦，途经里斯本到达华盛顿，已是六月下旬了。在华盛顿首先从野村大使那里听说了日美谈判之事。忽然联想起在伦敦，英国政府内的朋友说过日美之间似乎开始对话，所以回国途中在华盛顿和美国方面接触了一下。由此深感达成日美谈判非常必要。无论在对欧洲问题上，还是在对美国问题上，笔者都下决心说服松冈外相，遂赶忙回国并准备辞去大使职务。

从圣佛兰西斯克出发，经夏威夷乘船到东京已是七月下旬。日本政界形势已发生变化，松冈已经下台，而第三次近卫内阁是日美谈判的内阁，丰田海军大将任外相。尽管如

此，笔者仍去拜访卧病中的松冈，向他陈述笔者的见解。

松冈那时正患病，他用了几个小时慢慢地向笔者说明形势后，最后说："自己曾以调解与美国的邦交为最终目的而奋斗，可是这事终于不可能了。南北恐怕都将要点燃战火。我认为日本如果这样，一旦落入无底深渊，国民仍不会表现出自觉来。"他苍白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生气。笔者不了解国内重大形势，感到松冈历来采取的政策，和今天说的有许多矛盾之处，所以他那自暴自弃的言词并不疯狂。笔者从松冈家出来，一路在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避免日本参加大战。可是从今天来看，不能怀疑松冈以上的言论：明显地担心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军队的行动。甩开缰绳，在众人的喊声中疯狂地奔驰的烈马，这正是日本的形象。

笔者的进言　笔者无论是在宫中御前讲演，还是在联席会议上，或者对近卫首相及丰田外相，都从各方面陈述笔者的观察和意见。也去军部的参谋本部向全体将校做了讲演。在其它场合也向各种人披露所见的大同小异的内容。我深深感到这是笔者的义务。

其要点如下：

首先阐述笔者居住过的英国的国情。"英国国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已经成为传统。英国人忍耐性很强，越遇到困难，意志就越坚强。领导英国的丘吉尔是位少有的斗志，有铁血的决心，统率着战时的英国国民。他动员了英帝国的一切力量，并和其它参战国密切联系，又完全将美国作为伙伴。在海上英国的优势自不必说，在空中、陆上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不断接近德国。德国的海上封锁失败了，相反，英国的大陆封锁却日益显示出其威

力。”

其次，论述对欧洲战势的判断。“德国已经不得不放弃一九四〇年夏天对英登陆作战，但它在陆战仍维持长久的优势地位。然而，这是就欧洲大陆而言，英国在殖民地富有经验的军队是出色的。英国海上的优越不可动摇。对苏作战，如德国所说的几个月内结束，是不可能的，就象我们对中国的战争，必然成为无限消耗德国武力的战争。战争不可能是短期的，而要经过很长时间。英国完成准备，美国实现预期的公开参战时，就同上次大战一样，是决定德国命运的时刻。”

进而对国际关系发表看法。“英国和其它参战国的团结日益巩固，法国国民也团结在戴高乐周围，他们对最后的胜利已充满了信心。美国的动向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在罗斯福领导下，事实已经与参战一样。美国现在巩固了在南北美的军事基地，并声称以英国本土为国防前哨。英美的国防已结合在一起，美国形式上的参战只是时间和机会问题。英国已对殖民地战争具有自信，而且德国在占领地的困难也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因此，英、苏、美对德的包围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大势所趋，战争已经越过险期。”这种对战争的一般观察，驻英陆军武官辰巳少将也表示同意。他通过笔者，向中央军事当局提出了意见书。

笔者的结论：“日本不要介入欧洲战争。日本坚持绝不介入战争能使现在进行的日美谈判成功，进而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清算日中关系。如果日本不介入战争，依靠外交途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针，日本的地位在欧战后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提高。”

笔者长期在海外工作，对日本政府的方针和国内情况没接到过任何通告，根本不知道军部和御前会议的决定，但是我一直认为，日本人加入眼看着要失败的战争难道不是愚蠢的吗？

推动日美谈判　在宫中御前讲演时，详细地阐述了离开伦敦时和丘吉尔首相会谈——丘吉尔所表示出的英国的决心，英国皇室的动向，空袭下的英国人的沉着态度。天皇陛下而后命令笔者对皇后陛下也进行了同样的御前讲演。在参谋本部笔者的演讲是对数百名将校级以上的人进行的，重点讲战争大势，说明英国的不败和经过长期战争能取得胜利。不少有心的将校将此铭记住了，然而也有人认为笔者是英美派，在进行恶毒宣传。笔者也因此受到宪兵的盯梢。军部还认为胜利是属于德国的。舆论一直以压倒的优势盲目地歌颂轴心。

近卫、丰田外相都对笔者的说明产生共鸣，特别是对日美谈判表示了热情，如近卫向天皇表示决心，即使死也要为其成功而努力。笔者当时接触的多数有识者中，不少人鼓励笔者。笔者对近卫的日美谈判，也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可是，国内的形势已经很困难了。

十四　日美谈判（二）

日本的南进和美国的冻结令　排除松冈外相后的近卫抱着决死的决心第三次组阁。他仍继续进行日美谈判，但是前内阁时期七月二日御前会议所决定的关于进攻越南南部的政策不但并未取消，而且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这是何等的矛盾啊？日军占领西贡，海军又占领了日俄战争时

的俄国舰队所停泊的金兰湾，并在附近建筑一大飞机场。这个计划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实行。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古表示，只有武力才能使他们屈服。近卫又致电法国维希政府，保证尊重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力劝对日本的军事要求予以应允，并通知德国政府设法对维希政府施加压力。维希政府对法属印度支那问题，曾呼吁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可是在最后的时刻，法属印度支那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一项共同防卫法属印度支那的协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加藤大使在维希政府所在地签订了《日法议定书》）。

占领越南南部在军事上的意义是很明显的。金兰湾隔海与马尼拉、新加坡相望，陆上与泰国相毗连。英美在东亚的根据地，都已在日军进攻的范围内。英、美、荷三国发觉了日本的企图，日美谈判几乎中断。美国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对日本实施冻结令，冻结日本商社在美国的资金，停止对日本的全部贸易，展开了真正的经济战争。随着美国对日经济战的激烈，英国、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因此，为养活八千万人口所必需的海外贸易，除日军占领区以外，不论东西洋各地，都完全失去了市场。美国在经济上，掌握了日本生死存亡的大权。自此以后的日美谈判的中心便离开了主题，开始讨论恢复日美经济贸易，归结到日本从美国输入石油、日本需要让步到何种程度等问题。

这时日本军部仍盲信德国的全胜，还在做他们的美梦，计划德国胜利后，日本因为参战应分得何种重大的果实。

谈判继续进行 近卫首相对军部的判断也感觉怀疑，但奇怪的是对世界形势仍很乐观，以他周围的智囊团为中

心继续进行谈判。共产党员尾崎秀实也是他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谈判在近卫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丰田外相，由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进行。然而问题复杂多端，非常混乱。赫尔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野村大使不但未充分了解美国的主张，连日本的提案也未弄清楚。"日本内部，对谈判的方针没有达到一致。日军占领越南后，谈判曾一时陷于停顿，而美国仍认为继续谈判是上策。罗斯福于七月二十四日特别召见日本大使，提出一个方案，将越南(以后又包括泰国)划为中立地区，作为日军由越南撤兵的条件。日本于八月六日由野村提出的新提案中，竟提议恢复贸易，而对罗斯福的提案、从中国及越南撤兵等问题并未答复。顾左右而言它更伤害了美国的感情。谈判仍然毫无进展，近卫焦急苦虑，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提议与罗斯福直接谈判，解决两国的悬案。

日美当初谈判时，由民间代表所拟的提案中，就预定了近卫和罗斯福总统会谈。

近卫、罗斯福会谈问题　美国原则上并不反对此提议，而日本对这次会谈抱有更大的期待，近卫已内定了外交、陆海军首脑为随员，只待出发。海军方面对此无异议，陆军则提出了一个条件后才答应参加会议，其条件是：在八月四日举行海上会谈时，日本方案所包含的基本政策不容变更；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明日本的真意，继续推行其美国政策，日本必须立刻表示开战的决心，停止会谈。

日美谈判自五月开始以来，实际上没有丝毫进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三国同盟问题，即改变日本国策的问题，如从中国撤兵、南方撤兵、恢复通商等问题。四月十六日

根据民间人士提案开始谈判以来，日美双方的主张距离甚远，感情上恶劣的痕迹也日渐加深。国内日本军部的意见不但毫无缓和，而且在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召开后更为跋扈强硬，已不可挽救。近卫在这样的环境下去美会谈，即使日本承认谈判的成果，日本也仍背着国内巨大困难的包袱。近卫想，如果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而能达成协议的话，就得以天皇的命令强迫陆军就范。他把这种想法也透露给笔者，笔者表示赞成，并鼓励他这样做。军部的态度虽然毫无道理地表示出强硬，可是一般朝野人士大都希望日美谈判成功，这是一种力量。

美国对此海上会谈表示欢迎，罗斯福总统指定阿拉斯加的旧诺市为会谈地点；但是国务院检讨过去谈判的结果，认为在两巨头举行会谈以前，有必要对一般的重要问题先达成协议。特别鉴于近卫的经历及性格，在一般问题尚未解决前而举行会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反而会使日美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结果失去商讨的余地。所以，日本虽然一再催促（八月二十八日近卫又通过野村大使送给罗斯福一封亲笔信，说明此次会谈并非讨论细节问题，强调两国首脑直接谈判的目的是就重要的问题达成原则上的解决办法，请决定会谈的日期），但美国九月三日的答复是：继续进行政府间的谈判，应将主要的各问题先达成协议。

日本于九月六日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说明近卫承认赫尔的四原则，希望美国速予答复，但是美国认为这个新提案与日本过去的主张并未缓和一步。谈判仍无进展。日本于九月二十七日再次提出一新方案，可是美国仍不感兴趣。当时情形是日本越急，美国越表示冷淡不理。

十五　曹尔基间谍团

德国反对日美谈判和曹尔基事件　日美谈判开始时，德国曾接到松冈外相关于此事的通告，而德国认为谈判会削弱三国同盟的力量，所以表示强烈的反对。德国除松冈的通告外，驻东京的奥特大使也从曹尔基那里知道了日美谈判的情况。

苏联也通过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地的组织破坏日美谈判。它的目的是削弱日本对苏联的压力，煽动日中间发生冲突，使日本的北进政策转为南进，更进一步引诱日美之间爆发战争。为达到此目的，不仅是中共分子，而且在日本或欧美各国第五纵队的共产党势力，也被有效地加以利用。

在反对日美谈判这点上，当时正在交战的德国和苏联的利害关系完全一致。在这时，暴露共产国际活动的重大间谍案——曹尔基间谍案发生了。这件事更证实日本政治组织是怎样的脆弱，日本领导者如何的缺乏国际知识，以及日本人对重要政治计划及国家机密的保密多么疏忽。曹尔基事件一九四二年已由日本司法机构公布，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国也根据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调查报告给予发表，内容大致相同。

曹尔基和尾崎秀实　一九三九年末，做过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伊藤律师被捕，他供出日本共产党曾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通过美国共产党而转送到苏联，从美国回来的日侨北林共子与该组织有联系。政府马上逮捕了北林共子，再由北林共子的线索，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将与此案有关

的冲绳人、曾任美共支部部长的画家宫城与德逮捕。这样，就发现了在日本有这么一个大情报网，而且知道了此间谍团的核心人物是德国驻日奥特大使的顾问里哈尔德·曹尔基和近卫身边的尾崎秀实，不久这两个人便被逮捕了。

曹尔基之父是高加索的德国人经营的一个石油公司的技师，祖父是卡尔·马克思的秘书。曹尔基一八五九年生于巴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德军，曾三次负伤。他后来在德国大学读书，一九一九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作为新闻记者进行活动。后来他成了苏联共产党党员，作为国际共产党的干部当了红军第四本部(苏联最高谍报机关)的情报员，一九三二年来到日本。他能用日语自由交谈，被最富有国际知识的佛兰克佛尔德·察尊报社聘为特约通讯记者。在德国他是纳粹党员，故无人发觉他是共产党。红军第四本部对他的训令是：一、表面上与日本共产党无关系；二、派一助手，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一个白种人；三、介绍与日本政府要人认识；四、表面尽可能不与苏联大使馆发生关系。在抵日前路经上海时，由美国共产党员介绍，与朝日新闻社尾崎秀实见面，商谈有关间谍活动之计划。

曹尔基惊人的手法　曹尔基最惊人的本领是，他除了是共产党大本营克里姆林宫的直属人员外，又是纳粹党员，来到东京立刻能与德国大使馆武官奥特(后为大使)接近，并取得了他的信任。他从尾崎手中得到有关日本的秘密；取得奥特最大的信任，作为奥特大使的情报顾问兼秘书，参与了最高机密。他也利用奥特，得到了德国方面的机密，自然取得了克里姆林宫的重视。他所得的情报，是经他的合作者米克·克劳尊(波共党员、德国新闻社驻日特派员)，

用短波直接送到苏联。他的助手克力齐以法国阿巴斯通讯员的名义被派到东京。

共产党对日本的工作大多通过美国共产党进行，曹尔基谍报团也是以美国共产党情报机关为主体。当时日本及东亚各地最容易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活动舞台。

尾崎秀实及其活动　尾崎秀实是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的特约通讯记者，也从事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满洲事变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对日的策动。他于一九三四年回到日本，与曹尔基和宫城二人取得联系。他们曾宣誓，无论谁被捕务必设法自杀。宫城被捕后自杀未遂。

尾崎最初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工作，后调往东京。他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也是朝日新闻社的社论委员，所以立刻为各界所知，也有机会接近近卫。第一次近卫内阁产生后，被聘为内阁专员，直接协助风见书记官长工作，成为近卫的智囊团成员之一，通过国家各机构，实质上参与政府最高的计划决策。到第三次近卫内阁倒台被捕为止，他一直为近卫所器重。近卫有些疏忽，甚至国家的最高秘密，也随便与人讨论，所以对尾崎来说，利用他的地位，为完成其任务，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与宫城将最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曹尔基。日本政府尚不知在政治中枢养了一个最危险的间谍。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为改变日本的政策也绞尽了脑汁，他们实际上是完全达到了目的的成功者。

从没有任何一个情报团能象曹尔基间谍团组织得这样巧妙，运用得这样得法，收到得成果这样大。尾崎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被捕后，曹尔基和克劳尊也都感到处境危险，准备逃跑。十八日在逃跑途中被捕。

曹尔基的活跃 曹尔基间谍团的工作从满洲事变后开始，直到日美谈判的末期。根据尾崎的口供，我们知道他们工作的目标及计划包括中国及日本。

在中国，从马林、鲍罗廷时期以后，以赤化中国为目的的共产党最害怕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所以极力阻止这种事件发生。共产党竭尽全力攻击日本的武力扩张主义。随着形势发展，日军占领满洲、侵入中国本土，中国共产党公开对日宣战。在中国，共产党极力避免日本的矛头对准苏联，竭力使其对准其它帝国主义势力，主要是对准英国。也就是说，他们计划以一个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其它帝国主义势力，并使两者同归于尽。因此，随着日中战争爆发，他们费尽心血以使日本武力停止北进，转向南方与美国发生冲突。

他们对日本国内的计划是明确的：利用日本国内对立势力的激烈斗争，设法使日本内部更加混乱。正如从巴黎苏联大使馆逃走的前苏联驻日代表贝世德斯基所说："日本的对立势力，在政治上就是吸收旧藩阀势力的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立，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对立，在经济方面是三菱财阀海洋霸权和三井财阀的大陆侵略对立。这些敌对力量斗争的激化，必然互伤锐气，引起日本国内的混乱。日本共产党认为，这样革命方能成功。"

难波大助的虎门事件发生以来，政府更加严格取缔日本共产党及危险思想，所以共产党员潜入地下活动，只有少数人向政府自首，但自此共产党的活动反而渗入了政府各个部门，使日本局势更加恶化。

惊人准确的情报 曹尔基通过尾崎的协助，从第一次近卫内阁前后开始，得到了日本最高决策的正确详细的情

报，并全部报给克里姆林宫，同时也将一部分泄漏给奥特大使。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搜集日本对苏政策的情报，防止日本进攻北方和侵占苏联。他工作末期最得意的情报就是探知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御前会议中关于日本南进的政策内容。松冈虽然公开说南方与北方都将爆发战火，但曹尔基知道得很准确，他很有把握地报告：日本南进是确定无疑的，而北进只是虚张声势。

关于日美两国谈判经过，曹尔基通过在日本内阁工作的尾崎得到了许多详细情报。他竭力破坏谈判，因为德苏两国在这点利害是一致的，所以他的工作相当顺利。美国共产党为煽动美国政府和舆论，也积极进行有效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日美谈判，最终导致日美战争。

曹尔基最大的功绩之一，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前后，从奥特大使那获悉德国参谋军官带来的关于德国进攻苏联计划的内容。最惊人的是他将进攻苏联的日期也准确地断定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并报告给克里姆林宫。松冈赴莫斯科交涉中立条约时，斯大林甚至早已知道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

尾崎的追述　尾崎在被捕后，曾坦白地说过这样的话："因为自己长期需要戴假面具掩护，从事危险的潜伏活动，费了很多心血，所以头发全都白了。"又说："我们的赤化日本运动，已经达到了目的，日本已经卷入战争，扰乱必起，革命必至，自己的工作已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但不能看到其结果而死，实在遗憾。"

近卫辞职后，有一天对我谈及曹尔基事件，说起尾崎在司法当局的口供，一再反复地说："实在可怕极了。"近卫回忆说："过去自己有时制订政策方针，表面上也得到

了陆海军双方的赞成，然而一旦要实行时，不晓得要发生什么障碍，结果都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实行。”曹尔基和尾崎于一九四四年被处死刑。克劳尊和中西被判无期徒刑，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以政治犯的身份和其他共产党员同时释放。宫城和克力齐死在狱中。和此案有关的其他被判有期徒刑的人也都在战后被盟军释放。

曹尔基事件不过是许多间谍案中被破获的一个。战后世人也都逐渐知道，共产党为达到他们的目的，利用各种手段，通过设在世界各地的组织，在政治、文化、经济各部门，或以第五纵队的身份，或以间谍形式，仍不断地为他们的信念而暗中活动。

十六　御前会议(二)

进攻越南南部　第二次近卫内阁末期，在七月二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对英美开战及陆海军进攻越南南部的政策。如前所述，这次会议可以说决定了日本的命运。第三次近卫内阁继续执行这些政策。英美立即做出反应，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对日本实行冻结令(美国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英国在二十六日)，开始全面的经济战争，同时在军事上加强ABCD包围圈。英、美、荷诸国在华盛顿、马尼拉和新加坡等地也不断地召开军事会议。

日军进驻西贡、金兰湾后，与英、美、荷三国的殖民地仅隔咫尺，双方的大军虎视眈眈地互相对立。因此，双方舆论哗然一片。这时日本有一种悲观论调，指责缺乏石油等军需资源，长久下去，空费时间，结果势必投降；日

美谈判应当告一段落，和战必须早日决定，否则日本将坐以待毙，自取灭亡。

他们强调，为了防止坐以待毙，应早日促成轴心国家的胜利。就象德国所说，这是日本千载难逢之机，即刻开战是最有利的，所以应早下开战的决心，做积极的准备。赞成这种主张的占绝对多数。不言而喻，其急先锋是统帅部。

统帅部的开战决心 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长一起晋谒天皇陛下，面奏上述统帅部的意见。当时天皇非常忧虑，立刻召见近卫首相，面谕近卫站在旁边，静听统帅部关于军务的报告。

两总长认为，鉴于局势危急，日本军部长期旁观、浪费时间是下策。日美谈判不论是否成功都必须早日结束，若不成就立刻采取战争的手段，速下决心开战。杉山并面陈开战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即可将南洋一带扫荡完毕，达到占领目的。天皇听后表示不悦，斥责陆军所说的不能令人相信。关于中国问题，陆军曾说一个月内可告一段落，而今已有四年之久，尚无解决的希望，而南洋区域广大，比中国又远几倍，三个月岂能解决？永野又婉转地申辩说，如能获得南洋的资源加以利用，培养我方的战斗力量，即使战争拖长，也可继续支持。

天皇陛下不满意统帅部的说明，更踌躇做此重大的决定，命令内阁应审慎地加以考虑，不应完全由统帅部来决定。

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心 近卫首相与军部及其它方面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议决此事，可对日美谈判仍指示照常进行，并期待成功。这是两手政策：一方面决定

战争，而另一方面仍想日美继续谈判。这种政策的运用到底可行不可行，希望以御前会议的最高形式予以裁夺。在最高政治方面，虽然发生了这些矛盾，但近卫仍不放弃日美谈判成功的希望。近卫在感情上不知不觉间有一种想法，他认为统帅部是统帅部，政府是政府，政策问题和军事行动可以并行。统帅权的独立，就显示了国家意志的分裂。这对没有处在过去环境中但有常识的后代批评者，是不易理解的。

由于统帅部和内阁的意见一致，九月六日又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日美谈判到十月上旬仍无结果时即行开战，较之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又前进一步"决心开战"了。而且在这个决议案中，规定了在日美谈判中日方让步的限度。在会议上，由枢密院议长提出各种问题，按照旧例，统帅部负责人都一一予以了答复。

天皇对此决定感到不满与悲痛，不久他环顾左右，当众取出一首明治天皇自作的日本歌，高声朗诵道："当今四海皆兄弟，世界何事起风波！"希望他们以歌中的含意为宗旨，采取措施，再三敦促出席的内阁及统帅部的首脑深深反省。但是，御前会议仍无视天皇意见及通过的限期决议，着手对英美诸国备战，当然若日美谈判成功则立刻停止。此次会议的内容被泄漏出去，驻东京的各国大使馆纷纷将此情况报告本国政府。

十七　近卫内阁的垮台

反待毙论调　九月六日的决定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决策，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国内，又反应到全世界。当时的日

本政府好象一艘名叫"日本丸"的船，自己已把船舵拆除，却又想航行于波涛万丈的大洋，于是便被船上的机器声震动着，盲目地冲入了大洋。

这时又产生一种悲观论调，就是随着日美谈判的困难，海军更强调贫穷的可怕。他们说：日本这样按兵不动，不能从美国和荷兰输入石油，而且国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资输入也不可能了。长此下去，随着时间的消逝，日本的武力日渐萎缩，国民力也更加枯竭，结果只能向英美投降。趁此之际，扭转乾坤，发动进攻，就可夺得南洋的全部资源，把日本需要的资源控制在手，这样又可以长期应战，所以日本必须早日开战。这种见解不仅是海军的主张，也逐渐影响到民间舆论。他们要求日美谈判早日告一段落，即不管成否应立刻决断。在这种气氛中，举行限期谈判，其结果可想而知是必定破裂了。

对这种危险的反待毙的见解，近卫及内阁方面并未采取任何对策，好象已默许似的，听其发展。日美谈判没达成协议时，就这样等待机会，是不能领导国民的。归根到底，想想谈判能否成功，如果不能成功，就诉诸战争，日本的这个政策是以最高形式决定的。同时国内形势也很紧张。日美谈判到规定的期限十月上旬，仍毫无成功的迹象。

军部又进一步强迫内阁，如到十月底再不成功，就必须停止谈判，进入战争状态。内阁督促野村大使提出九月二十七日的新提案，进入最后谈判阶段。丰田外相也接见格鲁大使，提出附有期限的腹案。然而世界形势、美国的态度都已决定，谈判不可能按预想的进行。美国采取了拖延政策，以避免正面的决裂。

日美谈判的最后努力 关于近卫所主张的日美谈判，笔者可断言是遵照天皇的指示始终有诚意的。尽管缔结了三国同盟，又充满信心地打开日英美关系；尽管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决定开战，又期望日美谈判成功；而且，不管天皇怎样不满，仍平心静气地与陆海军妥协做出开战的决定，对这些矛盾如果不仔细检讨当时军阀操纵政治及舆论的状态，只凭常识是不能理解的。可是，近卫厌恶战争，希望日美谈判成功，比任何人都理解天皇的和平思想，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更希望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以强力压制军部。因此，他的随员除陆海军大将外，还准备拉上掌握实力的首脑部即统帅部的两个次长和军务局的两名局长。在外交当局，外务省的首脑部预先定好了随员，由笔者直接协助近卫。

关于近卫与罗斯福的海上会谈，因美国方面提出在会谈前需要达成一致的大纲而中止，但近卫仍热心于日美间继续谈判。近卫和丰田外相想尽办法，最后劝笔者单独赴美，协助野村大使打开僵局，并请格鲁大使代订飞机票。当时笔者提出的先决条件是，日本内部对于谈判的方针必须一致。

军部的强制 军部的态度日渐强硬。统帅部为发动战争正在考虑适当的开战时间。军部认为日美谈判搁浅时，应放弃政治上的措施，马上诉诸战争，为日本考虑应不失时机地开战；如果错失良机，必然导致无可挽回的军事上的失败。杉山参谋总长及东条陆军大臣所指挥的陆军的态度更加强硬，他们认为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表明天皇已经决心开战。

海军主张反待毙说，虽在备战，但并未完成立刻开战

的准备。对英美作战主要是海军，如果海军不决心开战仍是无用的，所以陆军曾质问海军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海军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因为海军虽对此负有责任，但难以回答。日本的南进主要是根据海军的主张进行的，特别是海军赞成三国同盟以来，已把国家引向悬崖断壁。关于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海军虽表同意，但是永野军令部总长和及川海军大臣为首的海军到最后关头却踌躇不敢有所表示，结果竟全部推给近卫去决定。

近卫在苦闷的绝境中对海军说："过去你们以统帅权的独立为理由，不许我干涉海军的事，现在与海军统帅权有重大关系的是否开战的决定，你们又推到我身上，身为首相的我，也不能负此责任。"并批评了海军不负责的态度，他说："作为首相，我希望这时听取海军的意见。"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整个形势已到了不是当事者互相推诿责任，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内阁总辞职 十月十二日近卫官邸举行内阁会议时，仍没达成一致意见。要想日美谈判得到成功，日本必须改变以往的大陆政策，同意从中国撤回全部日军。东条坚决反对全面撤兵，并认为对日美谈判必须马上判断有无成功的希望，故质问丰田外相："十一月上旬前，谈判有没有可能结束?"丰田回答说："如果能从中国撤兵，并缓和我方的态度，谈判的成功并非无望。"近卫也坚持继续谈判的态度，东条又以陆相的身份强硬地主张谈判必须要有期限，并以此判断谈判能否成功。

近卫曾要求与东条个人面谈，希望改变他的意见，但遭到东条的拒绝。东条说："国策已经在上次御前会议中

决定，再也没必要交换意见了。"近卫、丰田鉴于军部的态度，感到谈判在限期前绝无成功的把握。过去曾宣誓愿以死换取谈判成功的近卫到此绝境，决心将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也就此宣告了总辞职。

第八章　大东亚战争

一　战争内阁的成立

近卫辞职的意义　近卫在日美谈判千钧一发之际呈请总辞职，木户内大臣对此非常不满。这好象是“日本丸”这艘船正航行在暴风雨的波浪中，在万分危急时，船长又忽然离去一样。木户认为近卫应当奏请天皇，罢免东条，将真正的责任公布于天下，使国民明了此事的真相。

日本陆海军部的焦躁气氛已到极点，一般舆论也狂热地盲目兴奋。英美的态度反而强硬了。日美谈判除非日本让步，否则毫无成功的希望。问题归根到底仍在于日本是否能根本改变其对外政策。具体地说，就是日本是否能从中国大陆撤退全部日军。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平，必须接受这个条件，否则将此谈判告一段落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从当时日本的国情来看，要想悬崖勒马，必须要有很大的牺牲。近卫内阁末期，因为已经判明陆海军的意图，为了彻底实行他的信念，近卫希望以国民的援助为后盾，不惜流血，以铁石的决心与军部斗争，如能动员全部上层阶级及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是能达到目的的。希望这样做的并非笔者一个人。因为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国家领导者的意向必须非常明了，而陆军绝不能真正反映国民的希望。

虽然近卫内阁已经总辞职，但是包括近卫在内的一批元老，如能仔细分析内外大局，决心维持和平，协力一致，另组一个有力的新内阁，即使国内发生一些混乱，但也许可挽救日本的命运。因为上层人士如能一致遵守天皇的命令，军部也许会稍有顾忌。比如，不顾军部的反对，组织第四次近卫内阁，让支持他的元老入阁，在天皇的周围团结一致，不惜任何牺牲地坚持做下去，也是可行的办法。

近卫遇到这种局面后，竟和一般的政变一样，行不通时即将它抛开，不了了之。日本开国以来，遇到这种危机，就要组织新内阁。在形势变化时，采取的根本措施就是防止发生混乱，因为军部控制了主要政局，支配了满洲事变以来的形势，军部的势力仍压倒一切，而一般国民又抱着战败主义的想法，必然使日本进入亡国的状态。

新内阁的组织方针 当时在日本上层希望开战的人很少，大家都认为如何避免战争的发生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天皇极忧虑的事。主张盲目发动战争的，只有军部的势力。可是重臣们要求压制军部的势力，强行按天皇的意思采取一致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又是不可能的。重臣们对国际形势的知识很浅薄，而且盲目地认为外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稍微玩弄一点儿外交技术就可说服对方，也可能使谈判成功。他们没有考虑到外交不允许不现实。他们在简单地遮住眼，回避现实。

为了压制军部的盲进，重点应放在统制军部上。有人主张，为了统制军部，应由皇族负责组阁。但是，木户内大臣意见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往往皇族内阁不但不能控制军部，反而容易为军部所利用，况且现在皇族中，也找不到这种有魄力的人物。如果皇族被军部利用，皇室将

成为人民的怨府。如果一定要统制军部，那么皇族的力量不足，就会受到军部的反抗，成为内乱反影响皇室。如果皇族有政治野心，又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时，那就更危险了。”重臣们多数认为，这时不如推出一位能控制军部的人较为妥当。

重臣会议　为着推荐新内阁首相，召开了重臣会议。天皇命令将过去曾任过首相的重臣们召集在一起，征求他们的意见，其结果由木户内大臣呈报天皇。

当天参加会议的有曾任首相的清浦伯爵、若槻男爵、冈田海军大将、米内海军大将、阿部陆军大将、广田及林陆军大将等人。木户内大臣及原枢密院长也列席了会议。清浦老伯已经年迈，由护士护理着，但他坚决地出席了会议。平沼男由于被刺负伤，正在疗养未能出席。重臣们应当趁此机会，反省过去政府及统帅部所采取的政策及态度，毫无顾忌地加以批评，将国家重臣们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这也是他们指导政治的唯一好机会。但是，会上有人解释，这次会议不涉及现在政策问题，只限于推荐后任首相，以备天皇咨询，故没讨论日本是否导入战争这样的根本问题。重臣会议并未提到和战问题，只注重如何能控制陆军，集中全力讨论怎样能顺利地组织新内阁。

在重臣会议前，军部主张由东久迩宫组织皇族内阁，东条将此意转给近卫、木户及陆军出身的重臣们。木户认为由军部推荐的皇族内阁是危险的。在会上，陆军虽推东久迩宫组织皇族内阁，但要求并不强烈，而宇垣大将又不能统制军部。结果大家同意木户的意见，交给有统制力的东条陆相负此责任，并劝他遵照天皇的旨意，去推行政策。所以这次重臣会议，既无波澜，也无紧张的议论，仅此一

次会议，就决定东条为新任首相。

天皇陛下召见了东条陆军大臣。作为重臣，他还没有对国家负过这样大的责任。

东条总理大臣 天皇命令东条陆相进行组阁，并面谕东条："新内阁须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返原为白纸，由各方面重新检讨局势，另再决定国策。"又命令："海军大臣必须与陆军合作，不可磨擦。"在这之前，木户内大臣也指责将九月六日战争决心解释为御前会议的决定；为了实现天皇陛下的和平思想，必须取消这个决定。这样，东条得到重新检讨国策的自由，而且也有这个义务。

东条内阁于十月十八日宣布成立。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任首相兼陆相，还暂时兼内政大臣。及川大将推荐刚就任横须贺镇守府长官岛田大将为海相，岛田大将根据敕令特与陆军一起密切合作支持东条内阁。东乡为外相，铃木陆军中将为企划院总裁。任命寺岛海军中将为通信大臣，以与陆军的势力保持均衡。书记官长星野是一位为满洲建国出过力的将领，又是东条任关东军参谋长时期的助手。

现役陆相又兼首相，这是日本史无前例的强有力的陆军内阁。东条大将所指挥的陆军，过去是最强硬地主张战争的。重臣们却幻想这个新内阁运用外交手段促使日美谈判继续进行，并得到成功，这只能是白日做梦。

东条内阁出现的意义 关于日美谈判，从代表陆军的东条陆相的态度来看，不可能继续进行了，而近卫内阁倒台也是为一般人所知的事实。主张继续进行日美谈判的近卫，这次没再出来，而主张结束日美谈判、立即开战的东条陆相反出来组阁，国内外毫无疑问地认为，新内阁就是战争内阁，日本显然要进行战争。

新内阁声明不受以往国策的束缚，重新检讨决定新政策，日美谈判仍继续进行。一般国民对政变的意义不能十分了解，而稍知内情的人也曾经抱几分希望，静待谈判的发展。各国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一致认定东条内阁就是战争内阁，而且美国认为东条发表重新规定国策的声明不过是掩护备战的欺骗手段而已。

笔者赴美协助日美谈判的计划也随着近卫辞职而告中止，于是再度向政府提出辞呈。

二　美国与东亚

美国是怎样的国家　日本以前的谈判对象、将来的战争对手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美联邦共和国是由充满活力的欧洲白人，按照基督教精神，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里经过几个世纪建成的科学文化的国家。很少见如美国这样拥有丰富的土地、自然资源的国家。大自然为最有能力、富于活力的人类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景。文艺复兴后，焕发出自由解放精神的人类，经过一切精神和肉体的考验，征服了广大无边的大自然，创造出了新国家——美国。美国文化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不羁精神为动力，用条顿人的研究思想武装头脑，吸取了拉丁人的敏感性；欧洲科学文化及基督教文明在美国不为过去的习惯所左右，在最活泼新鲜的形式下，在自然的天地中成长起来了。

人类文明在过去的几千年间几经浮沉，而希腊、阿拉伯发端的科学文明以及基督教教义，都促进了人类解放、进化的过程。这些文化传播到美国这片广阔的新天地后，更

迅速地发展起来。征服了大自然，国民生活逐渐接近温饱水准，浑然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今天的美国。一切事物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是自然法则，而判断美国时更应谨防过分夸大其短处。

美国的力量就在于美国人的精神和能力，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创造了今天伟大的美国文化。勿容置疑，二十世纪走在人类前列的是美国。如果从海上进入东部的纽约，或进入西部的圣佛兰西斯科，观看眼前展现的美国的雄姿，就能理解以上所讲的意思。

随着人类的发展，国际关系的领导权曾从罗马帝国转移到英帝国，现在又由英帝国移到美国。

美国的国际实力 美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摆脱了殖民地的性格，在融合了思想的物质的美国精神的指导下，已具备了在国际上领导世界的充足实力。威尔逊总统想通过参加世界战争，建设大美国，以其实力领导世界。然而，美国议会尚未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实力和使命，所以美国实行孤立主义。世界得不到拥有巨大实力的美国的帮助，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

战后采取孤立主义的不只是美国。国际联盟在欧洲的力量不平衡，表面在政治上实行国际主义，但在体现政治与经济方面，各国实际上实行深沟壁垒的孤立主义割据。英国通过《渥太华协定》，树立了经济的帝国主义地位。一九三三年伦敦经济会议想借助美国的协助挽回世界经济败势，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因经济上各国实行狭隘的割据主义，不可能调节国际经济，终于发生了经济恐慌。实行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孤立的政策的美国，首先面临最深刻的世界性的战后经济困难。现在的经济学者一致认为，一

九二九年开始的连续几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因为人类没有能力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的结果。为解救危机，只能统制世界经济，适当安排人类需要的生产；而且，解救危机的捷径是，在国际范围内实行之前，应先在各国内部实行。因此，在美国经过共和党的孤立资本主义时代，为克服经济恐慌，富兰克林·罗斯福统制国际主义的新政出现就是必然的了。随着美国逐渐从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制度向社会统制的资本制度转移，世界的中心也逐渐从英国移到了美国。

罗斯福因实行计划经济的新政获得成功连任总统，美国的经济力由国家组织，国力充实跃进。美国非常自信地进入了从孤立政策转入世界政策的时期。

日本的谈判对象美国当时至少有比日本强十倍的国力，而且美国准备了比英帝国多一倍的实力。用人来比喻，就是处于精力旺盛、充满斗争精神的拳击手这样的状态。

美国的睦邻政策 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但其内容却随着美国国力的扩大而扩大。门罗主义在当初是极端孤立排它的，但随着日益广泛的世界协作的发展，由于国力迅速增强，门罗主义表现为兼有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的保守、强韧性和适应时代进步的实际性。

门罗主义在南北美解放时代意味着排斥欧洲势力，是不许外来干涉的孤立政策。随着美国势力的强大，门罗主义为美国扩张势力所利用（如西班牙战争、加勒比政策、巴拿马问题等），和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共和党所谓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同义语。美国在此政策指导下，飞跃发展，非常自信其国力。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威尔逊总统的

国际主义政策的背景。而与此相反，共和党实行孤立政策。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主党时期，门罗主义迅速转变了方向，变成了科德尔·赫尔所说的睦邻政策。他明确地表示，美国在南北美各地并无帝国主义的野心，美国希望的是南北美各国的和平发展，其目的是达到共同的繁荣与安全。因此，美国给这些国家提供援助；为了确保共同的安全，采取了共同防御外来侵略行为的立场。而多次召开的泛美会议（蒙得维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巴拿马以及哈瓦那——一九四〇年）已成为发展共同防卫的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墨西哥市召开的外长会议上，终于缔结了共同防卫同盟条约。

美国在罗斯福的领导下，通过睦邻政策提高了美国在南北美各国的威信，这和欧洲关系接近的阿根廷多少有些联系。因此，联合这些国家组成国际联合组织中的地方联合组织，在南北美各国间形成了共同的安全感和利害感。这是国际史上的大事件。这完全是美国自信其国力，同时也是感到对共同的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的结果。美国成功的睦邻政策成为将来美国世界政策的基础。

美国的安全感和自卫权思想 由于南北美结合，形成了共同的安全感，所以美国为了保护其安全，无论对欧洲，还是对东亚都更加关心，这当然被解释为门罗主义。美国认为，为了确保其安全，对发生在大西洋及太平洋彼岸的事，就不能漠不关心。

伍德罗·威尔逊解释说："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欧洲大陆的一国势力，伸到大西洋彼岸时，就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罗斯福继承了威尔逊思想，解释这个主义为在具体的大西洋主义下扩大解释门罗主义。大西洋主义就是不许美

国的敌国统治欧洲或非洲的大西洋沿海地区，以及通往大西洋的海道，如北海海口、英法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

美国在太平洋方面的政策一般不包含狭义的门罗主义：对中国在门户开放主义（一八九九年）名义下实行扩张。而且，罗斯福的门户开放主义，也由原来的经济意义转为安全保障的意义，即把其政策扩大为防止破坏中国的独立，以及利用中国和东亚的人力、物力资源进攻美国。罗斯福一九三三年就任总统时，表示不承认满洲事变时所发生的现状变更。

因此，这就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门罗主义也包括了大西洋主义及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世界政策的主体。随着对大西洋及太平洋所谓美国安全感的扩张，美国逐渐取消了孤立思想，比威尔逊计划的国际主义（国际联盟）进了一步，发展成为世界主义（世界国家——国际联合）的思想。

罗斯福所说的美国安全保障的观念已经不是在局部地区，而是与世界的安全保障一致的。罗斯福认为，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兴起，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都是与美国安全感为基础的世界政策不可调和的。为了向美国国民敲响警钟，并预告于世界，采用的办法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罗斯福发表的对日、德隔离演说。按照他的想法，美国的安全感已受到武力的进攻，这如同美国本土被侵犯，当然不是狭义的地理概念，所以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把危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德、日从国际范围内隔离出去。深知美国国力的罗斯福认为，不介入战争的政策是与世界安全感相对立的，因此将美国导入了防御（自卫）战争。

美国的积极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密切注意着欧洲

大陆纳粹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一九三八年就向英国首相张伯伦提议，为了维护和平，在华盛顿召开由美国主持的有关主要国家首脑参加的会议。他计划组织一个世界的和平机构。

罗斯福的世界政策和丘吉尔联系后，迅速、全面地实行了。美国民众坚信这是确保美国安全、维护民主的唯一方法，因此无条件地给予支持。最了解美国国情的丘吉尔，几次渡过大西洋访问华盛顿，成为白宫的客人，竭尽全力唤起美国的世界责任感。没有人象他那样确信，美国必将参加欧洲战争。

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国参战前，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会谈，并发表了所谓《大西洋宪章》，宣告美、英以民主主义的世界政策为基础，同时采取美英联合政策。

如前所述，罗斯福总统在法国投降前，暗示了参战的决心，保障给法国最大的援助；对已经表示战斗到底的英国也立刻给予不少援助，制定了《租借法》（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作为租借军事基地的补偿。一九四一年四月向英赠送了驱逐舰，更在同年十一月向美国海军发出命令，护送运输军需援助物资的商船，对阻碍运输的德、意海空军给予打击，这实际是没有宣战就参加了战争。宣战是唯有议会掌握的权力。这些行动被说成是为保卫美国的安全感而行使的自卫权。

美国的东亚政策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为对抗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而一直实行的海翰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这是在东方半殖民地插入列强殖民地的政策。因此，随着具有消极意义的门罗主义时代转变为美国在东亚的积极政策，美国也常常高唱反对列强势力扩张的高调，表示

同情民族解放运动。

日本防御俄国进入满洲时期，美国是同情日本的。可是，日本转为对中国的积极政策后，美国的政策则变成严格防止日本的“侵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以中国的自由解放为目的，同情革命分子。美国的国体使之不能忽视大众的主张。这与动辄只顾眼前利益、偏重于一党一派的日本的对华政策根本不同。

英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是在中国的最大权益国，在东亚有长久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日本成为强国而侵入的时候，英国便与日本共同确保其地位，这就是日英同盟时代。日英同盟使英国获得了莫大的权益，日本也取得了侵入中国的便利，美国对此很反感。

日英同盟在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为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体制所代替。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的政策是美国第一主义，在东亚则意味着从与日本合作变为与美国合作。日英同盟被拆散，英美在中国实行了共同政策。

满洲事变以来，美国提倡不承认现状变更的史汀生主义，援助中国，公开表示反对日本的立场。这种倾向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入而日益严重，终于废除了通商条约，实行了冻结令。美国对东亚的政策，通过日美谈判并没有一点缓和。

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的世界政策以充实的国力为后盾，去实现美国的国际理想；在东西两方面，与英、法、荷等西欧诸国联系，明确地断定轴心国为侵略者，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侵略者，固然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

随着日本的南进，A、B、C、D诸国紧缩了对日本

的包围态势，使日本只能表示和战之意，不能有别的举动。

三　对美开战

东条内阁与日美谈判　世界已预示着太平洋将发生风暴。美国舰队集结在珍珠港，英国及荷兰也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东条内阁以日美谈判为中心，为了重新检讨御前会议的重要决定，日以继夜地召开统帅部和内阁的大本营联席会议。

日美谈判已移交给东乡外相，政府又拟了A、B两个方案，准备向美国政府提出，这是十一月五日的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会议还限谈判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结束。为了协助野村大使谈判，外相特派前驻德大使来栖赴美，利用前内阁末期格鲁大使代笔者所保存的飞机票，从香港立刻乘飞机到美国。在华盛顿的谈判，以后由野村、来栖两大使进行。

如果日本的态度不根本改变，谈判就没有好转的希望。

穷途末路　作为美国世界政策一环的东亚政策是与日本军部外交不可调和的。日美谈判，从一九四一年九月赫尔国务卿提示的日美民间有志者所拟定的方案开始，越谈判感情越疏远。日本政府几次提出新方案，情况仍然如此。美国的态度一直没与日本接近，双方的想法根本不同。当时，美国获得了日本电报密码的译法，所以国务卿在与日本大使谈判以前，已经知道了日本的意图并准备了对策。

日本战争狂潮日益高涨，连当初一度不赞成开战的永野军令部总长也变了主张。最初他说战争不可能进行一年

半以上。后来又说就是打一年半也不要紧，最后竟说战争一开始就可以占领南洋、印尼，获得了石油和其它资源，即使打长期战争，也不用担心了。

作为岛国的日本参战，完全要看是否有制海权，才能决定胜负，至于是否开战则要看海军的估计和决心如何。海军强硬论占上风，认为与其坐等投降，不如南进获得资源，孤注一掷争取胜利。海军的意见占有优势，而国内没有能反对它的力量。早已决心开战的陆军，对海军的新决定更加欢迎。

于是关于日美谈判规定了我方让步的限度。军队非常自信，认为没必要改变我们的计划而妥协。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后提案的同时，东条首相、东乡外相都表示了让步的限度，态度十分强硬。

最后的谈判 东条内阁组成后，在联席会议上拟定了A、B两个提案，作为对美谈判的新提案。A案是根据过去的谈判，规定了日本新的最后的妥协案；B案是如果A案不能达成妥协时，日方愿将在越南南部的军队撤回越南北部，美国须放弃援助中国，收回冻结令，缓和紧张空气，重新开始谈判的方案。野村大使按照命令，先将A案交给美国政府。

东条内阁采取限期谈判的方针，再三催促美国政府对我方的新提案给予答复。野村、来栖两大使为使谈判在限期内早日得到结论，于十一月二十日将B案也交给美国政府，尽全力进行谈判。而东乡外相的指示电报，却告诉他们不要过于妥协。东条的强硬态度立刻反映到美国，因为已将日本密码破译出来，所以赫尔国务卿已知道日本政府的真正态度，对两大使的提案不再相信。美国政府对野村

大使最后提案中的有关三国同盟问题、从中国撤兵问题、南方问题以及经济问题，不但没做任何让步，反而依照实际政策更加强硬。另外，特派来的来栖大使没有携带任何新提案，仅仅是为了参加谈判，美国政府对来栖大使的使命很怀疑，不仅未相信他的说明，反而增加了疑心。（参看赫尔国务卿著书一〇六四页）

赫尔国务卿召请中、英、法、荷等与九国条约有关国家的代表，讨论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与日本的焦躁气氛一样，在美国很多人主张，让日本表明和战态度的时机到了。换句话说，美国应放弃拖延政策，设法判明日本的友敌之分。

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将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交给野村、来栖大使。这是综合了美国及其它友好国家的意见的对日本的答复，态度比以前强硬。在美国政府内部，应军部要求，赫尔国务卿也曾提出内容比较缓和的暂时协定，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再准备一个正式方案，但最后根据中国（蒋介石）和英国的意见，提出了这个强硬内容的答复，与日本摊牌了。总而言之。这个答复就是要求恢复到满洲事变以前的状态，不但要从中国本土撤兵，而且要从东北撤兵。美国总统、国务卿都预料到日本不但不会接受这个条件，而且必然要采取军事行动。

决裂前夜　日美谈判的主要妥协点就是承认“满洲国”问题。日本是以此作为最低收获物来进行谈判的。从满洲撤兵，就意味着“满洲国”的解体。东条内阁的态度已在十一月十五日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了。日本认为美国的新提案，是明知日本不会接受而强迫日本的最后通牒。

日美谈判果然面临最终的危局。根据美国政府所发表

的官方声明，美国政府已预想到，这个答复到了最后阶段，日方不会接受，所以命令太平洋各地的陆海军采取了紧急警戒措施。丘吉尔也鼓励美国，如果日美开战，英国必在一小时内参战。日本方面，统帅部、政府也都暗暗地下了决心。

本来日美谈判一开始，双方就产生了根本的误解，这个误解始终没有机会解释。谈判也由一些不明日本意思的人负责，结果越发复杂化，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日美间最初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美国确立了援助英国、打倒纳粹德国的基本政策，因此决心不可避免地参加欧洲战争。但是，如果日本能结束因三国同盟产生的与德国的关系，改变对英美协调政策的态度，有意从中国大陆及南方撤兵，那么美国也打算在满洲问题上做些让步，与日本妥协，但美国不想牺牲在历来主义上所采取的政策。因此，美国的态度随着谈判的进行、苏联态度的明朗，更加强化。日本方面谈判代表的善意和热诚不容怀疑，但是左右日本政策的军部，和这些持和平主义的人见解不同，他们对于自己树立的积极政策下的预期活动，没有丝毫改变。美国为完成对抗日本军部计划的准备，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日本军部正焦急地等着谈判结束后，立刻采取行动的机会。日美谈判从开始就集中了矛盾和混乱。

外务大臣的说明 这时，日本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马上采取战争行动，一是暂时停止谈判，以观世界形势的发展。笔者当时不可能知道东条内阁的谈判经过和联席会议的决定，但是始终相信日本只要不介入战争，未来的道路是宽广的。因此，笔者认为即便到最后时刻，也要努力阻止日本卷入自毁的战争。经过深思熟虑，在东条内阁

成立后，就访问了外务省。当时东乡外相不在，所以和西次官进行了面谈。我说："我今天来，并非想知道日美谈判的秘密。外务省即使撤换几位大臣，也不是说这时就不负战争责任。当然，我们正面临困难局面，外务大臣很辛苦，请把我的意思无误地转达给大臣。"如果外务大臣辞职，陆军大臣、总理大臣又要兼外务大臣，这样就可以实行其主张。但是，笔者认为外务大臣的强硬态度必将使日本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不久，东乡外相想调笔者任驻华大使，在面谈时笔者问东乡："外相为什么赞成开战？"外相说："从军部及企划院提供的统计数字来看，日本必胜，所以自己不可能反驳，而且也没有反对的余地。"又说明了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的情况。笔者批评说："是否开战，不是统计数字的问题，而是最高政治问题。"这次面谈时，日本海军在珍珠港、马来海上取得了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绩，举国沉醉于战争胜利的气氛中。当时日本上下一致按宣战诏书的精神，为进行战争付出最大的努力，已经到了要做出最大牺牲的时候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回答的备忘录，正象预想的一样，使日本决定了其态度。这样，以前海军内部的一批犹豫分子、政府其它方面的反对人士都一致赞成开战。他们认为日本没得到所提出的要求。疲乏的舆论也兴奋起来了。十二月一日，御前会议审议了对英、美、荷开战方案，终于做出了开战的决定。

出动舰队和最后通告　军部已开始行动，命令舰队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向千岛集结。日本决定的程序是：在今后的谈判中"如果美国仍不反省，判断搁浅，十二月X

日限期开战，立即进攻敌人。”我方舰队接受了秘密命令出发了，但决定若在X日以前谈判成功，舰队就立刻撤回。所以，以X日为期限，野村、来栖两大使按照政府的命令，在华盛顿拜访赫尔国务卿，准备在舰队进攻前结束谈判。

外务省认为必须根据哈古条约的精神，事先发布战争行为的通告，统帅部、政府都认为应这样。但是，海军希望通告与攻击的时间尽可能缩短，以便收到更大的奇袭效果。通告的时间，本来交由统帅部及外务大臣商定，但是因海军军令部强烈要求，决定谈判结束的通告应该缩短到开始进攻前三十分钟以内。关于进行通告的训令电报，前一天由外务省拍给驻美大使馆，其内容只指示结束谈判，而最重要的部分最后再电示。美国已经将日本政府的重要密码内容全都译了出来，事先已知道。日本政府又命令野村、来栖两大使，与赫尔国务卿约定在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时举行重要会谈。

重臣会议　一切都在秘密中迅速进行。首先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召开重臣会议。政府对重臣们报告了一般形势和日美谈判的内容。当时，只有若槻男爵表示对经济方面比较忧虑，此外并未提出别的问题。后来，天皇又在首相陪伴下征询了他们的意见。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竟无人反对战争，或对国家前途有所表示。当时，舆论哗然，有识之士对和战的形势表示忧虑。政府将重臣们召到宫中，向他们说明国家面临的内外形势，以后天皇又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是亘古未有之事。为什么要召开这种例外的集会，是天皇想听取重臣们的意见吗？笔者相信重臣们都知道其意义所在。在国家危难之际，最高主权者天皇虽然给了他们直接发表意见的好机

会，重臣们如果反对战争(内心里是反战的)，为什么又不敢大胆地将意见说出呢？重臣的态度恐怕是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听其自然吧。也可能是被民间对军部发生的败战主义的空气所支配。在这以前高松宫曾对天皇说："在最后的阶段，海军尚无把握，是反对开战的。"天皇听后，立刻召见岛田海相及永野军令部总长，询问海军的真意。两人回答说："海军对于开战的决心及战胜的信念，和联席会议上所决定的一样。"一切按联席会议上的决定进行。十二月一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完成了一切手续，又批准了开战诏书。

突袭 十二月八日黎明前，东京的电话更加繁忙。消息灵通人士早将袭击珍珠港取得大胜的消息告诉了亲友。不久，电台播送了日本对英美开战的消息及诏书。人民听到了突袭的好消息，似乎放了心，也感到一点安慰。这种感情，与其说是听到突袭成功而高兴，不如说是长期笼罩在阴惨的战争气氛下的人们得到了一种解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是软弱的日本人的感情。当然没时间思考它意味着什么了。

格鲁大使在十二月七日开战前夕收到了罗斯福总统致天皇要求维持和平的电报，马上与东乡外相协商办法。可是，一切都晚了。外相半夜入宫，向天皇呈上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可是，那时珍珠港已经开战了。后来在东京军事法庭才搞清，因为开战急迫，对于派送英美大使馆的电报事当时是故意积压。就是罗斯福的亲电，虽然事先已由新闻电报报导了出来，但遵照参谋本部官员的指示也是特别迟送给美国大使馆的。

东乡外相估计野村、来栖两大使向赫尔国务卿进行结束谈判的通告已到了预定时间，就在十二月八日黎明要求

接见格鲁大使，将在华盛顿通告谈判结束的公函副本交给格鲁大使。格鲁大使以为这是对罗斯福的回电便拿了回去。这时美国大使还不知开战的事实。他回到美国大使馆时，已被断绝了电话等一切外界联系。

最后的通告 不幸的是在华盛顿谈判结束的通告比预计时间晚。电报文书的草稿已写好，但因为没时间，还没来得及誊写清楚。野村、来栖大使会见赫尔国务卿的时间，超过预定的一小时以上(到下午二时二十分)。这种重要事情出现差错，是玷污外务省传统的恨事。但拍给大使馆的日本政府的电报已全被破译，所以赫尔国务卿已知道两位大使来访的目的。在会见前，赫尔国务卿从白宫的电话中已知道珍珠港发生了什么事。两位大使被满脸怒气的赫尔国务卿以极其冷淡的态度接待了。国务卿说："听了两大使的来访目的，这是我五十年生涯中，从未见到过的虚伪无信的行为。"随后指指房门。两大使表情非常紧张，辞别了国务卿，回到日本大使馆后方知开战之事。

大东亚战争 以前发生的事是事变，而现在日本公布了宣战诏书，这才是正式的开战。战争由海军偷袭珍珠港开始。海军曾提议把这次战争叫作太平洋战争，可是陆军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经过这次战争，可以获得三国同盟所规定在大东亚方面的指导地位，主张这次战争定名为大东亚战争为宜。结果定名为大东亚战争。

海军、陆军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战争。然而这次战争对日本来说，既不单纯是太平洋战争，也不单纯是大东亚战争。日本已真正卷入世界大战的波涛中，无论大东亚战争、欧洲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都不是个别的战争，而是一个有密切联系的世界战争；而日本竟用狭隘的观念

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根本就不清楚这次战争的性质。这些忽视世界局势的日本领导者们的愚笨的见解，是误国的一个根本因素。

德、意两国根据三国同盟的友谊立即对美国宣战，和日本处于同一战线。

欢迎德苏开战的丘吉尔首相得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电报后，知道胜利在握，大喊："这样我们就能完全取得胜利了。"因为英国从此可以公开地将美国的精神的及物质的实力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四　日本与战争(一)

根本的错误与不统一　现在笔者应该谈谈第二次大战中日本战败的冷酷历史。日本战败是过去十多年政治紊乱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作为国家还是个人，不时刻自我反省自以为是，就象把眼睛蒙上向前乱跑一样。作为国家，为了在当今国际生存竞争中完全生存下去，没有大智是不行的。对整个世界形势进行错误的判断，必然误国。日本不但对大局没有正确认识，而且他们的焦躁感情更助长了失败。政策的失败，必导致作战的失败。战时日本人的心理也起了很大作用。玉碎常伴随着感激，但是坚忍、睿智更为珍贵。

欧洲战争开始后，因为缔结了三国同盟而卷入战争，在德苏战争尚未揭晓时，又冒险南进；欧洲战争大势已定，但硬要将两大强国作为敌人，卷入世界大战，这岂不是自取灭亡？

在这次战争中，日本的内外指挥不统一，又错误地估

计了物质力量，这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日本领导者在这次战争中，完全暴露出他们缺乏冷静的科学的检讨。

东条大将的感慨 东条大将在巢鸭监狱曾与笔者谈论战败的原因，他感慨地说："与一国命运休戚相关的首相，竟无权过问军队的指挥，这样的国家能取胜吗？统帅部又分为陆军和海军，各自为政，很难合作。中途岛的失败，在一个月后才通知我，而且始终不知道详细情况。这样，直到最后仍没实现作战上的完全统一。"东条一向沉默寡言，竟说出这种话，其他人可想而知。东条最初任陆相，后又任首相兼陆相，领导战争，最后又亲自兼任参谋总长，企图控制政权和统帅权，集权力于一身。他在被处死前说的这些话，我想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根据他在狱中对笔者的说明，还有东京军事法庭上的资料，来看看日本军部的一般作战计划。

作战的基本计划 军部的作战计划是：认为德国的胜利已是既定的事实，日本参战更能促进共同的胜利，也可以取得战后有利的地位。尽管三国同盟缔结以来，客观的情势已发生变化，但日本仍未改变其方针。把苏联拉入三国同盟的计划已成泡影，德苏战争已经爆发，而日本军部仍希望德国攻破苏联，从高加索经伊朗向印度洋南侵。按照这种希望，拟定了军部作战计划。日本军部以瓦解大英帝国为目标，开战后就占领了英国在东南亚的根据地新加坡，海军进兵印度洋，希望与从北非及中亚东进而后又南下的德军会师，实现日、德两国的共同作战，企图确保最后的胜利。军部的这种想法，是相信德国有压倒的实力，始终为德国的宣传所迷惑。

海军的作战 海军认为，这次战争是太平洋战争，其

作战本来是以美国一国的海军为目标。对美作战本来是渡洋作战，作战的中心则是破坏美国的渡洋舰队。美国的渡洋作战，是先利用菲律宾抵抗日军，等候美国舰队输送大批援军，以圆形阵式横跨太平洋而来。这样先解菲律宾之围，然后转为进攻日本。从美国的常识来看，它一定采取这种作战方式。所以，日本海军作战的中心应是如何能破坏美国的渡洋舰队。日本在菲律宾与美国之间，拥有很多群岛(小笠原群岛及委任统治地域)，纵断太平洋为南北两部分。小笠原、马立亚纳、加罗林三群岛连着东京湾的南方，经俾斯麦群岛，与新不列颠岛及东部新几内亚岛相接，是西太平洋上理想的堡垒。美国渡洋舰队必须首先突破这些防线，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是利用这些小岛，击破美国舰队。

可是，这个作战计划只是以美国一国为对象，除美国之外，英国及其它国家都成了敌人，战线扩大到从南北太平洋到印度洋，还有空军参战的海上立体战，于是日本海军被包围了。所以必须将英、美两大海军中的一个早日给予打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除此以外，无法抵抗敌人的优势，于是采取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本来美国间谍早将日本海军的密码获悉，并做了战争准备。虽然是偷袭，但大军远行进攻，是非常冒险的。由于敌人的疏忽和我们的幸运，经过周密的计划与长期的训练，偷袭珍珠港收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功。

珍珠港的进攻使美国人愤怒了，举国卷入战争狂潮之中。美国及各国观察评论家都在说"不能忘记珍珠港"这句口号，结果美国获得了对日战争的胜利。如果日本海军不进攻珍珠港，其行动只限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方作战，

按原计划等待美国舰队渡洋，再对其进攻，始终坚持大东亚战争的意义，政略战略达到一致，美国舆论的影响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海军在战略上也许会是有利的。可是，如果不突袭珍珠港，对日本来说，至少在当时，战争一定会更困难。

总之，进攻珍珠港的成功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懑，日本因胜利而松懈则是日本海军失败的开始。

广大的地域 陆军认为这次战争不是太平洋战争，而是大东亚战争。战争的重点是尽可能迅速地与德国武力会师，使大英帝国屈服。陆军重点对英作战，而海军重点放在对美作战，陆、海军的观点是根本矛盾的。从一般的观点来看，海军和陆军的作战并无多大差异。海军最初主张，尽管进攻的主力指向印度洋方面，但为保护其侧翼，有必要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致命的打击。但是，袭击珍珠港取得重大成功，南方作战不断胜利，海军自夸为无敌舰队，将战线逐渐扩大，极端派竟主张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占领夏威夷群岛，最后扩展到南太平洋。而陆军希望将主力集中在东南亚。双方的意见的不同，使作战更难调和。结果都各依自己的意见去作战，把作战区域扩展到最大限度。

他们忽视了空间与时间，作战计划成为地图上的空想，连物质上的实力也来不及计算了。在这样广大的远洋上作战，后方的联络与补给是基本的条件。日本海军竟认为，有把握在西太平洋上与世界两大海空国家争取制海权及制空权。这实为历史上的奇事。

开战初期，日本海军所保持的制海及制空权，随着战争的进行，也逐渐被英美夺回去。无论在太平洋上各大小岛或东南亚方面的日本远征军，都进入了自杀式的战斗，最后连日本全国也都面对着自杀战的命运。

日本军队善战，在战斗中没人玷污日军的声誉，在各处的"玉碎战"向世界表明了日本精神是什么。国民从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的公报中得知，在阿留申群岛的孤岛阿图岛上，山崎部队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赞扬士兵的悲壮及勇敢的牺牲并给予无限的感谢和同情，但是这些悲壮的"玉碎战"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作用。

"玉碎战"的概况　开战初期，敌人还未完成准备的时候，日军已投入积极作战。突然袭击经常是日军的信条，也是他们的得意之作。不到一年，在南方各处，日军完成了预期的进攻。在进攻作战中，陆海军都很出色，令世人惊骇。尤其是海军所属的空军精锐无比，在南方的陆军的密林作战则可以说是日本军队独有的。出现了陆海军竞赛的伟烈局面。由于初期的成功，在西太平洋方面、南方一带及东南亚方面，日军所到之处，扩大了占领区，到处进行最大限度的战术及政略上的防卫。

向这样庞大、与世隔绝的地区的远征军，提供海上补给，恐怕就是调集当时日本的所有船只也决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制海权或制空权，各远征军就会孤立，只能陷入被敌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命运。初战成功不到一年，形势逆转，制空权、制海权都丢失了，实际上我们的远征军在各地都陷于孤立的命运。

五　日本与战争（二）

初战告捷　战争是将十二月八日为X日在各方面一齐开始的。南云中将率领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舰队从千岛南下，为粉碎美国太平洋舰队偷袭了珍珠港，击溃了美国的

太平洋舰队。日美战争正式爆发了。这个报导犹如晴天霹雳，由电波传遍世界。多少人以认为应该来的事终于来了的心情看待它。

日本舰队偷袭珍珠港取得巨大的成功，集中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覆灭，这是日本海军平素艰苦训练的结果。

南方新加坡是日军进攻的目标。因为有必要将泰国拉入日本一方，所以同时开始与泰国进行外交谈判，强迫该国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在越南等待时机的日军，一部进入泰国，一部在海军的保护下，在英属马来半岛北部新高打登陆，沿马来半岛南下进攻新加坡。山下将军指挥南方军，另一路军以台湾为基地南下。山间中将率领的进攻菲律宾的部队在菲律宾的林加延登陆。

尽管战前被派遣到新加坡的英国政府长官国务相达夫·库巴曾口出狂言，但是日本迅雷不及掩耳地进行了攻占马来的作战。日本的海空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伟业。开战后数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此会谈并发表《大西洋宪章》的"威尔士号"战舰，也是英国海军吹嘘的世界最大的不沉战斗舰，和"雷巴尔斯号"一起为阻拦日军在宋卡方面的登陆作战，从新加坡出发，在北上途中，遭驻守在越南南部的日本海空军的飞行队袭击，两艘巨舰沉没，英国东洋舰队司令长官菲力蒲司令阵亡。一般人认为日本海军真是无敌于天下，国民的士气日益高涨。

山下将军的远征军仅在两个月内就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攻占了新加坡。海陆军都以此地为中心，伸展到荷属东印度各岛及南方一带。由于周密果敢的作战，战胜了敌人的抵抗，三月八日占领仰光，三月九日征服爪哇，三

月二十三日占领安达曼，一月三日占领马尼拉，四月四日占领科雷希多。海军又击沉了进入印度洋的敌舰，炮击了马达加斯加岛的敌海军设施，突袭了南太平洋的澳洲。

占领菲律宾不象预想的那么快，因为美军为扼守马尼拉湾的巴丹半岛和科来西特尔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所以攻陷马尼拉的战斗超出了预计的时间和兵力。麦克阿瑟最高指挥官和全家一起乘小船脱离了险境，他临走时说："我还会再回来。"他逃到了澳洲，图谋再起。

大东亚共荣圈的实现和狂妄自大 日本陆海军共同迅速地占领了南洋全域，即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西伯里、苏门答腊、新几内亚西部、帝汶岛等岛；在西边则进入缅甸，一直伸展到安达曼群岛及尼古巴群岛等地；在太平洋方面占领了中途岛与关岛之间的威克岛。

海军在太平洋上的阵势是以亚洲大陆周围的琉球、台湾、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为第一线，以东京湾的小笠原、马立亚纳、加罗林群岛、俾斯麦、新不列颠、新几内亚东部为第二线，而且攻占了其前哨威克岛、马绍尔、吉尔伯特、所罗门诸岛，将澳洲北方的各岛全部置于其统治之下。日本海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在敌人未准备期间，最大限度地扩张其势力。

为避免苏门答腊及婆罗洲的石油资源被破坏，日本第一批空降部队在巴邻邦降落。为开采石油，将内地的重要设备、技师运到该地。

由于占领了南洋全部，达到了预定的开战后的第一个目的，而且获得了重要的资源，所以日本开始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以随时将长期战争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控制在手。军部以为如果能保持运用现有的战果，战争必

能获胜无疑，这决不是空想，甚至德国也羡慕日本的成功。军部自喜其作战成果，态度更加蛮横，海军方面负责宣传的平出上校曾声称："在华盛顿白宫签订城下之盟，"得到了日人的欢呼。初战的军事成功使一般国民错认为大东亚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更加轻浮乐观，已不可能正确认识世界战争。日本人的欢乐与美国国内的"不忘珍珠港"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

珊瑚海海战　南太平洋的作战从新不列颠岛伸展到所罗门群岛东南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如果再进一步攻占法属新赫里布里底群岛及新喀里多尼亚岛，就可威胁澳洲与美国的海上联络。为了保护这些前进基地，从帝汶岛渡海，直捣澳洲北部的军港达尔文，必须先攻占澳领东部新几内亚(即巴布亚)。即以此为基地，先攻占澳洲北部，再从澳洲方面防止敌人的北上反击。二月十九日，日本舰队曾空袭军港达尔文，港内的船舶受到致命的损害，军港也没法使用。日军进攻新几内亚东南部、澳属巴布亚的首都莫尔兹比，从海上突破比较便利。日本海军计划与满载陆军的运输船一起，从拉沃尔迂回到新几内亚的东端，进入珊瑚海，从海上袭击莫尔兹比港，但是却被美国航空母舰所阻截。

日本在莫尔兹比港登陆作战被阻止，美国菲基少将所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与日本原忠一少将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遭遇而交战。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美国主力航空母舰"力基希顿号"被击沉；"尧克顿号"受伤，从珊瑚海逃到珍珠港急修，参加了六月五日的中途岛海战。但是，日本损失也很大，放弃了从海上攻击莫尔兹比的计划。后来又制定了从陆上占领莫尔兹比的计划，但终于失败了。因此，不但进攻澳洲北部的计划不能实现，而且进攻所罗门

方面的日军后方联络，也由于美国舰队的积极作战而非常困难。珊瑚海一战日本勉强取胜，但是在整个战略上，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已完全被美国封锁，而且在瓜达尔卡纳尔一带的战斗中日本受到了更大的打击。珊瑚海战和中途岛作战是日本海军最后的两次积极战争。

海军的第二期作战 为了挽救初战的失败，英美两国积极地备战了。在澳洲对日军进攻的准备是与美国合作进行的。美国西部海岸各港是麦克阿瑟元帅在澳洲组织训练的澳洲军及美军的补给基地。

日本海军粉碎美国太平洋舰队后，为防备美澳军的反击。不得不考虑扩大太平洋作战，向澳洲的南太平洋作战，所以必须切断美国对澳洲的补给线。为达到此目的，海军计划进行第二期作战。

中途岛的战败 美国空军已经预料到日军一定要进攻中途岛，所以严阵以待。日本派拥有航空母舰、刚从印度调回的南云舰队为前哨，山本司令官率领大批舰队和载有陆军一个旅团的运输船一起公开进攻中途岛。当时美国空军已从夏威夷迁驻该地，大批美国航空母舰也集中在附近。

美国舰队的空军在正确地探测出日本舰队接近以后，先发制人，利用日本飞机空袭中途岛的时间，从美国数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大批飞机，从四面八方袭击日本舰队。日本舰队立即应战，当准备从轰击陆上目标转为海上作战时，遭到了敌飞机的袭击。敌机突破了日军的炮火，向满载飞机的日本航空母舰投下大量炸弹，舰上所载的军需物资立即发生爆炸，这仅是几分钟的事。山本长官鉴于这种情形，只好放弃了进攻，将混乱的舰队带回日本。日本的航空母舰也一一沉没。当时美国雷达已发现飞往中途岛的日机，

所以美国飞机已全部飞离机场。日机毫无所获，待飞回到大海时，才知母舰已经沉没。这次海战，日本海军全部优秀的航空母舰(最优秀的四艘)和受过长期训练的空军几乎全被葬身于海中(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舰长也多与舰艇遭同样命运。南云司令虽被救，但以后在塞班战死。美国经此一役，报了珍珠港的旧仇。

中途岛海战实际打破了日美海军的均衡。随着我们在海上的不断失败，太平洋的制海空权很快都被美军夺了回去。中途岛海战实际是日美战争胜负的转折点。美国的士气由此提高。美国利用其巨大的工业生产力，迅速增加军备，积极训练军队，尤其惊人的是技术机械方面的进步使战斗力更增强。日美双方的实力悬殊增大，日本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中途岛日本海军的失败对于整个作战的指挥影响极大。海军事后并未将真相告诉国民和内阁，即使海军部内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对于返日的士兵，也严令其必须缄默，不准将此事告诉国民。

日军不许军队战败，即使战败也不准承认失败。对中途岛海战，海军竟发表消息说，这次战斗给敌人很大的打击。明明是事实却不承认，明明失败而不承认失败，这是日本军的最大弱点，是日本陆海军共同的封建思想之一。这并不是真正强者的态度。这种态度直到日本战败仍未改变。

第二期作战攻击阿留申群岛虽然成功，占领了基斯卡、阿兹等地，但由于中途岛的战败，只好放弃了南方的斐济岛及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为了确保前进基地，在与世隔绝的所罗门海空一带与美国海空军展开了不利的消耗战。日本的补给十分困难，海军实力逐渐消耗。以特鲁克为基

地的山本司令长官在前去督战的时候，在布格威上空遭到美机的袭击而战死。事后才知道美国间谍早已获悉山本司令长官的行动。

东条大将在中途岛战败后一个多月仍不知真实情况，事后他感慨地说："当时日本应变更根本的作战计划，可是已指挥不了海军的行动了。"由于中途岛战败，日本海军不仅丧失了主力，而且不能重建其战线，却仍贪恋所罗门群岛一带。这时不少人主张，日本应毫不迟疑地从占领一年多的阿里亚纳、加罗林、拉布尔一线退却，由此获得重建并巩固新防线的时间；应认真研究中途岛战败的教训，保持住新防线。决定日本命运的中途岛海战，是日美开战后仅仅半年发生的。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消耗战　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给日本海军巨大打击，从珍珠港以来的劣势中恢复起来，充实了国内的战备，显示出在海上特别是在空中的优势。日美两军在太平洋的均衡被打破后，势力差距迅速增大。日本海军所轻视的美国潜艇在各地区威胁着日本广大的海上补给线，以后连东京湾附近也感到危险了：在横须贺军港建造的最大最新的航空母舰信浓号（七万二千吨）下水后想驶往吴港，刚出东京湾就被击沉。日本逐渐地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

美国端纳司令所率领的反攻瓜达尔卡纳尔的两栖作战部队与日本陆军的战斗极为悲壮。为掩护作战，日美海军在加罗林、俾斯麦、马绍尔、吉尔巴特群岛等西太平洋中部一带，展开了大规模海战，真是席卷太平洋的战争。笔者称之为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海战中，日本舰队与势均力敌的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其中有许多永载海战史册

的事迹。但是由于日美的国力悬殊，美国有强大的军需工业生产力和飞速发展的科学，使日本在太平洋的长期消耗战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

瓜达尔卡纳尔是日军威胁美国本土与澳洲及新西兰联络补给线的最前锋要冲，所以美军的反攻首先要夺回该地。日本陆军尚能作战，可是海军已逐渐丧失了制空、制海权。由于美国潜艇的攻击，日军补给几乎断绝。日军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撤退，数月后布格威鲁群岛也陷于同样的命运。士兵忍受着极端的困苦，粮食只能供应一半，靠农耕自给。日军的殊死战斗是勇敢而悲壮的。这种自灭性的战争，以后更加凄惨。日美陆海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到布格威鲁，经过了几个月的殊死消耗战，这真正是日美的决战。日本海军从此将海空军的重要力量消耗殆尽，以后日美失去了战斗力的均衡，制海权、制空权完全归于敌手，大批日援军葬身海底，各地日军以草根、树皮甚至蛇鼠为食，饿死了许多人。

美军夺取瓜达尔卡纳尔成功后，利用空军优势及海军的掩护，以大批两栖作战部队，采用“跳岛战术”，逐岛进攻，由布格威鲁、新不列颠、新几内亚、菲律宾陆续北上。这支由麦克阿瑟统帅的大军，是他从马尼拉战败后，在澳洲费一年时间所训练成的结晶。

在日军放弃太平洋的最前线瓜达尔卡纳尔的时候，德国的南方最前线的隆美尔大军也从北非退败，还有进攻苏联的作战亦因苏军夺回斯大林格勒（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而形势大变。一九四三年初期，轴心国的战势无论在东方或西欧都恶化了，日军所期待的在印度洋上与德意军会师已成泡影，于是开始筹划如何将扩大的战线缩小整理，但对

在战术上只知进不知退的日军来说缩小战线极不顺利。

六　德国和战争

对苏战争的失败　在欧洲一九四一年是德国进攻苏联的一年。

据德国说，如果能将集结在国境线的一百数十个师的苏军击破，以后就如入无人之境，苏联问题不出三个月就可解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莫洛托夫访德以来，德苏关系日益恶化，希特勒发现苏联是德国最危险的敌人，立刻调动军队，军部也认为这是处理苏联的极好时机，遂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非常秘密地发布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作战计划的第二十一号命令。命令说，"虽然对英法作战尚未结束，军队要立即发动对苏作战，一举消灭苏联"，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前，必须完成准备。这样，德国从对英作战(海狮计划)就转到了对苏作战(巴巴罗沙计划)。

德军遵照希特勒的命令，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潮水般地涌进苏联，但是遭到了苏联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后方的游击战更令人头痛，德国的军事行动未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北路军队逼近列宁格勒，一直度过冬天。中路进攻莫斯科。苏联政府十月迁到古比雪夫，但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的铁路联系却没被割断。就这样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了冬季。

在对苏作战上，德国军部与希特勒之间在战略上存在着很大分歧。总司令官布劳赫齐主张调隆特许铁特的进攻乌克兰的部队，协助中路保库的部队，消灭莫斯科附近的苏联总预备军，再破坏其野战军。但是，希特勒从政治观点

出发，坚持进攻乌克兰，就罢免了布劳赫齐的职务，自己掌握指挥大权，哈尔达将军仍任参谋总长。一九四一年雨季甚长，乌克兰的进攻毫无进展。

"冬将军"曾使拿破仑败退，现在希特勒又重蹈复辙。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是数十年来没有过的寒冷天气，对过冬没有充分准备的德军遇到了空前的苦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经过冬季作战训练的苏军的反击和后方的游击战，使德军牺牲很大。一九四一年对苏战争毫无进展，表明德国东部战线的失败，终于导致战败的命运。

对苏战争与日本 德国的对苏作战同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一样，事先未给三国同盟的日本任何通告。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说："对苏战争是德国自己下决心进行的战争，不期待日本的任何援助。"日本和德国之间对战争的指导没有直接协作。

对苏战争遭到失败后，里宾特洛甫外长才力劝大岛大使，希望日本也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说这是在大东亚除去苏联的好机会。军部盲信德国力量的人，有点动摇。但是，他们认为，象里宾特洛甫外长所说，在东亚扫除苏联的危险是主要问题，再进一步，德国处理苏联后，其势力从西伯利亚进入海参崴，就会与日本发生对抗，就如德国席卷法兰西时，恐怕其势力波及南洋一样。陆军以"关特演"的名义，在满洲集结大军，也就是在这时候。

军部因为已制定南进的方针，除北方派外，大部分对德国之引诱表示冷淡。所以，日本一九四一年底反而进攻珍珠港。德国希望日本进攻新加坡或进攻苏联，进攻美国是德国最不赞成的。

希特勒的对苏作战与德国军部 一九四二年是德国对

苏战争决定胜负的一年。如果本年未解决苏联问题，就会促使苏联加强和美英的关系，从而完成其对德国的包围态势。一九四二年的对苏作战，也是关系轴心国存亡的一年。

东方日军的战争初期情况很好。这时日、德应默契配合作战，可是当时日、德双方都对同盟国的实力估计过高。

德国参谋本部在哈尔达将军的领导下，并未改变对苏作战计划。他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先破敌人的野战军，再击破敌人的武力，则可以达到政治目的。一九四二年德军全力冲向莫斯科，切断苏联的南北交通，再进攻苏联的主力，军部认为依照这个计划进行，以后再扫荡其它各地就不困难了。

军部认为作战目标是破坏敌人的野战军，这是毛奇将军的兵法。可是希特勒认为，现在的统帅，不单纯在军事方面，而且必须考虑政治、经济方面。关于对苏作战，他从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大军南侵，从乌克兰进攻高加索，将石油控制在手，可断绝英美从波斯湾方面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亚细亚，再与印度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日本军部从缔结三国同盟以来，也是这样考虑的。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后，仍与陆军一起，电令在柏林的野村武官，劝希特勒调德军进攻高加索。

希特勒因一九四〇年西欧战争取得胜利而非常自信，这次又推翻参谋本部的计划，固执己见，将哈尔达将军免职，强令进攻乌克兰。

德国在东面的失败 德军除意大利军外，还调用罗马尼亚及西班牙的混合部队，侵入乌克兰，从敖得萨占领克里米亚半岛，逼近高加索，可是一九四二年战争并未分胜负。战线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西部，截断了欧洲与苏联的

联系，到达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畔，并且进入高加索，伸展到黑海，这是陆战史上未曾有过的漫长而单一的战线。可是，苏军仍维持着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之间的交通，在内线作战中取得很大好处；并且拥有从波斯湾获得英美援助的道路。一九四三年一月德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战，企图切断苏联的南北战线，战争异常激烈，但终未成功。德国当时在东西两面作战，国内动员力逐渐减少，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拥有极大动员力的苏联相比，在数量上更趋劣势。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北方地区集中，开始大规模的反攻。首先完成对意大利军及罗马尼亚军的正面突破作战，又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队包围消灭，再把乌克兰地区的德军分成几段，使其陷于混乱。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正式宣布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停止抵抗。德军受到重大损失后，不得不开始总撤退。对撤退的德军来说，苏军的冬季作战是他们最棘手的，而为对付游击战也常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九四三年初期，东西轴心国的战势都已恶化到不可恢复的程度。从此，日本和德国在印度洋会合作战的计划也不得不就此结束。以后德、日都陷于各自作战的命运。

作战和政治思想 希特勒实际是位军事上天才的独裁者。如前所述，德国军部的战术是按照毛奇的兵法，以击破敌人的野战军为战争目标。他们认为，首先粉碎敌人的武力，就能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希特勒则认为，在全体主义的战争中，武力是战斗的主力，但仅仅是一部分，战斗力应综合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要素，应立体地运用，在作战中多进行政治考虑。希特勒用这种新思想，

抛弃了德国历来的陆海军平面作战方法，无论对挪威，还是对法战争都收到了巨大成功。

但是，已经完成希特勒的综合战术的是苏联。从科学唯物的主义的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苏联，已经练成全体主义的军队。革命后二十多年，苏联完成了党部及军部的融合，苏联的武力是政治、经济、思想及科学的综合力。苏联的军队建设由许多德国人援助，所以混合了许多德国的思想，但是，它完成了近代军队建设，仅在革命后七八年，就比德国军队前进了一大步。一九四一年斯大林的军队是一九一四年沙俄军队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的力量几乎不能类比。因此，在完成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防卫后，经过冬季作战，就能够反击、消灭德军了。

在西方战场曾获得巨大成功的希特勒战术，在东方战场竟完全失败了。这是因为其对手的素质不同。希特勒排斥了军部的意见，过于注重政治上的考虑，高加索之战成为对苏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德国军部是德国传统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势力。纳粹“革命”抬头后，希特勒全力争取军部与党部的合作，但这并非易事。处罚激进派冯·罗姆事件，也是为此而引起的。注重秩序、尊重能力是德国的国民性，所以希特勒经过几年的统治，军队方面逐渐有规律，党部与军部也见融合，与军部元老普劳姆培尔的关系，也见好转；但是，七八年的时间太短，不能完全完成这些任务。

两次压制军部的强烈反对、对苏战争都遭失败后，军部对党部及希特勒的反感忽又死灰复燃。原来德国陆军传统上对苏俄抱好感的人很多，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更造成了

东部军队思想的崩溃。拥有机械化强大力量的德军，这时显得特别弱了，军队首脑部已经不属于希特勒和纳粹，反而成为反抗希特勒和纳粹的势力，对希特勒的暗杀计划或反抗阴谋层出不穷，甚至愿向苏军投降。在东方战线上，无论将军或士兵，都对战争表示厌恶。

东部战线精神的崩溃立刻传到西线。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军队的统制力在西部也完全丧失了。

七　对华新政策（一）

日本有限的实力　满洲事变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日本自身的自卫。因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方面以直接行动排斥日本在满洲的重大权益，而日本即使从解决人口不断增加的粮食问题，即从国民生活问题看，满洲权益对日本来说也是至关生死的重要问题。但是，日本行使武力是一个难题。还有满洲的统治方式，虽然采取了五族共和主义的"满洲国"独立的形式，但其内容无可争辩地总是以军部的力量的军国主义旧思想为基础的。

日本侵占满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出于日本经济上的动机；同时，日本经济也有予以开发的力量。但若超出这个范围，既没有理由，更没有消化的力量。将满洲事变扩大，是日本在经济方面招致自灭的行为，这也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了的。当时军部的经济财政论者们支配着日本，他们的见解是：在财政方面，只要印刷钞票就可弥补；经济方面，只要用滚雪球式的武力向外伸张即可发展。官僚和学者，都成了这种军部见解的后盾。军部方面

竟毫无理由地以强化日本的经济为名，或以获得资源为目标，深入华北向南扩张。

仅以经济上讲，日本根本就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况且，占领地的经济与军事力及政治力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日本对中国统治的根本错误 日本突入了超越它自己能力的日中战争，是日本崩溃的原因。华北工作转变为卢沟桥事变，更发展到日中全面战争，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主要城市。但是，仅以不足百万兵力，去占领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日军所占领的不过是"点"与"线"而已，或者说仅是"点"更较为符合实际的情形。

既然如此，军部占领中国的政策仍是"满洲政策"的延长。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都采用了"满洲式"的办法。由于实力不足，结果一无所获。例如：文化工作，根本就不值一提；而在经济方面也是完全失败了。对于"满洲国"，日本多少尚有贡献，但是对中国本部，竟成了片面的掠夺。日中之间的感情愈发疏远，所谓的"日华经济提携"、"共存共荣"，随着掠取中国更多的物资，在实际上已经变成对中国经济的榨取了。

满洲事变后，由于经济封锁，增加了通商贸易的障碍。日本为维持大国经济，不得不在邻近诸国逐渐将经济交通集中，为此请求从中国供给原料物资的情形日益增多。对于中国供给日本的物资，日本也用生产产品及其它物支付中国，予以补偿。此时，日中双方所得到的利益是相互的、共荣的、提携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提出了"日满华共荣圈"、"日满华经济提携"的口号。然而，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物资主要用于制造军用品，民用生产的物资均感缺

乏；再者，日本没有从其它国家输入原料，已经使日本逐渐感到在向中国输出产品和支付手段上均有困难。而且，因为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取得军需物资又是非常之必要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在占领区依靠印刷钞票作为支付手段，其结果是引起了通货膨胀。因为靠强迫，所以不断加强占领军的压力。

日军为了便利地攫取物资，又命令日本人组织各种公司。所谓"日中合办公司"的成立其实也不仅是为了获得权益，而且是更想达成这个榨取的直接目标。

占领区内军政的幼稚 日本为了操纵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设立了"兴亚院"；又在各大城市设立"联络部"，以监督中国的政治行政机构。当时华北有"华北政务委员会"，南京最初成立"维新政府"，以后又归并"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隶属于"汪政权"。这些中央政治及地方行政机构，都受到日本三方面的监督。第一，是日本顾问及日本职员在内部指导；第二，是"兴亚院"及"联络部"在外部监督；第三，是驻在该地的陆海军的综合监督。结果，好干涉他人闲事的日本人与厌恶干涉的中国人之间，绝不能融洽。在华北又创立了以中国人为会长，以日本人为副会长的"新民会"，开展与政治相并行的民间运动，所谓"新民主义"是三民主义混合了儒教的王道主义运动。但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对这些都毫不感兴趣。

这些落伍的政策，即在"点"与"线"的地区内实行，所以重庆方面的反攻及中共工作是很容易进行的。日军为了护卫铁路，沿着铁路挖掘战壕，相隔一定的距离又建筑一些碉堡。在华中占领区，又实行所谓"清乡"办法，将广大的乡村用竹杆围起来，调查其中的居民，处分"不良分子"，

完全是一些幼稚无知的办法，丝毫未能达到目的。相反的，在中共首都延安，日共首领野坂等以日本俘虏为中心，施以共产主义教育，进行扰乱破坏日本军的工作。而且，即使中国方面与日本合作的人也都是想以与日本合作来开拓中国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决不是日军的傀儡；几乎没有违背他们的目的，盲目地进行合作。

对华新政策的根本精神　一九四二年初笔者被派为驻南京大使时，从战况报导看，日本的权威达到了顶点，经济状况也好转。日本与中国之间保持了交通联络，物资也可以自由输出输入，联银券和储备券都能同日元交换，贸易也很便利。而且，中国商人购买许多日本商品，得到了极优厚的利益。

在这种日中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笔者决心根本改变日本对华政策。认为这是实现多年来主张的对华政策的良机，而且此时如不实现，真正日本精神将永远无法表示出来。笔者主张把占领区政治、经济上的一切问题完全让给中国人，日本不干涉占领区中国的内政，援助中国人实现自主权的重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必须是个独立国。废除一切日中间的不平等条约，树立完全平等的关系，自动地在政治、经济上互相援助。战争已无必要，日军可由中国撤回，将一切权益归还给中国政府。日本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除了日中平等及互相尊重以外，我认为再没有其它办法调节日中关系。“满洲国”问题，南京已经承认，也就解决了。只有在今日日本充满信心地统治东亚之时，才可实现这种政策的转变。笔者认为，在中国及东亚各国中，如果实行笔者在满洲事变爆发前所主张的政策，建立起尊重主权及互相平等的关系，那么这个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完

全没有意义的。如果能树立这样的政策，对过去日本对中国的行动做点赔偿也是有意义的。

笔者屡次回到东京都向朝野要人游说此事，鼓吹首脑部及军部树立这种政策。天皇对此也全面予以采纳，东条首相亦表明愿遵照天皇的旨意陆续改善，并尽力向军部方面说明。用了宝贵的战时的一年时间，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全面实行这个政策，即所谓对华新政策。

实行新政策的基础　中国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困难万分。现在军部虽然表面上改变了他们过去的态度，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天皇的表示及东条英机遵照日皇指示的实行，踌躇了一年，最后终于成熟。

第一，自一九三七年以来，将近百万的日本青年士兵经过在各地长期战争，他们也明白了中国的情形。他们都在问自己日中为什么要战争？但是无人能找出必须战争的理由。大部分人都认为日中两国应当融洽，而不应当发生战争；互相亲善，共谋繁荣，这才是应有的态度。过去虽然遭受很大的牺牲，但唯有这次的大牺牲，日本人的感情才走上了正轨。

第二，日本人经过这次战争，眼界也开阔多了。他们也知道，日本用武力压迫中国，使其承认日本在中国所获得的权益，是违反日本使命的；日本在东亚的使命，是与中国共同负责。也渐渐地从大处着眼观察问题了。关于中国问题，过去日本人是完全钻牛角尖，只顾眼前利益。这种近视眼的想法，也逐渐减退。日本人是从恶梦里初醒了。

第三，军部对中国物资的榨取，不但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即是日本国内人民需要的物资生产也迅速减少。由于船舶的缺乏，运输更日趋困难。因此，日本只有在中国

搜刮物资，但未将应该交换的物资运往占领地区，致使该地区通货膨胀。为了维持日本军需工场所必需的原料，不得不依赖中国的自动协助。日军的压迫政策，对中国当然是有限度的。不但是经济，在各种问题上，日本也明白必须是中国的自动愿意合作才能有效果。正在这时日本发生了设立大东亚部问题。

新设大东亚部 满洲事变之后，日本军部为了处理满洲问题，曾专门设立对满事务局。卢沟桥事变后，又设立了一个兴亚院，主管关于中国的问题。这次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占领广大的南洋地区，这些地区都利用旧有的行政机构，由日本军予以监督。其后军部主张，为了处理有关"满洲国"、中国占领区及南洋一带的事务，在日本外务省新设大东亚部，管辖兴亚院及对满事务局和南方工作，这种主张旋即被内阁所采纳。

这种主张对内是排斥外务省，企图缩小它的职权。这是基于军部战时无外交的思想，对外是要将各独立国化为特殊关系地。此机构完全违反对华新政策的精神。

大东亚部的新设虽然遭到外交部和枢密院的强硬反对，但东条军阀内阁仍将这一提案通过，东乡外相因此愤而辞职。

笔者也认为大东亚部的设置绝无实行新政策的希望，遂呈请辞职。然而东条首相对笔者的说明，却与此判断相反。他说："为实行新政策才成立大东亚部，并任命对新政策有认识的青木一男（前藏相）为大臣，又任命对新政策有充分理解的谷情报局总裁为新外务大臣，协助运用外交。希望主张新政策的你仍留原地，执行新政策。"笔者以为真有实行的可能，故应允暂时仍继续工作。然而，东条首相

对于新政策的认识，与笔者的见解完全不同，不过笔者仍决心与志同道合的人指导日本实行这个新政策。

新政策与和平问题 笔者对未来战争的信念是，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对华新政策终是符合大局利益的；同时，笔者的见解是，日本走上错误道路，对外是从中国问题开始的，所以如果想纠正这个错误，必须仍由中国问题出发，逐渐改变其它对外的问题。笔者想将新政策的精神慢慢地反映到对内的政治方面，纠正日本的错误。新政策不但是在中国或东亚，即在日本国内也须实行。也就是说，内外政策必须共通一致，才能将导入歧途的军部策略矫正过来。笔者相信这才是平定昭和动乱的理由。

对华新政策的内容是中国多年来所盼望而日本未能如此做的，倘若能认真实行，日中之间的冲突，必能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日本虽然刚准备暂以南京的汪政权为对象并使其实现，但新政策如能真正实行，则重庆国民政府就没有再与日本继续战争的理由。于是，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政权也可能妥协，甚至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和平问题也可能实现。但是日本如果不改变它过去的政策，无论向重庆国民政府做几次和平试探，也是不会有结果的。笔者认为新政策才是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政权及日本妥协的最大前提，以此为后盾的外交政策才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日本政策的根本改变，实是消弭战争和全面和平的关键。

当时，英美正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援助。也许有人怀疑，即使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无再继续战争的理由，可是由于中国和英美友好的关系，恐怕仍是不可能与日本和解的。然而，日本对外政策如能依照新政策去进行，也尽量设法符合英美的希望和主张，打开走向世界的路，那么不但重庆

的国民政府，即使与英美进行妥协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日美谈判时，如能采用新政策，谈判必能达成协议。新政策是恢复一般和平的基础工作。

国内只有明了新政策的意义，才能督促政界要人们进行反省觉悟，也可转换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新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清算日本过去的错误政策，当然对战争的影响是很大的。换句话说：不必等着战争的结果，而是积极地准备早日将它终结。

八　对华新政策（二）

天皇的意旨　日本天皇对于新政策在内外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甚为了解，希望能着手实行。除命令东条实行外，又派三笠宫（昭和天皇的三弟）赴驻华占领军总司令部工作，以监督当地日本人切实执行新政策。三笠宫屡次在上海日本军部、官员及民间的集会上，鼓励日本推行新政策。

东条英机首相体察天皇的意旨，对新政策的实施极其热心、努力。他到上海、南京时，大讲新政策的意义，并令其实现。但是，东条对新政策的意义理解到何种程度，确是疑问。由于日本天皇令实施新政策，他也似乎真正地在执行着。同时也应承认，他作为军部首脑及军事政治家出现，同其他人比较，对新政策的理解也还是最深的。这从他在大东亚会议和其它场合的言行中看得很清楚。

对华新政策的实施　对华新政策自一九四二年起做准备工作，于一九四三年开始实行。当时大致可分为政治与经济两方面。

汪政权获悉日本将树立新政策，以为南京政府的目的

可以达到，所以很欢跃。然而，实行这种政策在日本内部仍有很多的障碍与误解，究其原因是日本军部过去的错误思想与新政策的思想完全不同。他们依旧存在着《日中基本协定》的旧想法，而且日本政府的命令在当地的部队往往不能彻底实行。例如：日本决定将中国的财产交还中国，但是在交还时，其中大部分机器都已破坏不堪，不能使用。

此外，与外务省有关的政治方面较经济实行得要多。例如：笔者在满洲事变前即主张废弃不平等条约，现在终于实现。苏州、杭州、汉口、天津各地的日本租界，首先开始办理归还手续。

租界归还以后，开始商讨取消治外法权的问题；其后又将关税问题解决，并将庚子事变的议定书（关于北京与海口间驻兵权）予以废弃。一九四三年一月，日本与汪政权之间达成了协议，将过去不平等条约全部撤销。

改组内阁与新政策的推进　一九四三年四月，笔者为请示实施新政策的第二阶段，返日述职时，东条首相请笔者入阁任外相，笔者表示愿回中国，实行新政策。但东条希望笔者留在中央方面，以加强推行新政策，进而处理东亚各地的外交。结果决定外务大臣与大使互相对调，改派谷外相为驻华大使。笔者接受此职后，决心在中央把握机会，加强推行新政策，希望能迅速实现一般的和平。

当时，天皇不仅屡次嘱咐必须实行新政策，更对战争表示忧虑，希望早日恢复和平。

笔者与谷大使两人合作，逐渐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将所有日中间过去的不平等关系全面地具体地清算之后，决定双方以平等的立场，建立同盟关系。当时，日本国内情形也相当复杂。虽然到处遭遇意外的障碍和刁难，但是最

后仍能突破这些难关，全是由于时事的演变。东条又发表宣言，在与中国国民政府恢复和平的时候，日军从中国全面撤兵，故日本对新政策的实行也相当迅速。

笔者立即开始将新政策用于整个东亚地区。与此同时，通过议会努力使全体国民了解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形。迄今为止，这一努力还不能完全说明日本大力宣传的战争目的已显露出了。因为东亚的解放，亚洲的崛起，东亚民族摆脱殖民地地位，立于各国平等之地位，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实现这些目标，才是日本战争的目的。也只有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才能完全满足。这时，日本对华新政策基本上走上了正轨。

新政策与日中关系 在日本最高决策机构中反对意见逐渐减少，在中国开始实施归还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新的日中同盟关系即平等关系。经过日中（指汪政权）双方共同的努力，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如果没有抗敌关系，日本驻军会立即声明从中国撤回日本。

如果考察满洲事变以后中国与国际间的关系，就可以知道重庆国民政府已与英美发生友好的关系，中国既不能违反英美的意见而与日本单独协商媾和，反过来说，中国也无力调停日本与英美的关系。何况恢复日中关系的计划阻碍甚多，且蒋介石先生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尤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开罗与罗斯福及丘吉尔举行会谈，共同发表开罗宣言之后，更是如此。所以如果由重庆蒋介石先生负责进行与日本洽商日中间或者英美的和解，除非日本投降，否则绝无希望。

可是日本如果能以中国人民为对象，实施对华新政策，

将日本的行动政策放在公正的理想之上，使世界各国都能明了真相，最起码这也可以成为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而且，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为了恢复日中将来的关系这也是绝对需要的。

日军对中国的态度过于荒唐无稽，所以日本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应求中国人民了解日本人的真正精神。新政策的对象，是通过汪精卫政府，以中国人民为对象，希望中国人民看到这些新政策，证明日本人是否有诚意。

日本的外交政策 无论军事当局怎样解释，战争状况正在走向恶化是事实。在战争问题上，日本国民均自觉地进行善意战争的努力，正因为这一点，日本国民不是盲目的。笔者能够对世界范围内的形势做客观的分析，通过内阁、议会、翼赞政治会及实业家的聚会等，努力给国民提供形成评判观察的资料。由于对军部专管工作规定严格，所以对当时战争近况的报导及说明必然有相当的困难。

笔者对于议会的软弱感到吃惊，而且笔者认为，为了诉诸于国民，除了通过议会之外别无它法。笔者欢迎认真的外交商讨，但是在议会上始终能听到所谓外交软弱的非难。这是由于当时外交受到限制，外务大臣在法规上只有极小的权限，所以在运用这一极小的权限时，常发生许多困难。但不管外交权限如何，笔者作为外交大臣当竭尽全力推进外交政策。当时在议会召开的公开与秘密会上的演说与答辩，都是出于这一意图。

对华新政策，必须实行到底，同时应将其逐渐扩大，伸展到日本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笔者将这新政策定名为“大东亚新政策”，它的目的是促进亚洲民族的觉醒，实现民族的解放与复兴，更进一步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日本

必须采取国际亲善的政策，与各民族、各国家建立善邻友好的关系。日本还同苏联订有中立条约。严守中立条约和善邻政策是相辅相承的。

进行大战争的日本的战争目的必须是光明正大的主张。日本的主张和战争目的就是东亚的解放和亚洲的复兴。只要这一战争目的达到，无论何时都有恢复和平的准备，所以大力宣传的日本战争目的论成了恢复和平的基础工作。同时，既然已经发动了这样的战争就不能半途而废，即使还要做出牺牲也不能停止。无论是人们，无论是国家，自然而然发现了至善的本来面目，这是伟大的力量，是神圣的工作。那神圣的工作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也决不过迟。

以上旨趣，笔者在外务大臣工作期间，在议会和其它场合的演说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九　大东亚新政策

日本的战争目的与东亚的民族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明确的是为民族解放而战；在欧洲白色人种中间，在巴黎会议上，实际确认了民族自决主义。然而，当时民族主义只在欧洲范围之内，亚洲依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为确立为亚洲民族主义而战。亚洲的民族应以这次战争为觉醒的契机，为自身的解放与复兴而战。

亚州和非洲的解放、复兴有助于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欧洲各国利用亚洲和非洲做为榨取的对象和在操纵殖民地期间，是不能确保世界和平的。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世界东方的解放与复兴。日本没有其它任何野心，只要日

本突入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实现，无论何时，日本都有终结战争的准备，这也是我的主张。

根据以上主张，日本鉴于在东亚地区还没有独立的各民族，决定承认每个国家的独立。缅甸和菲律宾均被承认。属于日本领土之内的朝鲜、台湾也允许进行政治参与和自治活动。印度的独立也在准备之中。对于印度的独立日本也给予援助，并对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也予以承认。日本期望在它力量所及的地方所有民族都实现独立。当然在内部还有不少困难、阻力，但是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困难和阻力。

东亚民族的领导者　日俄战争以来，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在东亚地区出现了许多民族志士。其中的代表者，在菲律宾有劳雷尔博士，在缅甸有德古达·巴莫，在印度尼西亚有苏加诺。在其它地方，也有不少志士仁人来到日本。这些人都是东亚民族的伟大领导者，都热烈期望自己的国家脱离欧美的殖民主义压迫，实现完全的独立。他们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是真诚的，即使战争失败了，他们的精神也将永远留在东亚天地之间。

对于菲律宾的独立，日本立即予以承认。克逊的朋友劳雷尔博士曾任高等法院院长职务，独立时被选为大总统。此人是个卓越的铁腕人物，是领导菲律宾民族独立的杰出人材。缅甸独立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德古达·巴莫，费尽心血长期从事独立运动。他崇高的精神和渊博的知识创造了缅甸独立的基础。印度尼西亚还处于独立的准备时期，由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苏加诺领导的长期独立运动，依靠日本的援助在急剧地进行着。

在论述亚洲民族主义时，不能忘记印度的伟大英雄钱

德拉·鲍斯的名字。

乌呼！钱德拉·鲍斯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独立运动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集结起来。甘地的门生钱德拉·鲍斯则主张用武力和直接的军事行动，作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者的尝试。

钱德拉·鲍斯在印度出生，但他也学习了英国的文化，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了印度的独立，他发誓要贡献自己的一生。为此，他不考虑个人生活，四十岁时还过着独身的生活，从而为同志树立了榜样。他是一个非常激动的热血男儿，但决不说大话，深谋远虑，其容貌、举止和表情都表现出真挚，是一个真正的勇者。

他在印度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与英国官吏发生冲突，曾被投入监狱达数十次。欧洲战争爆发后，他秘密越狱逃到阿富汗，不久依靠日本方面的帮助进入德国。后来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取得印度独立的极好时机。他在柏林期间，以印度俘虏兵为主，编成了印度独立军第一大队。一九四三年初，他又乘坐德国潜水艇来到印度洋，又换乘日本潜水艇进入马来西亚，在这里组成了印度自由军。

他曾三次访问日本。第一次，为了确保与日本当局的联系；第二次，是为了出席大东亚会议；第三次，由于战争局势恶化，与日本进行最后洽商。他在大东亚会议上的演说和在政府欢迎会上的演说都声泪俱下，这是革命志士对苍天的申诉。日本采纳了他的要求，占领了印度的安达曼和巴科巴群岛，尔后这些群岛置于印度临时政府的统治

之下。日军又越过缅甸北部的国境。在英帕尔强行作战虽然是轻率的，但其目的是为了援助印度大陆一部分人为创造印度自由天地计划而进行的。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钱德拉·鲍斯作为印度临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呼吁印度国民奋起独立。这是个不朽的檄文。英帕尔战役初期取得成功，但由于硬干使目的没有达到而失败。英帕尔战役失败后，他非常苦闷，第四次飞往日本。飞机在离开台北飞机场之际坠落。他是为印度独立而战死的。他死后，印度人仍相信他还没有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钱德拉·鲍斯的部下都被逮捕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在印度首都审判席上，辩护人要求笔者或笔者代理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认为应推翻英国检查官的所谓钱德拉·鲍斯是日本傀儡的主张。外务省次官及驻缅甸大使与外务省职员泽田廉三、松本俊一以及太田三郎三人，作为笔者的代理人在印度法庭上证言：他不仅不是日本的傀儡，而且反是为印度独立奋斗终生的革命志士。最后在印度的英国审判官终于宣告鲍斯是印度爱国者无罪。同时英国人也深知印度独立时期到来了，战后英国承认了印度的独立。

《大东亚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历史性的大东亚会议。觉醒的东亚民族在日本聚会，形成亚洲自己的宣言。作为东亚的独立国，到会的有汪政权、“满洲国”、泰国、菲律宾、缅甸以及日本，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者有汪精卫（南京）、张景惠（“满洲国”）、温 依（泰国）、劳雷尔（菲律宾）、巴 莫（缅甸）、钱德拉·鲍斯（印度）及东条（日本）诸人。日本代表被公推主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共同宣言。

宣言指出：大东亚各民族站在独立平等的立场，相互尊重主权，共存共荣。宣言决议各国要共同努力，实行通商自由和奉行文化交流，为亚洲的解放与复兴而奋斗。宣言的内容同一九四一年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是相对的，同时它又包括宪章的许多思想。它是会合了各国的政策所实行的宣言，因此这个宣言被称为《大东亚宣言》。《大东亚宣言》比对华新政策前进了一步，它是真正日本精神的表示，表明了日本的战争目的。

十　战时外交（一）

对苏外交　日本的战时外交同大东亚政策一样应当考虑对苏关系。因为日本和苏联订有《中立条约》，所以在条约有效期间内，虽是在战争中，但仍可以同苏联维持和平。日本在德国同苏联战争中是中立国，而苏联对日本与美、英的战争最初也是中立国。日本因信赖《中立条约》，所以特别谨慎小心，无论在海上、陆上所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尽最大的努力，寻求解决。苏联虽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将满洲所发生的国境事件归咎于日本的侵略战争，但对日本在战时遵守《中立条约》一事，并未表示不满。

那么，苏联是否遵守了《中立条约》呢？日本方面相信苏联必能遵重条约，并再三地提议加强这个关系。松冈外相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时，苏联希望日本将在北库页岛所有的石油、煤炭的权益取消，而日本却希望自一九三六年因成立防共协定而停止谈判的渔业条约再度恢复谈判，并取消每年为缔结临时协定而发生的困难，但是双方仍有意见分歧。笔者曾将这个问题提出与

苏联磋商关于撤销权利事，克服了日本内部的重重阻力；也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渔业条约才能达成协议。一九四四年春，佐滕大使与莫洛托夫外相在莫斯科签署了最后的协定。

德苏和平问题 日本企图更进一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这也是签订三国同盟时许多日本人的想法，他们都希望德苏战争早日解决。

当时直接负责战争的军部在作战上希望德国与苏联休战，为了同样的目的，也盼望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和平。实际上，外交并不象军人纸上谈兵说得那样容易，如果梦想玩弄外交上的手段，操纵它国，一朝一夕之间即可以实现和平，那就纯系幼稚的想法。但为了巩固恢复和平的基础，希望造成与国民政府和平的空气，同样的，也盼望德苏停战，所以当时认为应改善日苏关系，遂将德苏问题提出讨论。

当时笔者提议特派一位有权威的元老赴莫斯科，后来又选了广田前首相，设法进一步地努力改善日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必要时，由苏联经过中立国前往柏林，并赋予全权处理恢复德苏关系及一般和平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些重要任务，确实需要选择一位对苏问题有多年关系，而且对外必须获得它国信任的有经验者。

这个提案在日本虽然得到各方面赞成，但是苏联方面却解释这仅是德苏和平的调停，予以拒绝。虽然以后再提出，甚至更准备了改善日苏关系的具体方案，但苏联表示鉴于一般国际情势的演变，不是接受日本特使的适当时期，仍予以拒绝。据美国方面的记录，苏联每次均将日本提案通告给了美国政府。

苏联与《日苏中立条约》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曾多次对佐藤大使表明，苏联绝对遵守《中立条约》。对于日本要求《中立条约》延期的提案，他表示尚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何必焦急！一九四五年五月，最后通告废弃中立条约时，莫洛托夫仍对佐藤说："《中立条约》到失效为止，尚有一年以上的有效期呢。"

一九四三年四月，笔者就任外务大臣时，苏军转取攻势，以后每战每捷，直到大战结束。苏联胜利的态势逐渐影响到对日的态度，在关于加强《中立条约》及特派日苏亲善使节等谈判中已改变了以前的面目。很明显的，苏联对战争的结果，曾加以精密的计算。苏联不理睬日本的反对，仍让空袭日本的美国空军降落在苏联领土，而且更加设法隐蔽。当时美、英不但要求苏联保护其驾驶员，应不惜违反中立；更对苏联表示，愿付重大的代价，希望苏破坏《中立条约》，对日开战。这个也可作为判断苏联对遵守条约的观念上的一个参考资料。

研究苏联唯物主义外交的人对于苏联态度的判断并不感到困难。仅从日本开战时，为努力维持改善日苏关系的外交谈判经过，即可窥见苏联对东南亚的阴谋。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之后（根据美国及其它新闻情报资料可以判断）苏联随时都在准备对日开战，在接受废除《中立条约》通告之后更可证实这一点。

对德意的关系 根据《三国同盟条约》，与站在共同战线上的德、意两国交涉，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互相援助，以期收同盟之效，但笔者任外相时期，因彼此的战场已经分为两个，无法协助，仅仅是尽一点同盟的礼节而已。

相反，美英之间联系更加密切，而轴心国却在东西两个战场上各自苦战，这是轴心国战败的第一个原因。轴心国希望将东西两个战争在印度洋上联结起来，以后再统一作战，这个战略在最初即告失败。

德国感到对苏战争不能顺利进行时，曾再三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大使为达到这一目的，经常对日本军部或日本外务大臣（笔者）提供各种情报，如：苏联违反中立，供给美国空军及潜艇所需的基地，或美国输送大量军需品供给苏联西伯利亚的军备等等。笔者为避免德国政府发生误会起见，也屡次向它明白表示日本无意违反《日苏中立条约》，并劝告他轴心对英美既然无战争的充分力量，与其扩大，莫如收缩战线反而对日、德两国有利。德国大使对日本这种态度也并没有发生误解。

德国大使史达玛与笔者在南京时即已认识，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看得很清楚，并且表示赞同。笔者曾通过他劝告德国政府，必须采取和新政策相同的政策。但是，德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希特勒不但已经对斯拉夫民族等异民族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且已把占领地行政交由罗占贝尔赫负责掌管，而他是一个生在波罗的海附近的非常偏见与心胸狭窄的人。自从希特勒表明拒绝笔者所劝告的树立全面和平提案及对苏和平的问题以后，我们才知道德国已经采取了不胜即自杀的决心，绝不采取除此任何中庸的态度。

对法、葡关系 在东亚地区，法国时常处于困难的境地。原因是，法在中国和中国租界地及铁路等方面都与英国有同等重大的权益。排斥日本多年的法印殖民地更是抵挡了日本南进的道路。战争中期，原驻中国大使考思姆作

为在日本客死的安恩利的后任来到了日本赴任。考思姆在法国人中以精明强干闻名，极困难的任务他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十分令人尊敬。无论是在日本、在中国，还是在法印，法国人总是担心本国的状况。当时维希政府处于德军占领之下的地位。戴高乐将军则是在英、美阵营的法国代表，在东亚对日本持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当时，维希政府对于轴心国是同盟国，但是戴高乐将军的政权对于日本则处于宣战的状态。在东亚地区，法国的官吏对日本大体不采取极端对立的态度，始终限于消极抵抗。但是在战争后期，戴高乐将军回到巴黎，法印德古总督向戴高乐将军宣誓效忠后，对日的敌对性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不得不排除法印敌对官吏的干扰。而且为了确保日本军队的安全，同时接受越南一带民众的要求，遵照大东亚宣言的精神，允许他们开始建立独立国。

葡萄牙在中国南疆的澳门有工厂、洋行等，在南洋属有帝汶岛，同战争中的日本有极其微妙的关系。澳门是中国南疆唯一的中立地带，它成了联合国情报机关活动的根据地。帝汶岛是荷属印尼和澳洲的要冲，日本占领了帝汶岛的西部，这里就成了追击退却敌人的战略要地。特别是葡萄牙把亚速尔群岛(大西洋)供给英美使用以来，日本和葡萄牙关系相当紧张，但经过战争还能维持两国邦交是很幸运的。

西班牙本来站在轴心国方面，与日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战争后期，随着轴心国失败西班牙的态度骤然变化。最后，西班牙同日本在菲律宾权益问题上发生争执，纠缠不休，不管日本方面做怎样的努力，终于导致了两国邦交的断绝。

十一　和平之试探（一）

和平问题之处理　关于如何能使战争结束，这个和平的探求无可否认的是赋予外务大臣战时最重要的问题，笔者入阁的意义也就在此。入阁时，东条首相告诉我，日本天皇对和平的问题十分关心。这次战争并不象日俄时期那样是国家与国家的决斗，而是吃掉或被吃掉的全面战争。日本军部表示，决心将这次战争打到底，如果有人中途提倡和平，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制裁。军部独裁的实权，以陆军大臣为中心，为贯彻这一政策，使用宪兵作为政治警察，而宪兵则对国内凡谈论和平的人，都斥责为反战主义，凡说战败的人，都被斥责为反军思想者而加以镇压、逮捕。军部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走向胜利的途径，才是维护国家的方法。宪兵严格监视元老、内阁大臣、议员及自由主义者的言论、行动。笔者也未例外。所以处理和平问题，确实非常困难。这种政治统治的先锋是军部的首脑者，与日俄战争伊滕博文协助内阁处理和平的时代相比较，政治实情是完全不同的，自不待言。

当时，军部虽然操纵了政治的各部门，但是宪法的运用在表面上尚无大的变化，宣战和媾和的大权依然属于日本天皇。按照宪法规定，日本天皇有"外交大权"，而外务大臣也有辅弼的责任，所以外务大臣对和平问题可以直接请示天皇，以后再遵照指示对外交方面予以计划或运用。当然在实行时，需要与首相及内阁协商同意。可是，在实现和平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及详细情形，决不能和军人首相（指东条英机）及军人内阁商量。当时日本政治情形就

是如此复杂。很明显，对处理和平问题，笔者需要如何的审慎和注意。

和平与交涉条件 笔者就任外务大臣后不久，就恢复和平问题先从木户内大臣处探询天皇的意见，进而在每次关于外交问题内奏时都直接询问天皇的圣意。当时天皇对和平问题的意见是：尽可能地早日恢复谈判，只要能维持国家的声誉，海外领土问题可以不必考虑。但是这个意思如果泄露出去，说不定国内可能发生不幸事变，所以当时天皇的意见只有木户内大臣及笔者两人知道，且只能静待实现的机会。

一九四三年五月，笔者就任后，立即与木户内大臣进行商谈，就恢复和平问题做彻底的检讨。他的意见是在南洋方面宁可做相当程度的让步，以便谈判成功。但是笔者以为这次战争与日俄战争不同，实际上已经是一场全面战争，已经不幸成为轴心国与联合国之间的一场全面对立的战争；鉴于目前战局形势，要想恢复和平，我们必须有接受对方所提一切条件的决心，若想仅依调停者斡旋，战争就仍会照样进行，而现在日本局势是不能站在对等立场上谈判的，所以需要有这种决心，这是先决问题。英美两国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萨布兰举行会议后发表宣言：战争继续进行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为止（十一月又发表了开罗宣言）。

然而，由于对华新政策和大东亚政策的贯彻以及关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的交涉等，加上许多深受刺激的战报，所以感觉一九四三年过得很快。

和平问题与德国 关于恢复和平问题，最值得考虑的是日本与德意同盟国不单独媾和的条约。这个盟约是在开

战时由日本提出三国同意签订的，所以和平问题是轴心国全体的问题。一九四三年夏季，意大利已经战败，问题仅是日、德两国之间的事情。恢复和平的第一步骤应是使德国同意，目前仍与苏联保持正常关系的日本，与苏联之间首先继续保持和平。史达玛大使虽对此不表示反对，但是德国政府不但不采纳日本方面的意见，并且反对日苏进行谈判。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表示，德国最后必胜。由此可知，他最初就抱定除非获胜，否则宁愿自杀的决心。因此，与德国共谋和平的事，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假使日本想和平，必须等待德国崩溃、希特勒自杀之后才能进行，那时日本才不受不单独媾和条约的约束。

与木户内大臣的盟约　一九四三年底开罗会议时，蒋介石亦参加，中、美、英三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卡萨布兰加会议）的原则加以再度确认，并表示决心必将日本领土恢复到日清战争以前的状态。

笔者与对日本天皇负有辅弼责任的木户内大臣不断地讨论战争发展趋势及恢复和平问题，本来曾提议按照前例在宫中召开重臣会议，加强主和派的意见，成为实现和平的政治势力，但鉴于重臣的性格及其个人背景的势力不同，反而难以达到目的，也就作罢了。军部所操纵的内阁，除非到最后的场合，也决不是协议终战问题的适当机构。和平运动若被军部获悉，万事休矣。当时，宪兵对败战主义者的镇压是绝不留情的。结果，除必须等待时机来临，用日本天皇的绝对命令（当时我们用“鹤的一鸣”暗指此命令）实行终战以外，别无良策。这个时机必须是战争大势已定，而德国已经崩溃，日本解除三国同盟。这时候国民也比较容易接受。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开始做各种准

备。关于这件事，木户与笔者两人负全部责任。宫中由木户负责商洽，政府方面由笔者进行。此后，即依此方针，分别地进行活动。

战况与改变作战计划 一九四三年后半期，轴心国的战势更陷于不利的状态。太平洋方面的日军作战到处失利。在北面的阿留申群岛、在阿图岛作战的山崎部队全部阵亡。以此为开端，南面瓜达尔卡纳尔等岛的部队也相继遇难。靠近新几内亚东端的新不列颠岛的作战要冲阿德默勒尔蒂湾也是经过苦战之后才夺回来。海上及空中的后方联络，由于美国空军及潜艇的优势活动也日趋困难。日本舰艇及空军损失非常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军不得不一再地缩小战线，变更大本营的作战方针，最后决定从小笠原群岛到马绍尔、卡罗林岛，北部到新几内亚为日本的防御线，拟定了日本必须绝对死守这条战线的方案。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原枢密院议长质问："统帅部过去屡次将作战计划予以更改，这次是否有坚守这条战线的把握？"当时，军令部总长永野元帅答称："战争之事，任何人都无绝对的自信。"因此，引起全场的争辩。结果，将此方案撤回。海军对此新方针实在也无自信。

由于战争形势不乐观，所以关于结束战争的方法尽管不断地讨论也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吉田大使(战后任首相)建议他和近卫两人在瑞士等待机会，但当时欲往欧洲旅行，非乘潜艇不可。重臣中近卫对和平最为关心，木户和笔者经常与其保持联络。

十二　与美英作战（一）

英美方面的胜因　多数国家间的战争决定胜败的关键主要在于友方国家是否能团结和作战的统一指挥。因为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力量，都要依靠彼此合作互相信赖。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两人的战争指挥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负的基本要素。在他们的指挥之下，集中英、美两国的物质及精神的全部力量，挽救危机，共同夺取胜利，这的确是极其贤明的措施。相反的，轴心国自始在精神及政治上，就未团结在一起，物质力更无把握；在相隔很远的分散战场上，各自为战，这是战败的最大原因。独裁者的战争，在指导上就有错误。此次和日俄战争时代完全不同，日本国内根本未能一致。

英美两国从开战到一九四二年末的两年半期间，不断地遭遇到危机，尤以一九四〇年法国战败为最。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根据一定的计划实行突击，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轴心国比较占优势。英美方面，在危急时坚忍克服困难，等到完成准备以后，才积极地采取攻势。这个时期，德苏战争已有一年，美日战争也已有半年，美英两国的共同作战，才告完成。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萨布兰加会议之后，才向世界发表决定“要求无条件投降”和采取“欧洲第一主义”，开始了反攻作战。

美国如何挽救一九四〇年的危机？德苏战争为什么会发生？罗斯福如何援助崩溃的法国？美国如何接受了英国的民意而参战？一九四一年八月与丘吉尔宣布《大西洋宪章》，采取美英的共同世界政策已表明美英在和战上已经一

体化。从如何反击珍珠港突袭这些重要历史都可看出美英民主主义已经团结在一起。兹将以后的形势及他们指挥战争的概要简述如后。

苏联的重要作用　德苏开战之后，英国立刻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关系，完成包围德国的作战。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使美国正式参加了战争。双方很明显地划分为敌友两个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西洋及太平洋、欧洲及东亚几地激烈地展开。当然，美英最费苦心的是怎样力谋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为了援助苏联，巩固包围德国的战线，丘吉尔与艾登两人所做的努力最大。六月二十四日德苏开战后，罗斯福也声明对苏实行援助的方针。七月十七日，美苏间的互助条约及单独不媾和的协定也签订了。针对着德军排山倒海的作战攻势，苏军竟能善战反攻。英、美及各友好国家都意识到利用苏联陆军攻破德军是战胜的捷径。当时各国相继争着与苏联恢复邦交或新成立友好关系，缔结通商协定。而各国的共产党先前都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并加以反对，但自苏德开战之后，他们又都完全改变过去的态度，成了共同进行战争的急先锋。同时各国内部的左派也都一致支持，加强了声势。美国共产党也从内部鼓励政府，政府亦完全利用了这种空气而作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日本偷袭了美军基地珍珠港后，英、美首脑部即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协商欧亚两面作战的政策，更成立了包括有苏联等二十六国的反轴心同盟。对苏联的关系，美国所负任务较为重要。十二月二十八日，艾登外相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商决对德作战，于是美、英、加等国对苏联的物资协助协定相继

签署。嗣后经波斯湾、莫尔曼斯库及海参崴等地，运往苏联的英国武器及军事物资数量很大。这样一来，更加强了苏联的战力，而美、英、苏三国的联系也日渐稳固。

苏联与英美的交涉 苏德战争开始时，德国的强大陆军继续东进，使英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苏联的形势相当紧急。一九四二年五月，美、英同苏联之间在作战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关于以直接攻击德国为目的的所谓"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本来，苏联无论从哪方面观察都与美、英两国是极端不同的国家。在德苏开战之前，与美、英两国并无特别的联系，对德国始终采取独自的立场。由于德国的进攻，苏联才和美、英站在共同的战线上，当然这种与英美的关系，也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有别。苏联的目标，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是想将全世界化为苏维埃的世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保卫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更应该使之在战争中取胜。所以他们最高度地利用英美力量，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苏联以全世界苏维埃化为目标，偶然因对德战争的姻缘，竟与世界民主化的美英，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以后双方的谈判，在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

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一九四一年的德苏战争，虽然德国并不顺利，但到一九四二年德军重整阵容，如浪涛般侵入乌克兰，更逼近高加索地区。在北非方面，隆美尔军援助意大利，攻到了尼罗河。在东方的日本，一九四二年前半年进展神速。表面上看，德、意、日的轴心共同作战即将成功。一九四一年后半年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的确是美英联合战线遭到一九四〇年以来最大的打击时期。苏联政府于一九四一年迁移到古比雪夫。

在这种情形下，苏联政府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急派莫洛托夫外长前往美国，提出作战上的重要的要求。莫洛托夫外长是于五月二十六日在伦敦同英国缔结了同盟条约之后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在同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中，莫洛托夫暗示，如果美国不采纳苏联的意见，苏联可能不能支持到最后而脱离联合战线。莫洛托夫当时说："苏联今天承担着德国全部陆军在东方的作战。"因此，他要求美、英军为了牵制德国在东部苏联战线的四十师大军，必须在西欧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如果在本年(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不能开辟第二战场，苏军就很难再作战。在英、美各国的共产党也一齐开始积极宣传，主张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总统答应了莫洛托夫的要求，希望他回苏联时到伦敦再与英国政府协商。罗斯福并将这个答复的内容和莫洛托夫访问美国的经过，予以公布。当时，罗斯福感到如果能将苏联拉住，对于战争胜负极为重要，所以他对苏联的评价很高；至于对莫洛托夫的要求，虽无充分时间与英国政府商洽，但也毫不犹豫地含糊答应了。

莫洛托夫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时受到热烈欢迎，也得到各种援助的口头约定。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英国只表示尽可能地迅速实行，但并未给任何决定性的诺言。因为在法国北部实行大规模的登陆战，是英国生死问题，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所以必须做充分的准备。丘吉尔对于罗斯福给莫洛托夫肯定的回答，颇感惶惑。他们希望美国一旦完成准备，即将军队做最有效的使用，开始正面进攻德国。故在作战方面，英国和美国的立场不同，直到战争完结为止仍是如此。

英国反对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总统既与莫洛托夫约

定，所以美国的作战计划就已决定了。这个计划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由法国北部向德国开始大规模攻击以一决雌雄，因此须与英国研商具体的方案。于是罗斯福即派空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元帅、金格海军军令部长作为陆海空负责人，和总统私人代表赫布金斯等组成代表团赴英。

在伦敦的英美最高统帅会议上，两国代表的意见相当分歧。不过这次的会议，较任何一次会议都为重要。英国方面，以丘吉尔为首，对于在本年中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坚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法国北部是德国防御最坚固的地区，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即刻强行登陆作战，万一失败，也许可能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失败，所以英国认为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是冒险的，必须展期到绝对有把握的时候再实行。英国方面坚持主张英美的武力先行集中地中海方面，可立刻击破轴心国中最软弱的意大利。然而苏联的立场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希望尽可能减少本国的损失。

美国主张在法国的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以符合苏联的要求，立刻东西相呼应，进攻轴心国的核心德国，直捣希特勒的根据地，一决胜负。美国还表示，象地中海作战等英帝国的战争，可以展期再实行。假使英国绝对反对的话，那么美国只可将主力调往美国所重视的太平洋方面，与日本战斗。据闻这次讨论英美军事专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而且也从有过如此的对立。在这次辩论中，包括种种重要的问题。例如：第一，欧战与太平洋战争是否同时并行呢？或者欧洲第一主义的问题？第二，直接先攻敌人主力的德国呢？还是先攻脆弱的意大利，使它先离开战线呢？当时英国所坚持的主张是：欧洲第一，应先在地中海方面展开主力战，击破意大利，其次再包围德国，对日本

作战延缓到最后实行。

美国因为对苏联的关系不能反对欧洲第一主义。罗斯福曾发挥了最大的政治力量，由华盛顿电令美国代表团顾全大局，可照英国的意见进行，同时罗斯福还命令作战部门于本年(一九四二年)内美军必须与德军直接接触。于是，英美首脑部决定采取共同北非登陆战。在英国训练的艾森豪威尔辖下的美军，大部分运往非洲，同由美国调来的派遣军会合，进攻突尼斯，时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英国伦敦的英美会议压倒了太平洋的主张，采取了欧洲战场第一主义的决定，对于开辟第二战场也决定展期。因此，英、美与苏联的关系忽转恶化，斯大林竟公开责骂丘吉尔。

北非登陆作战 美军集中非洲的计划颇有进展，以后更实行从多哥、喀麦隆横跨沙漠北进的大规模作战。美主力部队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与英军会师，在法领土摩洛哥登陆，并依照罗斯福的命令，年内在北非与德军开战。

最初大规模出现在战线上的精锐美军部队和英国共同追击北非的德军，攻入突尼斯，完成了北非的扫荡战。罗斯福与丘吉尔立刻召集两国军事专家，在卡萨布兰加(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了第四次英美首脑会议，确认欧洲战场第一主义，协商地中海方面的作战计划，并发表声明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从此以后，英美方面的作战是改取了攻势。

意大利投降 一九四三年五月，英美首脑又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北非作战完成之后的对意大利作战计划。此时在东欧的德苏战场，苏军已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战，德军被迫停止抵抗；在乌克

兰方面，苏军也展开了对德军的追击战；而在太平洋方面，日本已由所罗门群岛及瓜达尔纳尔各地撤退，所以轴心国的战势在东西两地都转入了逆境。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开始了意大利本土作战，首先实行向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继西西里岛后，又开始突入意大利本岛的作战。当时，意大利自夸威震地中海的海军及空军，并未发挥任何威力。古拉齐尼的陆军被英军击破。一九四三年前半期，英、美空军将意大利各大城市陆续予以炸毁，意大利的民心已经脱离了墨索里尼政府。王室、政治家及军人也先后背叛墨索里尼，结果前参谋总长巴多格里奥将军将墨索里尼监禁起来，并解散法西斯党，拥护王室，成立新政府(一九四三年七月)，与英美媾和，派使节到中立国的西班牙接洽。一九四三年八月，巴多格里奥意大利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于九月三日正式签署投降协定，随即参加英、美阵线，开始与过去的同盟国的德日正式宣战(九月九日)。

九月十二日，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派遣的空军从监禁他的深山中救出，并让他主持在北意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但是，随着德军的败退，他也跟着没落，后被共产党系军队杀死(一九四五年四月)。墨索里尼的爱婿、过去曾活跃一时的齐亚诺外长因为参加了颠覆墨索里尼政府的阴谋，被捕后被处以极刑。象他这样的人竟成了反抗墨索里尼的急先锋，这确是败战时的一大悲剧，也是意大利脱离轴心的最后一幕。

地中海战争结束　一九四二年五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会谈中，曾口头答应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之前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由于英国的反对，

苏联的要求并未实现，而后苏联同英、美的关系出现了危机。英美在北非及意大利作战期间，苏联曾不断地对英美恫吓，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军部首脑及政府负责人为了使苏联继续战争，必须另外采取适当的政策，最后决定暂时适用“援助法案”，迅速地开始供给各种军需物资。这样，苏联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愿望已经完全达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哈里曼两人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尽力设法解除与苏联间不愉快的分歧。因为英美认为战胜日、德，必须借重苏联的力量，所以对苏联的要求，也给予最大限度的允诺。可是苏联通过罗斯福的代表赫布金斯及哈里曼两氏窥破了英美的这种态度，又提出很多更苛刻的大规模要求。此外，苏联因对德战争已占优势，更动员了美国内部同情苏联的人及世界各地的共产组织间接呼吁，以便达成这个目的。

英美战争的态势自意大利投降后好转，也正因为这样，才挽救了与苏联间的分歧。丘吉尔领导的英国进行稳步的作战，陆续收效，把握住轴心国的弱点，先将意大利击败，而达到第一个目的，地中海又化为英国的内海，确保了大英帝国的联络线。从此英、美联合全部兵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开始进攻轴心的大本营德国。

十三　与美英作战（二）

魁北克会议　地中海战争结束后，下一个步骤是直接进攻德国。因此，这时才考虑到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满足苏联的要求。为了协商英、美、苏三国的对德共同作战，英、美预定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在魁北克召开

会议，并将此事通知苏联，但苏联拒绝参加会议(八月二十日)，所以魁北克会议以罗斯福、丘吉尔两人为主，英、美双方的首脑部均参加。这是兴致勃勃的人们为迎接将要到来的决胜阶段而举行的会晤。

魁北克会议时，才正式有了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决定于一九四四年夏季进行。其时与莫洛托夫约定的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已延迟了两年，英、美才完成准备。丘吉尔认为最后击败德国的时机很快就要来到了。

关于对德决战，英、美间的意见并未完全一致。丘吉尔置重点于地中海及巴尔干方面，而美国却考虑与苏联的关系，积极地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重视地中海战的理由，不但是尽可能使英军损失减少，收最大的效果，而且想控制巴尔干，作为战后对抗苏联的棋子。这是出于英国传统的政策：无论在任何场合，英国与殖民地间都要相互联系，必须保持安全与便利。这个英国式的作战同美国以世界政策为基础的作战，当然是依照不同的计划而进行。最后，英、美双方达成的妥协是：一方面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实现最大的目标；另一方面使巴尔干的作战获得更大的效果。

英国的帝国政策因此与美国世界政策相配合。从丘吉尔的保守主义发展到艾德礼的自由主义，战后英帝国政策仍是在美国的世界政策的轮廓之内才获得了很大成功。开辟第二战场时英美意见的协调便可证实这一切。领导英国获得战争胜利的斗士丘吉尔自然地又与罗斯福所希望的由美国领导世界的计划相配合。

魁北克会议的意义　在魁北克会议中，英美双方决定调派主力进攻德国，这和过去欧洲第一主义的作战并无变

化。这次会议除去讨论战后处理轴心各国外，双方首脑部又交换了关于战后国际机构的意见。总之，魁北克会议在战胜的前提下，协商了今后的作战及政策的全部问题。

魁北克会议时，恰巧意大利投降的消息报导出来，英、美方面的士气更为旺盛。丘吉尔在会议后，先赴美国与罗斯福再交换一般问题的意见。有一天，他到哈佛大学，论及英、美在今后世界上的地位和责任时，主张两国的市民权必须共通，鼓吹为领导战后的世界应采取"英美合体主义"。

确保和苏联的合作 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应当立即通知苏联，其它各种问题美国也早想派员赴苏沟通意见。于是函询苏联政府，可否派赫尔国务卿赴莫斯科传达魁北克会议的结果。苏联表示欢迎。因此，英、美、苏三国间的危机才告解除。当时，德苏战场方面，苏军已占决定性的优势，开始第二次的夏季大攻势，波兰共产党解放委员会及自由德国委员会都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也依照美国的要求而解散，苏联开始积极准备处理战胜的收获。北非的戴高乐政府首先被英、美承认为合法的自由法国政府。另一方面，日本在太平洋一再败退。在中国，中共又发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七月)。

赫尔国务卿及艾登外长联袂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底访问莫斯科，立即与莫洛托夫举行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虽然将开辟第二战场、处理德国，以及设立欧洲咨询委员会等问题提出讨论，但赫尔国务卿最努力完成的却是成为现在联合国母体的美英苏中四国签署有关战后国际机构的协约(四国莫斯科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为了实现美国的战后世界政策，除了英、美合作以外，苏联的合

作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中国已是亚洲的代表者，必须列为大国之一。赫尔在莫斯科时，关于这些问题曾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并力劝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直接谈判，结果在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上也获得了默契。然而斯大林对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却表示非常冷淡，相反他告诉赫尔，苏联有意参加对日战争，这使赫尔大为惊讶。

苏联已与日本订有中立条约，且一再向日本保证绝对遵守这个条约。然而，在一九四三年秋，竟从斯大林口中直接说出有意加入对日作战的这种话，而且是透露给美国的。由此可知，苏联早已做准备却又参加了谈判。直到这时，日本才获悉苏联的真意，对苏表示更为忧虑。日本曾提出派出亲善使节赴苏，这一提议遭到了苏方的拒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认为如果在满洲的势力不能保持均衡，日苏关系必将危险，所以格外加以警戒。

赫尔在莫斯科完成任务返抵华盛顿时，受到上、下两院空前的大欢迎，他做了详细的报告。美国当时一般人都知道无论第二战场开辟得早晚苏联都应该协助，所以似乎感到安心。听此报告后，更为感谢和满意。赫尔的访苏使英、美与苏联的关系已告恢复，并决定以英、美、苏的力量进行包围德国的共同作战。

十四　与美英作战（三）

太平洋作战与欧战第一主义　当时美国是在大西洋及太平洋两面作战。大西洋方面，是与英国共同在欧洲大陆作战；但在太平洋，对日本本土的正面作战，却是以美国

为主力。至于究竟应以欧战为主呢？或者以对日战争为主呢？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统帅部的首脑之间，最初也是有歧见的。美国一般舆论是先解决对日战争，但罗斯福总统却始终站在大局的观点上，支持欧战第一主义派的意见。可是，这并不说将对日战争拖延下去，仅是将战争重点放在欧洲。在此方针之下，美国仍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对日战争。

珍珠港被突袭之后，美国经过了一个重建的准备时期，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中途岛大战后，在华盛顿召开有关各国的太平洋军事会议。

从此，很明显，美国开始反攻了。在太平洋虽然陆续获胜，然而日本陆军在中国占领地区，仍拥有强大的兵力，要迫使陆军屈服，仍是遥遥无期，所以当时都推测对日的决战，必须展期在击败德国之后才能实行，而且估计需数年才能完成。因此，在此期间内，必须鼓励援助中国，可能的话将苏联也拉入参加对日战争，与联合国各国密切联系，有更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国共合作时期，全国一致抵抗日本，而且背后又有英、美、苏各国的支持，中国决不至于停止战争；但为了激励重庆国民政府，安抚中国民心，确有将英、美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明白地公告世界的必要，这不但是对中国，同样的，对英、美、澳各国，在共同作战上，也应该如此做。

魁北克会议时，已获得基本谅解的英、美两国，作为展开决定性攻势的棋子也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开罗会议 罗斯福与丘吉尔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前往开罗，并邀请蒋介石委员长来此地，决定中、英、美间有关对日作战的最高方针。蒋介石先生除蒋夫人之外偕同军部

首脑人员参加会议。

开罗会议决定首先进行英美双方协议，关于对日战争的问题主要目地是要使蒋先生高兴。会议决定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所获得的各岛全部予以剥夺，日本从中国所侵占的领土包括满洲及辽东半岛(旅大)、台湾及澎湖岛全部归还中国，并恢复朝鲜的独立。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

尚未对日参战的苏联，当时对开罗会议颇为注意，但并未参加。苏鉴于与日本有《中立条约》关系，表面上为避免刺激日本特别小心翼翼，但事后证明苏联早已决定了在对日战后期参战的秘密计划，以便在东亚方面取日本而代之。以后，由于苏联参加了波茨坦宣言，也追认加入开罗宣言。

罗斯福及丘吉尔与蒋介石会谈后，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见。

美、英、中对日作战 英国的对日战争是以澳洲及印度为根据地。印度总督由北非英军总司令官、后改任印度军总司令官的魏菲尔将军担任。除去调派军队及训练印度兵外，虽然英国的交通极困难，但为了仍能继续单独对日作战，故在印度各地建立了许多军需工厂。英国的对日作战和地中海海战一样，也是从英国的观点出发，开战初期以马来半岛为防御线，以后进攻的方向是从澳洲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香港。这一点可以看出与美国以直接使日本屈服为目标的大规模作战根本不同。

在进行对日战争期间，东南亚方面，美英军的司令官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欧战那样尖刻，但仍有歧见。尤其是美国史迪威将军所主张开辟印度、重庆空运交通线的问题，

美、英立场未能一致。美军想空运飞机及军援物资，加强重庆方面，而且美国空军要从中国本土起飞，轰炸满洲及日本本岛，以便破坏日本战斗力的根源。相反，英军想将主力集中，夺回缅甸、马来及新加坡等地，美军对这种作战似乎并不感兴趣。

美国的反攻是以澳洲为基地的麦克阿瑟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为主力；另一方面，海空军以夏威夷为基地，由尼米兹总司令统率。麦克阿瑟军首先夺回了瓜达康纳尔，再经过新几内亚、菲律宾、台湾、琉球，直逼日本本土；而尼米兹舰队夺得了马绍尔、卡罗林诸岛后，进攻关岛及小笠原诸岛，并有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空军主力协助作战；东南亚方面的史迪威计划从中国大陆进攻日本；英澳联合的东南亚军在夺得新加坡后，继续北上。这些联合军队，在最后日本投降时，由麦克阿瑟为统帅。

中国军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自日中战争开始后，都到处坚决抵抗日本，所以在共同作战方面更做有力的部署，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十五　与美英作战（四）

美国的亲苏政策　在美国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与日本和德国作战时，苏联已经与德国激战，所以苏联是美英的恩人与救世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布金斯，于德苏开战后一个月，忽然来到莫斯科，以后哈尔曼也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抵达，并根据《援助法案》无代价地送给苏联十亿美元以上的援助物资。赫布金斯同哈里曼两人都主张与苏联进行“无条件合作”。军事首脑马歇尔元帅等的意见也

是想利用苏联。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斯福总统从开罗到德黑兰，应斯大林的邀请前往苏联驻伊朗大使馆，与斯大林、丘吉尔开始会谈。当时罗斯福的态度是为了赢得对日德战争，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所以他用尽各种手段，努力使苏联在战后也能协助美国的世界政策。因此，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求，都全部无代价地予以允诺，以期获得斯大林的好感，使他不但在战时可以合作，即在战后也能配合美国的世界政策。

爱好和平的民主国 罗斯福的上述措施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更符合了他世界共产化的目的。对于罗斯福所提出的《大西洋宪章》，斯大林也表示同意；对于战争的一般目的，即拥护民主主义等事，当然也表示赞成。为达到这一目的，在战时或战后的国际协助等诸问题，都没有表示反对。同时，斯大林对过去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并未多提。斯大林还进一步透露在德国崩溃后三个月内，苏联必将参加对日战争。这一点使罗斯福特别喜悦。

罗斯福甚至相信用基督教的民主主义的方式与斯大林直接会谈，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更公开地说："苏联的要求，仅是为了确保安全，其目的仍是为了和平。为了这个目的，苏联需要与西方国家合作。"于是，罗斯福误认为苏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在德黑兰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声明中，也使用了这种名词。其实，美、苏的世界政策在根本观点上是不同的，无论所谓"和平"还是"民主主义"，双方的解释均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罗斯福等美国领导者竟无条件地表示了这种态度，致使政府各部门及民间机构，甚而派驻中国或南美的美国人，也都信以为真而采

取了这种态度。

美苏两国关于结束战争的政策 德黑兰会议时，苏联的领袖们对于未来战争的发展似乎已经获得了结论，症结已经不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德国屈服有关战争最后阶段的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的问题。苏联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理想，而是具体的利益。它所想的是如何将共产主义势力在各地区扩张，也就是在东欧、巴尔干及中央亚细亚与远东所面临的势力范围问题。一九四二年五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希望英国同意苏联在东欧及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但艾登外相考虑到美国方面的意图，并未承诺，反而建议缔结英、苏同盟条约。苏联的目的，永远是猎获具体的权益，所以斯大林表面上赞成罗斯福所怀抱的世界政策，实际上他是想努力利用这个而达到自己的目标。爱好和平的两大国领袖思想，外表是一致，而实际却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的。

在德黑兰会议中，关于对德作战有关的军事及政治方面最重要问题也曾加以讨论。

十六　与美英作战（五）

德国战败 一九四四年是英、美、苏联合阵线在战争中最顺利的一年，相反却是轴心国更忧虑的一年。苏军在东部战场，从南、中、北三个方面，如洪水般地同时涌入德境，当时，斯大林宣称："已有把握将猛兽堵在岩穴之内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军也在法国北部布勒斯特半岛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更以破竹之势，越过莱茵，侵入德国西部。德国的ＶＩ等各种秘密武器并

未发挥扭转战局的效力。与法国北部战场相呼应，英、法军又从地中海方面在法国南部登陆。德军隆德许铁特将军的反攻并未奏效，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后胜利的信心。关于统帅问题，希特勒与军部之间又发生了歧见和磨擦。因此，基础尚未坚固的纳粹德国内部开始动摇，军部中背叛希特勒的人陆续出现了。

兹将一九四四年初期以来，欧洲战场及其有关的重要事项，列举如下：

一月二十七日	列宁格勒解放。
四月十日	苏军收复敖得萨。
六月五日	德军自罗马撤退。
六月六日	英、美军登陆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
六月十五日	美军收复塞班岛。
九月十二日——十六日	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九月十六日	苏军进入索非亚。
十月一日	联军登陆希腊。
十月十二日	红军夺回里加。
十月九日——十八日	丘吉尔、艾登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莫斯科会议。
十月二十日	美军登陆雷伊泰岛。
十月二十三日	英、美承认戴高乐政权。
十一月三日	英、美军结束比利时作战。

十一月二十日　美、英军突入亚尔萨斯。
十二月十六日　德军隆德许铁特开始反攻。
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七日　苏军占领布达佩斯。
二月四日——十一日
　雅尔塔会议。
三月五日　美军突入科伦。
三月二十一日　日本公布硫黄岛陷落。
四月二十三日　红军攻入柏林。
四月二十五日　旧金山会议召开。同日美苏两军在易北河畔托尔高地区会师。

德国军部的谋叛　德国纳粹党部和军部之间从来就充满了矛盾。指挥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总指挥鲍留斯元帅被俘之后，苏联立即利用他，试图报复德国利用被俘的苏联将领乌拉佐夫一事。

德国侵入苏联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已经掀起了民族运动。为了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压迫，不断地向德军投降。战争的第一年，投降人数就达二百万。乌拉佐夫当时组织了反苏军，还着手苏联统治之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并逐步显示了效果。但是德国想把这些占领区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因此，对于乌拉佐夫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太感兴趣。战后，乌拉佐夫的余党均被联合军逮捕，交给苏联被判处死刑。苏联利用鲍留斯不断地向德国广播，劝告德军反对希特勒。在莫斯科，由德国共产党员组成了解放委员会。一九四三年九月，塞依德里茨大将为首的被俘德国军官成立

了"德国军官协会"。战后，编入东德警察队的很多人是战时的被俘军官。

在德国，本来军部是亲俄的。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德军将校曾援助苏军建设。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反对战争的军人们被压制。他们筹谋着暗杀希特勒和建立和平政府的活动，在贝西拉斯滕堡地下室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但是参谋本部的冯·施道芬堡的计划失败了（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不久，发生了血洗背叛希特勒的事件。战争的最后时刻，在军人中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仍在进行之中。德国对苏战争走向失败以来，陆军内部已经发生了崩溃，许多军队丧失了战斗意志，不执行希特勒的命令，逃避对英、美军进攻的积极反击。纳粹统治已经失灵，就是军队的上层也在酝酿反希特勒。

德国战势不断恶化，日本战势也处于令人忧虑的状态，海军亦感到应绝对防御的加罗林线有困难。不久，塞班岛失守，太平洋战争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雅尔塔会议与建立国际机构 罗斯福与丘吉尔两巨头各带军政最高长官数人，为研讨处理有关结束战争的事，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到达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的从前沙皇的行宫，受到了斯大林的欢迎。英美两国经过长时间的商洽后，为了迁就不愿出国的斯大林，于是在雅尔塔举行这次会议。

在会议时，斯大林的大部分要求都被罗斯福接受了。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在战后的联合国中，也各获得一票的权力。波兰及巴尔干各国的问题，原则上也都获致协议。本来英国对波兰及巴尔干各国，在欧战开始时，关于领土及独立，已经予以保证，因此对这些国家转而被苏联占有表

示不满。以后，对雅尔塔协议的解释虽然英美与苏联的不同，但在伦敦的以波兰农民党为基础的流亡政府，最后仍不得不向苏联的主张屈服。于是，苏联将东欧及巴尔干全部控制在自己武力之下，并在各地很顺利地成立了赤色政权。

关于对德国的作战，苏联承认可以进驻易北河为止，赔偿问题也达成初步的谅解。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并同意派莫洛托夫外长出席旧金山会议，商讨有关联合国组织的未了问题。罗斯福更表示欢迎苏联参加或协力战后的国际政治。在他的印象中，美国指导的世界政策，在战后定能很顺利地实现。他很高兴地离开了雅尔塔。在会议时，关于联合国理事会中大国的否决权及纷争国双方的投票权也达成了妥协。关于后者投票权的问题，苏方表示让步，但对大国否决权，却郑重地坚持。而苏联更要求苏联联邦十五国都有表决权，妥协的结果是，只苏联、白俄罗斯及乌克兰有三票的表决权。

罗斯福之死　罗斯福自雅尔塔归途中在中东发表了威胁的宣言，他说："在这次世界战争中，未参加合作的国家，在战后的联合国中，必将他们开除。"他呼吁土耳其及其它中立国参战，因此许多中立国陆续对轴心国宣战。这次罗斯福的声明已经明显地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联合国的本质。

英、美双方虽在战争中却仍积极为战后的政策而准备：关于维持国际和平的机构，除政治部门外，更有国际经济、文化、粮食及劳工等各部门。有关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一九四四年七月）及有关战后保障安全机构的敦巴顿橡林会议（同年八月）是其中主要的，其它各种国际

会议也在筹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旧金山召开会议的宗旨，也就是希望在结束战争以前，由战胜国就这些国际机构达成协议。因此，美国为了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不惜在雅尔塔会议时百般地努力，想利用联合国作为战后世界政策的基础。

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后，已经精疲力尽，几乎处于半病人状态，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旧金山会议之前，也就是德国全面崩溃的前夕，忽然死去，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地位留给了副总统杜鲁门。

雅尔塔会议与东亚问题　罗斯福死后，大战结束，才由白宫发表了关于东亚的英、美、苏密约。全世界都震惊了。因为这密约的存在，在美国，除签字人罗斯福外，无人知晓。据说这还是在他死后从白宫保险柜中发现的。由三国最高领袖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共同签订的秘密协定是根据军部首脑们的希望，作为引诱苏联对日战争的代价，罗斯福终于答应苏联的要求而缔结的。苏联方面企图战后在远东大陆方面完全继承日本的地位。

根据这个秘密协定，苏联恢复日俄战争以前旧俄罗斯帝国在满洲之权利，以及一九一九年七月自己宣布放弃的全部权益。例如：旅顺港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苏联获得大连港及通往大连之满洲铁路之优越权利，且美英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关于日本方面，英、美两国保证将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千岛，归还苏联。这个文件，依照斯大林的请求，除斯大林外，并由罗斯福、丘吉尔签名，作为参加对日战争的代价。英、美给苏联的保障，事实上，是东亚大陆北部苏联的特权。一九四三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赫尔国务卿透露，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以

内参加战争，又于德黑兰会议时，更对罗斯福确认这个诺言。破坏《日苏中立条约》、忽视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签订的。英美两国竟将独立的它国尤其是与战时同盟国(中国)存亡有关的权益秘密卖给苏联，真是不敢想象。控制蒙古及“满洲国”即可支配华北或向中国全国伸展其力量，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能知道的，这些问题也是日本自苏联革命前后多少年来最感困难的问题。

此协定保持秘密很久，才由新任赫尔利特派大使告知中国政府，使中国大为惊讶，且表示不满，但是中国政府仍须仰赖英、美的援助，也无可奈何。经美国总统的劝告，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莫斯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承认雅尔塔的秘密协定。外蒙古从此正式脱离中国。又公开承认苏联代替日本支配满洲。

战后，在满洲及东南亚各地发生的扰乱主要原因都是由于这个雅尔塔秘密协定所产生的。这个协定实在是东亚全局(包括日本)命运攸关的重要协定。

十七　战局恶化

太平洋上的玉碎战态势　一九四三年，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由轴心国移到联合国手中。意大利投降后，德国无论对苏战争或对英美战争，都是继续在败退，而日军在太平洋各岛也展开了玉碎战。日本的陆海军与日本本土断绝了联络，兵员、武器、粮食等的补充均不足，到处展开了玉碎战。敌方把这种勇敢的作战精神称之为发疯，但它已给全世界强烈的印象：“日本人在此”。无论怎样批评，但这

些战死的陆海军都是日本民族的英雄和精华，他们的精神将一定能永远护卫着日本民族的未来。

在北方的阿留申、南方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南印度洋的尼科巴、安达曼诸岛，是与日本土相隔数千海里的绝海孤岛。把战线推至辽远岛屿的大东亚战争本质上是海空军的战争。日本是个岛国，必须依靠海外资源，把战争扩展到地球的五分之一，必然会感到战争补给的困难。

日本海上的补给虽然采取了集体的"船舶护送"办法，但牺牲仍不断地增加，日本所有的七八百万吨的商船队立即枯竭，许多运输船都和宝贵的生命及大量的军需品一同沉入大海。

珍珠港以及中途岛两海战都证明飞机是决定胜负的兵器，因此，落后的日本陆军及在中途岛遭受大损害的海军都倾其全力扩大飞机的生产。

军需生产的混乱 日本陆、海军分别自造所需要的兵器。海军在吴港及横须贺两地设有工厂，建造军舰、大炮及其它军需品，不足的才向民营工厂订购，但大量飞机必须依赖民营工厂的生产。

为了制造决胜兵器的飞机，日本工业开始与美国的工业竞争，所以需要更大的努力。每次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指导战争最高会议）时，双方总是争论制造飞机和争夺船只的问题。

东条内阁为发挥重要军需生产的效率，先行设立"监察使制度"，选有经验的人士派往各工厂地区，督导生产机关，密切联络，以期提高效率。同时，又在内阁中特设一个"军需省"，选拔实业家为大臣，以飞机为主，尽其全力进行军需品的生产。表面上虽然有了很大效果，但实际各生

产工厂已精疲力尽，毫无发展。况且监察使制度及军需省，对陆海军直接管辖的工厂，并不能干预，反以不直属于陆海军的工厂为对象，结果成了陆海军干涉民营工厂的机关。战时中这样临时调整机构，并不能矫正平时不健全的生产组织，而发挥更大的生产力。生产未能顺利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原料的缺乏及生产设备的不足。

从中国输入铁砂及其它原料已属不可能，而南洋的油及铝的原料也无法到手，于是飞机的制造能力虽然增加，但原料仍感供应不足。

总而言之，飞机的生产虽较前收效，但军部的要求也随着增加，从年产三万架增加到五万架，后又要求七万架，最后，联席会议决议年产四万架。因要凑足这个数字，开始粗制滥造，常常发生故障，新制飞机用空中驾驶办法输送，但能安全抵达目的地的为数甚少。

一九四四年六月塞班岛陷落后，日本常常被轰炸，交通机关发生阻碍，工厂又被炸毁，军需品的供给与前线的联络已经完全陷于混乱。

因战败造成的社会及经济组织的混乱 庞大军费的支付以临时军事费的名目无限制地付出，而议会方面也无批评地予以通过。军需生产工厂迅速地扩张起来，但为满足陆海军的需要，日本工业生产能力仍嫌不足，何况运用于全工业的原料资材更逐渐感到缺乏。

陆、海军在搜购资材方面几乎一直都在竞争对立。预算各占一半，但是已超过日本工业界的消化能力。陆海军为了动用预算，不惜争着用大量的金钱，从民间抢购重要物资；可是由于供不应求，引起物价上升，通货膨胀。为了制止这种现象，政府又用法律与强权，压低物价。结果，

黑市横行，即使陆海军的军需工厂及大规模的民营工厂也都因抢购物资而竟用黑市交易。因此，经济界的秩序开始紊乱，继而只有向萎缩枯死的路上迈进。

为了集中生产军用品，一般的经济都已完全枯竭，而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完全回到原始的状态，尤其粮食的缺乏，一年比一年厉害，最后为获得当日的粮食，妇女们也都到了疯狂的程度。政府所规定的配给，虽然实行得很好，但仍不够维持生活，结果，许多食物必须自己耕种，或者出去搜购。本来对战争并不十分理解的国民现在更以为这次战争并非国民的战争，而是军部的战争。陆海军皆属军人，除津贴外还有粮食、被服等特别的待遇，几乎在各方面都有特权，而这种特权是军官较士兵、上级比下级更优厚，所以军部内部的统制也混乱了，一般人对军人的恶感也随着增加了。

因为战败，这些社会形象普遍迅速地继续发生。军部为了执行强权、控制国民，竟毫不留情地开始利用宪兵及警察的力量。

十八　东条内阁下台

塞班岛的陷落　一九四四年，德国战争已近尾声，而英、美对日反攻随之日趋激烈。

在新几内亚东部，因饥饿而发生的自杀战未结束前，美军又在新几内亚西北部比库登陆以牵制日军。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调海军的主力开始进攻日军死守的马里阿纳战线重要据点的塞班岛。假使马里阿纳、卡罗林的防御线一旦被敌人攻破，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大势必将瓦解，

所以塞班岛的攻防战是太平洋战争的决战。

日本海军虽然因中途岛战败，以及在瓜达尔卡那尔一带的消耗战中受了重大损伤，但仍有抵抗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余力，所以特别期待塞班岛的这一战。由于舰队用油的关系，以苏门答腊一角岛屿为根据地的日本舰队奉命在菲律宾群岛的西南方苏禄群岛一带待机出动。

塞班岛登陆战开始后，美国舰队分数队在西方海上巡逻，空军为阻止由日本岛的增援，一再轰炸硫黄岛的空军基地。日本联合舰队电令赴比库救援的大和战舰继续北上，与航空母舰会合，以为这是攻破在塞班岛附近美国主力舰队的好机会，所以斗志极为旺盛。首先发现美国舰队所在地的日本舰队即刻采取各种击破美国航空母舰的战术，从六月十九日黎明开始，全力实行长距离轰炸。然而，空军并未发现敌舰，不得不在距离最近的塞班岛陆上飞机场降落，但立刻遭到敌人的袭击，几乎覆灭。丧失了空军的日本舰队已陷入不利的地位，边战边退，后又遭空袭及潜艇的攻击，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于是放弃了塞班岛。在该岛的守军如野兽般地激战后也都战死了。

塞班岛原在日本委任统治下种植甘蔗，但没有制糖工厂。日本移民也很多。战局紧张后，数千妇女和孩童都乘数只轮船返国，但在回到日本前均被击沉，人员全部葬身大海。

继塞班岛后，铁尼安、关岛及东南方的科塞林各岛都先后被攻占，守军也均战死。

对军部的责难 在御前会议上决定防守的马里阿纳群岛不久也被击破。日本不仅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发生动摇，即日本本岛也面临着太平洋美空军直接攻击的危险。

因此，日本朝野顿起了很大的恐慌。塞班岛陷落后，对日本岛的轰炸遂日趋激烈，展开了本土战的序幕。陆海军统帅部也惹起严重的追究责任问题。统帅部过去以作战上需要为理由，对内阁常有过分的要求，而政府总是被逼设法满足其需要，所以庞大预算支出、粮食、船舶及其它军需物资全部让军用优先，而民需几乎停止供给。可是军部仍再三宣言：这一次一定可以大胜。结果，塞班岛的决战竟一败涂地，以后则是每战必败。朝野一致责难统帅部过于注重政治外交，对军事作战反而疏忽，致使国防设备生产完全停顿。陆海军虽然仍在自夸，但相信的人再也没有了。民与军之间的感情完全破裂。

统一指挥战争 主持内阁、领导国民、对作战发号施令的东条大将经过研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战争未能顺利进行的主要关键在于战争指挥的不统一。例如：指挥作战与战争直接有关决策大都由独立的统帅部职掌，而内阁却不得过问，内阁变成仅是满足统帅部要求的一个机关而已。所以为了实现全面战争，指挥必须统一，否则一定战败。东条想到这几点虽然为时已晚，但现在仍应有加以审慎调整的必要。

日本陆海军分别直辖于天皇，虽互相可以协商，但不得干涉，双方已形成独立的相对抗的机关。于是东条大将遂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强行改组自兼参谋总长，企图直接统治和指挥陆军。海军也效仿此办法，永野辞军令部总长职务，改由岛田海相兼任。此后日本陆海军改由东条、岛田两大将直接统辖。东条以首相身份领导内阁，现在已掌握巨大范围的实权，但对海军仍不能干涉。

改组后，东条的主张在各方面都较能彻底实行，统帅

部与政府之间关系也较前密切，但这些治标的办法又怎么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呢？日本实力与敌人比较过于弱小了。况且，权力的集中反而增加了东条的独裁性；宪兵政治的流弊更加严重，使全国人民的愤恨都集中在了东条个人身上。

随着战争的紧张，国民生活的不安也日益增大。左派人士乘局势恶化煽动得更为猛烈。国民互相推诿责任，造成谩骂的风气，全国排挤的丑态越发暴露出来。宪兵以疑心监视人民，例如：曾吹捧过纳粹的政治评论家中野正刚竟因公开演讲反对东条便被宪兵逮捕，释放后即自杀，原因迄今不明。由此可知，社会的不安是怎样地增大着。

东条命令凡是反对内阁的败战主义者，或者被认为有鼓吹和平运动嫌疑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要求国民举国参战。但一般的批评更坏，反抗者只有增加。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朝代，对于专制政治外表上虽是服从，但暗中仍在设法反抗。东条的末期，是自满洲事变以后国民对军阀横暴跋扈的恶感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总之，越压迫或越败战，国民的反抗也越坚决。

对东条首相的责难　军队内部到此最后关头对东条一人身兼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之要职表示非常反对，尤其在国外各地部队的指挥官们更是指责东条。由此可知，军部派别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争斗。互相攻击增加了感情的磨擦。参谋本部也不赞成东条此举，故有两三个皇族出身的军人秘密面奏天皇：陆相不可兼任总参谋长之职。

重臣们对东条的独断专行也表不悦。东条表示假使重臣对国家有不利的言论，或进行和平企图、颠覆内阁运动，就采取不客气的手段对付。大多数的重臣断定东条有负众

望，开始秘密接触策划倒阁运动。此外，最具体的活动是对海军大臣兼任军令部总长的责难。海军内部的人指责岛田是傀儡，而部外的人也批评他不能肩负这个重任。海军过去对国民一直秘而不宣中途岛以来的败战，以及塞班岛战中海军的无能，现在国民已完全获悉并一致主张追究岛田应负的战败责任。就是天皇也曾面谕东条应加注意，所以东条不能再置之不理。

东条下台 对于东条内阁的恶评已成了朝野上下的舆论，即阁员中也有人劝他下野，但东条仍坚决表示在战时绝不辞职。为了缓和对他的攻击，他辞去兼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继其后任，海军也另调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大将兼任军令部总长。不久岛田辞职，改由前驻柏林武官野村海军大将任海相。

嗣后，东条又更换一二阁员，并想邀请陆军的阿部大将及海军的米内大将入阁任不管部大臣，以便强化内阁。东条实际上并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独裁者，他仍有很多不如理想的事。米内海军大将以军人不愿担当文职为由拒绝入阁，结果东条内阁改组的计划终于失败。

东条最初顾虑的是怕负责开战的人中途垮台，可能使世界各国误会自认败战，所以进退维谷，颇费踌躇，但人心已失，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遂决定停止改组内阁而呈请总辞职。

第九章　大东亚战争（续）

一、小矶内阁成立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小矶、米内联合组阁　为了挽救政局的混乱，于七月十八日召开了重臣会议。重臣们虽积极参与推翻东条内阁，但对收拾时局并未抱更大的决心与良策，因此对遴选后继人颇感困难。

重臣会议照例先由天皇垂询，再开始推荐后继内阁首相。结果因在战时需要军人任首相，为了推行战事及统治军部，又一致议决应由陆军为主，遂遴选前朝鲜总督小矶陆军大将为首相。本来陆军的第一候选人是战争论者的急先锋寺内大将，但是因为寺内大将不能离开南方战场，所以小矶大将首先被遴选。

小矶大将除满洲事变外，被认为是三月事件及十月事件的幕后核心人物，在战前早已离开政界，与指挥战争久无直接关系。近卫等重臣对小矶的资历甚为忧虑，特别推荐米内海军大将协助小矶大将。米内遂排除海军的反对，用天皇的敕令恢复现役任海军大臣。陆军大臣杉山以及外务大臣笔者仍继续留任原职，笔者并兼任大东亚大臣。此外，前田米藏、岛田俊雄等政党领袖也被邀入阁，以表示重视国会的势力。

然而，小矶与东条不同，他虽是陆军出身，但并非现役军人，对军部既无实权，且与陆军的主流也无联系，与政党更无密切的关系，所以新首相唯有仰赖这些私人关系的合作。

笔者作为外相兼任东亚大臣曾承诺，要重视一般外交与大东亚政策的关连性，不改变已实行的对华新政策，以反映上峰的意图。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小矶内阁虽非强有力的内阁，但他没有象东条那样独裁，故一般评论尚佳。可是他仍是战时内阁，只注重如何使战争转趋有利，并非一个商讨和平的内阁。和平问题，依照过去的实情，仍须在阁外策划（根据木户内大臣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口供）。

小矶首相为加强大本营之联席会议，将它改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小矶更改会议名称的目的，似乎是企图利用自己军人的地位掌握指挥大权。但是这个会议原系统帅部在大本营内召集的，内阁人员即便是首相的发言权也只限于与内阁有关之事宜。实际上，军部并未将指挥大权让与内阁，况且，首相与陆相根本是两个人，除非首相是现役，否则军部与内阁是各自存在的。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过去的联席会没什么不同，这个会议的常任委员有统帅部的陆海军两总长和两次长，政府方面有首相及陆、海两相及外相（东条内阁时期，藏相及企划院总裁也出席会议），其他的阁员遇到关系自己事务时才临时出席会议。为了贯彻会议的事项，陆海两军军务局长及内阁书记官长均出席，必要的官员则在邻室等候。会议的内容及其状况也同过去没有任何不同，对于军事统

帅和作战一点也不涉及，相反却人为地使首相与陆相相分离，在事实上感到远离了战争指导。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之后，在全体内阁成员会议上，关于战争经过由陆海军情报部长做说明，外务省政务局长则对外交情形做说明。内阁会议的议题是，会议事务局首先提出，由陆海军军务局长同内阁书记官长商议后，又与有关人员商洽，然后制定计划、方案。为了完成直接的战争，有许多是统帅部对内阁要求的船舶、飞机以及其它军需资材方面的问题，接着还有内政、外交等问题。这些大小问题只有处理军部制定的计划要求是会议议论的常例。关于军部作为作战上的必要的要求，是内阁成员不理解的重要政治问题。他们只好专心致力于防御的努力。

关于战争状况的报告常被人们最认真地听取，由负责官员做相当详细的说明，但大体上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说明，至于日本方面战败与损失的真相，则不报告。首相以下的成员，对于广泛的军务也就是统帅事项，当然没有发言权。

其结果，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只是旁听统帅部为实行指挥战争上所必须辅助的各种政策的决定和接受军需物资的订单。这个会议竟变成了交易所，小矶内阁只是全力供给定货罢了。

战况恶化　小矶虽对统帅部要求的军需物资，全部予以供应，可是战争状况却与本身所期望的相反，形势越来越恶化。

在美军夺回塞班岛之后，日本注视着美军下一次进攻的方向。从战略位置及飞机场的地形观察，一般推测是美军必择塞班岛更接近日本的海洋方面，尤其是小笠原群岛

中的硫黄岛；但是，夺回新几内亚北部及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的北上的美军究竟会先攻何处，尚是个谜。一般人预料麦克阿瑟将军可能会放弃跳岛的战术，选择任何都可以登陆的地点。当时，尼米兹所率领的美国海军，在战略上计划穿过菲律宾群岛先期占领台湾，打算与中国大陆确保联络，切断日本与南洋的交通，然后开始进攻日本本岛。但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夏威夷召见麦克阿瑟将军时采纳了他的意见，为了表示不放弃菲律宾人，批准实行对菲律宾岛登陆的作战计划。

开战之初，麦克阿瑟在离开阿里基多要塞时曾宣称："我必重回菲律宾。"他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力劝罗斯福总统夺回菲律宾。他选择了吕宋岛的东南部的成为南北菲律宾连锁地形的雷伊泰岛，于一九四四年十月指挥优势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开始了大举进攻。当时山下奉文将军已在马尼拉，菲岛的日本军队增援也很多。山下将军认为敌人登陆雷伊泰岛正是求之不得的，所以调派大批援军增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也指挥其舰队待机出动。当时陆海军说明这是决战的绝好时机，政府阁员也特别期望取胜。为了救援雷伊泰岛，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对于统帅部所提出要求的船舶等竭尽全力提供。小矶首相也声明雷伊泰岛将是胜负的决战场。连吕宋岛的陆军预备队也被调出来，日本联合舰队亦从南方基地出发，参加最后的决斗。

雷伊泰岛之战 塞班岛战败之后的日本联合舰队虽损伤甚大，但尚有作战的能力。美国陆海军既展开对菲岛的争夺战，日军当竭尽全力应付。日本联合舰队分两批开往吕宋岛南部，它的战略是一部分从雷伊泰南方直捣敌人的

登陆地点，企图搅乱敌人的基地，另一部分迂回雷伊泰北方进攻敌人，准备阻止登陆。为了牵制这次的作战，从日本国内派山泽舰队急驶吕宋岛的东北方。从雷伊泰岛南方突入的舰队途中遭遇空袭及潜艇的攻击，予敌人以重创之后全部战死。而迂回雷伊泰北方的栗田舰队，于击沉敌舰数只后，停止突入雷伊泰的作战，准备驶回日本，却忽遇南下敌人舰队的空军的主力，又告全灭。

雷伊泰一战，日本联合舰队事实上已全毁灭了。国内所残留的舰队薄弱得不值一提，这是战后才知道的事实。战时建造的六万四千吨级的"武藏号"战舰(载有十八寸巨炮九门)也在这时被击毁。

当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席上已收到了关于雷伊泰之战的详细报告，但陆海军仍说予敌人以重大杀伤，敌人已丧失进攻能力，我方因寡不敌众，迫不得已而撤回。他们更说："敌人越近，我方越有利。"军部发表这些声明，内心必然是很痛苦的，但企图使国民及内阁仍抱有希望。然而当外务省根据敌人发表的资料质问军部真相时，军部仍然坚决否认敌人的战报。

吕宋岛之战　雷伊泰岛之战受到敌人沉重的打击，日本军事当局没有领悟到美军会很快地进行下一个进攻目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麦克阿瑟宣布雷伊泰岛之战结束，并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率领大批水陆部队直接逼近吕宋岛的西海岸，在林加海岸展开了登陆战。这次进攻完全成功，马尼拉于一九四五年二月被美军夺回。

根据陆军的说明，马尼拉是开战以来日军的根据地，既有充分的防御设备，军需物资储藏又甚多，在山下将军指挥下必能大获全胜。小矶首相也说，吕宋岛之战是日本

的天王山。政府采纳了军部的要求，牺牲民需供应品，将手中的东西全数提供给战斗部队，真可谓震动了天王山。一般国民也特别期待这场战斗的胜利。然而由于雷伊泰一战后，日本舰队已受到致命伤，输送船只也消耗殆尽，对吕宋岛之战不能增援，所以山下将军也和其它孤岛守军一样，走上了自杀式的玉碎战之路，但是山下麾下的海军与陆军部队不能统一且搞磨擦，虽在最后仍在暗斗。

对于美军的凌厉进攻，日本军队几乎无法还手，只有举行玉碎战。当时被认为做了充分准备的山下将军，其实部队的防御装备非常薄弱。在巢鸭监狱中，据山下将军的武滕参谋长透露，他上任时看到部队薄弱惊讶不止。而且在菲岛的日本占领军，对于新政策欠缺了解，又在败战死斗时常常发生不轨的行动，在菲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坏印象。

日本承认的菲岛政府拥立的总统劳雷尔在北方避难。后来，他带两三个慕僚以及村田大臣来日本避难。

硫黄岛的陷落　继塞班岛之战后，尼米兹又统率大军围攻硫黄岛。因为小笠原群岛是东京的一部分，这时日本人才感到战火已经迫近了。但无论是海军或空军方面都无力增援硫黄岛。棚桥守军利用火山岛的地形建造巧妙的阵地血战，最后全部阵亡(三月二十一日)。

美军在塞班提尼扬建筑机场之后，开始用B—29型轰炸机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因空袭而造成的损失日益增大。尤其夺回硫黄岛后，更加方便了美军飞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所以美军更利用该岛作为基地展开对日本的猛炸。

攻击日本的空军由塞班岛起飞，分数队飞近日本，以富士山为目标突入箱根上空，或以名古屋的工业地带为目标，或以东京、横滨为目标，实行夜间空袭；白天则在高空飞

行，侦察地形或摄影。

美军有时又从纪州湾或丰后水道空袭大阪地区，将四国、九州、关西一带的工业区及其它城市都予以普遍的轰炸；另一方面又从房总半岛轰炸日本东北地区。B—29决不放过日本海沿岸的任何一个重要城市。

此外，由中国起飞的美国空军也轰炸满洲的鞍山炼钢厂，因而使日本又蒙受很大的损失，同时使日本人颤抖。以后，在中国的美空军又开始轰炸日本九州北部的八幡制钢厂和佐世保军港。于是，日本完全被美国空军所蹂躏。

空袭 空袭给日本最悲惨的教训。美国空军以日本军需生产向民家疏散为理由，采取了大小城市一齐轰炸的手段。日本的都市房屋，几乎都是用木材建造的，所以用烧夷弹最易毁灭，美军将烧夷弹加以改良，增强了爆炸的威力。其使用的方法，依照一定计划，首先飞入日本上空的机队先在城市的周围投下若干炸弹，使城市发生大火，尤其常在风强的黑夜以利用顺风；第二批机队再以被火灾包围的都市为目标，在此火圈之内部，挨着顺序投下汽油弹，此即所谓"绒毯式"的轰炸。大都市如东京、横滨曾在一夜之间遭受到数次空袭；但是小城市只用一个编队，一次就可以把小城市烧光。被轰炸的城市，似被一片火海包围，居民被烧死、炸死的不计其数。据云三月上旬东京下町地方的空袭，烧死约有十万人左右，隅田河的水都变得发热，被尸体所遮盖，其惨状比大地震时更厉害。全国大中城市都被烧光，烧死的居民也在数十万人以上。

日本本岛日渐变成焦土。面临这样的惨状，缺衣少食的人们实在太悲痛了。在这种情形下，军队主张实行玉碎战，自然被认为是可行的办法。如果有天皇的命令，日本

的全体臣民真想冲到战火中去。

日本大地震 在美军对日本空袭的初期，集中于名古屋一带的工业地区，由于空袭，致使该地区的军需生产损失惨重。不幸正在此时，名古屋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大地震，其损害的程度较空袭更大。丰田区一带街市完全烧毁，一部分精密工业已经破坏到不能恢复的程度。连日的空袭，再加上大地震，日本人真是多灾多难。

日本的军需工业饱受轰炸及地震的破坏，已遭到致命的损害，无法恢复生产。但军需大臣和政府、工业家以及工人们如同战场上的勇士，仍在其岗位及工厂中继续挣扎、苦斗。他们曾考虑将飞机制造工厂转移到地下，但已为时太晚了。

用血和汗制造的飞机、船舶及各种军需物资虽然由工厂大批地运出，但是大部分在运到战场以前，就遭途中空袭而沉于海底或被炸毁。

二　战时外交(二)

对外方针 小矶内阁为了进行战争，尽全力协助统帅部，可是战火日渐逼近日本本土。小矶一再强调对重庆国民政府及对苏工作的重要，并且说：“如不实现，将遗恨千古。”因为要使战争转对日本有利，就必须使重庆国民政府脱离英美阵营，使德、苏之间休战，并将苏联拉入我方的战线。这种见解也是军部的想法。

关于这几点方策，在东条内阁时代本已尝试过，尤其在目前的战争状况之下，已经得到结论是决不可能。既然无成功之把握又不合情理，就不过是掩饰败战而已。据笔

者观察，日本的败战早已决定，不如尽最大的努力着手寻觅接受战败的捷径。笔者以为对中国工作应在与日本命运休戚相关的“汪精卫政权”(即南京汪的国民政府)允诺之下，始可进行；而德苏之间的和平调停，如果德国不承担很大的牺牲，终究还是不能实现的。

对重庆的工作 汪精卫政权是在日本保护之下成立的，日本承认汪政权为正式的中国政府。汪精卫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访问日本之际，即使在日本皇室也是把他作为友好国家的元首接待的。而汪政权树立的标语也有“和平、建国、反共”，以统一国内和平为目的。实际上，汪精卫对于和平问题，曾表明愿意依照日本的希望进行，更为达到和平的目的，也表明其本人的进退可由日本人去决定。置南京“汪政权”于度外，密谋与重庆的直接谈判，在情理上是不允许的，尤其是鉴于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日本在承认汪政权以前，各个方面曾用尽各种方法，力谋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妥协，其结果均告失败。承认汪政权之后，政府决定暂时停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一切策动活动。嗣后，军部虽秘密地屡次派人在北平或上海企图再与重庆方面联络，但经手的中国人都是一些为了拥护自己将来的立场而与日本方面联络，至于重庆国民政府则根本置之不理。

这些中国人与重庆联络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是以个人的关系同重庆方面的友人进行联络，日本利用他们，而重庆方面也利用他们，以便从日本占领军取得若干的好处。从北平、上海走陆路到重庆或走海路绕道与重庆联络的人，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其中尚有一些人在

日本军人默契之下用无线电台与重庆方面联络。另一种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的，例如，上海实业界的各团体随着日本战争形势的恶化，开始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表示热诚，其目的与其说是为和平问题，莫如说希望使上海一带免受战火之灾。

这些人大部分都先与汪政权联络，如果没有汪政权的默认，是绝对无法进行的。在这种状态之下，日本瞒着汪政权而秘密地与重庆方面进行谈判，这是政策上的失败。这一切的不利都归日本，是显而易见的事。

东条内阁后期，日本曾决定不反对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后并促进这一谈判工作的进行。到小矶内阁时期，对和平工作更为重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决议积极展开与重庆的和平谈判，但是谈判要通过汪政权去进行。决议做出之后，特派柴山陆军次长(原为汪政权之最高军事顾问)赴南京。为避免误解，曾向汪政权特别详细说明此事。南京方面的首脑陈公博、周佛海(当时，汪精卫因病在名古屋医大病院治疗之中)予以同意，并表示此事需要相当的时间，在尽量早日办理这个手续后另行答复。

意见分歧 关于中国问题，小矶首相与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的笔者之间此时不幸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小矶首相任拓务省大臣时，对汪精卫逃出重庆虽未表示反对，但也并非衷心赞成。这种见解，直到他任首相时仍未改变，它与日本政府尊重并承认汪政权的想法不同。他任朝鲜总督时期，即与反对汪政权的日中人士不断往来，他对中国抱有特殊的看法。鉴于中国的地势及历史，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困难的，主张应在日本力量之下，分成

数个地区分别统治。他于十二月初旬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发表早已准备好的详细计划与具体意见，促请出席人员应迅速地加以考虑。笔者当即表示，这时提出这种政策的真意实在令人费解，遂作为外务大臣反对这个提案。在目前的阶段，日本对中国应采取的政策，仍须坚持过去一贯的方针，尊重中国人民的希望，不应当变更通过汪政权与中国人民谈判的态度。参谋本部代表秦参谋次长也表示在今日的形势之下，提起对华新政策的根本问题，很是令人遗憾。以后笔者与小矶首相的意见，始终未能一致。

小矶首相不仅与笔者意见不一致，就连军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同他有分歧。陆相杉山曾对笔者说："我对于小矶大将的做法感到非常不安。我在当次官时，他任军务局长，彼此之间不太了解。满洲事变前后，他就搞了许多小动作，其后照旧。这一次在他周围的，有满洲事变时的二宫（参谋次长），现在是内阁成员，还有松井（大将）、建川（中将）、桥本（大佐）、大政翼赞会的兴亚同盟和壮年团等，他们作为内阁的一股势力非常活跃。因为不知又要搞什么，所以须特别注意。"无意中接受了这种告诫，但因为总是反复遇到这一问题，所以使笔者似乎感到有什么更深一层的意义而须警惕。

改组内阁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小矶首相与笔者面晤，表明要改组内阁。军需大臣藤原银次郎因工作过度劳累而辞职，其他也想更换一二阁员，笔者所兼任的大东亚大臣改以二宫文相（中将）充任，田中秘书长改任文相，另起用某中将为书记官长，并说已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

关系到自己进退的大东亚大臣问题，笔者当时表示考

虑后再予以答复，因为这个问题包含有重要的政策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笔者采取了反对的立场。笔者认为，为了顺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大东亚政策必须与外交一致，假使另设专任大臣，有采取与外相相反政策的危险，所以表示反对。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首相陈述了对华政策，仍要把大东亚部与外务大臣分开。笔者则明确坚持不变更大东亚政策是作为外相的责任。后来有米内海相等从中斡旋，提出种种妥协政策方案。在战争现阶段，对这种根本问题，笔者决意坚持已见。

改组内阁，结果仅是更换军需大臣一人，滕原氏的后任改由吉田茂（当时的福冈县知事，前后生大臣与吉田首相同姓名）充当。

大东亚新政策的贯彻 大东亚新政策在笔者的指导之下竭尽全力地贯彻、执行。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交通也几乎断绝，许多计划不能实行或者困难重重。第二次大东亚会议召开就是个例子，由于各种因素，取代这次会议的是大东亚地区召开的大使会议。这次会议力图彻底贯彻大东亚政策。在笔者辞职之后，总算看到了这次会议的召开。

汪精卫终于在日本的名古屋病死，但其后陈公博接替了汪精卫的职务，同时周佛海也继续协助陈公博加强汪政权。笔者认为，此时对于贯彻对华新政策仍是有利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作为中国的“爱国者”，为了实现中国多年的愿望与要求，非常努力地工作；日本方面也给予大力援助，使新政策继续贯彻下去。新政策的实施，在政治方面：已经废止了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政治上的要求；在经济方面：笔者在兼任大东亚大臣时，就标榜新经济政策，

首先把驻外官员召集到东京，着手进行这项困难的事业，计划彻底坚持新经济政策，谷大使在他的驻外机关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因为战争形势的恶化，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了。

除中国之外，东亚各国也在实行新政策，同样也是积极推进。因为东条内阁没有使新政策得以实现，小矶首相则赞同实施新政策，因此立即决定在御前会议上讨论援助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小矶首相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演说。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在苏加诺访问东京时，笔者就已赞同其国独立。当时苏加诺很激动，准备按程序进行这一工作。兰印驻屯军的民政顾问林久治郎（前大使，满洲事变时任奉天总领事）的意见，被全部采纳。在该顾问指导下，在现地开展工作，此后苏加诺的独立运动在飞速地进行。

法属印支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法印当局迄今为止事实上对日本军仍实行消极抵抗的政策，同时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之下，对日本表面上遵守缔结条约规定，采取合作的方针。日本向法印南部扩张，在形式上取得了维希政府及法印政府当局德古的同意。以后，战争形势更趋恶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法印当局的地位更加困难了。

英、美两国对于法国贝当政府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贝当政府投降德国后，英国同贝当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美国则作为中立国与贝当政府保持了外交关系，罗斯福总统特别派自己的亲信李海将军（海军大将）作为驻法大使，监督法国贝当政府的态度。美国参战后仍保持这种关系，其间

美国利用阿鲁久里亚总督、维纲将军的亲美态度，与法属北非发生了关系。以后美国和贝当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美、英联军占领了法属北非等地。即使在那之后，美国对于在英国保护之下的戴高乐政权也没有轻易地承认。战争后期，戴高乐将军开始主持北非政权，并在法国本土解放的同时回到了巴黎。

维希的贝当政府随着德军从法国撤退的同时，也逃到了德国境内。戴高乐政权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得到了美、英、苏的承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戴高乐决定对日宣战，声明法国与日本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后来法印总督德古表示忠于戴高乐政府，法印与日本的交战关系更加明朗化了。显而易见，在充满敌意的法印的日本军的地位是非常不利的。

法印在马来、缅甸、爪哇以及苏门答腊等地日本军的背后，当法印成为敌人时，法印就起到对日军前进部队与后方的联络造成直接威胁的作用，所以日本军部催促部队要巩固自己在法印的地位，这是军事战略上所绝对必要的。既然对方已经表明了敌意的态度，若我方面不采取相应的手段，难道还要受侮辱吗？

越南及其它法印地方的民族运动即独立运动是自法国征服越南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法国的殖民政策与欧洲其它诸国同样（甚至更加反动）是镇压所有的民族独立运动。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们除了亡命日本及东亚各国之外，别无它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这些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们频繁往来于日本，独立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排除表示敌对的法国当局者，为确保日军的安全，承认民族独立的要求，实行独立政府的政治，是日本大东亚

新政策的根本点。因此，在法印的日本军队依照政府以及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法印当局解除法印军队的武装，令其将行政权交给独立政府。

在战时，笔者几乎全力运用大东亚政策来援助在法印越南等地的独立运动。

朝鲜、台湾的政治参与制度 大东亚新政策既然是日本决定在东亚地区贯彻的民族政策，那么实行这一政策便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朝鲜与台湾。

朝鲜与台湾永远归拓务省及内务省所辖。在外交的范围之外，准备按日本内地对待。本来对于朝鲜与台湾的方针，最初采取了同化政策。为了贯彻这一政策，军人总督实行了许多积极的措施。

在朝鲜，斋滕海军大将任总督时，提出了无为的感化方针。接替斋滕的宇垣、南、小矶等陆军大将在任时提出了积极主义的方策，最后一面把朝鲜人的名字改为日本人的名字，另一方面在朝鲜还实行了征兵令。在其它方面，对于朝鲜、台湾，应看到都有发达的日本文化设置，连大学都设置了。不但朝鲜人的政治知识顿时提高，就是各种工业生产也飞速向前发展。当时小矶总督对朝鲜人政治上的迫切要求深表同情，热心地提出送相当数量的代表到日本帝国议会参与政治。在东条内阁时期，内部已经确定选派朝鲜、台湾代表作为帝国议会议员的方针。到小矶内阁时，做了正式的决定，通过议会形成了成文法。

这种制度恰在爱尔兰独立前，与把爱尔兰众议院议员送到伦敦议会时的制度是相似的。然而，这不是朝鲜、台湾独立的直接目的，但必须承认这是迈向自治的第一步。满足于朝鲜、台湾现状是令人感到困难的。笔者欢迎有助

于朝鲜、台湾民族运动的划时代措施。总之，对此一方面是不满足，另一方面日本的行动对于大东亚政策又有矛盾。

缪斌问题 小矶内阁的末期，关于中国问题，小矶与笔者之间不幸又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重庆工作问题上。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议，特派赴南京的柴山陆军次长面请汪政权，开始与重庆进行和平工作。在未接到回答以前，小矶首相又想利用汪政权的立法院副院长、汪政权的异端分子缪斌进行这项工作，并且秘密地邀他去东京。

缪斌过去被蒋介石先生免职，仍然留在沦陷区，被日本人所利用，以后在北平任“新民会”会长，汪政权成立时，由日方推荐参加汪政权为委员之一。其后，汪精卫因为他曾背叛汪政权而予逮捕并拟处刑，后来由于日方出面疏通才未执行，而且继续任汪政权的立法院副院长。虽然如此，但他仍不断地策划反对汪政权，在上海与重庆方面的友人经常联络。日军情报机关为了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利用他作情报人员，而且默认他用无线电与重庆的友人联络。可是缪斌也利用这个地位及有利的条件，与反对汪政权的日本人士交往，以与重庆接洽为招牌，建议以撤销汪政权以及约定日本军队由中国撤兵为条件，设法请蒋介石回来，亦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据缪斌说，他所联络的重庆方面的重要人士是戴笠。戴笠当时是秘密政治警察负责人，又是美国秘密情报团与在日军后方进行搅乱的组织的联络中心人物，至少是不可信赖的人。

由他负责与重庆联络，在中国的日本大使及军司令官们都一致认为决不能成功。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小矶首相临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报告已将缪斌接到东

京，拟根据缪斌对重庆的提案为基础，准他使用无线电，由他的宿舍（首相之迎宾馆）直接电询重庆的意见。出席人员都惊奇小矶首相计划的鲁莽。

笔者对此举动表明反对，并宣读驻华谷大使拍来关于缪斌访日的意见的电报。谷大使说："这种计划既违反过去的决定，也轻视汪政权，决无成功的希望，况且从缪斌的地位看，他所提出的使日本让步的方案的结果仅是被他个人及重庆所利用，不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陆海军大臣也相继发表意见，均一致表示反对。梅津参谋总长更认为即使缪斌的策动能成功，恐怕指挥日军的撤兵也必发生困难。

嗣后，小矶首相同有关者秘密地交换意见，结果决定将缪斌送回，此事才告一段落。

四月三日，笔者突然奉召晋谒天皇。天皇说："小矶总理昨日入宫报告政务，提及缪斌来日之事，希望准许他进行重庆工作。我认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此时采取这种谋略手段，对整个大局是无益的，但小矶似乎不以为然。今晨我召见陆相征询意见，陆相也表示反对；又召见海相，海相强烈反对。对一国的总理采用这种手段深表遗憾。你的意见以为如何？"

笔者当即回答说："政府已经讨论数次，缪斌大概已经回国，请勿忧虑此事。"天皇又说："不是，他并未回国，仍在此地活动。"笔者又将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所发表的意见重复报告一次，并利用这个机会补充说："今日战争已经恶化，如何使它结束，愿遵照圣旨去进行。国家处于危局，日本应当采取的态度必须是走大路。只要无亏大义名分，即使一旦国破，将来还有复兴的希望；若是玩弄不

正当的手段走入歧途，日本也许将永远灭亡。”天皇说：“我也有这样的同感。”笔者当即访问小矶首相，劝告停止缪斌的活动，叫他速回上海。小矶表面上是同意了。

后来才知道缪斌仍留在东京，与小矶进行密商，最后他表示重庆方面已不相信日本军部及政治家们的话，为了更进一步地进行此事，希望拜见天皇直接听取意见，所以请他设法办理晋见的手续。有关人士即设法将他介绍与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东久迩宫大将会见。东久迩宫很详细地听取他的意见，将这件事又传到木户内大臣的耳中，故关于缪斌的一切，宫中似乎也已知道。关于缪斌的事，后来小矶在东京军事法庭供述：“这是通过重庆与英、美谋求和平的和平促进方案，以后遇到外务、陆海军大臣的反对，及天皇的命令阻止，未成功。”缪斌在战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时的中国特别法庭，根本就否认戴笠与缪斌的关系。太平洋末期的斌缪，同丰田秀吉讨伐朝鲜时的陈惟敬是同类人物。

三 和平之试探（二）

着手终战的准备 我们恢复和平的腹案在时机成熟时，只能用天皇的命令来决定。在此之前，必须在陆海军军部内，先造成这种空气与形势，以免发生其它的阻碍，同时也需要对内部联系。这个问题是国内最困难的问题。

笔者努力说服杉山陆相，经过多次的接触，杉山大将已经对于结束战争发生了兴趣。米内海相对结束战争之事也未表示反对。在军部方面，比起能看清大局的上层人士来，主要是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因此嘱咐外务大臣的高级

秘书加濑俊一与内政部的秘书长松平康昌、陆军大臣秘书松谷大佐取得联络，以谋共同进行。这些人并非是贩战主义者，他们都是离开了现役军人职务的人，为了挽救日本民族的将来，出于爱国心而挺身谋求恢复和平。笔者在离职(外务大臣)之后，这些人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促进了各方面的理解。

但是在军部当中，主张"本土防卫"的人仍占着大多数，他们还在梦想：这不过是前哨战，将敌人诱至本土后，再用已经准备的数千架"特攻队"飞机，予以歼灭。而且，军部已经在长野县犀川附近建立天皇及国家中枢机关的安全地区，甚至还建造了一座地下皇宫。另外，为了训练新招募的军队，特意制造了一些竹枪和木炮。

"本土防卫"之说与"玉碎战"之说是直接相关的。军部的玉碎战之说更加流行，人们的思想已经麻木了。

玉碎说与日本国　笔者曾多次在自己头脑中试图批评玉碎之说。然而，人类即使作为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有不少的场合，为了名誉，在生与死之间而选择了死，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与其依靠生，不如依靠死来求生存的场合。我们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太平洋诸岛，日本人进行了一个又一个自杀式的玉碎战。特攻队高喊着"天皇万岁"，用自己身体同飞机和鱼雷艇一起向敌人的飞机和舰艇撞去而死。在日本本土住着天皇陛下和他的全体臣民，为着日本民族永远的利益与无穷的生命，在必要的时候，选择玉碎不需要有什么踌躇。

一九四〇年夏天，当德军席卷法国之后又向英国突袭之时，笔者目睹了英国国民所具有的英雄决心，而当今日敌人正蹂躏日本本土之时，笔者也同样盼望日本有同样的决

心。英国国民的决心是为了求得生存的勇气，今天的日本也是为求得生存而具备勇气。为此，英国国民决心继续进行战争。然而日本方面的结论则是：必须决心停止战争。这是经过反复考虑不能改的，于是日本仍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军部宣称用本土防卫战歼灭敌人的说法，以过去战争的经验观察，是不能使人相信的。敌人在夺回硫黄岛后又可进攻琉球，甚而在日本的九州、四国或本州各地登陆。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占领日本的重要据点并非难事，而且很明显的是时机已日益逼近。

一九四〇年夏天，法国投降德国之际，英国全体国民在丘吉尔的领导之下，形成抵抗的伟大决心。他们看到英国的海、空军尚健在，国民牢固的团结，以及美国对英国的大量援助，坚信胜利必属于他们。这个判断是极其冷静而透彻的判断。然而不幸的是，日本不能以英国为榜样，明确树立起有胜利把握的信心。这场战争，在事实上不是国民的战争。日本作为崩溃的国家，一旦组织机构完全垮台，日本人又如何能再次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国家的地位呢？日本国在世界上怎样与其它民族处于平等地位，最根本的是依靠日本民族，因为日本民族有尊重他人的传统，这是自不待言的。

本来，日本国民对这次战争并不十分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都是想逃避战争而谋求和平，天皇本人也不希望战争。因为自满洲事变以后，已经过十数年的战争，大家都已精疲力尽极盼停战，但也深深知道这是很难实现的。尽管军部怎样地宣传玉碎战之说，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国家表面的、假装的现象。

当时，知识分子都怀疑天皇是否对时局的真相知道得

很清楚。一般舆论都主张天皇应该召开重臣会议，向他们询问关于战争问题的真正见解。在召见中的重臣中能将时局分析清楚且具有正确意见的只有近卫一人。一九四五年二月近卫谒见天皇，他先书面写好，后又用口头报告，其要点是关于日本赤化的危险。他认为战争拖延的结果较投降更为可怕的是赤化。天皇当时向近卫提出质询："如果那样的话，现在我们如何是好呢？"近卫对于实际的对策又答不出来。天皇对时局的一切情形特别熟悉，而且已经获得了结论。天皇已经准许做和平的试探，关于和平的方策已从木户内大臣及笔者处知道。近卫拜见天皇时报告用的文件，在吉田茂大使（战后任首相）住宅里被宪兵偷偷摄影，成了吉田大使被捕的原因。当时宪兵对和平运动的取缔完全超出常识。

重臣聚会与外相的申明 笔者与木户大臣经常保持联系，研讨和平的方法。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德国尚在战争之时，根据三国同盟及单独不讲和条约，日本必须等到德国崩溃之后，才能接洽停战。

正值此双方展开宣战之时，若根据公开情报的基础，很难判断欧洲战争结束的日期。但是，笔者所下的判断，是依据当时的记录，估计德国大约在四、五月左右势必崩溃，所以必须开始做此准备。然而，苏联随时都在准备与日本开战。关于这些国际的形势，在内阁会议上和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由上村政务局长几乎做定期的说明。笔者认为还有向内阁之外的要人们做坦率说明的必要，尤其应该促请重臣们对国家的将来，要多加以审慎的考虑。

当时，对于未来的战争，除了重臣之外，还有许多人都表示忧虑与不安。笔者出入各处，已经会见了许多知名

的人士。笔者认为已经到了直率地陈述自己意见的时机。重臣之中一些关心时局的人，常常进行秘密的交往。例如：近卫与冈田大将为商讨此事，都费尽心血。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通知笔者，参加一个私人的聚会报告国际问题。笔者当时立即赴会，出席会议者当时有若槻、冈田、平沼及近卫四人。

若槻男爵首先代表他们质问："在战争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之下，是否用某种外交方式可以挽救？尤其是可否依赖与我国有中立条约关系的苏联？"笔者当即将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国际局势，依照笔者的见解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且答复："苏联已经准备随时参加英、美的阵营与日本开战，决不会代日本调停此事，日本所能做的是必须与英美直接接洽，但日本一定要正确认识国家目前所遭遇的环境，要下一重大决心，有这种决心，才可以立即采取外交方式解决此事。换句话说，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此决心。"冈田即刻表示："我已经了解，更表同感。"所谓同感，很明显即是对于处理停战表示相同意见。

笔者又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现状，以及日本所面临的危险，以便作重臣们下此决心的参考。

对枢密院的说明　在重臣聚会时笔者所做的说明引起了政界要人们的注意。一星期之后，枢密院也通知笔者出席报告。枢密院是日本要人们的会场，笔者认为有向他们做坦诚明确的时局观感报告的义务，而且相信这是最好的机会。在会议上，笔者首先将国际形势做了详细的分析，其要点概括起来有三：

第一，德国战争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德国首脑部所宣称的必然取得胜利所隐藏的新式武器，据日本驻德国大使

大岛电报讲，据观察新式武器的效果不能指望。在今日机械化立体的战争之时，陆空双方均已陷于劣势，其战败更较预料为迅速，故断定德国在四、五月左右必将崩溃。

第二，希特勒不听日本的劝告，不采取恢复和平的办法，直至今日仍声称要取得最后胜利。据悉德国必战到最后自杀为止。关于德国准备单独讲和的消息是不值得信的，还没有那种可能性。纳粹德国的地位与有皇室的日本国情是不同的。

第三，根据情报，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已经等待对日参战的机会，那个机会就是苏联在西伯利亚的武力对日本在满洲的驻军有绝对的优势之时。苏联虽然重申遵守《中立条约》，但这是绝不可靠的。日本必须觉悟到这一点。

从以上国际形势以及日本所面临的当前战争状况观察，日本目前已经面临国家选择方向的重要时期。

枢密院的反响　笔者在重臣会谈及枢密院报告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对时局能有正确的认识，采取必要的决心。当时枢密院会议也没有很多的咨询就散会了。究竟他们有何印象？也不知道。散会后，枢密院议长铃木和其他两三位顾问围着笔者闲谈。铃木议长发言较多，他说："德川家康每战必败，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才夺取了江山。数十年前，我任练习舰队司令官访问旧金山时，在美国欢迎会上曾发表意见：日美之间若开战，将必共亡。当时美国人也以为此话甚对。"铃木作为枢密院议长的一席话，似乎仍在鼓励笔者，日本必须战至最后。

因为铃木是位军人，笔者对他的态度是了解的，但笔者颇感失望的是：虽然做了一个小时以上的报告，结果反应太少。当时我们已对战时内阁表示失望，许多人都希望

铃木大将出马组阁收拾战局。不久，果然铃木接任首相出席会议，并做了与笔者谈话内容一样的演讲，积极地指导战争和鼓励国民。

委托中立国斡旋　当时的情形我们不得不承认轴心国已濒于没落。意大利已经投降，而且脱离了轴心国；德国正处在崩溃之中，而且不考虑和平。既然与德国共同进行和平不可能，所以日本结束战争的措施必须在德国崩溃之时或以后实施，这个时机已经迫近了。与日本订有《中立条约》的苏联的态度已经显露，若想通过它寻求和平是最危险的。日本如果想求和平，莫如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直接向英美试探。这是最有利的。笔者当时想选择驻在马德里的英国阁员代表，但是并不太理想。驻东京的中立国代表仅有瑞典公使巴基，否则只有委托教皇的代表。

瑞典公使巴基驻在东京很长时间了，对日本也非常了解，而且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以前曾由外务省昌谷公使介绍与笔者保持联络。巴基也向笔者透露，愿热心斡旋和平，他甚而说："不忍使有永久历史的日本陷于灭亡。"笔者对他表示，以挽救日本的名誉为条件，令在斯德哥尔摩的冈本公使委托巴基向英美进行试探和平的意见(根据东京军事法庭巴基公使的作证)。

四　战局恶化与小矶内阁下台

特攻队　从马绍尔群岛进攻小笠原群岛的尼米兹海军及夺回菲岛的麦克阿瑟大军，在中国的空军支援下，下一作战是什么地方，大体上是能够预想得到的。为了切断南洋与中国大陆的日军联络，占据台湾与琉球是必要的。美

军放弃了跳蛙战术，一定会进行单刀直入占据军事战略要点的尝试。这样，下次作战无疑的是攻占台湾与琉球。果然不出所料，美国的海空军对台湾与琉球开始了猛攻。为了防卫日本本土，军民更为紧张，尤其海军已在进行最后的努力。自杀式的“玉碎战”在各个战场上，展开了决斗。海军又组织了“神风飞行队”，凡所属该队的空军，誓必用自己肉体和所载的炸弹，一起突入目标给敌人以重大的伤害。遇见敌舰，勇士们都向船上的烟筒冲去。夜间单人驾驶的小型鱼形水雷艇朝着敌人的军舰，载着水雷连人带船一起冲过去。这些人都是从各地征募的学生或少年。敌人也指责这种自杀战术为野蛮行为。我们知道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有个青年军人勃阿留，在枪口上插上一朵鲜花，微笑着突入威尔旦及兰斯的“死的战线”。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大军将要侵入英国本岛时，我们也看到英国的少年航空兵，同样的嘴里哼着歌，驾驶战斗机，突入德国的机队。那时候在丘吉尔的领导之下，他们都抱有坚强必胜的信心而战。可是日本却与此相反，明明知道必败，而仍在继续战斗。这种精神永远是日本民族将来的保护神。

对军部的反感　美空军的轰炸（从满洲到九州一带）加上名古屋大地震，使日本的军需工厂完全破坏，交通已陷于停顿，生产秩序已不能正常进行，而敌人的大舰队已逼近并用巨炮轰击沿岸重要都市。

在工业生产方面，军人到处伸手，一般民营工厂都被单纯的军人所支配，对工人施以军队式的训话或精神的训练，生产组织反而由内部日渐腐蚀。因为军人的跋扈及鲁莽的行为，使一般人对军部的反感，无论在中央或地方，

都普遍地高涨起来了。

琉球战与本土防卫 敌人如果突破九州、琉球、台湾的防线，以后必在济州岛或九州岛登陆，或直接突入本州（日本岛之中部），因此，全国必须加紧防卫本岛。可是大部分的陆军及武器，全部调往南方和中国，本土的要塞竟是空壳。日本海军更不足信，所剩的只是若干空军及手无寸铁的新兵。陆军开始尽速设法从满洲及朝鲜调回军队，因无交通工具，一部分竟徒步返国。开始在各地挖掘战壕及建筑城防。军队为了准备玉碎的战场，使许多宝贵的田地被立即征用。因此，又断绝了粮食的来源，人民更表不满。军部的征用，在各地都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问题。结果，本岛的防卫计划，引起了日本人民生活组织的混乱。这些都成为日本非常困难的问题。

海军宣称，台湾、琉球方面的战争为最后的决战，要求陆军保留的飞机全部出动。对此陆军表示反对，认为应保留为本岛的防卫作战。琉球、台湾的海空战告一段落。美军在确保制海制空权之后，五月中大批的美军在冲绳岛登陆，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冲绳岛。日本为应付敌人的下次作战及防卫本土，陆军在广岛设立了西部总司令部，另在东京设立了东部总司令部。

小矶总理要求恢复现役 小矶总理竭力进行战争，但他对战争的形势，又非常困扰，无论如何做也无法挽回战争的溃败形势。小矶和东条大将一样，认为军部与政府必须密切联系成为一体，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小矶是退役将官，得到天皇特别批准，可列席大本营的统帅会议旁听，但并无发言权。小矶对此不满，所以又呈请天皇准许他恢复现役兼陆军大臣，以积极地发挥作用。

过去与小矶大将等退役军人因感情上不合的一部分人，不断与军部的一派人洽商，对于小矶的计划，表示激烈的反对。陆军的理由是：军部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小矶是退役军人，因此不能恢复为现役军人。陆军不理小矶的意思如何，自行更换陆军大臣，任命从南洋战场回来的阿南大将继杉山元帅为新任陆军大臣。改派杉山任东部的总司令，并派从中国返日本的畑俊六元帅任西部总司令。天皇批准了陆军的这项命令。因此，小矶未能达到愿望，遂以不能恢复现役兼任陆军大臣指挥战争为由呈请总辞职，小矶内阁也就垮台了。

五　俘虏问题

敌忾心与人道问题　满洲事变以来，日本人对英、美的反感随着局势的演变及国际倾轧的激烈日渐深刻。而美、英两国的反日的言论，也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与军阀势力激增的同时，排外思想竟演变成一种主义，利用新闻、杂志、图书广泛的宣传，渗透于国民之间。而世界的共产势力，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更利用这种倾向，火上加油，排外的风气已经越过了常轨。

当然，对英、美的恶感自战争开始之后便急剧地增加，但无可否认其间有人在幕后策划宣传煽动这种感情。在美国参战之初，报导日本人非人道和私刑情况；再者，随着交换船返回的英国领事在印度大谈有关英国官吏受到某种恶意待遇的谈话的广泛传播，日益刺激着国民的精神。零星的小空袭，对于军事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意义，但因机枪扫射造成小学生死伤，更激起了对空袭的恶感。随着战

争的进行，在美国报纸刊载的在美国流行有所谓用日本兵骨头做玩具和在南方战线美军用火焰喷射器射杀日本人的照片，均被介绍到日本，从感情上越发令人紧张起来。

空袭日渐严重起来。由于烧光城市计划的实施，房屋和居民同时遭到歼灭。反感终于爆发了。

在战争中的敌对行为与处理战俘和敌国人员的人道问题完全是两件事。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可忘记人道。若缺乏这种精神，日本人就违背了传统，无颜面对祖先。这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问题。如果能保持这种态度，即使战败，将来在国际的地位也尚有希望可以恢复。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到俄国旅行的人，曾受到俄国人的欢迎，原因也就在此。日俄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进行得极为顺利，就是因日本在战争中表示了这种人道精神。即使在日德战争之后，也有类似之处。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人道问题，被各国检举有许多不法行为，过去的名誉已经完全扫地，给外人的印象则是最残忍的无道德的民族。这是很可惜的，必须从各方面调查研究、反省。然而，指责这种非人道行为是日本人普遍的性格，是否适当呢？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特别是由于粮食、物资的缺乏、交通的不便，管理多数俘虏的困难，也是可能发生的。由于这种鲁莽的行为，日本人的人道精神被掩盖了，那是很遗憾的。当然，给外国遗留这种恶劣印象，永久妨碍邦交，也阻止日本人的正当发展。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在东京军事法庭彻底追究调查的结果，判明政府领导者并未有计划命令实行非人道的行为。当时谈论的话题是，知道发生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日本侵华部队华中派遣军

司令，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首领）曾很遗憾地大声哭泣。再者也有不少在战后报导日本人亲切事迹的，从所有的战俘及被扣留者的直接感谢情形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过分的敌忾心　由于战争双方开始杀戮，战斗部队容易引起过分的敌忾心。战争给当地的居民以极大的痛苦。接连满洲事变发生的第一次上海战争（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之际，笔者曾深思苦虑关于缓和逃进上海租界避难的难民问题；同时促请日军考虑，军队的战斗行动延期进行。对战斗部队要求这样的事情，无论何人都能想象到这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的英美等敌国人员也没有被长期的隔离、收容。由于战争正在进行之中，即使收容也是不得已的。体察当时日本在华大使的心意，收容所的勤务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是令人稍稍满意的。

笔者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中央就任外相大臣时期，同英美开战尚不足一年半。关于处理敌国战俘适用于海牙条约及热那亚条约，日本当时已确定准备用法律命令形式在国内公布。军事当局根据这点进一步制定了军事命令，以处置战俘问题。关于处理战俘与交换情报，根据前例，特别设置了陆军省战俘管理部和战俘情报局。笔者在外务大臣任内，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战俘和敌国人员问题。目前这个问题的责任者，是军部与警察当局。对于这个问题，日本虽然通过法制，立即取得了谅解，但是如把所有的事情都作为军部统治之下考虑时，大概会立即判明在军部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敌国被扣留者受到日本人保护是外务省应有的职责。同时，在国际上由于表示了日本行为的正当以及在外交上所得的成绩，外务省在处理战

俘及敌国人员上不但没有过失，而且极力希望从敌国方面赢得满足就是当然的事情了。在外交上，考虑战后日本所处地位时，更是如此。因此，关于这一点在接受外国抗议时，当然应进行竭尽全力的解释。笔者相信能尽力限制过分行为。但是，关于这一点，作为有罪的笔者，今天并没有指责东京军事法庭判决的打算。

处理战俘的事务 笔者特别苦心忧虑充满敌忾观念的军部当局。然而，当时一般的民众对空袭产生恐惧与反感；不仅仅如此，从敌国政府又收到许多抗议书，笔者担心自己的理想与战争现实相距甚远。

在内阁会议上，笔者说应竭尽全力处理战俘和敌国人员。对此，一个有力政党出身的阁僚提出反问，为什么让粮食陷于困境的日本人对于杀戮非战斗人员的残暴敌国人员要竭尽全力安置？为什么对于搜捕、射击无辜居民的飞行人员不可问杀人罪？为什么外务大臣及他的幕僚不使用“美国鬼子”的语言？非难笔者处置敌国人员的态度。再者笔者收到许多来信，内容是：每天有许多与战争无关的居民，与住宅同时被烧杀。在居民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缺乏粮食之际，政府为什么给与这种非人道行为的敌国战俘以优待？对于这点，陆军大臣自然支持外务大臣的态度。即使在议会，笔者也是尽量缓和对于日本屡次攻击、击沉伤员船、对日处理不当的抗议。

在这种气氛之中，关于处理自己不管辖的敌国人员，外务省期望万全是非常不容易的。外务省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和鞭挞军部。无论如何，对于外务大臣来说，没有权力干预这一工作。外务省还设立了特别部门，期望处理有关战俘及敌国人员的外务省工作（处理抗议书）没有遗漏。

在军部的上层，对于处理战俘似乎没有疏忽笔者的主张。他们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反而都表示同意。然而，在军部的中层和前线部队则有不少纳粹意识形态的分子，无视上级的意图而擅动。对于敌国的抗议，外务大臣答复的内容都是战俘情报局供给的资料，正是为此，在陆军省内设置了情报局。情报局供给的资料，在许多场合，不能完全答复敌国，但是谅解外务省所做努力的也只有情报局。因为战俘情报局本身实力不足，没有充分抓住前线部队和收容所的全部真相。

军部的态度与日本的耻辱　随着战争的进行，通过中立国，外务省收到敌国方面的抗议日益增加，外务省先将这些抗议转送俘虏情报局及有关部门。抗议的内容不一，包括有各种情况，比如：泰缅铁路使用俘虏的问题，威克岛的虐待行为，南洋地区俘虏待遇的不当，及击沉伤员船等等问题。其中有许多例子，不但是站在人道上不容许，即使在战争法规上也无法申辩。作为日本人，实在感到可耻。英国艾登外相在议会中将自日本逃回来的俘虏报告中说明日本人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都揭露出来以攻击日本。其中有许多事实毫无所闻。笔者根据这些抗议，通知军部应当彻底调查详情，并希望它加以改善。但是数次的函询，军部的回答总是否定有其事，并驳斥这都是敌人用毫无根据的事实诽谤日本，而且表示他们是经常训令不准有不法之行为。

笔者感到这个重要问题的确有改由国家处理的必要，故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包括有朝野人士及枢密院顾问等参加。但军部表示反对，认为目前对战俘及敌国人员的待遇是合理的，当然还需尽可能改善，对于抗议也允予进行

详细调查。

笔者为了这个问题，决心尽最后的努力。要对军部施加压力，唯一的办法只有报告天皇，请天皇用直接敕令，使军部遵照既定的方针去实行。于是，将平日所准备的有关文件，先交给木户内大臣，然后面奏。其实，天皇早已知道此事的详情，他说："万一真有象抗议所记载的那样事情发生，不仅是惭愧，更是日本的耻辱。须特别注意此事，并命令军部改善。"

这个命令发出之后，军部似乎有很大的反应。

改善战俘的待遇　由于补给的困难，物资以及粮食极度缺乏的前线部队欲使多数的战俘全能满足，是非常困难的；若想中途改善待遇，也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军部大臣奉到敕令后仍尽可能实行各种的改善。可是战后才证实敌国不考虑日本的环境如何，而要求照着条文所规定的待遇，所以日本未能满足他们的希望。为此，战俘问题蒙了一些污名，实在是日本历史的污点。东条在巢鸭时反复申述没能充分贯彻天皇的御旨，这在他的遗书中可以看到。

中立国要求访问战俘营，也逐渐予以放宽，而救济物资的分发，更予以格外的便利，尤其通过红十字会送来的大量救济品，从苏联指定的西伯利亚沿海各港口运到日本再转南洋。日本此时船舶不敷调配，好不容易才说服军部拨给几只船。运送这批救济品最后的一只船是"阿波丸号"(一万七千吨)。为完成这任务事前已得到敌国允许，无条件予以往返安全的保障。该船使往新加坡将货卸完后，归途在台湾海峡竟被敌舰击沉，并有从南方顺便搭船回国的侨民两千余人，与船一起沉入大海。其中有数人是日本建

设所需要的技术专家，这是最为可惜的。此是笔者在职中最后所发生的事，时间为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旬。

追究战犯的责任 无情的战争已到最后阶段，人类所珍贵的生命如同草菅一样地被杀死。轰炸在全日本更激烈地展开。最后在广岛、长崎两地，原子弹作实验式地投下爆炸了，二十余万人的生命全被一次扼杀。此时日本决定投降，开始办理这方面的手续。

美、英、中、苏、比、荷、法等国会同或单独成立战犯法庭，追究战争的最高责任，对不法行为予以严重的处罚。各国的裁判都有各国的特色，但都发挥了战胜国军事法庭的威严。美国的裁判，将战时日本的俘虏或集中营美国人的书面报告，作为证据，不允许犯人有申辩的机会即宣布执行。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为止，有四千人以上被判处徒刑，其中七百人以上处死刑。战败已经四年了，到现在尚有数十万战俘及侨民，被战胜国拘留做苦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年以上，各国仍在继续复仇式的杀人。战争结束后的杀人行为，虽然是采取裁判的形式，但笔者认为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似乎也不应该。作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书代表的笔者，为了将来国际关系的融洽及人类的和睦，希望早日结束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处罚，以恢复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

第十章 投 降

一 铃木内阁与最后战况

铃木内阁的成立 为了推选新的首相，在东京又召开了重臣会议。既然战争已至此，在重臣们的头脑中就有两种人选，即是结束战争还是实行玉碎战的内阁。除上次出席之重臣以外，另有东条大将参加。

会议中，各重臣们仍然认为军人更为合适。东条等陆军出身的一二位前任首相发表意见，主张为了继续战争，应选举陆军现役军人。然而非军人出身的重臣们，都考虑时局的演变，推荐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他们的理由是铃木任侍从武官多年，可以成为天皇最忠实的发言人。木户内大臣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天皇。

铃木大将于四月七日组阁，本来陆海军大臣及外务大臣仍继续留任；但前首相小矶反对笔者仍任外相职务，于是笔者提出辞职，东乡就任新外相。

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期望铃木内阁是个和平内阁。

德国的崩溃与投降 战争已经进入了最恶劣的阶段。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主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的登陆战获得成功，隆美尔将军溃败，而隆特许铁特的反击也未成功，预备队在适时适地的集中作战亦告失败了。大陆地区的制空权已经丧失，陆军方面也失去了优势，其命

运是必然要失败的。……

德国的空军失去优势后，全德的城市都被B—17型或其它飞机破坏无遗，工业地带濒于全灭，尤其人造石油工厂被炸毁后，不仅飞机用油，就是坦克、军用汽车也都因缺乏燃料不能驾驶。东西两战线之德军已经发生反叛行为，士气降低，近于瓦解。

越过莱茵河的英美军依照雅尔塔协定，美国军队从德国的南部，英国从德国的北部，继续向东进攻，在预定的战线上会师；而苏军一部分也从东普罗亚直接进攻柏林，另外一部分从西利加继续往西追击。希特勒于五月一日死在柏林，政府一度逃往德国南部，但要人们先后被捕。希特勒在自杀前将政权交与非纳粹党员的杜尼兹海军总司令，而杜尼兹即向联军无条件投降(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占领德国的联军，不承认德国政府的存在，即置德国于占领军的军政管理之下。这是铃木内阁成立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

日本军的溃败 日本的战局与德国战局一样急转直下。赢得德国战争胜利的英美军又大批调来远东增援，使太平洋及东南亚的英美军开始大规模的反攻。

丧失制海及制空权的日本，对于那些远隔数千里之外的孤岛和中国大陆上的日军已经完全无用。因为敌人可以利用制海、空权，随时随地集中大规模的兵力，将日占领地分别予以击破。

美军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夺回吕宋岛后，又攻取了太平洋上的基地巴老岛和帛硫群岛。尼米兹的海军主力遂于三月占领硫黄岛，完成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态势。

在塞班、硫黄岛被占后，敌军B—29型飞机的空袭使

全日本化为焦土，不但与各地的日军失掉联络，即日本本身的防卫也全被破坏。敌人更加紧轰炸台湾、琉球及九州各地，突破日本海空军最后的抵抗，于五月展开了冲绳岛争夺战。

冲绳战是日本海军最后的一战。海军也知道，若丢掉此岛，日本将无法防守，所以特别组织了空军的“特别攻击队”，陆续飞出与敌人死战，给敌造成的损失颇大。特攻队每隔数日，续十数次，反复出动轰炸敌人的航空母舰及其它战舰。敌人也感到这次是最后的决战，故不顾一切牺牲大批增援。日本海军要求陆军将保留的数千架飞机全部使用于此战，但陆军竟说最后的决战将是本土的登陆战，而加以拒绝；到此最后关头，陆海军还发生磨擦，互不合作。冲绳岛之战，结果也全败了。下次作战将是日本本土决战，陆军发表声明：“日本尚有七千架飞机，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并开始制造竹枪和木炮。

铃木内阁与外交　铃木组阁后不久便召开临时议会，在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新内阁并未提及一般人所期待的停战，反而信任军部的宣传，准备在本土做自杀战。

这种态度在德国崩溃之后仍未改变。此时苏联夜以继日地将大军运送东部西伯利亚，战争局势更趋恶化。

东乡外相原来就是亲苏派人物，就在接到废除中立条约的通知后（四月七日），他仍相信苏联，暗中委托亲苏派的广田前首相与在箱根避战中的苏联大使马立克秘密接触，以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权益为交换条件，试探苏联对日本的意向。马立克虽然对广田的要求表示颇感兴趣，但莫斯科毫无反应。近卫以后又以私人资格与马立克面谈一次，但反响极其冷淡。

因为铃木内阁已更换外务大臣，前为斡旋和平而返国的瑞典公使巴基，通过日本公使函询新外相是否仍采取与前任外相相同的方针。但是，东乡外相竟表示那是前任内阁时代的意见，函复巴基公使停止斡旋和平的活动。当时东乡如此决定，可能是想利用苏联的关系，解决和平问题。

但是，苏联的立场并非愿意代表日本调停和平，相反是正在准备宣战，虽然在表面上马立克通过广田继续试探，获悉了日本的态度，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也对佐藤大使重申苏联愿意遵守《日苏中立条约》。

二　和平之试探(三)

天皇促进和平　天皇对铃木首相透露："战况似乎较我想象的更坏。"与日本本土相联的冲绳岛激战之后，天皇对停战已经毫不犹豫地在心中决定了。

木户内大臣于六月十三日与米内海相会见时，说："现在恐怕已经到了应该考虑停战的时候了吧?"可是米内海相回答说："铃木首相的意见过于倔强。"以后木户又同样地问铃木："是否已准备了恢复和平的办法?"然而铃木首相却答道："因为米内海相的意见强硬，不能进行。"木户颇感奇怪，即表示希望他们两人直接交换意见。而东乡外相对木户内大臣同样地质问，也答复说："因为御前会议已经决议继续进行战争。"

木户所忧惧的是六月八日御前会议中，曾有"战争继续到底，以期维护国体，保卫皇土，达成开战的目的"的决议。这次御前会议决议的第二项，又议定有："注意世界情势之转变，积极展开对外各种政策，尤其加紧对苏对华的

政策，设法使其对战争转趋有利。”因为有此议决，东乡仍然幻想战争能转趋有利。但木户得到天皇的允许，不理这些议决，开始终战的准备。阿南陆相虽然曾主张在本土决战到底，但在六月十八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也提出和平谈判是否可以委托中立国代为调停的提议。

天皇不久又命令铃木首相具体地研究终战的方案，并于六月二十二日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之全部委员(茶会招待)正式表示了这个意见。然而，经过数天之后仍无下文，七月七日天皇又催促他们早日进行。

终战的形式，无论如何实际上都是日本的投降，所以军部是坚决反对，主张在促进和平以前，先在本土决战。参谋本部和陆军部也同样地反对和平，海军因在米内控制之下并未反对。铃木首相奔走其间，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协商的结果是决定派一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函赴苏联，委托苏联代为调停，并选定近卫公爵为特使。

近卫于七月十一日晋谒天皇，直接受天皇的委托。晋谒时，近卫对天皇的态度感动得流下了泪，决心以一死誓必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其后，东乡外相即电令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申请特派近卫赴苏之事。佐藤于七月十二日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同意。苏联政府质问派遣近卫赴苏联的目的何在，佐藤大使当即答复：近卫赴苏的目的是要求调停和平。莫洛托夫对佐藤说：“因我要去旅行，正式答复可能稍缓。”他即刻同斯大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于七月十七日从莫斯科启程了。对于近卫赴苏之事终未答复。

波茨坦宣言　为了处理德国善后问题所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出席，并带同贝尔纳斯国务卿和共和党的参议员范登堡；英国原定由丘吉尔及艾登外长

代表，嗣因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工党组阁，改由艾得礼同贝文外长出席。会议于七月十七日召开。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于十八日抵达，即刻参加了会议。

雅尔塔会议之后，已经过了半年，对日战争几乎由美国一国负责，今日已将到最后的阶段。前次雅尔塔会议时，虽然付了很大的代价要求苏联对日参战，但到了波茨坦会议时，局势转变已经感到不需要了。所以，英、美两国对此事，并未热心地提及，但苏联胸有成竹，方针早已决定了。这时在新墨西哥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经成功，由随同出席的陆军部长史汀生报告给杜鲁门。而且史汀生建议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前应先劝告日本投降，警告日本如不投降就将使用这种毁灭性的炸弹。波茨坦宣言就是以史汀生部长的原提案为蓝本而草拟的。美将这个提案与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的报告，同时秘密地交给苏方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传阅。虽然苏联当时对此种做法仍表示踌躇，但是，美国终于在七月二十六日向世界透露，呼吁日本早日投降。

《波茨坦宣言》的内容：第一，日本军队即刻无条件投降；第二，政治问题，遵照《开罗宣言》，日本的领土恢复日清战争以前之状态，朝鲜恢复独立，台湾、澎湖岛归还中国，太平洋委任统治各岛也脱离日本的统治。其它包括有赔偿、禁止重建武力、排除军阀采用民主主义、处罚战争罪犯等各项，但与德国不同，并未否定日本政府的存在，且在对日本将来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上保障供给各种原料。

日本获悉了《波茨坦宣言》内容，在赞成与反对两派的意见尚未决定以前，铃木首相发表声明："不理睬《波茨坦宣言》。"内阁情报局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这种意见。当时，主张拒绝的只有军部。东乡外相闻此声明之后，极度表示愤慨。

笔者的家因遭轰炸而迁往日光，但关于停战之事仍与木户大臣密切联系。随着德国的崩溃，笔者预料苏联必将参战。克服了交通的困难，回到东京已是八月。木户内大臣即与往访的笔者，详细讨论派近卫赴莫斯科的安排。笔者对天皇终于决定终战表示赞同。当时木户问我：“关于近卫赴苏事，已经过了两三个星期，苏联仍无答复，是否会有答复呢？”木户对此似乎表示不安。笔者回答：“答复是会来的，但答复的内容，恐怕与日本所期待的完全相反吧。”同时，笔者也还告诉外务省次长等准备早日结束此事。

原子弹爆炸与苏联参战 正当日本各方面就《波茨坦宣言》赞同与否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之时，同时也在焦急地等待苏联的答复之际，八月六日在日本西部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广岛，美国空军突然投下一种非常奇怪的炸弹，使整个市区全部毁灭。大冢县知事和市民全被炸死，仅畑总司令官幸免。继而苏联又突然对日宣战，西伯利亚的苏军如潮水一般地涌进了中国的东北。

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召见佐藤大使，对近卫特使赴苏联的要求，竟用宣战的通告代替答复。其内容大致是：因为日本已经拒绝英美的《波茨坦宣言》（以铃木首相的声明为借口），因此苏联不能斡旋和平。鉴于日本这种非妥协的态度，苏联为促进世界和平的实现，与英美合作对日宣战。

美国宣传在广岛投下的炸弹（即原子弹）已经使周围几十平方里完全破坏了，人畜永久不能繁殖。而日本军部竟发表这种炸弹是有特异性的炸弹，但其效果并非如敌人宣传之甚，并且说：“不足惧。”但是，从广岛传来的消息是广岛已变成一片瓦砾，全部遭毁；在广大的区域，生物全被残酷地消灭了。

天皇早已下决心停战，而又命令统帅部及政府使其实现。军部因已奉到这个指示，所以不能从正面表示反对。因此，先同意派近卫赴苏，嗣后对波茨坦宣言也表示在下列四条件下才能接受：①维持天皇制；②敌人既不得在本土登陆，也不得占领；③在海外各地日军的撤退由日本自主地实行；④战犯之裁判处罚由日本自行办理。但是上述四项条件与《波茨坦宣言》相差太远，即使提出也不可能得到答允。敌人已经在准备登陆日本。国民看到新兵用木炮和竹枪在练习都感不安。第二颗原子弹又于九日投在长崎，使九州的一角完全毁灭。

八月七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对军部的四条件也并未予以特别的讨论。近卫对此严重的局势甚为忧惧：假定政府将军部的条件提出，而敌人拒绝时，日本岂不完全灭亡？八月九日上午，近卫来征求笔者的意见，当时笔者答复说："如将这种条件提出，敌人可能坚持无条件投降，或者有较《波茨坦宣言》更苛刻的条件来处理日本的危险。结果我方不但仍然必须接受敌人的任何条件，且我方的立场反而更不利。在此期间敌人的作战会更趋猛烈，反徒然增加国民的牺牲。"近卫又说："今日探听的情形，内阁似乎对军部的要求无法拒绝，所以除非呈请天皇批准，是无法进行的。但木户内大臣认为应由内阁负责决定的事，不应再请天皇核定。木户对此颇感为难。"于是，笔者即刻赴宫内省访木户内大臣。

木户最初面露不悦之色，他的意思是关于终战之事，既已特别麻烦天皇自己裁决，而现在实行这件事，似乎不应该再麻烦他，故木户表示踌躇。笔者当时强调：一步走错，军部与反对派的纠纷恐怕易被敌人所利用，若是再经过一个

时期，大局恐不易收拾，反而误了整个国家。现在内阁已无力控制军部，必须呈请天皇批准，才可使军部就范。木户这才同意这个办法。外务省坚持终战并努力设法勿使停战的机会错过。当时，苏军以破竹之势侵入"满洲国"及南库页岛、千岛，并还准备进攻北海道地区。

御前会议与天皇的决断 天皇同意木户的意见，若由内阁呈请，决定予以裁决，又将此意对铃木首相直接表示。但症结是军部主张应将四个条件全部提出，而外务省则主张只提一个维持天皇制的条件。

铃木首相于当天(八月九日)晚间决定召开御前会议，并通知统帅部。除统帅部及内阁阁员之外，尚有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特别列席。

铃木首先提出波茨坦宣言必须接受。至于如何答复，讨论的结果，军部仍主张另附四个条件，而内阁仍主张维持天皇制一个条件，因此双方条件未能一致，遂即提请天皇裁决。天皇先听军部和外务省方案的内容说明，后批准采用外务省的方案。于是，这最重要的终战终于决定了。关于维持天皇制的词句，外务省方案是要求不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而枢密院平沼议长却根据国体论的学说，认为天皇的统治权是在国法之上的，所以主张使用"天皇的统治大权"的句子。御前会议席上，军部对未采取他们的意见，表示了不满的态度，尤其认为在当日上午所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席上，内阁对此四项条件并未提出反对，为何又在当天深夜突然召开的御前会议否决了军部的提案？他们怀疑这是阴谋。

敌人连日继续轰炸，满洲及库页岛的情况已经不明。国家存亡即在眼前，国民彷徨无所适从，不安达到了极点。

投降与天皇的统治权 英、美两国通过中立国瑞士而收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通告，知道与日本的血战即将终止，已赢得了二次世界大战全胜。当时万民欢呼。然而苏联在这时却不承认终战，仍用全力进攻满洲和库页岛，美国的赫尔塞海军总司令也在继续战斗。

美国军部表示对天皇制的要求不妨接受，国务卿贝尔纳斯亲自执笔起草回答，再呈杜鲁门总统批准后发出，其内容为天皇的统治权必须是置于占领军最高司令官之下，而且日本将来的统治形态须由日本国民自己来决定。在这些公函往返之间，渐渐明了实际上与《波茨坦宣言》的条件相同。日本收到了美国以联合国名义的回答后，内部又发生了争辩。军部的见解是：关于天皇制的这个回答与日本的国体势不两立，不能接受。尤其陆军大臣的意见更为强硬。统帅部陆海两军总长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平沼议长亦赞成他们的见解。

外务大臣却解释这个答复可以满足，内阁也同意这个意见；而木户内大臣亦表示关于外交文件的解释应当尊重外务大臣的意见，说服了平沼议长和军部。此时，敌人在日本各地的上空大量散发《波茨坦宣言》的传单，从而唤起日本的舆论，提醒日本不可错失良机。关于天皇制的问题，结果仍须呈请天皇本人裁定。八月十四日召开了最后的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最高会议的人员外，内阁全体成员也都参加了。首先由铃木首相报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经过、敌方的回答，以及军部和外务省等意见分歧，然后提交会议表决。当时，军部只简单地发表一些意见，并未深入讨论。天皇即依照外务大臣的意见予以批准，接受美国的回答。于是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翌日八月十五日，天皇决定亲自对全国国民广播接受《波茨坦宣言》。

此时，铃木内阁呈请辞职。在这停战的最后阶段，铃木首相与东乡外相的奋斗是笔者难以形容的。

三 叛乱

少壮派军官的反对 主张在本土决战的陆海军极端派军人，对于终战非常不满，从感情上而言也非反抗不可。阿南陆军大臣在御前会议席上，并没有强调任何的反对意见，就在终战的诏书上签了字。但是，军部在激烈的气氛中，如想控制少壮派军人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少壮派军人是在昭和动乱的时代一直支配着军部的实力派。

少壮派军人的计划是立刻用军人的力量实行叛变，将天皇身边的主和派人士及阁员予以全部铲除；拥护天皇继续实行战争政策，阻止敌人的登陆；主张在本土与敌人决一雌雄，万一战败了的话，全国国民即使都自杀，也在所不惜。但是，决不在本土没有决战之前就考虑停战；并且已经准备在长野县建立天皇的避难所和内阁的办公处。

军部首脑的动向 阿南陆军大臣于八月十四日召开的最后御前会议之后，抱着极度悲愤的心情，访问梅津参谋总长，指责终战是不适当的，表示事到如今军部只好决定叛变，拥护天皇，成立军政府，继续战争，并要求梅津参谋总长也参加。梅津已经获悉了军部的动向，他听完阿南大将的要求后，严肃地阐明了建军之大义，并表示：天皇的御旨既已决定，而且御前会议上又很清楚地亲自批准了，故大义名分已判然，所以军部无论遭遇何困难也必须采取万

全的措施，这是军人的义务。他要求陆相对不法的少壮军人们予以严格的取缔。对于梅津的劝说，陆相阿南也未表示反对，很沉默地辞出了。

八月十四日上午尚未召开御前会议时，天皇又特别召见永野(海军)、杉山及畑俊六三元帅，告知终战实属不得已，命令他们尽最大的努力采取最妥善的处置。军部首脑又于当日在陆军部内举行聚餐会，梅津参谋长提议为实现天皇的意旨，宣誓尽力完成这个任务，要求军部三个首脑(梅津参谋总长、阿南陆军大臣、土肥原教育总监)与东部总司令(杉山元帅)及西部总司令(畑元帅)各人在宣誓书上签字。他们都表示赞成。阿南陆相开始奔走于少壮军人之间，劝告他们不可轻举妄动，结果未达到目的，遂于八月十五日黎明在陆军大臣官邸剖腹自杀，以向天皇谢罪。

中坚将校叛乱 叛变终于爆发了。以陆军省军务局畑中少校等中坚将校为先锋，他们企图袭击议论和平中心的宫城。他们和近卫师团的参谋们及其他同志，考虑应设法阻止天皇对国民的终战广播。

他们为鼓动禁卫师团访问森师团长，希望劝告他也参加，但遭到森反对，遂将师团长和参谋长当场刺死，伪造师团长的命令，调派一部分禁卫兵袭击宫城，以期逮捕天皇的幕僚之后，拥立天皇，达到自己的目的。

铃木首相及平沼议长的住宅全部被放火烧光。叛军的第一步是全力地搜寻天皇对国民广播所用的录音片，先在宫内省各房间搜查，都没有找到，也没有将木户内大臣捕获。一部分人遂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以使广播不可能；但十五日，天皇的诏书却由他们所未探知的另外一个电台播出来了。

东京防卫总司令田中大将亲到宫城，声泪俱下地劝告叛乱军的少壮军人们不能采用这种强暴的举动。叛变的首领们遂知无成功的希望，均当场自杀，因此军部的叛变终于没有成功。

负责防卫首都的田中大将在全部叛乱告一段落之后也自杀了。

这次叛乱也是昭和动乱时代军部一贯作风的一个表现。

播送终战诏书 对于天皇诏书的广播，全国人民都肃静恭听，在各地的部队及外国人士也都在收听。知识分子对此事似乎早已预料到了。对于过去不明真相盲信玉碎战宣传的大部分国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晴天霹雳，但同时又感激天皇的果断，感到悲惨的战争现在总算停止了。

可是，在国民中不谅解的人也不少。陆军或海军用自杀对停战表示抗议，大西军令部次长即此一例。国民中认为终战是国耻的人，先后集结在宫城门外二重桥前，对宫城诉苦，其中一部分竟悲愤慨叹而自杀。民众与军部的叛变相呼应，局势并不乐观。

右派思想团体中有十数名青年在早晨太阳升起后，集合在代代木练兵场，用剖腹自杀来表示抗议；另有一部分潜伏于爱宕山中继续鼓吹暴动。

在这种不稳的气氛之中，东久迩宫于八月十七日成立了终战的内阁。

四 皇族内阁的使命

险恶的形势 铃木内阁决定终战后即告辞职，将实行

终战的任务移交给继任内阁去实行。终战的实行，也由天皇直接裁定进行。当时，也没有召开重臣会议的时间，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近卫以副总理资格辅助东久迩宫，陆军大臣改用了下村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大将留任，笔者重任外相。组阁总部使用被大火烧后的废墟中仅存的赤坂离宫，就职典礼改在宫城内的宫内省举行。

政府的各官厅大部都已烧光，幸有议会及首相官邸尚未波及。厚木飞机场是海军特攻队的总部，由此地编成许多神风队，其中一部尚在待机准备本土决战。现在忽告终战，他们心中自会不甘，不肯罢休。每日违反禁令，在东京上空乱飞，做些冒险的低空飞行，对宫城及各机关附近做示威运动，散发自杀的玉碎战传单。军部中央的叛变计划虽未成功，但宫城前及爱宕山仍继续不稳。

军队在满洲及关内和南洋各地较国内尤多，至于这些部队对终战究有何种反应仍未明了。当时，向太平洋各岛守军传达命令，是军事当局最困难的工作。但不论如何困难，国民大部分都能了解，而且表示衷心欢迎，有关部门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皇族内阁与终战事务　东久迩宫皇族内阁的任务很明显地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新内阁的主要目的是使军队与国民了解和服从终战；第二，完成终战的手续；第三，实行作为终战条件的《波茨坦宣言》。

天皇对三军发出终战令以后，又遴选了皇族三四人派往国内、中国满洲及大陆关内和其它重要司令部，直接传达圣旨，以免终战后再发生意外。

军中央部自叛变失败后，除发生抗议自杀外，海陆军都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各地的部队都知道这次终战是

由天皇亲自决定，所以也都饮泪服从。只是不可能传到命令的太平洋上的几个孤岛，在终战后几个月或数年后尚在继续抵抗，但这不过是例外。天皇诏书广播也制服了厚木飞机场的空军，但军事当局最感困难的是投降后如何将军队予以解散。

宫城前已经恢复了平静的状态，爱宕山的暴动也都解决了。国民们一方面仍在搜索当日的粮食，另一方面却在盼望丈夫或儿子从战场归来，而最关心的是在中国满洲及其它地方多数妇女的命运。

皇族内阁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在东久迩宫首相热心指导之下充分地实现了。

完成终战手续　皇族内阁的第二个使命是完成终战所必须的手续。日本既已表示投降，只有等待盟国的反应。

麦克阿瑟元帅以联军总司令资格仍在菲律宾办理受降手续。日本除派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及外务省调查局长冈崎胜男外，另有陆、海、外务各省的随员，飞往马尼拉。

这些人数日后返回日本，他们所带回的是以后正式签署的投降文书之复本，此外并有麦克阿瑟的第一号指令。投降文书固然以《波茨坦宣言》及《开罗宣言》为内容，要求天皇及内阁与大本营的双方代表者予以签署。第一号指令是长篇的指示，规定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实施具体办法，停止全部国内军需工厂的生产，迅速解除军队的武装，撤去军事设备，停止飞机飞行等等，颇为苛刻。这个指令，即是摩根陶方案的日本翻版，使日本闭守于四个小岛，回到明治时代以前的农业国。

投降书内容是大致能预料到的，但第一号指令中的军

队投降及停止军事行动以外的一般问题，尤其是关闭工厂事却使内阁煞费苦心。因为按照规定，稍与军需有关的工厂，必须全部停工，若按日本式来解释，那么几乎全国工厂都得关闭；然而内阁为忠实履行终战使一切圆满进行起见，都遵令实行了，其它也都依照指令办理。投降后的一般人心好象完全处于空虚状态，而思想极端的人却仍在做不法的准备，故不安之气氛还是笼罩着日本。

五　签署投降书

占领军进驻　投降书的签署仪式原定八月底举行，嗣因麦克阿瑟元帅终战后受命为联军最高司令官，包括海军也在他的管辖之内，陆海军之间不免有点隔阂，故又改为九月二日在横滨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据说，选择海军的司令舰"密苏里号"作为签署仪式的场所，主要是表示尊重在战时曾付出重大牺牲的海军的感情。而"密苏里"这个名称，也正是杜鲁门总统的故乡的州名。

最早占领日本的盟军于八月二十八日在厚木机场降落。接着，麦克阿瑟元帅从马尼拉飞抵，立即在横滨成立了总司令部。美国舰队也占领了横须贺军港。以横滨为中心的东京湾一带地区是盟军指定的第一期占领区，特攻队控制的厚木机场也于一两天之内清理好交给盟军接收。

签署投降书代表的人选　当时，日本政府对于签署投降书的代表究派何人颇感困难。派的人一面要对终战负责，而一面又要为对方所信任。这是战败后的第一步骤，若稍有错误，是不堪设想的事，因为一方已经抛弃武器，而一方尚未能完全控制。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当时，日本要人们的心理的确是变态的。他们都尽量避免肩负终战及投降的责任。在当时的气氛中，他们甚至认为去签署投降书那一个人，若是文官就表示那人已经“完结”，若是军人则无异是自杀。

笔者期望已久的终战终于实现，而且又负责处理终战最后的手续，所以聚精会神，决心完成这个工作。当时也预料到别人可能要投掷炸弹，但决不畏惧，心中仍在祈祷：投降是日本将来复兴的唯一道路。

代表的使命 照理陆海军两统帅部各派一个代表参加投降书的签字仪式是完全必要的，故有人建议另外指定两个人代表天皇及内阁为适当。笔者依照这个方案，除外务大臣外，希望首相及副首相能代表签字，这样就可直接代表天皇，但这个提案并未实现。最后，外务大臣的笔者代表天皇及内阁，梅津参谋总长代表统帅部。天皇分别召见我们，循循地嘱咐这次使命的重大。

笔者作为外务大臣和天皇、内阁签署投降书的全权代表在我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我在晋谒天皇上奏时说：“签署投降书实是我国有史以来的一大事件，自然是不祥之事，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这是拯救灭亡的日本民族，继续日本文化的唯一方法，这的确是不得已的。日本自古以来是个君主制国家，陛下具有万民之心。天皇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时至今日动不动被滥用，所以才看到今天日本的悲惨境遇。《波茨坦宣言》要求的民主政治，在实际上不但与我国现状没有矛盾，而且日本的本来面目由此被发现。因为出于这样的考虑，签署了这一降书；而且我认为，只有完全诚实地实行这一文件，才能开辟日本的国力。”

天皇对我的见解深表赞同，夸奖说：“的确是那样。”并

鼓励将这一方针贯彻到底。

签署投降书 九月二日黎明，在首相官邸集合与梅津以及随员一同遥拜宫城后，启程前往横滨。沿途荒凉无比，尚无人影，只见一片烧毁的断壁残墙，其间灾难的人群有的仍在烧残的瓦砾中搜找什么。血战的痕迹全部在眼前展开了。

从盟军占领的横滨码头乘美国驱逐舰约一个小时，穿过东京湾内的英美舰队，到了尼米兹总司令的座舰“密苏里号”上。昨天还是暴风雨的天气，今天忽而转晴，海上也风平浪静。登上“密苏里号”舰的船梯，接受甲板卫兵的敬礼，抵达会场时，已经将近十点钟。在会场当中，站满了敌方各国观礼的人，有新闻记者及摄影记者，也有几个熟悉面孔的日本新闻记者在场。在新加坡投降的巴西拔尔英军司令及在巴登旦半岛投降的云莱特美国将军们，也特别列席参加。在狭窄而拥满了人的会场中，各国代表隔着一张长桌与我们面对面站好后，麦克阿瑟元帅出来演讲，宣告战争结束，命令签署投降书。笔者首先签名后，梅津大将也同样签上名，以后各国代表依次签了名。美国代表是尼米兹总司令，英国代表是弗立查总司令，中国代表是徐永昌部长，另外苏联代表等也参加了签署。

我们回到横滨码头后即返东京，向内阁和天皇报告完成任务的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到此暂告中止，新日本也从此时开始。然而，这个新日本的建设还是昭和日本的革命。新日本的将来完全由日本民族的能力和努力来决定。人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若要延续过去的作风，即使战胜，前途也无希望。所以必须根本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和态度。万事从头做起，将来才能繁荣，才有生存的价值。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笔者不能否认这句话的真理，但对国家前途予以深刻考虑之后，又不能不感到悲痛。

六　签署投降书之后

军事管制的实施与动摇　签订投降书之后不久，九月二日晚上，外务省驻横滨的铃木九万公使从麦克阿瑟司令部收到了已贴遍日本全国的对日实行军事管制的抄件。接到这个抄件时东京刚好开完议会。对日本实行军管震骇了日本上下。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方面与盟军方面似乎有根本不同的解释。盟军方面认为，因为日本是无条件投降，所以，依靠军事管制实行行政的占领，与对待德国相同。日本方面则认为，日本投降与崩溃的德国不同，日本是根据《波茨坦宣言》所提条件投降的，如果依据《波茨坦宣言》，军队被要求无条件投降，但在其它方面则承认日本政府的存在，所以，《波茨坦宣言》明确地记载着这是相互的义务。

笔者深思熟虑一夜之后，于九月三日晨到横滨，在盟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麦克阿瑟总司令，详细地陈述了日本方面关于签署投降书的决议及准备，要求打消颁布军事管制的原意。

结束战争是因为体谅国民的愿望，所以天皇做出直接的裁决。天皇决心极诚实地履行《波茨坦宣言》，为了实现这一决心，特别成立了皇族内阁。成立皇族内阁是实行《波茨坦宣言》最有效的方法。在《波茨坦宣言》上，明确地写着以日本政府存在为前提条件，但没有提出用军事管制取代日本政府。这是日本投降与德国投降的不同之点。

盟军如果期望实现《波茨坦宣言》，同时以此为满足，那么通过日本政府实行占领的政策将是最贤明的政策。但与此相反，占领军实际上却准备部署军事管制，采取直接行政责任。因为这些要求是《波茨坦宣言》之外的内容，所以在日本方面不仅不期望，而且实际上也是解除了日本政府诚实地履行《波茨坦宣言》的责任。也许是在这里看到了混乱的头绪，对于这种现象日本当然不负责任。日本政府已经根据第一号命令采取了措施，全面着手解散军队或解除武装和关闭有关军需工厂，凡此一切均命令停止。特别是天皇本人极力强调实行《波茨坦宣言》的决心，而且，关于和平的意图，上溯到满洲事变之前，把事情分开一件一件地说明。

麦克阿瑟司令官很有兴趣和理解地听取了笔者所谈的情况，终于同意停止实行军事管制。在这种场合，他立即命令参谋长萨瑟兰采取必要的措施，萨瑟兰参谋长立即打电话给各部传达总司令的命令。

在此之际，让麦克阿瑟总司令吃惊的是，日本方面根据第一号命令断然实行关闭全国所有的军需工厂。如果将这些形成文字实行，必然会立即影响国民生活。总司令官从笔者口中听到种种情况，并声明：除了以主要制作军需品为目的的工厂之外，对国民生活所必需的工厂全部恢复生产。在这次会谈中，关于种种紧迫的事情能够得到麦克阿瑟总司令的理解。

控制东京湾的房总半岛馆山地区因为是首先占领的地区，所以九月三日凌晨该地守备队参谋长被叫到了“密苏里号”军舰，从美军处接受立即施行军事管制的通告。因为拖延了通告的立即实施，故稍稍使人看到了混乱并直到后

来军事管制被取消。笔者为此再次往返于横滨盟军总司令部，因为上述情形明显地不符合总司令部传达的停止实行军事管制的命令。

如此，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总司令根据在日本的宪法继续成立、政府继续存在下实行占领的政策，对日本政府发出必要的指令。对于麦克阿瑟元帅识大局的占领政策的第一步，在美国引起许多不满。之后，好象抓紧了占领政策的实施，但是在通过日本政府实行占领政策上一点也未变。日本政府和国民们都没有变更专心致志履行《波茨坦宣言》和彻底忠实投降书的誓约。这就是麦克阿瑟元帅的占领日本政策成功的基础。

人心的浮动 天皇关于终战的想法能够依靠皇族内阁的威令实行；同时国民一般都能理解或协助；议会、报社记者对于皇族内阁也表示了宽大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最初结束战争的工作没有阻碍。然而，一旦战争结束了，转瞬之间，政治家和实业家们都想恢复日本战前的状况；最后也有少数人轻信恢复旧的国际关系，连通商也立刻自由开放；期望战争象日中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样处理。很少有人理解什么是全体战争，也很少有人认识整个日本命运陷于敌手的冷酷的战败的事实。

不仅如此，追随战争中的军部、希望走在战争前列的人还翻手为云，现在似乎成了军部的敌人、占领军的讴歌者。从来高唱对外强硬论，咒骂软弱外交的许多人都非常急切地自称为“稳健派”，成了和平主义者；而且，为了维持自己的立场，似乎认为陷害他人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种极卑劣的状况。这种趋炎附势的倾向，有战败不得已的因素，但仅是使有识之士皱眉而已。无论是对军阀，还是对

于占领军，都没有追随而待之一样公正的态度的人们，反而逐渐隐藏起本来的面目。

占领军司令部的态度是经营以国民生活为主的事业，在和平时同样明显没有阻碍。许多的实业家虽然似乎已感觉到在今日也还可象战前从美国和其它国家实行引进，但关于这点，有时自己提出交涉，有时对当局，接连不断地提出与战败国身份不相应的过分要求。这种状况反映到政府，政府内部也有许多估计不足。如果日本方面提出交涉，占领军司令部无论如何都要受理。笔者在会见报社记者时谈到，复兴日本的唯一途径就是有必要反复地、自觉地反省战争的失败。

处理终战事务 使用“投降”一词，日本人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军人出身的官员尽管主张译文上使用“休战”二字，但在原义上还是投降；再者，战败的结果也实属投降。必须充分地承认这一事实，如不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日本就不能获得新生。

日本外务省为了管理和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的联系，提出增设一个小机构作为“终战联络事务局”的提案。这个提案在内阁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的意见是：因为和盟军总司令部联络事关重大，这个机关在内阁内有必要是首相直辖的大机构。笔者则认为，结束战争事务是日本战败后几乎支配了全部的国务工作，是全体内阁的工作，内阁各省本身也应类似。正因为这样，没有必要成立大机构。只是问题是：作为外务省的任务需要与占领军联络，通过外务省做事务性的工作，继续采取日本政府独立的立场。坚持这一方针对维持日本政府独立是必要的。然而，各省在它的范围之内，不应仅限于与盟军总司令部的直接接

触。联络事务的不统一必然带来重大的不利。

建立大规模的结束战争的机关，将民间有影响的人物插进这一机构，也是考虑了自身利害的实业界方面的意见。相应地建立听取民意的机关是必要的，无论是外务省还是内阁决定设立这一组织，笔者也没有异议。然而，日本的独立主权即使被限制，也须彻底维持这一原则。为此，处理联络事务，仍在外务省的管辖之下是必要的。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近卫副总理似乎是想利用政界、实业界的有力人物来操纵这个机构。

政府内部的气氛与冷酷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好不容易为忠实地实施《波茨坦宣言》方针而成立的内阁，为实现投降签字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使命是顺利的，但其后应完全恢复平时内阁的工作。然而这些观念与昨天战争的日本被置于敌军占领下的现实是相脱离的。

逮捕战犯　占领军对于昨天发动战争的日本没有宽恕的道理。麦克阿瑟元帅对日本实行恩威并施的方针，显示了政治家的风度。但是日本多数人对此是感恩的趋炎附势的态度。美国的态度是从美国利益及大政方针冷静地提出来的，当然对于利他的行动没有什么兴趣。

占领军派出自己的宪兵将东条英机在他的住宅逮捕，自杀未遂的东条就这样被送往横滨。第二天，岛田繁太郎大将也被逮捕。笔者立即往访横滨司令部，指责这违反了通过日本政府实行占领政策的原则，今后应由日本方面逮捕，然后将其引渡。在总司令部，要求将逮捕的名单交给外务省联络员。名单是指战争之初的议员和其他特殊右翼关系的人们，其中包括作为前首相的广田弘毅和绪方竹虎的名字在内大约有二十人。名单中包括现任议员和重臣

是不妥当的，所以笔者再次和司令部对话，要求将现任议员和重臣从名单中去掉。占领军很重视日本的右翼势力，把广田、绪方两人和其他有关系的玄洋社似乎作为右翼的代表本山一样看待。那时，还没有涉及到近卫和笔者的问题。

其他战犯均由日本政府引渡，最初被收容在旧横滨监狱，以后又转移到大森旧俘虏收容所。此后关于战犯问题人们非常敏感。在日本统治集团中有人在横滨以个人名义极力与总司令部联络，也有把人情暗中向麦克阿瑟司令部报告以表示敬意的。

仅次于战犯问题的是占领军将东京、横滨及附近烧后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和比较好的个人住宅毫不客气地开始征用。极其混杂的电车、火车不少也被占领军征用。迄今为止，在牢狱中作为刑事犯人的共产党员已全被释放，他们立即参加了反政府和反天皇制的共产宣传示威运动。这些都是在占领军的默许之下进行的。占领军奖励对天皇制批评的国民。众多的报纸和广播电台被共产党控制。日本呈现出恰似革命前夜的征兆。在占领军显示威力的同时，日本人争先恐后地讨好占领军。

进言与解职　除了占领军的高压政策与民众的趋炎附势之外，政府的指导思想依然如故。日本政府没有看到由于战败不仅造成了根本变化的状态，而且也没看到出现的新情况，仍想恢复日本旧时的政治状况。关于实行《波茨坦宣言》有根本不同的想法，想完全改造日本的占领军有怎样的要求也并不是没有大体上的构想。作为战争罪犯的一些内阁议员被要求引渡，即使要求一时被撤回，但占领军对内阁也是不信任的。作为内阁，应取消投降条件的实施。

本来皇族内阁就是要结束战争的内阁，同时应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的原则。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在新的形势之下，有必要清除旧时代的人物，由能和占领军配合协调的新人组成新的内阁。因此，笔者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之上，在总理府极力进言说，除了总理府之外，其它的机构一律让位给新人。

由于笔者的进言被拒绝，应总理大臣的要求提出辞职。笔者的职务终被解除。笔者辞职十天后，麦克阿瑟总司令部指令日本政府中与特高课有关系的内务大臣以下的全国警察部长立即免职，终于导制了内阁总辞职。